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名人之死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前 言

凡名人之死，大抵皆不平凡。

那么，何谓“名人”呢？模糊地定义是可以的。如果从各自的角度看，“名人”似乎很难一致。为此，本书所收集的“名人”，及此概念理解，是广义的，一般意义上的。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本书中所列举的名人，不仅有正面的、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受世人称颂的名人，也有反面的、遗臭万年的、做为警世教材的“名人”；不仅有文豪、作曲家、艺术家、思想家，也有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及战犯；不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

古今中外，介绍名人成长过程的文章屡见不鲜，但是涉及他们最后时刻的系统资料却比较少见。有感于此，我们广泛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加以编写，奉献给读者。

因本书编纂于5年前，收集资料也比较困难，书中一部分资料参考了同期出版的报刊、书籍等。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多人编写，未能列出有关作者的姓名及原作名称，在此深表歉意。同时，仅向有关作者及出版单位鸣谢，也向关心过本书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元月 于北京

名人之死

蔡平

“五四”旗手最后的悲惨岁月

——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之死

1938年8月3日午后，一艘朝辞重庆的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着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布蓝色长裤，面对咄咄逼人的光照，他用一柄蒲扇斜遮在头侧以勉强地抵挡着。他年近六旬且血压甚高，适才经过船上5个小时的摇晃和颠簸，早已疲惫不堪，此刻更觉酷热难耐。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挽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变得有些蹒跚了。

此番远足，陈独秀明知也难寻得他的净土和乐园，但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有力斗争，蒋介石只得将一大批政治犯予以释放。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把他第五次被捕的为期4年零10个月的铁窗生活，连同前来接应的国民党中统局官员丢置脑后。

他曾想到延安，他托人转告共产党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到党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对他的回归亦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一伙人的干扰下，陈的这一愿望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组织则数次邀请陈独秀回沪主事，重振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自是不屑一顾。

出狱的当天，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以优等房间的“殷勤”招待，而住进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

不久，傅家住宅遭日机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北大学生陈钟凡家。

一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南下，住武昌一蓝氏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弄得陈独秀极为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旋又来到“陪都”，寄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飘泊，使携着家室，抱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牛毛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得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又一次踏上了旅途。

谁知，却在邓家遭邓太太冷遇。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至的丧母，则是予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打击。

时至初冬，街旁光秃秃的树枝已在凛冽的寒风中打颤。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越俎代庖地为其太太作了一番“自谴”，陈独秀乃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延年医院时有一楼一底，楼上恰有多余的屋子，刚够陈独秀一大家人居住。屋子虽说不上宽敞，但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甚叫陈独秀意足心满。

陈独秀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羁旅在外，四海为家。分处天

南海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下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使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诲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之情笃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知多少生趣。

但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度过第一个严冬以后，当万物复苏的春天回返大地，楼前草坪四周的冬青树绽出新绿，几株桅子花散发出馥郁而醉人的芳馨时，3月22日，78岁高龄的谢氏溘然长逝，永远的阖上了她那双日渐失明的眼睛。

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娘！”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一身竹布长衫的胸襟湿了个透。

在隆重进行的丧仪中，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焚烧着一大迭钱纸。

有谁能知道陈独秀此刻极其复杂的心情？不用说，他的大姐是难以理解和不能体会的。

在一拨吹鼓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鼓乐声中，从焚烧后的钱纸堆里轻轻扬起又轻轻飘落的黑色灰屑，在陈独秀看来正是一群亲人的亡灵……

1927年7月，陈独秀的年仅29岁的长子陈延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系我党早期的优秀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28年6月，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这位也曾随兄长延年一同留法勤工俭学，于1922年入党，“五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年轻领导者，亦在上海惨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终年26岁。

同年，陈独秀的长女筱秀，本在安徽上学。一听说乔年弟又如延年之惨死，禁不住悲愤万分，便风尘仆仆急驰上海。没想到体质羸弱的筱秀，经过旅途劳顿之后，一时病恨交加，竟夭折于上海医院中。

1930年至1931年，陈独秀的前两位妻子，先后在安庆和南京病逝。陈独秀当时正把自己的身心沉浸在中国托派政治活动的狂热中。

……失掉多少亲人呵，可自己作为一名父亲，一名丈夫，在他们有生之年，究竟付出了多少情爱，尽到了多大责任呢？……陈独秀一面默默地撕开一张张纸钱，机械地往积满灰烬的火堆里投送，一面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母亲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也迁居到了学校。多了宽余的屋子，少了家事的牵扯，陈独秀的心平静了一些，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政治文章。自然，与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是不能少也不能断的，他渴望着了解战争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但烦人的干扰发生了。

7月的一天，为邓太太的一通指桑骂槐的刻薄话，潘兰珍在卧室内整整饮泣了半日。待陈独秀一再追问，方知系邓太太实难容忍“寄生虫”之故。显然，如此难堪的处境是无法呆下去了。经过陈独秀情辞恳切的坚决请求。仲纯只好答应了陈独秀的迁出。陈独秀不久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仅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但是，这儿毕竟太偏僻了，进出不便，往返一趟县城至少6个小时。若要雇请滑竿，既破费又不易找到脚力。况且，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腾给陈独秀夫妇作卧房和韦房的两间斗室是偏屋，上无天花板，下无三合土，泥

土地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室内用具不但少而且破，真是家徒四壁，室如悬磬。联想起杜工部昔日在锦城草堂栖息的为秋风所破的茅屋，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孤独，如蛇一般噬咬着陈独秀的心。

为排除这难熬的寂寞之苦，以振作自己的情绪，素无烟霞痼疾的陈独秀，便也努力去接近风光旖旎的大自然，并常与石墙院附近善良而朴实的村民们攀谈。

斗转星移，暑去寒来，陈独秀在江津居然呆到了第四个年头。但是，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升，已经殃及到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它犹如一片巨大的阴影，也不可避免地罩上了陈独秀头顶。1942年的一个冬晨，陈独秀似乎第一次有了切肤之痛的发现和感受；他和兰珍，已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中。

为了节约菜金，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事农事，向胼手胝足的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对老夫少妻的劳动也换来了可观的收获，家里的屋角边，常常有一堆土豆在那儿展览着。

油荤日益见少，能打一次牙祭也会叫夫妇俩高兴一番。有一次，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了几只鸭子前来探望。胃痛得在床上打滚儿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流落异地后身无长物，一时颇显潦倒，联想起自身今日的窘困，怎不感慨万端。陈独秀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他赠欧阳竟吾的诗稍作修改，随即用毛笔誊抄好转赠给忠厚、恳挚的友人蕴山。

捧着赠诗，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然而，此情此景，仍令朱蕴山黯然神伤，凝对着墙角边残剩的几颗于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地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陈独秀的字——笔者注）竟然没有东西吃！”

可是，鹤山坪一带不知内情的盗贼，暗想做过共产党的大官的陈独秀，定有不少油水，在1940年那个荒时暴月的一个仲夏之夜，打洞进屋，盗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为失去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章和手稿，陈独秀直气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在江津期间，陈独秀既谢绝了胡适之邀他去美国作传记的盛情，也两度婉拒了托洛茨基清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如今，贫穷、艰难到饿饭的地步，堂堂大丈夫居然不能养家糊口，这却是陈独秀始料未及的。过去说，“长安居大不易”，怎会相信信息影荒村野舍，也度日维艰呵！一种沉重的思绪如团团乱麻缠结，充塞在陈独秀的胸中，他的心情真有些难以平静。

为解救眼前的燃眉之急，陈独秀略一思忖，便从枕旁抓起灰鼠皮袍，顺手递送到兰珍手里，故作轻松的说：“明天，劳驾你去当铺，它还多少值几个钱”。

“那你？”兰珍紧紧攥着皮袍，一副实在是于心不忍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还有夹袄嘛，吃饭要紧，至于这袍子，我和它后会有期。”陈独秀说着便跨出了门。

他到房主人家借来几斤米。这是他第一次硬着头皮去告贷。

处于极端孤立的政治环境，时感寂寞和孤独的陈独秀，在贫病交缠的晚年生活中，终于卧病床褥，时为1942年5月13日夜。

他是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后中毒的。因曾经听好几位医生和朋友说，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这年春天他不时泡服，虽然

没有奏效，却也未受到什么损害，而这次服用的蚕豆花，采摘时遇雨，晒干后其中仍有发酵的，泡服时水已呈黑色，味道也不纯正，可惜治病心切，一时未加注意，因而中毒。所幸病情不甚严重。

13日上午，友人包惠僧从重庆陈家桥来访，这空谷足音，使陈独秀不亦乐乎，他一时高兴，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加之他本是多年的十二指肠及胃溃疡病患者，一经食物作梗，于是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拖延至17日午后7时，陈独秀从床上挣扎起来，欲上茅厕，刚一下床便晕倒在地，四肢僵厥。

陈独秀所患的高血压病本已严重，在南京蹲监狱时高血压就达到180水银柱，而迁石墙院后即增至210水银柱。所以，这次卧病后沉绵床第，真可说是数病并发，恰如同时遭受到几头魔怪的团团围困。

18日清晨，陈独秀觉得自己的身体已抗不过病魔的凶焰，只得请人把病情告知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之瑜于是立邀仲纯到石墙院诊治。自此一直到病逝的八九天内，曾有好几名医生先后为陈独秀诊治过，仲纯更是不离左右。

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陈独秀自知行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形同一轮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的黄昏，他把兰珍、松年等亲人唤到床前。

他清癯的一张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自动，发出的声音是那么虚弱。

忽然间，他吃力睁开眼睛，用似乎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先生，你想说什么？你说话呀！……”噙着一汪泪水的兰珍，强忍住揪心的悲痛，贴近丈夫的耳旁，柔声地说。

陈独秀忧郁的目光在兰珍的圆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掌，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圆实的小手。

想到自己就将不久于人世而留下兰珍孤零零一人；念及自己给兰珍的幸福太少太少，陈独秀一时愧悔交加，不禁把兰珍的小手攥得更紧更紧，他哽咽着喉头道出了一层肺腑！“兰珍，珍……为了我这不可雕之朽木，你献之以冰清玉洁一身……始自结婚之日，你为我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头……兰珍，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会为你馨香祷祝，祈望你将来幸、幸福……我死，死之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一阵激动噎住了他满腹的千言万语。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而下，泣不成声。是啊，她怎能忘记这十多年来，与丈夫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朝朝暮暮。在她善良的心地里，她始终期待着这一天：丈夫能开口认错，得到别人的谅解，高高兴兴重新开始他喜欢的工作和生活。可是，没能盼到这一天呵……

松年夫妇在一旁陪着流泪。

陈独秀喘息着，他想告诉儿子，他一生事业，多归失败，他痛憾自己未能认真总结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前途有望。

然而陈独秀又一时语塞。

蓦地，双目直对着房顶的陈独秀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慢慢滴了下来。

此后，便是不断的昏迷、吃语、呓语、昏迷……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倡科学与民主，在领导“五四”运动中执牛耳，尔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曾被青年毛泽东誉为“思想界明星”，晚年曾一度坠入托派泥潭的陈独秀，就在这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闭着、热爱着的人世，享年63岁。守在他病榻旁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筠、侄孙长文、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共八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莹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

共和国主席的归宿

——刘少奇同志之死

刘少奇(1898—1969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1919年在北京、保定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转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第二届(1959)和第三届(196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些职务直到逝世时为止。

1967年9月13日,就在刘少奇的儿女们被迫离家后的当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王光美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而,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刘少奇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刘少奇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刘少奇发火了,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刘少奇完全像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之后。迟群跑来,代表“中央”给刘少奇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他还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原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骂为“地道的保皇兵”,下了他们的枪,没收了证件。“看守”刘少奇的战士,也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要是有一点“留情”,就要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送回农村老家。刘少奇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孤苦伶仃地挣扎着。他要坚持活下去,活到胜利的一天……

当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女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刘少奇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1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刘少奇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刘少奇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驾:“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刘梅魁被通知可以送衣服和日用品,但不能相见,而且要“绝对保密。”一天,梅魁收到一张字条和长长的书单,是彭德

怀的亲笔字。她便和爱人老张按书单买了一大捆书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送去。实指望能见到彭德怀，结果只得到接待室的一纸收条。6月底，半导体退了回来，还有彭德怀一张回条：“梅魁，粮票还给你，半导体收音机也还给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说明了彭德怀的处境一定更坏了。

1967年7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军恶浪。大揪“军内一小撮”。康生、陈伯达和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人时，给彭德怀妄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韩爱晶便以“中央文革”的代表身份来审问彭德怀。彭德怀轻蔑地回答：“我都写过了。”

“你写的什么，丑表功！站起来，说！交代你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行！”

彭德怀勃然大怒：“你们无凭无据，硬要给我加上这些罪名，是何居心！”

“代表”上来一把抓住他领口，推倒在墙角上拳打脚踢。但彭德怀始终没有屈服。

戚本禹多次出面，给“批彭联络站”的头头们打气：“彭德怀这个庞然大物在小将们面前束手无策，”“他还很不老实哩，还是只有依靠广大群众制服他！”还“批示”：“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亲自布置对彭德怀进行批斗。他们把“百团大战”作为“重点突破的堡垒”，专门训练了一个出卖灵魂的“老干部”作为他们的“钢鞭”，利用无知的青年，对彭德怀开始了新的更严重的迫害。

7月上旬的一天，彭德怀被押进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大教一年多了；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刚从监狱里出来的17岁的源源，正艰难地行走在雁北的漫天风沙中；年龄更小的亭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苦苦争斗；小小处处遭歧视，正忍受着痛苦和凌辱。

刘少奇面对着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残酷迫害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残酷现实，10月5日大哭了两次。他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面对任何敌人、恐怖，面对任何流血、牺牲，面对任何委屈、误解，他从来没有大声痛哭过。今天，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失声痛哭！他哭得是那么伤心。他把对祖国、对民族、对党、对事业、对家庭、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一个真正的人的全部情感，从这决开的心堤里喷涌出来……

紧接着，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刘少奇捏在手里。到刘少奇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70岁的生日。刘少奇从来不让孩子们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特别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生日——

据说这天早上，刘少奇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刘少奇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

眼睛，喷射出怒火秋风凄厉，枯木凋零，孑然一身的刘少奇，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周总理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刘少奇，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

突然一天，刘少奇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小贾问有什么事，刘少奇只朝他微微一笑，小贾又问了一遍，刘少奇仍不说话，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天，刘少奇又同样叫来以前的卫士小于，也是微微一笑，闭上眼睛不说话，这是刘少奇向他们作最后告别了。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身边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这两个在身边工作过几年的青年卫士。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真诚地热爱刘少奇。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刘少奇送往开封。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刘少奇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刘少奇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刘少奇看，刘少奇又把脸扭了过去。刘少奇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7点多钟，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刘少奇关进一个特别

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刘少奇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刘少奇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刘少奇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

“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老李同志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同志到开封，直奔刘少奇的身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老李同志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孔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

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同志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刘少奇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 12 点，六七个人把刘少奇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 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刘少奇曾对孩子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人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他死时，只有那一尺长的白发属于自己，还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奇耻大辱。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最后一个直言者

——彭德怀元帅之死

彭德怀（1898—1974），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一直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爱戴。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

1965年底，彭德怀结束了在吴家花园6年的软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线建设，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再干一番事业。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又把他打入了灾难的深渊。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直接操纵下，1966年12月28日深夜，彭德怀被揪来北京，关押在西郊一个军营。

他们把彭德怀当作罪犯却又不说明“罪”，强令他写交待。彭德怀气愤地写道：“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自问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急的关头上我没有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待什么罪行……”

彭德怀就这样完全失去了自由。1967年2月，彭德怀的侄女梅魁被通知可以送衣服和日用品，但不能相见，而且要“绝对保密。”一天，梅魁收到一张字条和长长的书单，是彭德怀的亲笔字。她便和爱人老张按书单买了一大捆书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送去。实指望能见到彭德怀，结果只得到接待室的一纸收条。6月底，半导体退了回来，还有彭德怀一张回条：“梅魁，粮票还给你，半导体收音机也还给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说明了彭德怀的处境一定更坏了。

1967年7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军恶浪。大揪“军内一小撮”。康生、陈伯达和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人时，给彭德怀妄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韩爱晶便以“中央文革”的代表身份来审问彭德怀。彭德怀轻蔑地回答：“我都写过了。”

“你写的什么，丑表功！站起来，说！交代你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行！”

彭德怀勃然大怒：“你们无凭无据，硬要给我加上这些罪名，是何居心！”

“代表”上来一把抓住他领口，推倒在墙角上拳打脚踢。但彭德怀始终没有屈服。

戚本禹多次出面，给“批彭联络站”的头头们打气：“彭德怀这个庞然大物在小将们面前束手无策，”“他还很不老实哩，还是只有依靠广大群众制服他！”还“批示”：“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亲自布置对彭德怀进行批斗。他们把“百团大战”作为“重点突破的堡垒”，专门训练了一个出卖灵魂的“老干部”作为他们的“钢鞭”，利用无知的青年，对彭德怀开始了新的更严重的迫害。

7月上旬的一天，彭德怀被押进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大教室。墙上、地下和教室中央，挂满了标语口号，杀气腾腾。首先是那个所谓的“老干部”

上台，控诉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如何破坏了当时革命大好形势。又如何招致了日寇的疯狂屠杀，证明彭德怀是“假抗战，真助蒋，假功臣，真罪魁，”说得声泪俱下。

面对历史的亵读，彭德怀挺身而出，趁这条“钢鞭”擦泪抹鼻涕的工夫，突然反问道：“我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

“彭德怀，你太嚣张了！你敢翻庐山会议的案！”那个老家伙挣扎着反扑。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红卫兵小将们，庐山会议上是有一些同志就‘百团大战’的问题对我提出过批评，其中许多意见是好的。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这次战役对于振奋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有功的！”彭德怀看到有几个人向他冲过来，加快速度高声说道：“功在我们党，在万千八路军战士，烈士的鲜血决没有白流，没有白流！……”

彭德怀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昏过去了。一个家伙又抓起他的后衣领，一边辱骂一边将他的头往桌角上不停地猛碰。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不忍目睹这种惨无人道的兽性发作，反对这样残暴的折磨。彭德怀被摺在地上，满头淌着鲜血……

过了好一阵，他才发出一声呻吟。一个家伙拿出事先写好的纸，喊道：“叫他签字！叫他签字！”并抓住彭德怀的手要按手印。

彭德怀忙抽回手，喘息地说：“让我……看看。”题头上写着：“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他把纸放在面前的桌上，匀了一会气，用尽平生力气猛地站起来。肝部的剧痛使他踉跄了几下。他用手按住痛处，终于站定，对全场的人说：“我有罪”，猛地一拳击在桌子上，雷霆般地怒吼道：“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彭德怀再一次倒下，昏厥了。

彭德怀被打破头，打断两根肋骨，发高烧。但他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写下了对“百团大战”的回忆，严正地斥问：“那些诬蔑‘百团大战’的人，你们不仅替日本侵略中国作了辩护，也为蒋介石长期以来对我们党抗日丰功的诬蔑当了义务宣传员！你们呀，是些什么人呢？是无知，是无耻，还是其他用心？我很怀疑！”

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声讨大会上煽动，声嘶力竭地叫喊：“打倒彭德怀！”第三天，又在北航南操场举行号称10万人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的大会。

彭德怀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满脸是青的、红的伤痕，衣裤有几处被撕破了，脚上穿着一只棉鞋一只单鞋，被强行弯腰90度。他走路艰难，中间上厕所出来，抱着一根柱头喘息不止。突然，一个穿绿军装的人冲到眼前，大喝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抡起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他把彭德怀打倒在地。一只脚踩在他的胸口上，骄横地问：“你，还认识我吗？”

彭德怀在地上微微抬起头看，“认识，我认识你！”说着，一个翻滚坐在地上，像头受伤的猛狮怒吼道：“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差点没有枪毙你！”吓得那家伙扭头就逃。彭德怀喊着那家伙的名字，不停地说：“我当年没有毙了你，真可惜！真可惜！”是啊，可谁能料到历史竟会颠倒到这种程度。

批斗完了，他们把彭德怀和张闻天五花大绑，插上长长的箭标，押着在人群夹道中“示众”。刚走不远，两位老人瘫倒了。彭德怀喃喃地说：“让我，让我休息一下……我想喝口水，一口水……”那伙暴徒一边恶狠狠地骂，一边朝两位老人吐唾沫，然后抬起来扔进游斗的大卡车，向北京市中心开去。

自从北航批斗会以后，5年多彭德怀的亲属没有得到他的音信，也不知他究竟关在哪里。万般无奈，梅魁不得不写信麻烦周总理。不久，总理就派人来告诉她说：“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你伯伯的身体很好，东西还可以照常送。”可是，由于“中央专案组”从中作梗，他们仍然见不到彭德怀，送去的东西也没有回条。

1973年4月23日，“中央专案组”突然通知梅魁去医院看彭德怀。梅魁急忙跟着来人赶到医院。病房门口站着看守人员，房间的窗户用报纸从底下直糊到顶端，格外阴森恐怖。彭德怀正坐在当门的沙发上，那瘦弱的样子，使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的彭大将军。

“啊，梅魁，你来了！”彭德怀又惊又喜，“你怎么来的？”

梅魁指着旁边的专案人员说：“他让我来的。”

彭德怀不再说什么，紧紧握着侄女的手，慈祥地看着她，高兴地说：“这么多年了，……长胖了。”

梅魁含着热泪注视着彭德怀清瘦而刚毅的脸，握着他那颤抖而有力的手，迫不及待地问：“您那里不舒服？”彭德怀告诉她，4月6日到7日便血，8日更多，上厕所都起不来，就被送到了医院。梅魁感到问题严重，急切地问了好多病状。彭德怀却满不在乎，显然是想安慰侄女，说，“是痔疮犯了，没有什么要紧。好啦，好啦，我们头一次见面，说点别的吧。”

“这些年来，您生活得怎样？挨过打吗？”侄女把多年来的忧虑凝成简单的问号。

彭德怀沉默了好一会才说：“生活，我是不怕苦的，打是挨过的……”他怕侄女难受，又转过话题，“梅魁，这些年来，你一直给我送东西，花了多少钱，我实在无法记清。”

“我给您送东西，为什么不写个回条？”梅魁这一问，彭德怀就火了，指着那个专案人员喊道：“写回条？什么都没有，连支铅笔都不给！”又指着窗户说：“看这房子，封得这样严实，连窗外景色也不让看，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我不愿意住，非要我住。”

还没说到几句话，专案人员就要梅魁走。彭德怀站起来，握着她的手说：“走吧，以后不要再来我啦，免得影响你的工作。”

梅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她和爱人都是医生，一起查了很多医书，觉得伯伯可能患的是直肠癌。要是早期手术，做得比较彻底，还是能多活几年的。

彭德怀的确患的是直肠腺癌。25日上午，专案组的人又要梅魁去医院，说彭德怀的手术方案周总理批准了，可彭德怀不肯做，要侄女去动员。

正是大夫查房的时候，彭德怀坐在床上，紧闭着双唇，凝视着墙壁。梅魁叫了一声伯伯，他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彭德怀才声音嘶哑地对侄女说：“梅魁，你看我得了这样一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做手术。我要求出院，不做手术。”

梅魁问伯伯：“您是害怕手术吗？”

“不！”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没有怕过死。我只怕，我的话

再也找不到地方说了。我知道，上了手术台，我可能就下不来了。”彭德怀对在场的那个专案人员说：“我要求你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你们又不审查，我就这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死呀！’”彭德怀突然跳下床，激动地走来走去，仰天长叹，“我们这个党呀，我们的国家，叫一伙国民党特务搞烂了。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这个样的！”彭德怀停下来大声说，“我要见毛主席，我有话要向毛主席说。不把我的话说出来，我是不做什么手术的。今天让我见毛主席，明天我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要尽到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喘息着，反复地说，“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

专案人员催梅魁上前劝说彭德怀，可她说什么呢？她完全理解伯伯那颗心。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等彭德怀稍许平静一点，她说：“审查快不了，见主席也不可能，还是先做手术，养好病，以后会有机会说的。”

冲动的彭德怀以严峻的目光在沉思，在判断……

彭德怀手术后有一阵恢复比较好，心情也愉快多了，他高兴地对梅魁说：“看来手术效果不错，这一关又算闯过来了。也好，搞清了我的问题再去见马克思，省得到了他那里再交代。”

一天，梅魁穿着一身夏天的衣裳走进病房，彭德怀欣喜起来：“呵，夏天了，外头都暖和了，树都一片绿了吧？可我，这里还是冬天！”彭德怀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他虽然没有诗人的语言，却有诗人的情感，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充满乐观精神，总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在吴家花园的时候，彭德怀经常对侄女说：“我要给党写个报告，回我们湖南老家去，回太行山去也行，去种地，交给我一个公社，或者一个生产队。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有3年，搞不好我自己把右倾的帽子戴起来。你说你那一套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错，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试试嘛，让实践来评判嘛。”刚去三线工作时，他劲头也很大。他感慨地说：“可惜我老了，时间不等人啊！”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彭德怀一切权利，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彭德怀再也没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他只希望快点审查完，早有个结论。病情的好转，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可是，彭德怀哪里知道，早在1970年11月8日，专案组就秉承康生一伙的旨意，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报告，黄永胜批了“同意”。他们根本不让彭德怀知道，没找彭德怀核对这一条材料，也从未把这个决定告诉彭德怀，而是暗中加紧迫害。

1974年初秋，彭德怀的病突然恶化。左半身瘫痪，小便失禁。他流着泪对侄女说：“梅魁，这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啊！”那双凹陷的眼睛在寻求答案。天哪，谁能给他一个真正的答案呢？

彭德怀又气又急，加上病的疼痛，他经常在床上拼命挣扎。这样一个坚强的人，也不得不对侄女说：“梅魁，我实在痛得厉害，是不是叫他们打一针止痛针。”梅魁恳求着，可谁给彭德怀打这一针呢？梅魁气得直要哭，她看着伯伯疼痛难忍的样子，比刀子扎心还难受。

疼得厉害了，彭德怀就大骂“国民党特务”，用牙咬着被单，右手乱撕乱扯。专案组的人来阻止，彭德怀骂得更凶。护士带着委屈来劝说：“您不要这样，不要怪我们，我们都是普通群众。”彭德怀怒气未息：“我感谢你们！我骂的是国民党特务，撕的是国民党特务的被子。一个人快要死了，案

子还没有搞清楚，你说我怎么不着急？”梅魁知道他骂的“国民党特务”，就是指的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彭德怀早就恨透了他们。他们何止迫害彭德怀一个人，他们给国家、民族带来无法估量的灾祸，国家的元气、民族的精华被他们摧残殆尽。中华民族的子孙，将永远咒骂这伙民族罪人！

1974年10月，彭德怀时常昏厥，靠输液维持生命，说话不清。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要把自己满肚子话倾吐出来。他多么想见一见共同战斗过几十年的老战友啊，时常提起他们的名字。彭德怀说：“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哪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因为临死也还见不到老战友们一面，他常常惋惜长叹，暗自落泪。

彭德怀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梅魁要求陪住，专案组表面同意，实际上又不让，只能在探视时间去探望。梅魁一下班就急如星火地奔向医院，焦虑地守在垂危的老人身旁。针灸大夫试看彭德怀清醒不清醒，给他扎针，问：“您看这是谁来了？”

彭德怀缓缓睁开眼睛，用那细哑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大侄女梅魁，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同志。”彭德怀自己没儿没女，对梅魁和弟弟、妹妹们一向特别亲，特别爱，可从来还没有这样叫过她。她一下伏倒在伯伯身边，紧紧握着那干瘦的手，两眼含满了热泪……

“梅魁呀，不要这样！”彭德怀一句一顿，吃力地说，“对于这条命，我曾经有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我能活到今天，算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是做的不够好。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一阵欣慰的笑容掠过之后，他又沉痛起来，念念不忘地说，“我们这个党呀，坏事就坏在那伙国民党特务，在我们党里兴风作浪！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彭德怀的舌头发硬，说话特别困难，仍然嘱咐侄女说：“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屋子里。我住一天也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70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加瓦。不要去追名求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彭德怀一字一顿地艰难地说着，就像一位巨匠在侄女心头镌刻着他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梅魁，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恩格斯的故事吗？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这是彭德怀最后的遗嘱，从这以后，他完全不能讲话了。11月4日，做了切开气管的手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一连好些天，他都昏迷不醒。27日梅魁在伯伯身旁守候了一整天，只能默默地、呆滞地看着他受着时间的煎熬，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德怀异常清醒。护士告诉他没有人来看望，他便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流到枕头上，留在人间。突然，彭德怀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挣扎，张着嘴“啊，啊”想叫喊。他不愿就这样离开人间，他要最后看一眼祖国的蓝天、白云。然而，专案组的人根本不理这临终前的最后要求。彭德怀挣扎不起来，心枯力竭……。这是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午4点左右，专案组才电话通知梅魁，要她到医院料理彭德怀后事。

他们仅给她 20 分钟。她独自站在伯伯的遗体前，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为祖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元戎，替人民鼓与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将军，却在这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如此悲惨和凄凉地离开人间……彭德怀孑然一身地去了，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座丰碑！

他们将彭德怀遗体火化，不让亲人知道一切情况。王洪文批准专案组将彭德怀的骨灰改名“王川”，秘密运往四川成都，也一直不让亲属知道。几个月以后，专案组通知梅魁去领伯伯遗物，却把他看过的、作过批注的 62 本书，统统烧毁了，连彭德怀的字迹都不准留在人间！

1978 年 12 月 24 日，党中央给彭德怀彻底平反昭雪，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又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押上了特别法庭的被告席，由人民进行正义的审判，历史自有公论！这神圣的审判就是给彭德怀同志最好的祭奠。

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

——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之死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生于1909年8月11日，卒于1969年10月10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发表《朱元璋传》、《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及历史剧《海瑞罢官》等作品。建国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文革”中，全家遭受迫害，其本人及妻子、女儿均被害致死。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面开会回来，他和往常一样，一回家就要到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这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的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吴晗刚坐下，夫人袁震就从北边正房走过来，她脸色煞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呆了一会儿，连话也没说一句就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是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注意到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道：“《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十分愤慨，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它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对于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他实在想不通。

同年12月27日，吴晗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就文章中涉及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在某些问题上还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从此，吴晗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逐步失去了自由，被揪到各地批斗，经受着一场更加残酷的迫害。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被揪斗。红卫兵勒令他和他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马路，并随时把他们揪去侮辱一番。在酷暑烈日下，他们把吴晗拖到马路上，让他在粗沙粒上跪下，吴晗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绝不向他们求一声饶，从沙粒上爬起来后，他的膝盖冒出了血珠。

1968年8月，吴晗被捕入狱。罪名是“叛徒”，其实他根本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成为叛徒呢？

吴晗被捕后不久，袁震就被送进“劳改队”。他们的儿子吴彰回忆道：“妈妈身体弱不禁风，患有几种严重疾病，过去热天还穿棉袍子，现在却住在旧浴池里。她在那儿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妈妈的双脚瘫痪了。14岁的姐姐每天骑车往返30多里路去护理妈妈，干分配给妈妈的活，为了治妈妈的瘫痪，姐姐买来书和针，照着书在自己腿上练针灸，然后再去给妈妈扎。有时拔不出针来，妈妈就鼓励她：‘彦’别急，别急，你看妈都不怕。’后来，妈妈的腿居然奇迹般地让姐姐治好了，妈妈说，这不是女儿的医术高，而是女儿的心诚。”

1969年3月，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两个孩子高兴极了，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听说了，还特地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的最后一次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突然病发，大声喘气，孩子们立即把妈妈送进医院，但因为是吴晗家属，医院不认真抢救。第二天清晨，当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小

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吃口稀饭。”吴彰立即向医生哀告，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袁震难过得直掉泪，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吴彰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第二天，姐姐带我去太平间给妈妈更衣，看到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林彪、江青一伙把袁震折磨死之后，又把吴晗折磨死了。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接小彦和吴彰去看爸爸，姐弟两人一听非常高兴，以为允许他们探监了呢，没想到来人对他们说：“你爸爸早晨死了。”他们问来人：“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两人放声大哭，连在场的医生也都掉了眼泪，可是，正在这时却走出一个人，对他们大声训斥道：“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的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你们负责！”就这样，连死去的父亲也不让看一眼，只让他们拿回了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

由于受到过度刺激，小彦一度精神失常。1975年，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彦十分愤慨，曾多次找当时的有关当权者，责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你们应该拿出结论来。”四人帮一伙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走的那天，她刚动过阑尾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的证明。吴彰在回忆当时情景时写道：“姐姐呼喊着邓伯伯（邓小平）的名字被押入牢房，他们又给她带上脚镣，阑尾炎痛就给她止痛药吃，哭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1976年9月23日，当时只有22岁的小彦含冤死去了。

是谁谋杀了托洛茨基

——苏共元老托洛茨基之死

托洛茨基，苏联托洛茨基集团首领。1903年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并任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列宁逝世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逐出境。193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1938年召集各国托派组成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1940年死于墨西哥。

1940年8月21日，斯大林在中午12点左右来到办公室。同波斯克列贝舍夫打过招呼后走进工作室，坐在写字台前，习惯地把桌上的公文移到眼前，他的助手没有像往常那样向他报告当天的大事或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而是带着几分不太自然的微笑一声不吭地递上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托洛斯基受致命伤，可能已经毙命，详情后告。”

这是期待已久而又多少有些突然的消息。俄国革命的两位“卓越领袖”的决斗，持续了近20年后终于结束了。

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个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8月24日，《真理报》再次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为的是给他圈上最后一个句号。题为《国际间谍之死》的编辑部文章说：“一个人走进了坟墓，全世界的劳动者怀着鄙视的心情诅咒他的名字，他多年来一直反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们已经承认，他们和他们的主子托洛茨基早在1921年就已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成为国际间谍。他们以托洛茨基为首，担心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服务……同他一起完蛋的还有那些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从托洛茨基那里学会了从角落里进行暗杀、背叛和残暴地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苏维埃国家。托洛茨基是残暴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的组织者，并成为他自己的阴谋、叛卖、变节和暴行的牺牲品……”

斯大林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不时地微微皱起眉头，心思：把一切都归结到“间谍活动”，难道这些年来他与之斗争的只不过是个间谍？那后来为什么还要毫无顾忌地了解是谁杀了他？好像是在莫斯科杀害的，而我们都懂得很清楚……怎么能用几句并不高明的词句就把一切都抹杀掉呢……斯大林放下手中的报纸，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同托洛茨基最初的几次会面。

为了同托洛茨基斗争，斯大林付出了大多的精力，以致现在他感到某种空虚和若有所失。这种感受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心满意足。其实，正是由于同托洛茨基及其它倾向进行斗争，才使斯大林成为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人们常说，斯大林没有参与任何反对派，好像没有看见总书记事实上已经建立了反对列宁本人的反对派，把列宁的思想和结论置于脑后。从报告的手段可以看出，为了揭发派别分子的活动，斯大林做了多么细致的准备。他特意把反对派的全部“罪恶”加以系统化，提供给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他以《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倾向》为题所作的报告（包括结束语），共持续了近五个小时！斯大林向反对派发起的战斗，着重于“是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一问题。总书记搜集了一大堆反对派过去的错误、摇摆不定和无数的“行动纲领”，把反对派置于毫无出路的境地，只能进行无声的自卫。总书记不是在批评，而是进行冷酷无

情的“打击”。

托洛茨基作为“革命英雄”的晕光到 1925 年之后便完全失去光泽而悄然熄灭。在党和无产阶级的眼里，他更多地是个夸夸其谈的人，是政容和没有成为现实的独裁者。

托洛茨基在党内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辩论，然而事与愿违，他反而使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的威望越来越高。这个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可是看来谁都不会像托洛茨基那样去加强斯大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总书记的托洛茨基早期的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是献给孟什维克分子阿克雪里洛德的为由，将他置于死地。斯大林在一片嘈杂声中得意洋洋地宣读托洛茨基的献词：“致亲爱的导师帕维尔·鲍利索维奇·阿克雪里洛德”，斯大林在结束演讲时说：“瞧吧，去向亲爱的导师帕维尔·鲍利索维奇·阿克雪里洛德的康庄大道！是康庄大道啊！”

托洛茨基已感觉到，斯大林无情的长篇讲话对他来说，是政治生命的结束。正如后来他在墨西哥所写的，在听了斯大林的演说后，他感到好像在肉体上已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洛茨基变成了没有军队的“元帅”。党对他怀有敌意。他对于倾轧感到厌倦。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当内战结束时，他命运的顶峰也将结束，一切都完了。

托洛茨基支持者们试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组织示威游行，然而这却导致他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支持者在队伍中打出了只能被理解为持反对立场的口号：“打倒富农、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译注）和官僚！”“打倒机会主义！”

“执行列宁的遗嘱！”“维护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他们企图举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肖像，但是，斯大林早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民警驱散了这一伙托派分子。专程去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和留在莫斯科乘车巡视首都市中心街道和广场的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跟着他们走的只是少数几个人。这场游戏已经输了。托洛茨基不由得回忆起，10年前他在一片欢呼声中对走出苏维埃大厅的马尔托夫毫不客气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您的位置在历史的垃圾坑里！”现在，当他在革命广场上试图对走向红场的游行队伍发表讲话时，却听到了对自己的同样话。还有人朝托洛茨基扔石头，击碎了汽车的玻璃窗。他终于完全明白，斯大林正在把他推进历史的污水沟中。

斯大林没有忘记，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到阿拉木图去时，这位失宠领袖的支持者们还曾进行过抗议活动。托洛茨基拒绝自己走上汽车，他是被人抬上汽车并抬上火车的。斯大林的儿子一直在喊着：“同志们，快来看，他们抬着托洛茨基。”

当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一直注视着放逐托洛茨基的过程，经常有人给他打电话。这位总书记一声不响地听着，最后只简单地说：“不要姑息养奸！不能有任何让步！除掉托洛茨基的助手！要迅速，不要扯皮！”说完之后，他激动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紧张地思考着什么问题。几年之后，斯大林在别墅里同他的战友们讨论完刚刚收到的关于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发言的情报后，他坐在桌子后面说：“那时我们犯了两个错误。应当一直把他留在阿拉木图，无论如何都不应放他出国……还有，怎么会允许他带去那么多文件呢！”

斯大林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在室内走来走去，拿起一叠托洛茨基出版的

杂志《在野派公报》，从中找到了1938年的第65期，翻到好像夹着书签的一页后，便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托洛茨基撰写的社论。已经没有人愿意阅读这些对他进行辱骂和抨击的文章了，而斯大林却不是这样的人。他要阅读，而并从中加深着仇恨。

斯大林最感不快的是，在革命和内战年代，这个后来被他驱逐出去的人在同列宁的关系上远比他这位未来的总书记要亲近得多。甚至在已公布的军事信件中，列宁给托洛茨基发了78封电报或信件，而给斯大林的只有62封。列宁不止一次地保护过托洛茨基，称赞他的组织能力和宣传才能。在他们彼此关系尚能容忍的时候，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冒险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是暗暗同意的。

总书记很难接受的是，在革命和内战的年代，在列宁之后最有影响的领袖竟然是托洛茨基。当时排名单的顺序还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的原则，而托洛茨基总是（或几乎总是）在列宁之后第二个出现。然而托洛茨基的声望却并不表现在有众多的支持者。当时形成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斯大林的个人声望并不高，却代表着党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作为活动家显然享有更高的声望，与此同时却又很早就带上了“派别分子”的标记，这使他不能增加志同道合者。不论谁都无法知道，如果列宁不死，托洛茨基以后会怎样。当斯大林在加强其个人独裁的时候，托洛茨基却在世界上漂泊，马尔马拉海上的各个王子岛、法国、挪威和最后到墨西哥，是这位被驱逐的反对派领袖所走的道路。起初，托洛茨基还希望不久之后将能返回苏联，他认为斯大林的日子长不了。他似乎觉得，斯大林的智力上的缺点、工作上的关系、不文明、粗暴和狡猾是如此地明显，以致它们本身就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反对总书记。托洛茨基这次又错了。在马尔马拉海被人遗忘的海岛上，他徘徊在棕色漂砾之间，沉思着人的稀奇古怪的命运，这座海岛曾是监禁拜占庭的知名人物的地方，而现在来到这里的却是“俄国革命的建筑师……”。

托洛茨基在这些王子岛上住了4年之久，他在期待着，并考虑下一步的斗争道路。他将被“召回”莫斯科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他愈来愈确信，唯一的办法是留下来继续“漂泊”，这是同斯大林继续进行斗争。他还没有明白，他的第三次流亡已经是最后一次了，他已经永远不能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了。

1936年在挪威的时候，托洛茨基写出了《忠诚革命》一书。书中说，他知道在斯大林周围有一些人并不赞成他的政策。他预料，一旦德国发动对苏战争，斯大林就摆脱不了失败。

总书记一口气读完专为他翻译的那位未能上台独裁者的最后一本书。斯大林翻看这本书，怒火在胸中燃烧。未经深思熟虑，斯大林很少采取措施。他酝酿良久的两点决定终于考虑成熟了：第一，需要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托洛茨基，因为只要这位在遥远的地方的流放者还活着，领袖的专制政体就不可能完善；第二，他更加确信，必须坚决彻底地消除所有可能成为反对他独揽大权的潜在敌人。

斯大林记得贝利亚曾向他报告过托派组织在墨西哥当局的帮助下，在科伊乌康地方为托洛茨基购置了一幢大楼，并把它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堡垒，四周建起了带岗楼的水泥高墙。楼房的大门都包着铁皮，设有信号系统，有机枪保卫着。托洛茨基平时至少有10名警察和专业保镖负责保卫。他备有防弹背心，在外出时穿用。托洛茨基在这座避难住处里发表反苏声明，接受记者采访，预言苏联和斯大林将要垮台和第四国际必将胜利。在最后的两年里，

托洛茨基完全投入到反对自己过去的祖国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去了。1940年4月，他写出了致苏联人民的信《他们被欺骗了》，实际上是在战争爆发前夕号召推翻斯大林。

托洛茨基两次遭人暗杀，其中第二次结束了他的生命。第一次是在5月，清晨一群身着警察服装的人解除了门卫的武装后便向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丽亚·谢多娃及孙子的住处发动进攻。他们夫妇二人躲到了床底下。数十发子弹把他们刚才还呆过的地方打穿了许多窟窿。多数射击都是对着已经封了门的和上了锁的房间的，因而没有取得成功。无论是托洛茨基夫妇还是他们的孙子都得以幸免。因而此后每过一天，他们都认为是命运的恩赐。他们知道，有人正在认真地猎捕他们。托洛茨基如同牢房里的囚犯一样度日，不知什么时候对他执行死刑。前来进行调查的警察问道：

“托洛茨基先生，在这次暗杀中您有什么具体的怀疑对象吗？”

“当然”——托洛茨基俯身对着警察的耳朵笑谑地说：“这次攻击的设计师就是约瑟夫·斯大林……”

其实凶手早就在他身边了。此人早在1939年就已成为托洛茨基住处的常客，他是美国女托派分子、曾任托洛茨基女秘书的西尔维娅·阿格洛芙的男友扎克·莫尔纳尔。莫尔纳尔从事电影制片业，他在实业界还自称叫杰克逊。这位杰克逊最初认识了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阿尔福来德和马加利塔·罗斯梅拉米，这使他终于能够接近受到精心保护的托洛茨基。5月，杰克逊终于见到了托洛茨基本人。此后他经常不定期地到科伊乌康来，通过私下谈话来表明他“同情”托洛茨基的立场，为改善第四国际的财政状况提出各种各样的计划，不管怎样，反正如同美国报刊后来报道的那样，杰克逊取得了托洛茨基的信任。他们多次谈论“强有力的人物”、“强权人物”。托洛茨基的妻子后来回忆时说，托洛茨基对他甚至产生了怀疑：这位生意人会不会是个法西斯分子？

大约在8月中旬，杰克逊请求托洛茨基为他修改一篇无关紧要的文章。托洛茨基给他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8月20日星期二的傍晚，杰克逊带着修改好的文章来到托洛茨基的书房，请他看一遍。托洛茨基正在看《斯大林》那本书的手稿。杰克逊后来说，当他进屋时，“把风雨衣放在椅子上，从下面悄悄取出带铁尖的登山杖，闭上眼睛朝着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的托洛茨基的头部劈去。”杰克逊在法庭上说，受害者发出“痛苦的令人可怕的刺耳惨叫，这叫声我终生难忘”。托洛茨基挣扎了一天一夜后才断气。

他的白色坟墓就建在科伊乌康他避难时居住的院中，距离这位“卓越领袖”的出生地——乌克兰波勃林涅茨城郊雅诺夫卡，有数千公里之遥。

是的，斯大林希望托洛茨基早死。只要托洛茨基还活着，他就是那个遥远年代的代表。那时，“领袖们”冷漠地握手，一起听列宁讲话，他们争论，相互为敌。

托洛茨基比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更了解斯大林，虽然他们一直在他身边。但托洛茨基能够了解斯大林的内心，他的动机和意图。他们两人都想争当第一把手，可是非常不幸的是，老的列宁近卫军在失去了列宁之后，让其中的一个人离开了党的掌舵的位骨，却把另一个人留在了舰桥上。

托洛茨基死后，公布了他的遗嘱，其中的主要部分写于1940年2月27日。他隐居在科伊乌康时曾想把遗嘱写得符合列宁最后几封信的精神，但却

未能做到。

托洛茨基也曾想过自杀。他在遗嘱中最后写道：“我保留权利决定自己死去的时间。”但是别人却给他确定了死亡的时间。

托洛茨基的两个家的成员都尝尽了痛苦。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娅丽山大·索科洛夫斯卡娅和两个女儿，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崇拜者。早在1902年他的小女儿刚出世4个月，托洛茨基就离开了第一个家。初期他曾从国外给娅丽山大·索科洛夫斯卡娅写信，可是后来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新家庭的建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使索科洛夫斯卡娅带着两个女儿退出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了。托洛茨基一直十分关心的是，历史上将如何看待他，他赶在历史学家的前面，在其回忆的第一卷中写道：“生活使我们分开，却保留着牢固的思想联系和友谊。”两个女儿在革命后沾了父亲的光，几年之后，又陷入了流放之中。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家庭的命运后来很悲惨。由于是“敌人家族”，所有的人都得到同样可怕的报答。

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娜塔丽娅·谢多娃起初也是“革命者”。有一个时期，他们化名维肯切夫住在彼得堡。谢多娃后来一直同丈夫生活在一起，既与他分享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高升，也共尝在异国他乡无尽头的漂泊之苦。第二次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列夫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后来成为托派，在父亲被驱逐后，他神秘地死于巴黎。小儿子谢尔盖在托洛茨基还住在克里姆林官时就离开了家，宣称他“厌恶政治”，埋头于科学研究。他拒绝与其父亲一起被放逐，但是他天生就是“托洛茨基之子”，放逐是无法避免的。1937年1月，《真理报》说：“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此时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谢多夫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娜塔丽娅·谢多娃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十三年，后来与他丈夫的“形影不离的敌人”斯大林死于同一年。只有几个托洛茨基的远支亲属幸免于难，仍住在莫斯科。当然，他们都改姓别的姓了。

托洛茨基已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后，不久就下达了处决集中营里的托派积极分子的命令。在战争爆发的前夕，还发生了一起不大明显的风波，最后剩下的一批被列入托派积极分子名单的犯人也波消灭了。佩乔雷、沃尔库塔和科雷马何等地都变成了对已被击毙的第四国际领袖进行“追加”报复的无声见证人。斯大林不想了解，置人于死地并不是思想斗争的有效武器。

托洛茨基自称是“没有护照和签证的地球公民”。他很想扮演“第二天才的角色”，“列宁是人们用加了铅封的货车经过德国接来参加革命的，而我，除了自己的意志外，是人们用《伊里奇》号轮船把我接到君士坦丁堡的。因此，我不认为整个放逐就是历史的最后结论。”这几句话也是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托洛茨基将永远是一名演员，他曾同意只扮演最重要角色。但是，他没有料到历史却要在自己的殿堂里自行当家作主，里面按照荷马的意愿，有时也出现恶魔——变成妖精的神。

在办公室里，斯大林停住脚步，点着了烟斗，坐到写字台后面的坐位上。把刊登有关“国际间谍已死”的消息的报纸推到一旁，把标着“国防人民委员部文件”字样的一叠公文拿到面前。

战争已经临近了……

布哈林案件的前前后后

——苏共领袖布哈林之死

布哈林（1888—1938）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小学教员家庭。18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了布尔什维克。1910年被流放，后逃往欧洲，以后结识列宁，同列宁一起进行革命斗争，协助列宁出版《真理报》。1917年2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后一直担任重要职务。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真理报》总编辑并负责指导苏俄其它报刊的工作。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认为，从1936年8月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到布哈林被捕之前的几个月里，斯大林个性中专横的一面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对布哈林一家来说，这是一段极其艰难和极其揪心的日子，因为从肉体上消灭布哈林的种种迹象已愈来愈明显了。

8月初，布哈林获准去帕米尔度假，他很早就想去高山上打猎，这次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临行前，布哈林告诉妻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的朋友索科利尼科夫被捕了。布哈林认为这可能与此人在伦敦担任大使期间，挥霍国家钱财有关。告别了妻子和刚刚降生不久的儿子，布哈林飞往帕米尔。

一到帕米尔，布哈林就钻进了丛山峻岭，这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邮局，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话。

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布哈林的任何音讯。这时，报上公布了令人可怕的消息。8月19日，苏联各家报纸公布了初审所谓的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情况，还同时公布了出庭者的证词。许多证词对布哈林不利。随后苏联检察机关又公布了对初审中所涉及到的人进行侦讯的结果，在所列举的被侦讯者的名单中，有布哈林的名字。

而布哈林对此却丝毫不知。还是在他从塔什干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他才偶然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他担心，他乘坐的飞机一抵达莫斯科，他就会被逮捕。然而，在机场上，除了他的妻子以外，什么人也没有。他一下飞机，就马上让司机开车回克里姆林宫。在家里，他要通了斯大林的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他说：“约瑟夫·维萨里诺维奇（斯大林）去索奇了。”“这个时候斯大林会在索奇？”布哈林不相信。一连几天，他都在家里等斯大林的电话。然而，只有《消息报》编委成员K·拉杰克打过一个电话来，问布哈林为什么没有去编辑部上班（当时布哈林任《消息报》的主编）。

布哈林回答说：“只要报上不进行正式辟谣，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消息报》编辑部的大门。”

9月初，布哈林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去中央委员会与卡冈诺维奇进行一次谈话，“跟卡冈诺维奇能谈什么呢？”布哈林疑虑重重地去了。

从中央委员会回来以后，布哈林给妻子谈起了与卡冈诺维奇谈话的经过：他们安排布哈林与索科利尼科夫当面对质。索科利尼科夫是布哈林青年时代的朋友。他这时竟提供不利于布哈林的假证。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使布哈林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9月10日，报上有消息说，苏联检察机关已经结束了对布哈林和李科夫的侦讯。这看来是斯大林的一个小小的战术。布哈林天性是轻信的，斯大林正是利用了布哈林这一点，假装喜欢他，暗中从背后向布哈林开枪。

11月7日，布哈林收到了《消息报》编辑部一份请柬，他决定偕妻子去

红场，庆祝“十月革命”19周年。安娜·米哈伊诺夫娜回忆说：他们来到红场后，站在观礼台靠近列宁墓的地方，后来斯大林发现了布哈林。接着安娜看到一个卫兵向他们站的地方走了过来，当时她很紧张，以为此人是来逮捕布哈林的。可卫兵来到布哈林面前，行过礼后，却说：“斯大林同志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列宁墓上面去，斯大林同志说布哈林的位子应当在那儿。”布哈林登上了列宁墓。他本想与斯大林进行一次面谈，却未能如愿。因为斯大林站得离他们很远，而且第一个离开了观礼台。此后，平静地过了约一个月，连布哈林都相信，不久就会请他回编辑部上班了。

然而，12月初，有人打来电话，通知布哈林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会，但没有向他透露会议议程。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诺夫带头向布哈林发难，公然指责他参与并组织了刺杀基洛夫的阴谋。“住嘴！”听到这莫名其妙的荒谬指责，布哈林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在会议厅里大声喊道。全体与会者都调转头来望着他，一言不发。斯大林这时说话了：“不要急于作出结论，应该继续进行调查。”布哈林来到斯大林的身旁，对他说：“应该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性的言词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在历史上的功绩。然后就避开了这个话题。他不想把谈话进行下去。

此后艰难的三个月，布哈林基本上是在他一间狭小的居室里度过的。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他说明了所谓侦查的用意何在，是谁在指使进行这种侦查。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好几封信，声明自己是无辜的，否定了对他的无端诽谤。安娜·米哈伊诺夫娜终日与布哈林相伴。有一天，她看见布哈林手里拿着一支枪，她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布哈林却很平静地说：“不要紧张，我不会自杀的。”被软禁在自己家里的布哈林，面容已渐渐消瘦下去，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淡黄色的胡须也开始发白了。1937年2月，有人来家里通知布哈林去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并通知说在这次全会上将讨论布哈林和季可夫的问题。

布哈林决定不去参加这次全会，并宣布绝食到死。在他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说为了抗议对我的无端诽谤，我决定绝食……2月16日，在取得亲人的谅解后，布哈林开始绝食。

在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过后，推迟了几天的中央全会正式举行。布哈林宣布绝食成了新的反党罪行，被列入全会议程。

布哈林此时决定，在绝食的同时，出席中央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责问布哈林：“尼古拉，你向谁绝食呢？向党中央？请你请求全会原谅你的行为吧！”

“如果你打算开除我的党籍，还有这个必要吗？”

“谁也没有开除你的党籍。”

布哈林再一次轻信了斯大林。在全会上他作了发言，请求全会原谅。

1937年2月27日夜，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到贝舍夫打电话来通知布哈林参加中央全会。当天晚上，与布哈林惜别时的情景，安娜·米哈伊诺夫娜至今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才发生一样。她回忆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跪在我面前，含着泪请求我原谅他连累了我，他希望我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还请求我一定要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努力，最后他要我牢牢记住他的绝笔信，一个字也不能忘。这封绝笔信是在他被捕前几天写的，他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他知道，他马上就会被捕，并将永远告别人生。他最

终丧失了在前生澄清一切的希望，就决定向未来的党的领导人声明他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并表示希望在他死后恢复他的党籍。当时我 23 岁，他相信我能够在有生之年把他的绝笔信转交给中央委员会。他估计到，在他被捕后，进行搜查时，这封绝笔信会被抄走，他担心一旦这封信被发现，我会遭到毒手。于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要我背下这封信。在他被捕前两天，我跟他在一起反复诵读这封信，直到他相信我完全记住了为止。随后，他就把这封信的手稿烧掉了。

临别时，布哈林坚定地对我说，“形势会变的，一定会变，你还年轻，要坚强地活下去。你要牢牢地把我的绝笔信记在心上。”

我向他起誓，一定记住他的信。

这时他才从地板上站起来，向我吻别，用他颤抖的声音说到：

“安纽塔，你不要太悲伤，历史总会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真理一定会胜利的。”

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我们俩人都深知，这将是我们的永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戴上帽子，径直向门口走去。

他再也没有回来。

1938 年 3 月，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以“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件的名义，对布哈林等 21 人追究刑事责任，指控他们接受敌视苏联的外国间谍机关的任务，组织以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为目的阴谋集团，犯有破坏、恐怖等罪行，因此判处他们死刑。

50 年后，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消 50 年前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布哈林、季可夫等人的判决。决定指出，这些人的行为没有犯罪成分，该案不能成立，宣布为他们平反。这时候，布哈林的妻子已经 76 岁了，她在致戈尔巴乔夫的呼吁书中，叙述了布哈林与她惜别的情景，以及当时对布哈林迫害的过程。布哈林滴滴血泪的绝笔信也终于公布于世，布哈林在绝笔信中写道：

“我即将离开人世。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因为它虽然是无情的，但却是神圣的。我感到在地狱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它运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拥有可怕的力量，制造有组织的诽谤，行动大胆而自信。捷尔任斯基不在了。契卡的杰出传统逐渐丢失了。”“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法上我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的话，但愿后代对我的指责不要比列宁更严厉。我们当初是头一个奔向这一致的目标，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当初时代不同，习惯也不同。

我这封信是写给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你们的历史使命是解开一个可怕的罪行之结。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奔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

布哈林的妻子在后来被关押和流放的岁月里，一直像祈祷一样背诵着这封信。

苏联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布哈林等 20 人平反的决定，终于改正了沉积 50 年之久的这一案件。据可靠的苏联人士透露，布哈林“被重新恢复了党籍。”

断头机前，他不再是国王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死

查理一世，英国国王。在他任君主期间，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648年12月30日他以“暴君、判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被推上断头台。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一幕。英国从此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没有国王及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

那天，判决之前，法庭主席发表了长篇讲话，国王听着，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试图讲话，但被制止了。

当判决宣布之后，在场法庭成员全体起立，表示同意主席的话。

突然，国王像一个犯人似地大声叫喊起来：“阁下，您愿意听我说一句话吗？”主席说：“阁下，判决之后，不能听你说什么了。”国王哀告说：“不能了吗？”主席：“不能了，阁下。卫士，把犯人带走。”国王再一次哀告：“阁下，蒙您开恩，我可以在判决后讲话，作为国王，我可以在判决后讲话的呀！历来如此，请允许我……”“拖下去！”主席威严地命令卫士。

士兵们把瘫痪在被告席上的查理一世硬拉下来押进马车，向圣·詹姆士宫飞驰而去。

最高法院宣布判决之后查理一世深知，自己被处决的日子即将到来，活着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请求下院准许会见尚留在英格兰的两个孩子，即12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和9岁的亨利王子，同时要求会见伦敦教区的贾克逊主教。他的两项请求，均被批准。并同意贾克逊可一直伴随到查理一世上断头台为止。第二天，贾克逊主教来到查理一世囚禁处。主教在跪见国王时，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国王对他说：“别这样，我们没有时间搞这些了，让我们来考虑重要的事情，准备去同上帝见面。我希望怀着平静的心情去做一切，而你要帮助我。”

29日拂晓，伊丽莎白公主和亨利王子被带来见他们的父亲。查理一世亲吻伊丽莎白，并把小小的钻石图章赠给她作纪念，然后他转过身对亨利说：“我亲爱的孩子，敌人不久就要砍断你父亲的头了，他们也许要立你为王。你要记住，只要你兄查理和詹姆士还活着，你决不能当国王。”亨利听完，说了一句使查理一世十分欣慰的话：“我宁愿先被撕成碎片。”和公主和王子分别时，查理一世再次为自己辩护说，“我是‘为了国家的法律和自由’而死的。”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各国的君主们都在为拯救查理一世而呼吁。威尔士王太子也写信为父求情。他表示，作为下届王位继承人，只要饶他父亲的命，愿接受国会提出的任何条件。王后通过类似信件也请求宽恕查理一世。但是，所有这些请求，都遭到下院的拒绝。

16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查理一世起床，他对今天终将走上断头台，感到不寒而栗。于是他要求给他比平时多穿一件衣服，他辩解说：“季节这么冷，我可能会发抖，某些观者会认为我在害怕。我不愿意承受这种非难，我不害怕。”

黎明，贾克逊来为他主持圣礼，朗读马太福音第27章耶稣基督的苦难。这时，查理一世问主教：“阁下，你选择这一章，阿我目前的处境相吻合吗？”贾克逊主教回答：“不揣冒昧，臣向陛下陈言，这是适合于今天的课业。”

上午 10 时正，哈克上校走进屋子，来带查理一世上刑场。查理一世让哈克先走，然后，他挽着主教的手说：“来，你陪我去吧！”

大约有几个步兵连的士兵列队站在大道两旁。另一队士兵举着旗、打着鼓押送查理一世，他的右边是贾克逊主教，左边是汤姆森上校。来到白厅，查理一世被送进为他准备的房间。当教堂的钟敲过 12 下的时候，午餐已准备妥当。但他拒绝进食，后经主教苦劝，才勉强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吃了一片面包。

下午 1 点，哈克上校来押送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大厅的墙上已特地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缺口外就是断头台。断头台上高悬黑帷帐，两个穿着像水手一样的蒙面行刑者站在斧子旁边。查理一世穿过缺口，走上断头台，看了看四周，只见岗哨林立，较远处人头攒动，不禁毛骨悚然。但他强打精神对站在身后监斩的汤姆森上校和贾克逊主教说了一番话，想在临死前再次为自己辩护。

但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人碰了一下斧子，他急忙回过头来说：“别把斧子弄坏，弄坏的话，它对我的伤害会更厉害。”查理一世露出了慌乱和恐惧的心情。贾克逊主教对他说：“陛下，只不过再有一步路程了，是非常短暂的一步，它将带你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引导你从人间到达天堂。”查理一世无奈地摘下乔治勋章，交给主教，仰望苍天，悲哀地作起祈祷来，然后跪下，将头放在断头机的砧板上。一声令下，行刑者一斧砍下来，查理一世的头颅和他的王冠一齐滚落尘埃。

当行刑者按照惯例，将砍下的查理一世的头出示给四周的群众看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半是狂喜半是惊恐的呼叫声。

永别了法兰西

——拿破仑之死

1814年4月6日早晨，法国皇帝拿破仑命令召集元帅，他说：“我同意退位。我屈从我的命运，你们也屈从你们的命运。但是我们不是为安宁而诞生的一代人。”

1814年4月11日，即退位五天之后，当拿破仑已经在枫丹白露宫中整装待发，前往厄尔巴岛的时候，他与这些日子来很多时间都陪伴着他的科兰古道别，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正如后来所知道的，他拿出一个装满鸦片溶液的小瓶子，并且把里面装的鸦片溶液一饮而尽。

痛苦的折磨开始了。科兰古觉得情况不妙，拿破仑请求不要去叫任何人，甚至愤怒地命令他不准这样做。痉挛的发作十分强烈，科兰古终于跑出了房间，叫醒了医生，医生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小瓶子，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拿破仑开始抱怨毒药的药性不强或者是毒性减弱了，于是命令式地要求医生马上再给他一些鸦片。

拿破仑的痛苦继续了几小时，因为他拒绝服解毒剂。他坚决要求不让任何人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要死去是多么困难啊！而在战场上死去是多么容易啊！为什么我没有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被打死！”——他在剧烈的抽搐中说出了这几句话。

毒药并未起到致命的作用，而拿破仑从此以后也再没有作自杀的尝试，再也没有想起自己的自杀。

1814年4月20日，准备工作结束了。为拿破仑、他的人数不多的随从以及要陪送他到厄尔巴岛去的同盟国委员们准备的马车，已经停在官门口了。

拿破仑想同自己的近卫部队告别。近卫部队在官中的正庭中列队，前面站着老卫队和军官、将军们，后面站着新卫队。当皇帝出来的时候，士兵们举枪敬礼，旗手把老卫队的旗帜放到拿破仑的脚前。

后来，英国的报纸这样描述这一天：“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勇的史诗结束了——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

但是，从1793年12月在土伦开始的二十年来的史诗，实际上1814年4月在枫丹白露根本还没有结束。

拿破仑论定还要震惊世界，而二十年来使世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吃惊的正是拿破仑。

不容争辩，拿破仑在初到厄尔巴岛的时候，没有任何计划，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并且打算按照自己曾说过的那样，来写自己的统治的历史。他是十分平静安宁的。他于1814年5月3日到达厄尔巴岛。现在，他在孤岛之上了，在陌生的和平居民的中间，这些居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迎接自己的新的统治者。

拿破仑熟悉了自己的领地，接见居民，发布命令，似乎要长翎安顿下来了。时常有亲戚去看他，他的母亲列蒂契娅和他的妹妹波林娜·博尔盖泽公爵夫人都去过。瓦莱夫斯基伯爵夫人也会过，1807年拿破仑在波兰时她有过很亲密的关系，她一生中始终都爱着他。拿破仑的妻子玛丽亚·路易莎和小儿子没有去，因为她的父亲奥皇不放她去，并且她本人也不急于去看

自己的丈夫。

拿破仑曾经十分热爱过、后来又抛弃了的第一个妻子也没有到他那里去。约瑟芬是 1814 年 5 月 29 日拿破仑到了厄尔巴岛几星期以后在巴黎附近的马尔梅松宫中死去的。拿破仑听到这个消息后，接连好几天都闷闷不乐，沉默不语。

他到厄尔巴岛后的头几个月是十分平静和单调的。他没有在任何人的面前、在任何事情上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往往几个钟头沉浸在深思之中。看来，从 1814 年的秋天，特别是 11 月、12 月起，拿破仑就注意地听取一切有关法国和当时刚开始的维也纳会议的报告。这些消息清楚地表明，复辟了的波旁王族及其周围的人的所作所为，比预料的情况更加轻率，更加荒唐。

1814 年 12 月，拿破仑在波尔托费拉约（厄尔巴岛上的主要城市）自己宫殿附近散步的时候，突然在一个站岗的掷弹兵面前停下来。他是老近卫军的一个营里的兵士，得到同盟国的允许到厄尔巴岛来跟随皇帝的。“喂，老发牢骚的，你在这里不感觉无聊吗？”——“不，皇帝，不过我也不觉得十分有趣。”拿破仑把一个金币塞到他手里，在走开的时候低着嗓子说：“不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的。”

1815 年 3 月 7 日晚上，维也纳的皇宫中正举行舞会，这是奥皇为招待欧洲各国的君主和代表而举行的，突然，当舞会正在欢乐的高潮时，客人们看见弗兰茨皇帝周围有些骚动：面色苍白的、受惊过度的大臣们急急忙忙地从正门的阶梯上跑下来，造成了这么一个印象：似乎宫中突然失火了。转瞬之间，宫中的各个大厅中都传遍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使到会的人立即惊慌失措地停止了舞会；刚刚到来的信使带来的消息说，拿破仑离开了厄尔巴岛，已经在法国登陆，并且赤手空拳地直奔巴黎。

还在 1815 年 2 月初拿破仑就开始决定回法国，恢复帝国。他从来也没有对谁说过他的这个决定。也许，只是在 1814 年年底和 1815 年 1 月，他心中的这个信念成熟了：整个军队而不只是他的近卫军仍然像以前一样地对待他，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列蒂契娅来看他。他的母亲是一个聪明、坚定、勇敢的妇女，在自己家庭成员中拿破仑最尊敬她。他把自己最初的决定告诉母亲。他对她说：“我不能死在这个小岛上，也不能把自己的事业结束在安宁中，这是我所不应受的。军队在期待我。一切都促使我产生这样的希望：军队一看见我，就赶快投奔到我这里来。当然，我会碰见忠于波旁王朝的军官，他们会制止军队的发动，那时我在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死去。这种结束比住在这个小岛上好得多……我希望出发，并且再一次尝试得到幸福。妈妈，你的意见如何？”列蒂契娅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大震动了，以致不能马上回答：“让我暂时做一个母亲吧，我过一会儿再回答你。”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她回答说：“出发吧，我的儿子，遵循着你的使命。也许，你会遭到失败而马上丧失你的生命。但是你不能留在这里，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悲哀。我们希望，在这么多次战斗中都保佑你的上帝再一次保佑你。”她说完这些话就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

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十分秘密地进行的。拿破仑命令自己的三位将军在 2 月 26 日把一切准备就绪。这一天下午在波尔托费拉约城，一百名士兵突然全副武装向港口开去，并且登上了小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上船，准备开到什么地方去，事先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一句话，当然，在上船以前他们已

经猜到了。并且当皇帝在三位将军和老卫队的若干军官的陪伴下出现在港口的时候，他们欢欣若狂地向皇帝致敬。

拿破仑的母亲大哭不已，与自己的儿子告别。

士兵、军官、将军和拿破仑在小船上各就各位，在夜晚7点钟，小船队一路顺风地开往北方。

1815年3月1日凌晨3点钟，小舰队靠拢法国海岸，停在离昂蒂布海角不远的港口儒安；皇帝上了岸，并且马上下令开始登陆。奔跑的海关卫兵看见拿破仑，就脱帽向他大声致敬。他毫不停留地继续前进，经过色尔隆村，经过迪涅和加普，向格勒诺布尔前进。

3月7日早晨，拿破仑到了拉米尔村。拿破仑从望远镜里长久地观看派来对付他的军队。然后他命令自己的士兵左手持枪，枪口朝下。“前进！”——他下命令，并且冒着用来对付他的王室军队的前锋营的烟火，领头向前走去。

这个营的营长看看自己的士兵，找着警卫队指挥官的副官，指着自己的士兵对他说道：“我该做什么呢？你看看他们吧，他们面色苍白，象死人一样，只要一想到必须打死这个人就全身颤抖。”他命令全营撤退，但是没有来得及。拿破仑命令自己的五十名骑兵阻止准备撤退的营队。骑兵们大叫：“朋友们，不要开枪，这是皇帝！”营队停留下来了。于是拿破仑一直走到士兵面前，士兵们端着枪呆住不动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以坚定的步子向他们走近的穿着灰上衣、戴着三角帽的人。“第五团的士兵！”皇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发出了声音，“你们看出是我吗？”“是的，是的，是的！”——队伍中叫起来了。拿破仑解开上衣，露出胸脯。“你们当中谁想打死自己的皇帝？那就开枪吧！”目击者至死都不能忘记士兵们怎样打乱了队形，蜂涌着奔向拿破仑，并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士兵们紧紧把他包围起来，吻他的手，吻他的膝，高兴得哭起来了，像是群众性的癫狂症在发作。

所有派来保卫格勒诺布尔的军队，都一团一团地跑到拿破仑那边去了。

一大群、一大群的农民（据目击者计算有三四千人）跟在拿破仑和他的军队的后面，他们沿路向他聚拢，伴送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并且在每一个新的地点都换成了新的人群，一群农民似乎把他交给了另外一群农民，送给他军需用品，给予各种援助。人群中的人员在更换，但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连那么自信的拿破仑也没有预料到类似的情况。他已经毫不怀疑，几天以后他就会到巴黎了。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呢？上了锁的城市的大门吗？在格勒诺布尔，保皇党人在逃进城前试图把大门锁上。“我只用我的烟盒就敲开了这些门。”——拿破仑这样谈起这件事情。他甚至夸大自己的势力，说他用不着拿烟盒去敲，“只要他一走近，大门就敞开了”。拿破仑作为凯旋者，在严整的团队的开路和伴随下直奔里昂，沿途发布命令，派遣急使，接收情报。任命新的指挥官和大臣。

在3月19日夜晩，拿破仑带着自己的前锋进入巴黎枫丹白露。国王和全家已在3月19日夜晩11点钟逃出巴黎，向比利时边界逃去。

在第二天，1815年3月20日晚上9点钟，拿破仑在随从人员和骑兵的前呼后拥下进入巴黎。

无数的人群在杜伊勒里宫和周围等候他。

还在离皇宫广场很远的地方，就传来了簇拥着拿破仑的马车及其周围侍

从马队的无数群众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每分钟都在加强，最后变成接连不断的、震耳欲聋的、欢乐的狂涛，当叫喊声传到官前广场的时候，在官旁等候的另外的巨大的人群就冲上去迎接。马车和随行人员被无数群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不能往前走了。骑马的近卫军企图打开道路，但毫无结果。“人们在叫喊，哭泣，直接向马扑去，向马车扑去，什么也不想听”。——在皇帝马车附近的骑兵后来这样说。据目击者说，人群像发了疯似的冲向皇帝，他们把随从人员挤走，把马车打开，在经久不息的叫喊声中把皇帝抬进宫去，沿着宫里最大的楼梯上楼，抬进第二层楼的房间。后来，一位年老的保皇党人说，这是真正的偶像崇拜。

刚刚十分费力地把人群劝离皇宫之后，拿破仑就到自己旧日的办公室来了，他立即处理来自各方面的事情。

难以相信的事情实现了。赤手空拳的人不费一枪一弹，不经过最小的斗争，在十九天之内从地中海岸到了巴黎，赶走了波旁王朝，再度来统治法国。

但是他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和第一次统治时期一样，他的统治再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而被他的突然出现所震惊的欧洲，这一次一定会竭尽一切来阻止他集合自己的力量。

拿破仑于4月23日公布了新宪法。

全民投票的结果，是1552450票赞成新宪法，4800票反对。

6月11日，他接受了人民代表的祝贺，而在第二天，6月12日，他就到军队去了，他要去进行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欧洲的大厮杀。

拿破仑一生中最后的这场战争始终是有激烈争论的题目，并且不仅在科学著作中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受到广泛的重视。

同盟国家坚定不移地决定要消灭拿破仑。在最初的惊慌和泄气之后，一切派有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大国政府，都特别努力。拿破仑想同任何一个国家举行单独谈判的企图都被拒绝了，拿破仑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是“人类的敌人”。

拿破仑到达军队的时候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英国的间谍惊诧不已，向英国军队的首领威灵顿报告说，军队中对拿破仑的崇拜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

6月14日，拿破仑侵入比利时而开始了战斗。

拿破仑命令内伊元帅在6月15日占领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上的名叫卡特勒布拉的村庄，以便牵制英军，但是内伊行动迟缓，这件事做迟了，6月16日发生了拿破仑与布吕歇尔在林尼的大战。拿破仑获得胜利。布吕歇尔损失了两万多人，拿破仑损失了将近一万一千人。但是拿破仑不满意这一胜利，因为如果不是内伊的错误，毫无必要地耽搁了第一军团，让它白白地在卡特勒布拉与林尼之间徘徊的话，他就会在里尼一战消灭全部普鲁士军队。布吕歇尔被击败、被赶跑了，但是没有被消灭。17日这一天，拿破仑让自己的军队休息，军事评论家责备他，说他白白地损失了宝贵的一天，从而使被击败的布吕歇尔有可能整顿自己的军队。

6月17日傍晚，拿破仑带领自己的军队向高地前进，远远地在雾中看见了英国军队。

6月18日清晨拿破仑与威灵顿作战时，拿破仑大约有七万二千人，威灵顿有七万人。双方都在等待援兵，并且都有坚决的理由等待他们：拿破仑在等待格鲁希元帅，英国人在等待布吕歇尔。

对英国军队左翼的进攻继续着。你死我活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突然拿破仑看见圣·兰别尔东北方很远的地方有不太明显的运动着的军队的轮廓。他最初以为是格鲁希，因为他在夜晚，后来又在早晨几次命令他赶快开赴战场。但这不是格鲁希，而是布吕歇尔。布吕歇尔逃出了格鲁布的追击，并且经过很巧妙的转移骗过了法国元帅，而现在赶来支援威灵顿。拿破仑知道真实情况以后仍然没有困惑不安；他相信格鲁希会在布吕歇尔之后跟踵而至，那时这两支军队都会投入战斗，拿破仑派遣一部分骑兵去攻打布吕歇尔，命令内伊元帅继续攻击从战争开始以来已经不断遭到猛烈打击的英国军队的左翼和中心。

在这次著名的进攻中，法国骑兵死在英国步兵和炮兵的炮火之下。但是这并没有使剩下的人感到惶惑不安。

黄昏到来了。最后，拿破仑把自己的近卫队用来攻击英军，并且亲自带领去进攻。正在这时，在法军的右翼传出了呼喊声和射击的轰响声：布吕歇尔带领三万人赶到了战场。但是近卫队的进攻仍然继续着，因为拿破仑相信格鲁希会跟随布吕歇尔而到来！但是很快就传布开来一种惊慌混乱的状态：普鲁士的骑兵冲向在双方炮火之间的法国近卫军，而格鲁希还没有来。到了最后一分钟拿破仑仍在白白地等待他。

一切都完了。列成方阵的近卫军进行着拚命的抵抗，穿过敌人密集的队伍慢慢地撤退。拿破仑在保卫他的近卫军掷弹兵营中间步行着。

战场上躺着两万五千名死去的和受伤的法国人，两万二千名死去的和受伤的英国人及其同盟者。法国军队遭到了失败，损失了几乎全部炮队，几十万奥国主力军正逼近法国边境，还有几十万俄国军队不久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拿破仑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这一点他在离开结束他的血腥的生涯的滑铁卢战场之后很快就意识到了。格鲁希叛变了吗？他的迟到毁灭了法国军队。或者他只是偶然地犯了过错，迷失了道路？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成千个与滑铁卢之战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百多年来吸引了历史学家，吸引了这个战役发生时的当代人。但是，必须立刻指出，这些问题最初却很少引起拿破仑自己的注意。从滑铁卢到巴黎，一路上他表面是安静的，沉思的，但是他的面部却不像莱比锡战役之后那样阴沉，虽然现在事实上他已经失去所有一切了，永不复返地失去所有一切了。

滑铁卢之战后一个星期，他对这次战役的深奥的意义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列强不是和我作战，而是和革命作战。他们始终把我看成革命的代表者，把我看成是革命的人。”

现在，一切都立刻并且永远地熄灭了，在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一次也没有经历过1814年4月11日那种绝望的情绪，当时他曾服毒自杀。但是他失去了对活动的一切兴趣和口味，他只是等待着未来的事件将对他做些什么，他已经决定根本不参加未来事件的准备工作。

6月22日他第二次退位，他的继续了一百天的第二次统治时期结束了。

6月28日退位的皇帝离开了马尔梅松。他向大西洋岸前进。他已经决定坐上一只停泊在罗什福尔港的巡洋舰到美洲去。有人向他建议，不要坐巡洋舰，而是秘密地坐上一只小船。他不希望那样做。罗什福尔城的人知道皇帝到来了，每天都有几千人接连几小时聚集在皇帝的窗子下面，高呼“皇帝万岁！”最后，7月8日，他登上了自己的两艘巡洋舰中的一艘，并且开出海去。巡洋舰在罗什福尔城的稍偏西北的一个叫做埃克斯的大岛边停下来了，

但是要继续前进已不可能，因为英国的舰队封锁了通往大洋的一切出口……

拿破仑立刻作出决定。皇帝派遣萨瓦里和拉斯卡斯去同在四周巡航的英国舰队谈判，是否可以让拿破仑乘坐的去美洲的法国巡洋舰通过？是否收到了有关这方面的命令？梅特兰船长在“别列洛风”号船上接见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有礼貌的，但是坚决的拒绝。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巡洋舰的时候，当两只法国船上的水兵和军官们知道皇帝可能落入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全体人员大哗。另一只巡洋舰的舰长波内对蒙托隆将军说：“我刚刚同我的军官们和全体船员商量过。因此，我是以我自己和全体人员的名义说话的。”在说了这些话以后，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的巡洋舰“美杜莎”号在夜晚去攻击“别列洛风”号，和它开战。这将占去和牵制英国人两小时；当然，“美杜莎”号在这两小时以后会毁灭，但是在这两小时之内另外一只载着皇帝的巡洋舰“沙阿列”号可以冲入大洋，因为其他的英国舰队离“别列洛风”号很远，而那些离得近的船只大小，不可能截住巡洋舰“沙阿列”号。“美杜莎”号的水兵和军官们都表示了充分的牺牲精神，以便拯救皇帝。

拿破仑知道这个建议后对蒙托隆说，他不同意作这样的牺牲；他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为了拯救个别的人而牺牲法国巡洋舰及舰上全体人员是绝对不行的。拿破仑离开巡洋舰“沙阿列”号，到了埃克斯岛。在那里，几个年青的军官打算用一只小船把皇帝偷偷送走。

但是拿破仑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拉斯卡斯又到梅特兰船长那里去，并且对他说，拿破仑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英国。梅特兰肯定地说，他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对皇帝是会作出有礼貌的、应有的接待的。

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座上一只横帆二桅船“雅什特列布”号，这只船要把他带到“别列洛风”号上去。他身上穿的是他始终喜爱的近卫轻骑兵的制服，头戴三角帽。“雅什特列布”号上的水兵排成阵式，船长向皇帝报告。水兵们高呼：“皇帝万岁！”“雅什特列布”号接近了“别列洛风”号。梅特兰船长在梯子的下端迎接皇帝，向他低头鞠躬。拿破仑登上船，看见了列队在他面前的英国军舰的全体人员，梅特兰向他介绍了自己的部下。

拿破仑立刻走进梅特兰为他准备的船上最好的房间里去了。

英国在其存在的全部历史上最强大、最顽固、最可怕的敌人，已经在它的手中了。

远在16世纪初叶，在葡萄牙人继瓦斯科·达·伽马之后往大西洋南部的最初几次航行中，有一次发现了位置在南纬十五度半的一个十分荒凉的小岛。这个小岛是在1501年5月21日发现的，这一天正好是天主教会纪念圣赫勒拿的日子，该岛因而取名为圣赫勒拿。

英国政府一听到拿破仑在“别列洛风”船上的消息，就决定把拿破仑流放到这里。这个小岛离最近的海岸（非洲海岸）大约两千公里，乘坐当时的帆船从英国到这个小岛大约要两个半月至三个月。圣赫勒拿岛的地理位置对英国内阁的决定的影响最大。在“百日”之后，拿破仑比自己在史诗中的最后一幕以前更加可怕。一旦拿破仑可能在法国重新出现，就会重新使帝国复活，并且引起新的全欧洲战争。

由于圣赫勒拿岛在大洋中的位置和远离陆地，这就保证了拿破仑不可能返回法国。

当拿破仑听到要把他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他提出了抗议，说人们

没有权利把他当俘虏。他从“别列洛风”转移到巡洋舰“诺森伯伦”号上，这只巡洋舰经过两个半月的航行，于1815年10月15日把被俘的皇帝带到岛上，他注定要在这里结束他的余生。

只有很少的随从陪伴拿破仑到流放地来，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拒绝了很多要求到岛上来照顾皇帝的人。

在离开隆乌德很远的一个唯一的小城里，驻扎有一队保卫该岛的士兵。有趣的是：岛上卫队里的军官和士兵对拿破仑这个英国的死敌不仅显得尊重，而且有时还表露出伤感的情绪。士兵们向他献花，请求拿破仑的随从人员发善心让他们偷偷地去看看拿破仑。甚至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军官们在谈起这位俘虏（正是他使他们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生活了几年）时，也流露出同情心。

这终于引起了住在岛上监视拿破仑的大国的委员们的注意。亚历山大一世的代表巴尔马因伯爵说：“最奇怪的是，这个失去了皇位、被卫兵看守着的人，这个俘虏，竟能够影响一切与他接近的人……法国人看见他时浑身发抖，认为自己为他服务是十分幸福的……英国人只是带着景仰的心情去接近他。甚至那些看守他的人，也热烈希望他看自己一眼，力求他说出片言只语来。谁也不敢和他并列。”

拿破仑产生了一种忧郁怅惘的心情，这是他和他的“小朝廷”从未感受过的，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了。他主要是被闲散折磨了。他大量地读书、骑马、外出，对拉斯卡斯口述。但是，他一生养成了每天不倦地工作十五小时、有时甚至十八小时的习惯，现在要他来过这种生活，这是他不忍容忍的。

他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他竭力与周围的人谈话，显得很活跃，看来，有时也因此而摆脱了自己的忧愁。他坚毅地忍受着自己所处的地位。

这时，关于皇帝的消息已经越来越稀少、沉寂、暗淡、时断时续了。

从1819年起，他的病就越来越多了。1820年病情加剧，而在1821年初，被拿破仑允许来为自己治病的英国医生阿诺特发现病情相当严重，但是在每次卧病之后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间隔期，这时他就出来散步。1820年倦怠的现象已越来越明显。他往往说了半句话就不再下去，而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开始沉默不语了。这时，在1820年年底之前，他的关于自己的统治的口述记录和回忆，由拉斯卡斯记录下来的有两厚本，由蒙托隆记录下来的有八卷。

1821年8月，可怕的内部的疼痛复发，而且发作的次数逐渐加多。看来，拿破仑早已猜到这是癌，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传症，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才活四十岁就因癌症而去世了。

4月5日阿诺特医生通知拿破仑的随从人员贝尔特朗元帅和蒙托隆伯爵说，病人的情况十分严重。当疼痛稍稍减轻的时候，拿破仑力图鼓起周围的人的勇气。他对自己的病取笑说：“癌是从内部来的滑铁卢。”

4月13日他命令蒙托隆抄下他口述的遗嘱，4月15日他亲自抄写这个遗嘱，并在上面签字，遗嘱上面包含了现在刻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大理石板上的那些字句：“我希望能够把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畔，安葬在我如此热爱的法国人民中间。”遗嘱中的其他各点大多是有关分给各人的金钱的数目：他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共计两亿金法郎，他在遗嘱中说，一半分给在他的旗帜之下战斗过的“军官和士兵”，另一半分给1814年和1815年遭受侵犯的法国各地。遗嘱中也有地方谈到英国人和赫德森·洛：“我被英国的寡头政治和

雇佣兵杀死得过早。英国人民不要迟延为我报仇。”他在遗嘱中叫儿子永远也不要反对法国，并且记住座右铭：“一切为了法国人民。”

他十分安静，先是口述遗嘱，然后自己再抄写。三天以后，他对蒙托隆口述一封信，要蒙托隆在他死后，用这封信把发生的事情通知总督，并且要求英国人把所有的随从人员和仆人从圣赫勒拿岛送回欧洲。

4月21日晚上四点钟，他突然对蒙托隆口述改组法国国民近卫军的方案，以便在保卫领土不受敌人侵犯时能够最合理地使用它。

5月2日阿诺特医生、肖尔特医生和米歇尔斯医生告诉随从人员说，死亡已经十分临近了。苦痛大大加剧了，以致5月5日傍晚，拿破仑在半昏迷状态中从床上跳下来，用很大的力量痉挛地压在蒙托隆的身上，他们两个人都跌到地上了。人们把拿破仑抬起来，他再也不能恢复知觉了，接连几小时都躺着不动，睁开眼睛，没有呻吟。他以前在最疼痛的时候也几乎不呻吟，而只是辗转反复。在拿破仑的房间里，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和仆人，有的在床边，有的在门边。拿破仑动了动嘴唇，但是几乎什么也听不清；这天大洋上有最猛烈的暴风雨，把大树连根拔起，刮走了岛上的一些房屋，震动了整个隆乌德庄园。

岛上的总督赫德森·洛和英国卫队的军官一得知拿破仑濒于死亡状态，就连忙赶去，留在这所房屋的其他房间里。离床很近的人听见他的最后的话是：“法兰西……军队……先锋……。”

1821年5月5日下午六点钟，黄昏之前，拿破仑与世长辞了。

哭泣着的仆人马尔尚把他所保存的、拿破仑在1800年6月14日马伦哥一战中所穿的大氅盖在拿破仑的身上。然后，总督和军官们走了进来，向死者低头致哀。然后贝尔特朗和蒙托隆让列强的委员们进来，他们现在是到岛上后几年来第一次走进皇帝的房子，因为皇帝不接见他们。

四天以后，棺材就从隆乌德运出。在送葬行列里，除了随从人员和仆人以外，还有卫队全体人员，全体水兵和海军军官，以总督为首的文官，以及几乎全岛的居民。当棺材下放到墓穴的时候，礼炮轰鸣：他们给死去的皇帝致最后的军人的敬礼。

华盛顿在平静中死去

——美国前总统华盛顿之死

1798年11月初，66岁的美国前总统华盛顿回到了他的弗农山庄，他离开家16年，只是偶尔回来看看，每次逗留时间很短，因此，庄园已紊乱不堪。他雄心勃勃地做了计划，要认真整顿庄园。

冬天来临，偶尔还有风雨和冰冻，但华盛顿仍然像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到庄园各处巡视，用他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视察前哨阵地”。他一直盼望能实现他怀抱已久的希望——在他心爱的家园中安度晚年。

然而，命运之神是残酷的。

1799年12月12日早晨，天空阴霾。10点钟左右，他骑上马，像往常一样，到庄园各处巡视。在前一天晚上，他看到月亮周围不吉利的风圈，这是一个不样的预兆。但是他不顾天气严寒，继续策马到各处巡视，三点钟过后才回到家里。

第二天早晨，他说他嗓子痛，无法像往常那样骑马外出。下午，他嗓子嘶哑，到了晚上，嘶哑得更厉害。

黄昏时分，他和夫人以及利尔先生一起坐在客厅里，他仍然用嘶哑的声音高声朗读报纸。

在回去休息的时候，利尔先生劝他吃点治感冒药。

他说：“不必。我从来不吃治感冒药。它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回去吧。”

可是在夜里，他身上便打起寒战，呼吸困难，凌晨两三点钟，他把夫人唤醒，但却不让她起床，怕她着凉。黎明时分，女仆进来生火，才喊来利尔先生。此时华盛顿已呼吸困难，言语含糊不清。他希望去请克雷克大夫，同时，在大夫赶来以前，让监工罗林斯给他放血。

家人给他准备了一种治疗喉炎的含漱剂，但是，他每次用时，都抽搐不止，而且几乎窒息。当太阳出来不久时，罗林斯大夫赶来，但是，在华盛顿伸出手臂准备放血时，罗林斯却紧张起来。

华盛顿气喘吁吁地说：“不要怕。”

罗林斯作了一个切口。

华盛顿说：“切口还不够大。”

血液汹涌而出。华盛顿夫人不知道这种治疗方法是不是妥当，她恳求利尔先生停止放血。

利尔先生正要解开绳带，华盛顿却伸出手来制止，而且喃喃地说道：“再放点——再放点。”

在放了大约四升多血以后放血停止。这时，大家开始在他的喉部外面敷药，并且用热水给他洗脚，但是都不能减轻症状。

四点半左右，他把夫人叫到床边，请她到写字台中找出他的两份遗嘱。他把两份遗嘱看了看，取出其中一份说，这一份废弃不用了，由另一份代替，并请求夫人将废弃的一份烧掉，夫人照办了。接着，夫人又把另一份拿去，放到她的密室里。这时，华盛顿握着利尔的手：“我觉得我快不久于人世了，我快不行了。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病会要了我的命。请你务必把我近来有关军事问题的全部信件和文件加以整理登记。要把我的账目清理一下，把

来往账项结清，因为你比别人都熟悉。”

在整个下午，由于呼吸困难，他十分痛苦，不断在床上变换姿势。利尔先生努力扶着他，尽可能帮助他翻身。

五点钟左右，克雷克大夫又来到房间里。

华盛顿说：“大夫，我死起来真难，但是，我不怕死。我从一得病的时候起就相信，我躲不了这一关——我快不行了。”

医生默默无言地按着他的手，接着又离开床边，在火边坐下来，沉浸在悲伤中。

在五、六点钟之间，别的医生也进来了。大家扶着华盛顿在床上坐起来。

他又说：“我觉得我不行了。我感谢你们照应我，但是，我希望你们不再替我操心，让我安安静静地去吧。我活不了多久了。”

他躺了下去。大家也都退出去，只有克雷克大夫留下来。华盛顿仍很不舒服，焦躁不安，但是，他并没有呻吟，只是不断地问什么时候了。

晚间，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治疗措施，但都没有效果。叫他服什么药，他就服什么药，完全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从来没有叹息一声，也没有呻吟一声。

利尔先生写道：“十点钟左右，他几次想和我说话，都说不出来。最后，他说了一句：‘我马上就不行了。我死了以后，葬礼不要过份，过三天再下葬。’我鞠了一个躬，表示同意，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又望着我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回答说：‘明白。’他说：‘那就好’”。

“在他断气（他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断气的）之前大约十分钟，他的呼吸变得舒畅了一些。他安详地躺在那里。他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回去，摸着自己的脉。我看见他的脸色变了，连忙告诉坐在火边的克雷克大夫。克雷克大夫来到床前。华盛顿的手从自己的腕部掉下来。我拿起他的手放在我的胸前。克雷克大夫用双手蒙着脸。他断气了，没有一点挣扎，也没有一声叹息。

“当我们浸沉在默默的悲痛中的时候，坐在床脚的华盛顿夫人用镇定的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他去了吗？’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举起手来，表示他已经过世了。她还是用那种声音说：‘那就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很快也要跟着他去了。我也不需要再经历什么艰难困苦了。’”

华盛顿的葬礼举办得既简单，又朴素，这符合他自己的愿望，一切都只限于弗农山庄以内。弗农山庄本来是他对人生形成富于诗意的梦想的地方，现在则变成他最后的安息地。

震惊世界的枪声

——美国前总统林肯遇刺经过

1865年4月14日，那天晚上，总统和总统夫人乘马车前往剧院，随同陪伴的是亨利·里德·拉思伯思和他的未婚妻。拉思伯思是志愿兵少校、陆军部一个颇受信任的武官。

跟随总统的卫士是约翰·帕克，他的任务是寸步不离总统，严密监视可能暗算总统的任何人。

这一行人在晚上9点钟左右进入剧院，由一个引座员带着走向他们的包厢。在座的一千名观众看见或听说总统到来，便一起鼓掌欢迎，许多人站了起来，有的还发出了欢呼。总统停步向欢迎他的观众们点头致意。

舞台上演出的是英国戏剧作家托姆·泰勒14年前的作品《我们美国的表兄弟》。

林肯坐在扶手摇椅上，他只能看到包厢里同他坐在一起的那几个人、舞台上的演员和可能从左边走下舞台的一些人。这个包厢有两道门，靠前边的门锁着。

然而这个地方并不象想象的那么保险。在总统身后几英尺便是包厢的后门，除了可以从舞台攀上包厢之外，这道门是进入包厢的唯一入口。门上有个小孔，是那天下午才钻通的，一个“不速之客”用手钻钻出这个窥视孔的目的，是要站在包厢外面面向里窥视总统，然后选择时机溜进包厢。从包厢的这道门出来是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另一端有一道门通往戏院的楼厅。

71

这两道门是“不速之客”进入总统包厢的必经之路。他在通往楼厅那道门旁的狭窄过道的砖墙上挖掉两英寸深的泥灰，其用意是想把一根木棍插进挖就的凹处顶住门，以阻止其他人闯入，防止任何人在他从包厢门上的小孔向里面窥视总统时来干扰他。

指定给约翰·帕克的任务和他份内的职责是以毫不松懈的警惕性，片刻不离地站在或坐在通往包厢的那道门或通往楼厅的那道门旁。

不知是在演出换幕的间歇，还是在剧情不够精彩，不中约翰·帕克意的时候，或是由于贪饮一小杯随身带的威士忌酒，他离开了楼厅上的岗位，下楼到街上和几个同伴喝酒去了。这种情况给那个正伺机以待的潜伏着的“不速之客”提供了大好时机。

戏还在继续演着。

下一幕是雷鸣海啸，是火山喷发，是最野蛮、最不可想象、最致命和最混乱的悲剧。当这个悲剧传开来时，它空前地震撼了整个世界。

剧院里的观众谁也没有看到这千钧一发之际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人明瞭这瞬间的情况，这就是那个作好了一切准备、伺机而动的“不速之客”。他穿过外面的门进入狭窄的过道，然后把那根结实的细木棍插进砖墙上两英寸深的凹处，把门顶住。他蹑手蹑脚地摸到包厢门口，通过小孔观察包厢里的动静和扶手摇椅上他要暗算的那个人。他轻轻地拉开门，走近他要杀害的人。他右手握着一支铜制的单发大口径小手枪，一种致命的八盎司重的袖珍手枪，左手持着一把匕首，不慌不忙、准确无误地伺机而动。他举起枪，伸直右臂，眯缝着一只眼，瞄准五英尺内那个受害者的脑袋，扣动扳机。

“乒”的一声，一颗直径不到半英寸的铅弹头射向受害者头部左侧，从齐耳高、距左耳三英寸的地方进入了后脑。“子弹的路线是斜着穿过大脑朝右眼方向去的，最后停留在右眼眶后几英寸的地方。”

拉思伯恩少校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只见一个陌生家伙手攥匕首向他猛扑过来，就像一头张牙舞爪、活蹦乱跳的猛兽，他光着头，露着乌黑发亮的浓发，没有胡须的脸上杀气腾腾，闪动着一双凶狠发光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黑色便装。他恶狠狠地对准拉思伯恩的心窝猛刺过去。拉思伯恩用右上臂挡开刺来的匕首，手臂上挨了深深的一刀，他便向后晃了一晃。那个恶虎般的陌生人乘机跨上包厢的围栏。这时拉思伯恩已恢复过来，便又向陌生人直扑过去。那个人发觉拉思伯恩的一只手在后面拽住他，于是又转身向拉思伯恩猛刺一刀，随后纵身往下跳。但装饰包厢的联邦锦旗缠住了他的马靴上的马刺，使他失去了控制。他也许是从10英尺高的地方跌到舞台上的。他左脚落地，离脚踝稍微上面一点的腔骨折断了。一些人听到拉思伯恩在喊“逮住那个人”！许多人看见有个人从前排座位跳上舞台，一边追赶那个神秘的陌生人，一边喊道“逮住那个人！”可是陌生人从跨上包厢围栏跳到舞台上直至逃脱，前后还不到半分钟。

陌生人以惊人的速度从两个演员之间冲过舞台，穿过一个入口处，从距入口处四十英尺的一扇通往一条胡同的小门逃了出去。胡同里站着一匹栗色骏马，一个反应迟钝的仆役握着缰绳站在那里。陌生人一脚把仆役踢开，翻身上马。人们听见马蹄在石子路上奔跑的嗒嗒声，一会儿就消失了。从陌生人用袖珍手枪射出那一颗子弹到现在，总共才不过是六七十秒钟的光景。

这个现在骑着栗色快马逃遁的陌生人是否曾在舞台上停留过一会儿，叫喊过一句戏剧性的口号呢？一些人说，他逃走时那刚样子好像是分秒必争，唯一目的就是逃掉。另一些人则说，他曾面对观众片刻，挥舞了一下在拉思伯恩身上猛刺过一刀的血淋淋的匕首，喊了一句弗吉尼亚箴言，也就是布鲁图用匕首刺向至高无上的恺撒时高呼的那句口号：“暴君的下场总是这样。”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穿透了整个大厅。有些人后来说那是林肯夫人的声音。这一声尖叫震惊了許多人，使他们毛骨悚然。“他把总统打死了！”人们一下子拥到舞台，越过舞台上的煤气脚灯爬上舞台，过道里挤满了不知往哪儿走才好的观众。

大约两百名士兵赶来清查现场。拉思伯恩少校一边叫喊着找医生，一边冲出包厢跑到狭窄的过道上。他不顾受伤的胳膊鲜血直流，疼痛难当，摸索着要拿掉横放在墙壁上和门框之间的那根木棍。一个引座员在门外帮着他，终于把木棍取了下来。这时引座员身后已挤满了一大堆人。他把他们都挡了出去，只让一个留着络腮胡，样子很年轻的人进来，这个人是23岁的合众国志愿兵助理外科医生查尔斯·利尔。

利尔大夫在别人的帮助下把林肯从椅子上抬起来，平放在地板上。利尔大夫翻起林肯的眼睑，发现有脑损伤的迹象。他又开两手手指，迅速扒开被血凝结起来的头发，发现了一处伤口，他清除了凝血块，以减轻对大脑的压力，使林肯有了微弱的呼吸和脉搏。

利尔大夫弯下身，两腿叉开跪在林肯身体两侧，他把两个指头伸进喉咙，压迫舌根部，并用手指清除喉部积存的分泌物，设法启动林肯的呼吸器官，以刺激他呼吸。陆军外科医生查尔斯·萨宾·塔夫脱从舞台上爬到包厢里，还有一名内科医生艾伯特·金也跟着来了。利尔请他们各自摇动林肯的一只

手臂，他自己则按压横隔膜和其他部位，以促进心脏跳动。经过这一番抢救之后，林肯的脉搏和不均匀的呼吸都有了好转。

然而，利尔大夫认为，林肯由于伤势过重已经虚脱，现在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使他的生命维持下来。正如他后来叙述的：“我不得不平伏在他身上，胸贴胸，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我好几次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对准他的嘴和鼻腔强行呼进去，使他的肺部扩张，促进呼吸。过了一会儿，我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上，发现他的心脏跳动有了好转。我把身子直起来，跪着观察了片刻，看到总统已经可以自己呼吸，不至于立即死亡。我于是宣布我的诊断：“他的伤是致命的，不可能恢复。”

医生们决定，现在可以把总统转移到一间屋子里去，稳稳当地放在床上。四个士兵抬着总统的上身和两腿，培夫脱大夫抬着右肩，艾伯特·金大夫抬着左肩，利尔大夫抬着头。他们把这位受伤的“人类之友”抬进一个房间，安放在一张简单的木床上。当时的时间是10点45分左右，大概距开枪还不到半小时。

在病人稍许休息一会儿之后，大夫们给病人脱下衣服，从头到脚检查了全身，没有发现其他伤口，只是下身冰凉。利尔大夫叫一名医院护理人员拿来热水和热毯子，又要来一堆芥末膏，涂在太阳穴和整个前身上。

总统的呼吸渐渐困难，脉搏每分钟44次，很微弱。左眼瞳孔收缩得非常厉害，右眼瞳孔扩大，两眼对光反射完全消失，总统完全失去了知觉，偶尔因呼吸困难而出一大口气。

在隔壁房间里，林肯夫人由几个妇女陪着。有几次她被通知去见丈夫。其中有一次她对他哭喊着：“活下去！你必须活下去！”

凌晨两点钟，大夫曾试图找出那颗子弹，但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认为再找下去也无济于事了。

大约就在总统在福特剧院遇刺的同一时刻，一个年轻的彪形大汉骑着一匹高大的独眼栗色马奔驰到拉斐德广场国务卿西华德住宅门口。他滚鞍下马，按门铃，悦是国务卿的护理医生打发他来的，有一包药必须由他亲自送到国务卿的病房里。守门的仆人正想挡住他，可是他已经进门上了楼，突然猛冲到弗雷德里克·西华德跟前，用手枪柄猛砸他的头部，砸破了他的头皮和脑壳，甚至手枪柄都拉烂了。

小西华德同闯进来的那个人扭作一团。两人一直扭打到国务卿的房间前，一同摔进门里。弗雷德里克·西华德昏了过去，以后好几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国务卿的女儿和军队护士从椅子上跳起来。那个杀人心切的大汉左右开弓，朝着他们乱打一通，并捅了鲁宾逊一刀，然后冲到国务卿的床前。西华德因车祸摔伤已卧床近两个星期，头部和脸上戴着钢架。大汉朝着病人的咽喉连戳数刀，多亏钢架的保护，才使病人免遭致命的一刀，仅在脸上和颈部留下了三道深深的伤口。

随后，屋子里的那个陌生人从楼上猛冲下来，刺倒途中撞见的一个仆人，安然无事地跑出前门。他跳上马，疾驰出佛蒙特大道，朝东郊逃去。他逃之夭夭了，可是他使一个安静的家庭变成了野战医院。五个人的可怕的伤口鲜血淋漓，但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死。他还丢下了一把血淋淋的匕首，一支破烂的手枪和他的垂边毡帽。

这时候，在总统病室，曙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灰白色的光线使室内煤气

灯的黄色火焰和其他灯光显得黯然失色，总统眼看就要不行了。

清晨六点钟，韦尔斯走出门外，只见每隔几步就聚集着一堆人，其中有些人已站在那守候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人们向韦尔斯探询总统的情况，“没有希望了吗？”当听到他回答说总统很快就要不行了时，每一张脸上都露出了“极大的悲哀”，“特别是黑人，也许当时在场的黑人比白人多，完全被悲痛所淹没。”这种情景给了韦尔斯极其深刻的印象。

近七点钟时，韦尔斯走进房间，那位“人类之友”的体温在变凉，正在跨进那人人最后都得跨进去的冰冷世界。韦尔斯记述道：“林肯夫人马上来见最后一面。长子罗伯特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床边，罗伯特极力控制着自己，但有两次抑制不住悲伤，大声恸哭起来，转过头去倚在参议员萨姆纳的肩上。”

林肯的最后一次呼吸是在 1865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7 点 21 分 55 秒，最后一次心脏跳动是在 7 点 22 分 10 秒。死神降临了。阿伯拉罕·林肯，这个与闪电和长虹为伴在荒野草原成长起来的孩童，这个其名字与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奇式的人物，与世长辞了。

罗斯福总统的最后形象

——罗斯福之死

富兰克林·D·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位总统。1933年3月4日在美国经济萧条继续恶化的时刻，他正式就任总统，领导国家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深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带领美国同纳粹作战。1945年4月12日，二战结束前夕，他因脑溢血去世。他是美国第一位连任4届的总统。一些时间以来，那些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都颇为担心他的健康问题。早在1937年，总统已被确诊患有收缩性高血压，过了4年，又加上更严重得多的舒张性高血压。早在1943年，他就患过两次重病，一是流行性感冒，一是发烧，病因无法查明。由德黑兰回来以后，他又染上流感，晚上总说头痛，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又精疲力尽了。有时候，他一边说话，一边就睡着了。而有一次，他一边签字，一边倒头便睡，钢笔掉了下来，纸上沾上了墨水。

1944年3月，罗斯福听从夫人埃莉诺的建议，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去作检查。检查时，发现他心脏肥大，心脏周围的血管膨胀，血压高的惊人，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和心力衰竭。医生们建议总统休息。

7月间，总统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那时海军陆战队正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就要进行演习，在总统专用车厢“费迪南·麦哲伦号”上，突然，罗斯福脸色苍白，眼睛紧闭，痛苦地扭动着，气喘吁吁地说：“吉米，我怕是支持不住——我疼极了，”他的儿子想把这次活动取消，但过了几分钟，他又恢复过来，儿子的意见被否决。

第二次发作，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应邀去西雅图市演讲。特工人员建议他坐在一艘停泊的驱逐舰上，以舰上大炮为背景，对民众作演说。总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一切准备就绪，总统刚开始他讲演的第一段，忽然心脏病又发作。当时虽没人知道，但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心绞痛。接着那15分钟，他感到剧痛阵阵，横扫胸膛，肋骨架和双肩各处都极度疼痛。更不用说发表演说了。但这次只有他本人知道，至于他的听众，则感到失望，认为那次演说极不象样。他讲话时咬字含糊不清，平淡无奇，有时声音低到难以听见，而内容又杂乱无章，甚至连声音听起来也不像罗斯福。

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脸色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深陷，眼眶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和他漠视困难的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起当年的罗斯福。”

两周后，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安东尼·艾登认为总统和他们第一次晚会见时，思想模糊混乱。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看了总统一眼就肯定他是垂死的人。

他在必要时振作精神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艾伦·德鲁利当时是合众社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看到罗斯福坐着轮椅进来时，觉得他脖子骨瘦如柴，老态龙钟。但总统在退场前，仍然“用大家熟悉的姿态回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来向大家摆动，姿态和过去一模一样。”

1945年3月30日，总统来到佐治亚洲温泉疗养，4月11日下午，美第九集团军抵达易北河，12日是个好天气，有位邻居准备为他安排一顿烤全猪

的聚餐。这天，邮件迟误，他每天要批阅的大批文件还没收到，有人请画家舒马托夫人来给总统画像。

快到中午时，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他建议总统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当他批阅到参院 298 号法案时，画肖像的伊丽莎白·舒马托夫人来了。哈西特很快把散乱的文件收好，那位夫人把她的画架竖起来，帮总统把海军斗篷披在肩上。罗斯福继续埋头于文件。

总统在静坐中活动了一下，看了看表，下午一时了，他对舒马托夫人说：“我们只有 15 分钟了。”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看了一眼。她见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罗斯福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后来利齐对人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最后的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画像的姿势出溜下去，画家也知道再要他坐好已不可能。她看着他，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要在前额捏一下，但那只手垂下来，手指抽搐着，好像想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说：“您掉了什么东西么？”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声音极微，只有她听到——“我头非常痛。”他的手臂垂了下来，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来。那是下午 1 时 15 分。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命令，布鲁恩医生这时实际已成为总统的随从。他总是在总统近旁，一呼即来。早上 9 时 30 分在总统进早餐之前，布鲁恩医生对他进行过检查。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则颇高——高压 180，低压 110—120。但这并不考虑他的血压这样高已有一个时期。而且他精神也没有紧张。一周来，他和医生谈话时，对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表现曾一再痛加批判，但这天早上没提到这个问题。这时，布鲁恩跑进别墅来，见罗斯福歪倒在椅子上，靠扶手支托着。

总统的呼吸时断时续，并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已僵硬，高压达 300，左眼张得大大的。在医生看来，这些病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病人发生了严重的脑溢血。布鲁恩医生当时还不能确定严重程度，但他可以先行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兰色睡衣，然后，在随从的帮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总统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布鲁恩立即向在华盛顿白麦金太尔医生汇报，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士·波林医生去电话，请他尽快赶到温泉。波林抄小路，不到一个半小时便到了，他向麦金太尔汇报说：“我到达的时候，总统已经奄奄一息，他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的房间不到 5 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就已全部消失。那时是 3 时 35 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悄悄地蹲在卧室里，这时，它似乎感到发生变故，突然从角落里跳出来，冲出纱门，疯狂地汪汪大叫，窜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就像守灵似的。

“历史在我们面前爆炸”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经过

肯尼迪，美国总统（1961——1963 在任）。民主党人。出生富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海军上尉。1946——1960 年间历任众议员和参议员。任总统时期，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并建立“和平队”，实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加强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渗透活动。1961 年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1963 年 11 月被刺身亡。

1963 年 11 月 23 日，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们的肯尼迪总统不幸遇刺身亡，当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枪声在闹市区响起的时候，合众国际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恰好在总统车队的第五辆车上：

这是一个气候宜人，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驱车紧跟在肯尼迪总统的座车后面驶入达拉斯市中心。车队穿过商业中心区，拐上一条像是环绕一座公园的漂亮的高速公路。

我乘坐的是所谓白宫记者团的专用汽车；这是电话公司的汽车，车上装有无线电话。我坐在汽车前排，两旁是电话公司的司机和马尔科姆·吉尔达夫——总统在得克萨斯旅行期间的代理白宫新闻秘书。记者团的另外三名记者则挤在后座上。

突然，我们清清楚楚听到三声响亮得几乎震耳的爆裂声。第一声像是放爆竹声音，而第二声和第三声则毫无疑问是枪声。

总统的专车大约在我们前方 150 到 200 码，它似乎突然停了片刻。紧跟在总统防弹轿车后面的是特工人员专车，我们看见，这辆车里一片混乱。

林登·B·约翰逊副总统的座车跟在特工人员专车后面，再往后是副总统的警卫车，我们这辆车在这辆警卫车后面。

我们的汽车大概只停了几秒钟，可这几秒钟却像一辈子那样难熬。我们眼见历史在我们面前爆炸开来。即使是一个最训练有素的观察家，也难以一下子判断出了什么事情。

我朝着总统座车那个方向看去，却看不见总统和陪同他的得克萨斯州约翰·B·康纳利州长。他们两人一直坐在从华盛顿调来的防弹轿车的后排座位上。我似乎看见那辆车里有个粉红色的身影闪了一下——那大概是杰奎琳·肯尼迪夫人。

在我们这辆车里，大家都冲着司机大喊大叫，要他把车开列总统专车跟前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辆巨型防弹轿车和警卫车马达轰鸣，飞车向前开去。

我们冲着司机大叫：“跟上，快跟上。”我们的汽车一个急转弯，绕过约翰逊的座车及其警卫车，沿着公路猛开下去，即使是这样，也只能勉强跟上总统的座车和紧跟在后面的特工人员警卫车。

这两辆车拐过一个弯后便消失了。我们的车也拐过这个弯时，才发现前方是一家医院——帕克兰医院。这是一座大型砖结构建筑，座落在公路干线的左侧。我们的汽车急速左转，驶上医院的车道，没等车停稳，我们便纷纷从车里跳了出来。

我飞跑到防弹轿车跟前。

总统脸朝下倒在轿车后座上。肯尼迪夫人把胳膊垫在总统的头下，朝着

总统弯下腰来，象是在轻声呼唤他。

康纳利州长躺在汽车的地板上，头和肩膀靠在他夫人奈丽的怀里。奈丽在啜泣，已经哭不出眼泪，只是在摇头。鲜血从州长的前胸衬衣里不断流出来。我看不见总统的伤口，可是看得见溅在轿车前座倚背上的大片鲜血；我还看见，总统深灰色外衣被鲜血染黑了，这块污痕在不断扩大。

我已经从装有电话的记者团专用车里把三颗子弹袭击总统车队的情况向合众社达拉斯分社报告了。现在，看到停在医院入口处的轿车里鲜血淋漓的场面，我意识到必须马上找到一部电话机。

负责照料肯尼迪夫人的特工人员克林特·希尔正要躬身钻进轿车。我问他：“总统的伤势有多重？”

他只说了一句话：“他死了。”

我记不清楚当时车道上的情景了，只记得我耳中充满了人们急切、紧张的话音：“担架到底在哪儿？……叫医生到这儿来……他正往这儿跑呢……快，这儿好走。”以及什么人神经质的呜咽声。

在我打电话的时候，运载总统和州长的轮床正从我身边推过：但是，由于我背向走廊，直到它们被推到 75 至 100 英尺之外的急救室门口时我才看见。

窗口内那个男人的表情突然变了，这时，我才下意识地感觉到有人把他们从我背后推过去了。

白宫新闻官员吉尔达夫在走廊里奔来奔去。警官大声叫嚷：“把没事儿的人都轰走！”两位神父跟在一个特工人员身后匆匆走来，手里拿着一团卷得紧紧的法衣披肩。一位警官捧着一大瓶输给伤员用的鲜血跑了过去。又来了一位医生，他说，有人通知他“所有神经外科医生”立即到这儿来。两位牧师走出急救室，说总统已经接受了天主教的临终圣事。他们说总统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这时，肯尼迪的随行人员也陆续赶到医院，在车队里，他们的汽车紧跟在我们后面，刚才发生了交通混乱，所以他们来迟了。

一放下电话机，我就穿过整个医院飞跑回会议室，白宫交通处官员吉格斯·福沃一把抓住了我，说吉尔达夫请 3 名记者立即乘总统座机“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

我登上了“空军一号”，只见所有主舱的窗帘都拉上了。舱内很热，光线很暗。

我挤进舱门，数了数舱里竟有 27 人。约翰逊站在正中央，他夫人伯德女士站在他身旁。面容慈祥，67 岁的美国地区法院女法官萨拉·休斯手拿二本黑皮《圣经》站在一边，等着领读誓词。

机舱里越来越热。看到还有不少肯尼迪班子的成员进不得舱来，约翰逊心里很着急。他要大家再往前挤挤。可是站在杄杄里一张椅子上的通讯兵摄影师塞西尔·斯托顿上尉说，如果约翰逊再让大家往前挤，那就不可能拍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了。

原来，约翰逊在等肯尼迪夫人；她正在飞机后部的小卧舱里设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最后肯尼迪夫人孤零零地出现在舱口，还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羊毛衫。就是在今天上午，她穿着这件羊毛衫同丈夫一道同聚集在机场的欢迎者热情握手。

她面色苍白，眼中已没有了眼泪。她脚步略带蹒跚地走进舱来，朋友们的手都向她伸了过去。约翰逊握住了她的双手，让她站在自己的左边。伯德

女士站在约翰逊的右边，脸上带着一丝僵硬的微笑，显得很紧张。

约翰逊向休斯法官点头示意；她是约翰逊一家的老朋友了，是肯尼迪任命的法官。

女法官对约翰逊说：“请举起右手，跟着我宣誓。”

飞机外，一架喷气式飞机正在降落，隆隆之声清晰可闻。

休斯法官捧着《圣经》的手伸了出去，约翰逊把他巨大的左手放在《圣经》上。他的右臂缓缓伸向半空，法官开始用舒缓的语调宣读宪法誓词：“我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

约翰逊以低沉，坚定的语调跟着法官念到最后一句：“……愿上帝给我以帮助。”简短的仪式到此结束。

约翰逊先转向他的夫人，拥抱她的双肩，吻她的面颊。随后，他又转向肯尼迪的遗孀，用左臂拥抱她，吻她的面颊。

机舱里的人们——其中有几位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议员——都拥到新总统的跟前，但是新总统一看到谁要表示祝贺，便不由自主地往后缩。

两分钟的仪式于东部标准时间下午3时38分结束。几秒钟后，总统坚定地地下令道：“现在起飞。”

在总统座机飞平之后，肯尼迪夫人离开卧舱来到飞机后舱。这是总统家庭专用舱室，在这儿，他曾经和肯尼迪，其他家人和朋友们一道谈笑风生，共进餐，度过了许多快乐的空中旅行时光。

肯尼迪的灵柩就放在这个舱室里，是由几名特工人员抬到飞机上的。

肯尼迪夫人来到后舱，搬过一把椅子坐在总统的棺木旁。在整个飞行途中，她一直坐在那儿。总统的4位亲信幕僚不时进来陪她守护遇刺身亡的丈夫。

肯尼迪的侍从武官切斯特·V·克利夫顿少校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前舱忙碌，他传达各种命令，安排飞机抵达机场后的仪式和将总统遗体送往贝瑟斯达海军医院事宜。

当“空军一号”掠过灯火辉煌的华盛顿市区上空。准备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着陆时，天已经黑了。飞机于东部标准时间下午5时59分着陆。

只见一队担架兵把总统的棺柩从飞机后梯抬下来，放在一辆早已等候着的灵车上。我们看见肯尼迪夫人和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登上灵车，坐在棺木旁。

新总统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麦克风又读了一遍他上任后的首次声明。在同迎接他的政府领导人和外交官一一握手后，他率先向总统专用直升飞机走去。

有人把罗伯茨和我安排在另一架将在白宫草坪降落的直升飞机上。机舱里，在舷窗边的大椅子上坐着西奥多·C·索托森。他是肯尼迪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他没有陪总统去得克萨斯州，却到这个空军基地来迎接他的遗体。

面容憔悴的索托森坐在大椅子上低声哭泣。他那深切而庄重的悲痛，似乎概括了前6个小时中发生的悲剧和由此引起的哀伤。

当我们的飞机在宜人的夜空中盘旋，准备在白宫南草坪降落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就在6小时前。约翰·肯尼迪还是一个声音洪亮、面带微笑、不时向人们挥手致意的活生生的人。

星条旗上的光辉

——美国巴顿将军之死

1945年5月6日是巴顿将军率领的第3集团军战斗的最后一天。

5月7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它全部的陆、海、空军无条件地向盟军投降。

枪炮声停止了，巴顿很感失望，因为他过于习惯战争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欢呼又使他很快振作起来。这位在两年半之前还只被少数职业军人和曲棍球爱好音所了解的人，现在成了一位历史性人物。这位在西西里受到指责，在英国由于无关紧要的口误而受到非难，之后又侥幸没有被撤职的坚韧不拔的老战士，现在成了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最受欢迎的伟大圣战的英雄。难以忍受的折磨已在胜利时得到的辉煌的奖赏中忘却了。

巴顿凯旋回美，引起了不同人的不同反应，因为巴顿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位令人迷惑不解的人物。

当巴顿被邀请到波士顿讲演时，他仍然以战时的那种紧张势头去发表演讲，显然是为了保持国内战线对日作战的高昂士气。巴顿坚持用激昂的语调，继续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眉飞色舞地大喊大叫他讲话。

由于他的颠狂的言词和激动的感情，他多次受到牧师、知识分子、甚至“星条报”的批评。他们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解释，他把和平和战备联系起来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不幸的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却又像一个好战分子在号召对另外一个敌人重新开战。

显然，他的为打仗而打仗的嗜好受到了严厉的抨击。不久之后，这位胜利的英雄的形象又变得暗淡起来。在他事业的顶峰存在着一点阴影——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有点不正常。

很难确切地说明他们俩人互相不满的原因。实际上，这俩位伟大战士的关系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而紧张起来的，直到战争结束时人们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巴顿那些激动而敏感的部下对最高司令部的不满已不时带有怨恨的情绪，时而发脾气，时而进行嘲弄，其中有些是针对艾森豪威尔本人的。这类令人不快的俏皮话最初来自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并且由于不断他讲来讲去最后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耳朵里。

这种话说明了巴顿部下普遍的情绪，就巴顿来说，他极力想表白自己与这些公然侮辱性的比喻没有关系。

艾森豪威尔天生的耐心和容忍，他的开朗性格和诚挚的天性，使他具有宽宏大量的气度。但他对巴顿的宽容几乎达到了要迸裂的程度。在艾森豪威尔的情绪中带有一点怨恨，再加上一点报复心理，他就以自己微妙的方式来回敬巴顿对他的敌意。

艾森豪威尔对巴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偶尔耍的手腕冷冰冰地不予置理，并且对巴顿随后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明显地不予赞赏，这就使巴顿清楚地感觉出这位最高司令官在细小之处所体现出来的敌意是很尖刻的。在凸出地带之战快要结束，他们在巴斯托尼会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得意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对巴顿的战绩却只字不提。后来，在占领特里尔之后，巴顿兴奋地打电话报告这一消息，他当时明明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同布雷德利在一起。

可是使巴顿感到非常失望的是，布雷德利向巴顿表示了祝贺，而最高司令官却认为没有必要也对他表示祝贺。

战争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巴顿又一再碰到了胜利者的一些烦恼问题。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又回到他最不适应的职位上来了。如象两年半前在摩洛哥一样。他又是一位美国行政长官了。但是，这次是在德国，他所面临的问题的错综复杂，远远超过他在卡萨布兰卡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可是，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两点。一点是同盟军俄国人打交道，另一点是随时都碰到纳粹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些伤脑筋的问题。

像巴顿的大多数思想倾向一样，他对“俄国问题”的态度也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纯属个人方面的，带有他的易冲动的气质所产生的所有偏见：另一个是超然的，严格属于职业性的。就其个人来说，他就是不喜欢那种使人莫名其妙的机器人似的“新式”俄国人，也就是陆军情报局里的人类学者所谓的“苏维埃人”。这种思想感情是不近情理和武断的，也许只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没有足够的了解，从而不能做出正确或公正的评价。巴顿不论何时听到苏联代表来访，都指示科克上校为苏联代表准备一份精心篡改过的地图，并且告诉加菲或盖伊将军尽可能少给他们看，尽量伪装得巧妙一些。接着他便离开司令部，呆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直到来访结束。

少数他不能避而不见的红军军官，也没有改变他的成见。他们给他的印象是一些阴郁的、沉默寡言的、相当粗野无礼的家伙，他们的疑心和对人的不信任就像臭汗一样从他们的毛孔中渗透出来。从他本人的上层社会的角度来看，巴顿认为这些呆头呆脑的红军高级军官都是一些不懂礼貌的、像福斯泰夫一样肥胖的土包子。

战争停止后不久，当巴顿在柏林的一次联合阅兵式中第一次同俄国人正式见面的时候，他表现得极为幼稚。只是由于一位苏联将军意外善意的诙谐的言语，才在紧张的时刻避免了一场虽然很小但却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在这次阅兵式中，对苏联同行来说，巴顿显然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整个阅兵过程中他们不时地把眼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并且向他投来一些令人难堪的微笑。而巴顿对他们就像对待最下贱的畜生一样，紧紧地皱着眉头。尽管巴顿表现了这样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一位俄国将军还是派了一名翻译到巴顿这里，邀请他在阅兵之后去饮酒。

“告诉那个俄国狗崽子，”巴顿吼叫着回答，“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我的敌人去喝酒。”

那位翻译吓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话告诉那位将军。”

但是，巴顿命令他，要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出来，那位翻译勉强照办了。那个俄国人听了哈哈大笑，并且又说了一些话，翻译告诉巴顿，“将军说，他对你的看法恰好同你对他的看法一样，先生。他问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同他一起饮酒呢？”最后他们还是一同去喝酒了。

有一次，一位俄国将军来访之后，巴顿评论说，不可否认，布尔什维克提高了俄国人民的水准，把俄国人从普通的士兵和一般的工人提高到了军士和工头的水平。这就是他所乐意给的最高的评价。他不能想象，他同红军中的同行们会友好起来——那些魁梧的红军元帅们宽阔的胸前挂满了勋章，就像经过四个小时表演之后得了奖的斗牛身上披着缎带一样——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他们不是他那种类型的绅士。

在9月7日盟军联合举行的庆祝对日战争胜利的阅兵式上，巴顿会见了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他身穿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多么像滑稽剧里的人物。他身材矮小，胖胖的，长着像猴子一样的尖下巴，但是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他在第4俄罗斯近卫军司令部接受一级库图佐夫勋章的仪式上会见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费多尔·托尔布欣元帅，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极其无能之辈，整个授勋期间他都汗流浃背。”这就是他的全部看法。

巴顿还讲了他对俄国人的总印象：“这些军官们，很少有例外，从外貌看来像一些刚刚开化的蒙古匪徒。”他对“苏维埃人”的蔑视，使他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带上了有色眼镜。

巴顿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并不是一般的偏执狂类型。巴顿是从军事方面去应付“俄国问题”的。他研究了苏联在世界上新的态势的影响，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从后来多年观察的结果，具有卓越的预见性。

巴顿压抑在心头的忧虑，以及他对美国官方对苏联明显的宽客政策的恼怒，终于在一次同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的奇特电话谈话里爆发出来。麦克纳尼是他的老朋友，他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而来德国工作的，艾克不在时，他就代理战区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大型法本公司建筑物中。司令部里仍然保持着盟国之间合作的精神。苏联人抱怨说，在巴顿的美国军管政府管辖下的地段内的几支德国部队遣散和拘禁工作太迟缓了。当麦克纳尼向巴顿转告这一抱怨时，巴顿完全失去了控制，再也抑制不住他对美国对苏政策的不满。

“他妈的，”巴顿发作了，“你为什么非要管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怎么想法？我们早晚总要跟他们打仗的；就在下一代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趁我们的军队比较完整的时候，把这些该死的俄国佬在三个月之内赶回俄国去呢？如果我们掌握的德国军队武装起来，并且让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干这件事的；他们恨透了这些杂种。”

当然，巴顿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荒诞、轻率和政治上幼稚的谈话是他的事业开始的开始。这次谈话使麦克纳尼相信，巴顿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确实不适宜管理这些战败的德国人，不管怎样，在德国，纳粹主义还没有肃清。巴顿迟早要蒙受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耻辱，他将把这个耻辱的创伤带进坟墓中去。

巴顿的眼睛一直盯着要与苏联摊牌，于是他不仅开始使俄国人恼火，而且也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使驻德国的美国军管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都感到震惊，这些官员并不像巴顿那样准备忘记不久的过去和原谅德国人的卑鄙行为以及纳粹的罪行。

但是，很快巴顿就愿意掩饰过去，并且对所有的德国人（纳粹分子、反纳粹分子、还有其他人）都根据他们在反苏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进行评价。也许是由于他的新工作和新职责过于安稳平静，因而使得这位暴躁好动的人在他的沉重职务面前显得如此烦躁不安，莽撞而不负责任。8月10日他表达了他战后职业的感觉，他发现使自己闲散一下是多么困难。他无处消耗自己旺盛的干劲和充沛的精力。

由于他的怪诞和倔强的内在矛盾，所以他在德国的行为极不协调。例如，

7月28日，他耀武扬威地到他所管辖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去巡视，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呼。然而，过了没有几天，由于他下令迁走大约1500名纳粹德国强加给捷克人民的波兰法西斯分子，保护他们免遭布拉格政府准备给予的惩罚，因而激起了捷克人的愤怒。

到了9月份，巴顿的日子已十分难过。他雇佣了一个德国人，而这个人经历清楚地表明他是德国党卫队的，为此巴顿受到了公开的批评。他整天忧虑苏联的威胁。类似的忧虑后来把詹姆斯·福雷斯特尔逼得自杀。现在巴顿对德国的一切事情都以苏联威胁作为出发点来衡量。

德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乔治·巴顿将军是他们的朋友。在巴伐利亚，巴顿所到之处都受到德国人的欢呼。他们从窗口抛出鲜花，高呼：“他是我们的救星，他从俄国强盗手中把我们拯救了出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以致使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得不接连两次警告巴顿。

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巴顿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在香蕉皮上摔了致命的一跤。9月22日，当将级军官的谈话不得援引的禁令一取消，巴顿就在巴特特尔茨他的四面围墙的塔楼形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首先提出的是关于他对待纳粹分子的这个爆炸性问题。巴顿热切地回答记者的问题，毫不顾及他自己如履薄冰的处境。其中一位记者感到这正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巴顿不够谨慎的时刻诱使他谈谈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他便满不在乎地问道，“将军，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难道不就是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情形差不多吗？”

巴顿没有觉察出这是一个圈套，便一头栽了进去。他说，“是的，差不多。”

这位记者获得了他报道的标题：“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而且相类似的词句出现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每一张报纸上。

巴顿又重蹈覆辙。而且这一次，对他有利的情有可原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战争已经结束，巴顿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他是可以牺牲的了。现在巴顿已经没有宽容的时间了，也没有时间去适应新的声名狼藉的状况了。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罪过比在特洛伊那附近打了两个士兵的耳光更为严重。他侮辱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可以进行报复的敌人——美国的两党制。

在愤怒的风暴越来越猛烈，以致达到如同龙卷风的程度时，巴顿仍然保持着奇怪的、几乎是病态的沉着镇静。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用巴顿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不屑一顾。巴顿最新的一次丑闻已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和气愤，特别使他越来越感到恼怒的是巴顿一再干出的荒诞行为。近几个月来，已经有好几次他不得不警告巴顿，他已忍无可忍，他很快就没有任何耐心再来解救巴顿了。

最近的这次事件是从4月18日开始的，那一天巴顿撵走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新闻检查官（巴顿是无权管他的），因为他批准通过了关于对哈默尔堡的进攻注定要失败的报道。布彻事后写道，“艾克已经剥掉巴顿的皮了，但是我想巴顿一定有许多张皮，因为这至少是艾克将军第四次剥掉他开路先锋的皮。”但现在看来巴顿只剩下最后的一张皮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意识到，这一次他再也不能保全巴顿的皮了。但是他仍然决心给巴顿这位暴风雨中的海燕一个解脱自己的机会，通过一次公正

调查的正当程序。他指示罗伯特·墨菲查清这次事件的全部情况，对巴顿坠入一个狡猾的记者的圈套所造成的损失做出估价。但是要求处分巴顿的压力很大，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决定在收到墨菲的报告之前，就亲自处理此事。

巴顿奉命又出现在记者的面前，并且完全按照艾克的指示。但是，在其它方面巴顿并没有从他原有的立场上后退多少，艾森豪威尔对此极不满意。这只能使他更加深信，巴顿不适合处理前纳粹分子的工作，甚至也不适合管理巴伐利亚。他指示史密斯再给巴顿打电话，这次是命令巴顿来赫希斯特见艾克，表面上是要他亲自汇报他治理巴伐利亚的情况。

这次可悲的对抗发生于9月28日，地点在房门紧闭的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里，当时驻艾克司令部的全体记者都云集在走廊上，等待着这一轰动事件的结局。恶劣的气候使巴顿不能直接飞往法兰克福，他从巴特特尔茨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300英里，于当天傍晚到达这里进行摊牌。他的装束比他的表情更为庄重，这表明他本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和严峻的时刻。他下身穿的是简朴的士兵裤，而不是他那漂亮的马裤，上身就是一件艾森豪威尔式的夹克。没有佩带手枪。

他与艾森豪威尔密谈了两个小时，多恩博士和克拉伦斯·阿德科克少将参加了头半个小时的会谈，他们当着巴顿的面出示了他们调查来的材料，为艾克决定采取的行动作好了准备。当这次会谈在晚上不到7时结束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友谊也就此破裂了。

这次艾克挥起了大斧，砍掉了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巴顿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地离开了艾克的办公室，他心中充满了怨恨，如同毒芹的酸味一样。到这时候，他完全看不到艾森豪威尔所必须肩负的更大的责任；他认为艾克忘恩负义，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在二十五年前开始的友谊逐渐破裂，巴顿相信他现在认识到亨利·亚当斯的一句名言：得势朋辈丧情义。艾森豪威尔没有别的选择。如果说他有什么错误的地方，那就是他把管理巴伐利亚的工作交给了巴顿，但是那在当时也是无法回避的。战后巴顿的任用是陆军部推给艾森豪威尔去处理的一个难题。早在5月1日他就开始准备把他的部队调往太平洋地区了。

最高司令部里都知道，罗斯福总统曾答应巴顿，一旦欧洲战争结束，就立即把巴顿派往太平洋地区。但罗斯福逝世了，原来的诺言也不存在了，当时布彻在日记中写道，“巴顿的前途未卜，”“他总是说，他愿意战死在疆场。”

他最终确是死于战斗。但这并不是他所渴求的那种战斗，也不是他可以大显身手的战斗。

为了给这位被遗弃的英雄挽回面子，在10月2日的公报中使用了含糊其辞的语言，将巴顿任命为所谓的“美国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但是称它为“集团军”是极为勉强的。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支包括司机、炊事员和宪兵等在内的小规模的“服务部队”而已。他们是为一大批军官服务的，这些军官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根据现存的资料，编辑一种从欧洲战争开始到德国投降这一时期的军事史。

巴顿作为一个将军的使命看来已经终结。但是他仍然被允许去从事一种他还比较喜欢的职业——当一名历史学家。

老于世故的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表示了他最后一次的宽容姿态，问巴顿希望任命谁来作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接班人和巴伐利亚的新长官。“卢西恩·特

拉斯科特”，巴顿毫不犹豫地说。

10月5日巴顿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概括了他在结束自己事业这个令人心碎时刻的感情：“我虽然头破血流，但并没有低头。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又使你担忧了。我一直在帮助卢西恩熟悉工作情况，他的情绪相当消沉。我没有责怪他。有几天我极为伤心，但现在我又恢复正常了。”

两天以后，第8集团军在巴特特尔茨向乔治·巴顿将军作最后一次报到，聆听他的告别演说。

“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巴顿抑制着眼中闪烁着的泪花，把他最自豪的东西——第8集团军的军旗交给了特拉斯科特将军，军旗上是第8集团军的著名象征，一个由红、蓝色环绕着的大型白色“A”字。

1945年11月11日是乔治·巴顿60岁生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这是一个算总帐的日子，而此时他在生活中并不完全是心安理得的。他曾经大胆表示不满，这使他失去了第8集团军的指挥职务。然而，他在一连串的失意中发生的这最后一次失意已不再使他感到怨恨。不管怎样，不满现状总是他前进中的起点。

他回顾往事并不悔恨，相信自己渡过的一生是美好而有价值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写道，“想到我最后领取军衔的时刻已经过去，使我感到十分悲伤。但是，对于上帝赐给我的机会，我至少已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他是一个任性而果断的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好表现的作风，是由他的内心世界所形成的。他总是拿命运开玩笑，并常常使命运屈服。但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长期的事业给他带来了最高的报偿。《纽约时报》在他最后一次事件之后写道，“巴顿将军已从当前的论争进入历史，他必将名垂史册。”

眼下似乎又充满美好的前景。当他的生日快要来到的时候，曾经在他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因而感激他的人们，给他送来大量的礼物。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一些地方，诸如凡尔登和圣提埃丽这些地名使人回忆起古今许多战役而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地方正在计划授予巴顿荣誉市民的称号。比利时奖给他战争十字勋章并授予他利奥波德最高荣誉勋章。小卢森堡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公民，授予他阿道夫·德·拿骚骑士大十字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

在美国，巴顿这位即将返回的浪子，又在逐渐复原有的地位。纽约市正在为欢迎他做好抛彩带游行的准备。在他的生日前夕，人们已经知道，巴顿已内定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暂离欧洲时，担任驻欧美军总司令。

巴顿本人直到临终，都是以塞涅卡的那种达观的平静态度来看待为他恢复名誉一事：除了以前消逝的一切，什么也没有失掉！他在内心深处，开始为自己的灵魂寻求安息。人们可以听到他谈论退休，但他不愿就此止步。关于他个人未来的打算似乎并没有确定，他把自己置身于虚无飘渺的神秘气氛之中。

战争刚刚结束，他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事实上有点近乎死亡的祝愿——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在和平环境中当老百姓的前途把握不定。他一直信守他的信条，这有点象烈士以身殉职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一再重复说，“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落地死去。”

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有好几次虽然不是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但他的愿望差一点就得到满足。1945年4月21日，当他飞往雷德菲尔德第3军司

令部时，他的座机遭到攻击，原以为攻击是来自一架德国战斗机，后来发现是一位自愿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缺乏经验的波兰人驾驶的一架喷火式飞机。5月3日，当巴顿的吉普车以其惯有的高速行驶在公路上时，一辆牛车突然从一条死胡同窜到公路上，轰隆一声，巴顿几乎丧命。米姆斯军士虽然设法避免两车相撞，但是绑在牛车上的一根突出长杆还是擦伤了巴顿将军的头部。

他对科德曼上校说，“在我身经百战之后，竟然险些被公路上的牛撞死！”

6月份他到达美国时，强烈的死亡预感盘据在他的心头。他谈论死亡，认为他在今后的年月里无所事事，还不如死了更愉快和可取。他对他的孩子们说，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不同意这种悲观的预言，但巴顿没有理会他们，并且神秘地说，“真的，有人已经向我透露了。”

他在美国最后的一天是在南汉密尔顿家中同他妻子比阿特丽斯幸福安静地度过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家，但很少有闲暇享受这种清福。这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宁静、最亲密的时刻。他们就坐在沙发上，手拉着手，望着“绿草如茵”绵延起伏的田野——比阿特丽斯虔诚地默默不语，巴顿将军神色忧伤。在某些人，甚至最亲近的人看来，他仿佛正在同过去决裂。但实际上，他正在庄严地度过他生活中这一最动人心弦的时刻。

10月13日，屡遭厄运的巴顿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又受了点轻伤。12月9日，他走上了他生活中最后的行程。

那是一个星期天，巴顿打算到莱茵法尔茨地区的施佩耶尔附近去打鸟，那里森林中的野鸡很多。11点45分，他同霍伯特·盖伊少将（仍是他的参谋长）乘坐着巴顿手下的一名23岁的上等兵霍勒斯·伍德林驾驶的小轿车，正在由法兰克福到曼海姆的38号公路上向南疾驶。一位名叫乔·斯普鲁斯的中士开着一辆0.25吨重的卡车跟在后面。

在穿过曼海姆北郊和越过四通八达的铁路路轨时，伍德林把车速减到每小时十英里，驶上开阔的公路之后，又把车速加到每小时三十英里，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天气晴朗。

驶过铁路之后，斯普鲁斯中士驾车越过巴顿的座车，在前面引路。他发现有一辆大卡车在另一条行车道上以大约十五英里的时速开过来，当他驶近公路左侧的快速道时，显然把速度减慢了。

巴顿显得怡然自得而神态安祥，与盖伊漫不经心地聊着天，当他环顾农村的景色时，他那双好奇的小眼睛不时地左顾右盼。到处都堆着刚结束的战争中丢弃的破烂东西。上午11点48分，巴顿的轿车穿过两旁堆满废弃物资的道路，他指着公路的右侧对盖伊说：“多么可怕的战争！你瞧这些被丢弃的车辆，哈普！”然后他又转向另一边，叫道，“看那一堆废物！”

伍德林的视线也不禁离开了公路。正当这时，那辆卡车的司机罗伯特·汤普森独自一人坐在驾驶室内，发出了向左转弯的信号，并且把他的车以90度的角度越过公路，他想横穿公路，进入半隐蔽的快车道，驶向在公路边的后勤部队营房。

伍德林又把他的视线转向了公路，但已为时太晚。正当大卡车眼看要撞上他的车时，伍德林突然紧急刹车并且猛地转弯，卡车司机汤普森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避免相撞。小轿车撞进了卡车的油箱，车头撞瘪了，但看来还是一次较小的车祸。盖伊、伍德林和汤普森只是受了点轻微的震荡，但没有受伤。

巴顿可就不一样了。他坐在后座的右边，先是被甩向前面，然后又猛地被抛向后面，他的头部向左边歪倒，全身无力地倒向盖伊的怀里，鲜血从他前额和头部的伤口涌出来，但是他仍然坐起来，神态很清醒。他是第一个开口讲话的。他问盖伊，“你受伤了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伤着，你怎么样，将军？”盖伊问道。

“我觉得我瘫痪了，我感到呼吸困难，帮我活动一下手指，哈普”。巴顿说。盖伊帮他活动了几下，巴顿又说，“再来，哈普，活动我的手指。”

但是盖伊说，“将军，我看还是不宜让你活动。”

一个由彼得·巴巴拉斯中尉率领的第8081宪兵连的小分队赶到现场，用汽车把巴顿送到了第7集团军管辖区海德尔堡的第130驻军医院。

当巴顿被送进外科手术室的时候，他显然是受了震荡而神志仍然清醒，他只是说，“我的脖子痛。”

车祸的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巴顿在西线特遣部队的军医主任艾伯特·肯纳少将（现在是战区军医）几小时之内就赶到医院来负责治疗。牛津大学著名的神经外科教授休·凯恩斯准将也从伦敦飞来参加会诊。X光照片很快就为他们的诊断提供了必需的确切依据。

调光照片表明，“第三颈椎单纯骨折，第四颈椎后部错位，第三颈椎以下完全瘫痪。病危，预后不定”。

用外行人的话说，这意味着巴顿的颈部折断，颈部以下完全瘫痪。

比阿特丽斯·巴顿一接到出事的消息，就准备同美国陆军医疗团为他丈夫派出的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一道飞往海德尔堡。当巴顿夫人还在空中，她的飞机正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顶风前进时，在海德尔堡的医生们又发表了一份公报。巴顿仍处于危险状态，但是医生们满怀希望地说，颈部错位经施用牵引术效果令人满意。病人一夜安静，睡了大约五个小时。

巴顿感到相当舒服，神志完全清楚，甚至是轻松愉快的，他的幽默使医护人员的忧虑也有所减轻。当夜班护士伯莎·霍尔中尉给他一支玻璃管让他吸水时，他佯装生气地回绝说，“我才不喝这个鬼东西呢，除非它是威士忌。”

天主教牧师安德鲁·怀特上尉是第一个前来看他的牧师。当他在巴顿的床边为病人念完祷词的时候，他对巴顿说，“将军，顺便告诉你一下，你本人的牧师刚到，他一会儿就来看你。”他说的是圣公会的驻院牧师威廉·普赖斯，巴顿急切地问道，“你说的是奥尼尔神父吗？”——他以为是第3集团军的牧师奥尼尔上校。“好吧，”他对怀特牧师说，“带他进来，让他为我祈祷吧。”

巴顿夫人在12月11日下午三点半到了医院，先被引到巴顿病房所在的一层大厅里的一个房间。她被带到巴顿那里，看到他正在安静地躺着，吃着一些滋补食品。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体温华氏100度，脉搏每分钟70次，呼吸22次。他带着感激的微笑欢迎他的妻子，对她说，“比阿，恐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

到了13日，巴顿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医生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用飞机把他送到波士顿。130医院是一所小医院，但它可以同欧洲任何一座医院相媲美，它具有为巴顿治疗所需要的一切设备，在这里他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护理。然而巴顿夫人觉得，把巴顿送往“绿草地”家乡附近治疗，将会有利于他身体的康复。这个意见得到了斯帕林上校的赞同。事实上，随着巴顿病情的继续好转，医生们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们担心，他可能会终身瘫痪。

直到 12 月 19 日的下午，已顿的病情一直如公报所说，“有着十分满意的进展”。但是，后来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由于积存在支气管中的粘液受到颈骨碎片的挤压，开始造成他咳嗽的困难。同时脊髓的压力也增加了。

20 日下午二时，他突然呼吸困难，脸色灰白，一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些症状使斯帕林上校相信，巴顿患了肺栓塞，这是由于在血液循环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血块，从心脏压入肺部，它可以致人死命。斯帕林医生说，“当一个人年老，卧病瘫痪在床的时候，他可能在上肢或下肢的血管中形成这种血块。它往往是老年人患病时的大敌。”将巴顿当作或说成是老年人，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巴顿确有过血栓塞的病史，八年前他在波士顿医治腿骨折时，曾两次得过血栓塞，后来终于治好了，医生们称之为侥幸。然而这一次像这样的侥幸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巴顿最初伤势恢复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后来血栓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痰越积越多，咳嗽更加困难。肺积水不断增加。但也不时地又有点好转。医生们正在防止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越来越明显，巴顿将军正在经历他平生最大的一次搏斗，他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巴顿的神志一直是完全清醒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昏迷。他说话声音虽然很微弱，但仍然和经常在他床边进行护理的年轻医生威廉·杜安上尉和日班护士马杰里·朗德尔中尉互相逗趣。他十分坚强，努力设法安慰他忧心忡忡的妻子。

12 月 21 日下午二时，巴顿睡着了，他的妻子踏着脚走出病房。三点钟，斯帕林上校进来看他，他已醒来而且心情愉快，他告诉斯帕林，他好一些了，感到很舒适。然后又睡着了。他虽然呼吸显得沉重，但没有临终前挣扎的外部症候。

实际上，那一整天他的病情都十分危急，他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第一次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但是一直到傍晚时分，他都挺住了。5 时 49 分。巴顿正在安然沉睡，但是朗德尔中尉还是看了看他，因为他觉查出病人已经不行了。她召来杜安上尉，杜安马上沿走廊跑去，召唤巴顿夫人。巴顿夫人立即赶来。但当她来到床边时，巴顿已经停止了呼吸。

5 时 60 分，巴顿死于急性心力衰竭，他的左肺也受到血栓塞的袭击。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宣布，“巴顿将军长眠不醒，溘然逝世。”

这样的死，与巴顿是不相适宜的。

在一个细雨濛濛、浓雾弥漫的 12 月的早晨，巴顿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第 3 集团军的 6,000 名烈士葬在一起。举行葬礼的前两天，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海德尔堡一所豪华的住宅赖因纳尔别墅里，供人瞻仰，美国军人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排着队，川流不息地向这位伟大的士兵告别，他已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很快就要返回家园了，他永远也不能回家了。甚至在墓地上，他与他的士兵们亲密无间。在坡度渐缓的高岗上面，紧挨着他的是上等兵、底特律人约翰·赫齐瓦恩的坟墓。

人们唱着圣经中的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

在葬礼的最后时刻，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州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柩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米克斯热泪盈眶，脸绷得紧紧的。

他慢慢地鞠了一躬，把旗帜交给巴顿夫人。然后木然地向她敬了一个礼。

瞬息间，两人的目光相遇，相互凝视了一会，米克斯军士长转过脸去。一支12人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三响，枪声在卢森堡的群山之中回荡。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最令人感动。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而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它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而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有人曾把他同杰布·斯图尔特、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菲尔·谢里登相比，但是他所经历的战斗场面超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也许他宁愿在他所热爱的部下都在忠诚地跟随着他的时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着他。”

光绪皇帝的末日

1889年1月2日，这天是清朝皇帝大婚的喜日子，但看上去光绪皇帝却是愁云满面，十分不快。他对太后强迫册立她的内侄女——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为皇后极为不满。他深知这是太后为了监视和挟持他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白天他借口身体不适，撤去了大婚午宴，使群臣不欢而散，晚上闲人一撤，他就下了龙床，独自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其实光绪对坐在对面床上的表妹隆裕皇后，并没有什么成见。但是一想起慈禧在册立皇后时，那颐指气使的跋扈之态，心中就猛腾起一股无名怒火，他感到和皇后在一起，就像慈禧太后在身边一样周身不适。就这样，坐了半夜，想了半夜，天刚微亮就起身去看珍妃去了。

珍妃是侍郎长叙的女儿，这年才13岁，正值豆蔻年华，不仅容貌出众，才气也是极高的。左右手都能写得一笔媚秀的小楷。而且经史词章也读过不少。入宫前，还跟颇有些新思想的名才子女廷式学习过一年。这次和她15岁的姐姐瑾妃同时选进宫，就住在西厢的庆云斋。

初一见面印象就极好，一对乌溜溜的眼，娇憨之中，未脱稚气。回皇上话时，一反别人在他面前那种唯唯诺诺之态，想说就说，毫无忌惮，好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光绪感到新奇，觉得和她在一起时，好像有一股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心里顿时会轻松很多。光绪喜欢珍妃在他身边那种开朗大方、不循法度、潇潇洒洒、自然天成的神态。他们一起谈古论今而出以娓娓情话的模样，使他感到少有的一种友朋之乐。在珍妃入宫前，他常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勉强有点朋友味道的，只有一个翁师傅，但顾及君臣和师徒之分，始终很难畅所欲言。只有珍妃，她不但多才多艺，思想开通，更重要的是，只有她才能理解当今皇上的处境和苦衷。

珍妃知道，光绪自登基以来，没有当过一天真正的皇上。凡事却要秉承懿旨，做对了记在慈禧身上，做错了记在光绪身上。偶尔未经慈禧允许颁发了上谕，如不顺慈禧心意，便横加干涉，勒令推翻，甚至当众训斥责骂。久而久之，那些朝臣和地方督抚以及大内宫监，就都不把光绪放在眼里。甚至皇帝赐给亲王大臣的礼物，派人到内库支取，只要首领太监说一声：“老佛爷知道吗？”便无人敢给了。这一切珍妃都看在眼里，整个宫中，只有她敢竭尽全力为光绪出些主意，分担忧愁，想方设法为他消解胸中的气闷。这在后宫不准参预朝政的严厉桎梏下，确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光绪皇帝特别喜欢珍妃，两人经常在一起，真是知己同心，情意绵绵。

自皇上大婚以来，慈禧的心情越来越坏，总觉得一股无名怒气压在胸中，激得肋下隐隐作痛。近些日子皇后常来诉苦，一见面就哭得像个泪人儿。查敬事房的“承幸簿”，皇上自大婚后再也没有临幸过隆裕的宫中，多数日子都是同珍妃在一起。另据派在皇上身边的心腹太监密奏：

珍妃曾头戴皇后凤冠，身穿珍珠霞帔，在御花园给皇上献舞。

珍妃曾穿着皇上的龙袍在宫中漫步。

珍妃曾让皇上亲自用箸匙喂她吃东西。

珍妃曾从宫外请人带着架洋机器进来，并在殿前摆模作样，说要照什么“像”。更不可忍的是，一个小太监奉命回奏，说他昨晚听见珍主儿低声劝皇上，说：“您是皇上，往后大主意该自己拿，别老听别人摆布。”

“啪”的一声，慈禧手中的黄盖碗，重重地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当天，慈禧把光绪召到钟粹宫大骂一顿，边说边用戴满戒指的右手去掴光绪皇帝的脸。珍妃更惨、被重重地打了一顿鞭子，皮开肉绽，好几天都下不了床。以后这样的训斥打骂，不断施加在这对患难情人头上。

甲午战后，光绪和珍妃的爱情已脱去了那种缠绵旖旎的小儿女情态，变得愈加成熟了。山河破碎，国家危亡，年轻的光绪皇帝力争振作图强，但在慈禧的严密控制和后党官僚的多方掣肘下，新政步履维艰，踟蹰不前。珍妃虽然数遭毒打，并以后妃干涉朝政为罪名，被慈禧降为贵人，但她仍能尽心竭力地为光绪分忧解难，并在戊戌年间，通过她兄弟志锐，给维新党人送去一些重要情报。他们志同道合，感情越来越深。

谁知风云突变，1898年9月21日，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清宫，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并同时给珍妃施以杖刑，把她圈禁在钟粹宫后偏僻的北三所一间简陋的小屋里。她被没收一切首饰和稍好的衣物，每日三餐都从门槛下递进去，真是尘羹土饭，苦不堪言。并且规定，从今以后不许她再见皇上的。从此，一对情人同陷囹圄，咫尺之隔，河汉渺渺。

1900年8月15日，北京城外炮声隆隆，八国联军即将破城。慈禧身穿农妇衣衫，挟带着光绪皇帝和皇后、瑾妃，在一些王公大臣的护驾下，仓惶逃出了京城。坐在车上的光绪形容枯槁，忧心忡忡。国破家亡，人民涂炭，早已使他心力交瘁，更何况心里还时时念着留在京城禁宫中的珍贵人。一路上，真是“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好不容易盼到还驾京城，向心腹太监一打听才知道，他心爱的人儿，可怜的珍贵人，早在庚子出逃的当天，已被慈禧太后处死在宫院古井之中。

几天以来，光绪皇帝茶饭不进，神思恍惚，珍妃那一颦一笑在眼前不断闪过，那窈窕的身影似乎伸手可揽。可如今，她却独自离去了……。听说珍妃在临死前神色极其淡然，明知将死，还恳求太后，让皇上留在京城主持议和之事。她是想让皇上借此机会，摆脱太后控制重归大位呀！

瀛台位于紫禁城南海之中，四面环水，北架一桥。涵元殿在瀛台中央，周围奇花异石、古木参天，远远看去好像神话中的瀛州仙境。然而，在慈禧专权跋扈的年月里，这仙境却变成了囚禁光绪皇帝的牢房。

戊戌政变以后，光绪就被关在瀛台涵元殿，除了每天被拉去陪同慈禧“早朝”以外，就再不准自由出入了。周围的太监大多数是慈禧选派而来，名为侍奉，实为监管。传说某年冬天，水面结冰，一天光绪悄悄地从冰上走上岸，刚走不远就被守门人“跪阻”返回。事后慈禧命令人把冰凿开，以防光绪潜逃。

在瀛台，慈禧除了用侮辱、毒打和圈禁珍妃，来对光绪进行精神折磨外，在肉体上也对他百般摧残。光绪住的涵元殿卧室的窗户都以纸糊，日久天长窗纸破旧，无人修补。每到寒冬腊月，朔风凛冽，室内滴水成冰，光绪的玉尊之体，竟然冻得浑身发抖，手脚麻木而不能握笔写字。内务府大臣立山看不过去，率人来糊窗，当即被慈禧召去，狠狠地责打了一顿。

光绪住房里的陈设也很简陋，而且很多家具都朽坏不能使用。四壁油漆剥落，也没有什么书画屏风装饰，每到新年将临，光绪就自己写上一些“吉祥如意”、“出红大吉”等字样，让太监们贴在墙上，自赏自怜。

光绪每天三顿饭，虽说也有十几样菜，但是离御座稍远点的，都是十几天的残菜，发出阵阵酸臭之味。近旁的几样菜，也是又冷又干难以下箸。

有时候传御膳房换一两样可口的饭菜，但是膳房总管必须奏请慈禧，结果，都以劝皇帝要节俭为理由，不了了之。光绪每顿饭几乎都是半饱离席。

更有甚者，一天光绪给慈禧请安，正赶上慈禧吃元宵，她问光绪可曾用膳？光绪不敢说已用过了，于是慈禧叫人给光绪端来一盘元宵，吃完后又端上一盘，一连四次，撑得光绪实在咽不下去了，只得把余下的元宵统统藏到袖子里。回到瀛台，忙叫人拿衣服来换，小太监到处翻找，竟然连一件小卦都没有了。原来，慈禧已命人全部搜走了。于是光绪把这浆糊硬挺、满是油污的衣衫穿了整整一天，到晚上才有人把衣服送还。

据北京城里一位老牙医说，他曾受一个在宫里当太监的朋友相邀进宫治病。七转八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病人是一位中年男子，身穿青布长衫，面目青紫，牙齿松动脱落，满口鲜血非常痛苦，显然是被打伤的。医生为他止血并镶配好后就匆匆出宫去了。第二天那个朋友带来四两银子，说昨天那位病人已不太疼了，特命他来致谢。然后又府下身子，在他耳边小声说：“昨儿那位就是当今皇上，给人打的。”医生大惊。从这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太监，听说被慈禧活活杖死了。光绪自从被囚禁在瀛台以后，虽然终日愁容满面，却是滴酒不沾的。当时鸦片烟毒早已渗入禁宫，很多后妃、太监都偷偷吸食。戊戌年以后，慈禧曾令太监以治病为名，引诱光绪抽大烟，想借此来毁坏他的身体，并以“失德”为名把他废掉。不料光绪一听到太监请他去“香几口”时，竟大发脾气，以后也没人敢向光绪进烟了。

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变法图强事业，在慈禧等顽固势力的扼杀、打击下失败了，但是他图强的志向却一直未消。在1900年被慈禧挟持西逃的途中，他终郁郁寡言，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喜欢在纸上画一些大头长身子的鬼怪图形，然后把它们一张张撕碎。有时在纸上画一只乌龟，上面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拿一把小竹弓向它射击。然后一把扯下，剪成碎片，并狠狠地抛向天空。以此来抒发自己那壮志未酬的郁愤心情。

1902年初，光绪随慈禧回到北京，一路上，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军蹂躏过的惨景，感到万分悲痛。当慈禧提出要修复被八国联军破坏的正阳门城楼时，光绪皇帝却认为：“应该保留这个遗迹，使人民永远记住这个耻辱。”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这段时间，慈禧置千百万战区人民于不顾，在宫中不断大摆戏台，终日拉着光绪，在成群的宫女、太监陪伴下寻欢作乐。当时在宫中为慈禧画像的美国人卡尔女士很注意光绪的行动。她发现：“在一群尽情欢笑的观众中，只有皇上眉头紧皱，显得很不高兴。”在一次看戏时，卡尔发现光绪低着头，在一张戏单的背面写写画画。她走近一看，原来光绪是在画一张日俄在东北地区交战的地图。

身陷囹圄的光绪皇帝，仍在努力读书，密切注意世界动向，关心国家的兴衰。在慈禧无法抗拒的压力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终因忧愤成疾，于1903年11月14日，以38岁英年含恨逝去。他是一个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个弱者，在清末复杂多变的历史中他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马丁·路德·金谋杀案

1968年4月4日，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城。

下午8点左右，一个衣着入时的中年男子手提旅行袋来到了“雷伯尔”公寓，以“约翰·威拉德”的名字租了一个房间。他镇好了房门，从旅行袋里取出了带有瞄准镜的“雷明顿”狙击步枪。他轻轻地吹去枪筒上的尘土，仔细地检查了步枪所有的机件，然后压上子弹，来到了洗澡间。从这间房子的窗子里，可以看见一路之隔的洛雷因汽车旅馆的所有房间。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开始了耐心的等待。

马丁·路德·金就住在洛雷因汽车旅馆内。他是美国浸礼会的黑人牧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在1955年发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的黑人抵制该市的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制度，罢乘公共汽车382天，迫使汽车公司认输，取消了这种制度。“罢乘运动”的胜利使他当选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1963年8月，他又在华盛顿组织了25万人的集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196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这项奖金最年轻的获得者。今天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支持本地清洁工人为期两个月的罢工，并为组织“贫民进军华盛顿”做宣传鼓动工作。

傍晚6点钟，马丁·路德·金牧师和他的同事出现在旅馆二楼的阳台上。“雷伯尔”公寓洗澡间里的男子紧张起来。他用颤抖的手把枪固定在窗子上，调整着瞄准镜的焦距，马丁·路德·金牧师那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脸庞出现在瞄准镜里：他正俯在栏杆上和马路上的人谈话。那男子因为手在颤抖，瞄准镜里暗淡的线条像死神那黑色的影子在金牧师的头部徘徊着。

6点23分，一声刺耳的枪响，粉碎了美国黑人希望通过和平争取民主权利的梦想。金牧师惊愕地捂着脖子，慢慢向后倒下，靠在旅馆的墙上。惊慌的人们顾不得捉拿凶手，急忙把金牧师送进医院。晚了，子弹穿进了金牧师的脖子，在他颈后爆炸，炸断了颈骨。医生所能做的，只是把白床单盖在他的脸上。

警察闻讯赶来，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他们只捡到了凶手丢弃的狙击步枪和旅行袋，以及目击者的证词：凶手驾驶的是一辆带有亚拉巴马州牌照和墨西哥旅游标签的白色“野马”牌轿车。

美国震惊了！黑人愤怒了！当晚美国首都华盛顿及纽约、波士顿等20多座大城市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黑人示威暴动，仅华盛顿就有200多家商店被捣毁，180多处起火。整个城市浓烟滚滚，如同炮火连天的战场。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电视中发表讲话，对金牧师之死表示哀悼，宣布推迟原定在当天午夜前往檀香山的行期。另一方面，急令包括美国王牌部队第82空降师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军警12500人赴华盛顿“维持秩序”。

孟菲斯城更是势同燃烧着的炸药包一般，愤怒的黑人学起棍棒、刀斧来悼念他们的和平领袖。市长当即实行24小时戒严令，4000名国民警卫队封锁了交通要道，警察局的直升机不停地在黑人居住区上空盘旋飞行。

4月5日清晨，那个化名约翰·威拉德的凶手已经来到了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把汽车丢弃在僻静的马路上，然后住进一家小旅馆，避避风头，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此刻，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方面追查“野马”汽车的下落，一方面查证狙击步枪上的指纹，同时四处搜捕化名“威拉德”

的罪犯。

这时黑人的暴乱已扩展到 60 多座城市。

4 月 8 日，凶手又化名拉蒙·乔治·斯奈德，轻松地通过了美、加边界，来到了多伦多，骗取了一份加拿大护照，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

4 月 10 日，全国已有 168 座城镇遭到愤怒黑人的破坏。首都华盛顿更是混乱不堪。在这短短的一周内，这里就发生了 700 多起纵火事件。

“约翰·威拉德”或者叫“拉蒙·乔治·斯奈德”是从多伦多的电视中看到金牧师的丧礼的。

在黑人圣歌和教堂的丧钟声中，由两头骡子拉着一辆老式农村板车，载着金牧师的灵柩缓缓前往墓地，10 万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默默随着那简朴的灵车向前行进着。

4 月 11 日，联邦调查局宣布发现了凶手遗弃在亚特兰大的汽车。该车的登记号是 1—38993，车主是一名叫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伯明翰海员。但是，线索很快又断了，因为“高尔特”也是一个化名。

联邦调查局又羞又怒，这个“威拉德”、“斯奈特”、“高尔特”惹下大祸，使 21000 多人受伤，10000 多名黑人被捕，全国出动 55000 名士兵和国民警卫队来“维持秩序”，他就那么逍遥自在地溜了？！联邦调查局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指纹的查证工作上。

4 月 18 日，经过近半个月的努力，核对了五万三千多名罪犯的指纹，终于查出了凶手的真实姓名。他叫詹姆斯·厄尔·雷，是一个惯犯，多次因伪造证件，偷窃汽车被捕，这次因持枪抢劫被判处 20 年徒刑。但他并不想老老实实地服刑。1967 年 4 月 23

日，他在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监狱爬上一辆运粮卡车逃走，一走无踪影。

有了罪犯的照片、指纹和特征，联邦调查局大喜过望，以为缉拿罪犯指日可待。但光阴在苒，半个月过去，搜捕毫无结果。

联邦调查局断定，詹姆斯·厄尔·雷已经潜逃出国。为此，他们请国际警察组织的美国中央局财政部助一臂之力。财政部迅速向国际警察组织秘书处递交了紧急求援的函件。秘书处向所有的成员国发出了红色通知，上面有凶手雷的照片、指纹图，还有立即逮捕的命令，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捉拿凶手。现在这场搜捕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加拿大皇家骑警收到秘书处的红色通知，立即查阅了移民局和海关的记录，没有发现给雷发过护照，但一个叫斯奈德的人很像被通缉的罪犯。可是这个斯奈德在五月初参加多伦多旅行社组织的欧洲旅游团到葡萄牙去了。

5 月 2 日，大约 50000 名黑人在金牧师的助手拉尔夫·阿伯纳西牧师的率领下，开始了“贫民进军华盛顿”，他们要完成金牧师的未竟事业。

而此时，雷则在阳光灿烂的里斯本尽情地挥霍。

5 月 17 日，雷乘飞机来到英国伦敦，准备休息一阵子，然后再去布鲁塞尔。奇怪的是他又一次福星高照，平安通过了戒备森严的希思罗机场，竟然不知道警察正在世界范围内搜捕他。

6 月 8 日，雷手持拉蒙·乔治·斯奈德的护照来到希思罗机场。但这一次他运气不好，国际警察组织的红色通知起了作用，机场里的警察几乎从他来的时候就认出了他。

根据英美签订的条约，詹姆斯·厄尔·雷被引渡回国。出发前，警察给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套上了防护裤。因为谁也不愿意他再被另一个刺客杀死

灭口，重演奥斯瓦德的故事。回国后，他被塞进一辆特制的 6 吨半重的囚车送往孟菲斯城。关押他的单人囚室也装上了厚厚的钢板。

1969 年 3 月 7 日，孟菲斯法庭审理了詹姆斯·厄尔·雷刺杀马丁·路德·金一案。雷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检察长表示深为罪犯的“真诚坦白”所感动，决定不再要求法庭判他死刑。

7 月 10 日，孟菲斯陪审法庭作出判决：判处詹姆斯·厄尔·雷 99 年监禁。

苏加诺在最后的日子里

苏加诺，印度尼西亚总统（1945—1965 在任）。1945 年 8 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任第一任总统。任内曾对 1955 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以及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1905 年 10 月政变后失势，1967 年被软禁，1970 年病逝。

对于印尼立国者、前总统苏加诺被推翻直到去世的生活片断，他的女儿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

1966 年 2 月，我和弟妹们被送到离雅加达不远的芝巴那斯宫‘保护’起来，那时候，反对父亲的示威游行正在火头上，父亲担心我们的安全。

在那里我们被幽禁，无法同父亲互相通讯，长达 3 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我曾因极度思念父亲，变得歇斯底里，叫嚷着要回雅加达去，我甚至曾试图逃跑出来。

看管我的警卫看到我这个样子，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答允了我返回雅加达的要求，只是由于有消息说，通往雅加达的路上，在本扎区有许多部队和坦克，这才作罢。

芝巴那斯宫是我父亲喜爱的地方，过去父亲常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里有一幢小建筑物，父亲常在这里撰写文章，并曾在这里为他所写的《站在革命的旗帜下》一书作准备。1967 年 5 月，父亲开始被隔离，住在茂物。

在此之前，已见到一些征兆。早几个月，父亲就已停止了“活动”，他不像以前老是忙着开会。父亲“闲”下来了，有时邀我游览市区，散散步，买买水果。

大学生们还在继续游行示威，用恶毒的、伤人的词句攻击父亲。但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父亲邀我到卡罗鲁斯医院去检查眼睛，警卫随从、我和父亲及副官同坐一辆车。回程中，车行到沙林巴路，我们乘坐的汽车突然陷入人群的包围之中，人群互相推拥着，挤满了人行道，甚至路中心。

我们的汽车通过印尼大学的校园时，我斜斜地瞅了父亲一眼，他显得很开心，并以特有的微笑，向群众招手，“答谢”人民的敬意。这时，忽听有人喊道：“苏加诺万岁！”立即有人跟着喊道：“万岁，苏加诺！”“万岁！万岁！”

一个青年奋不顾身地走向前来，想打开车门来跟父亲握手，当然，那是徒劳的，因为车门紧闭着，当汽车缓慢前进，并把他抛到后头时，我看到他哭了。

掌权者终于决定，父亲必须离开雅加达到茂物，而且不许再回来。我和弟妹们必须自己生活。这种情况要继续多久？不知道。聊以告慰的是我们获准到那里去探望他。

父亲经常吩咐我们给他送些菜肴和点心。

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我们很担心父亲的安全。

我好几次被来自茂物的可怕消息弄得肝肠欲碎，消息说有人企图杀害父亲，我曾经在深夜里，强迫副官伊尔山伯伯护送我前往茂物，以亲眼证实父亲是否还活着，因为我听说父亲被恐怖地枪杀了。但当我到达父亲的居所时，证实父亲安然无事。在隔离时间，父亲住在侧屋里，初时，我们大家可以自由地探望他，后来就逐渐受到限制。

1967 年 8 月，我们接到最后通牒，限我们两天内离开我们住着的总统府，

我们感到惊慌，不知所措，父亲从茂物打来电话，镇静地对我们说，要我们服从命令，并携带必要的东西。

我们离开总统府后，父亲曾两次探望我们，父亲每次见到我们，都极力强制内心的苦痛，像往常那样谈笑着，为的是要我们鼓起勇气面对现实。但是父亲的眼睛，无可掩饰地映出了心底的痛苦，他不忍心眼看我们因他的事受到连累。

父亲的健康渐差，他感到寂寞。父亲本来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他喜欢朋友环绕左右，谈论各种问题。把他从自己的亲属和熟悉的朋友中间隔开，对他是一种精神折磨。

后来，父亲终于病倒了，并且病况日趋严重，我们请求苏哈托准许父亲返回雅加达，哈托伯伯答应了。

1968年10月，父亲回到了雅加达，在不自由的情况下，住在雅梭大厦，即父亲和拉特娜·黛薇一起住过的地方。这时黛薇已经离去，她住在法国巴黎，和她的女儿，我的同父异母妹妹加蒂卡·莎丽一起生活。

父亲很需要亲属陪伴身边，所以，当我和前夫结婚辞别父亲时，父亲情不自禁地哭了，“谁陪伴父亲，有谁在父亲身边？”他伤心地说。我也哭了，感到胸口窒闷。但是，我还是不得不离开父亲。父亲活着时，广交朋友，但是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他的忠实的朋友，少之又少。当父亲有权势时，谁不想靠到他的身边？可一旦他倒了下来，父亲的名字犹如瘟疫一样，人们由于一些理由，患了苏加诺恐惧病，那些在父亲有权势时感到不快的人或是他的政敌，都趁机发泄私愤。”

此后不久，苏加诺总统便在软禁中因肾病于1970年6月21日蒙辱去世，终年69岁。以后，他的名字便一直被官方“遗忘”，统治阶层很少用称赞的语调提及他。直到15年以后，印度尼西亚政府才恢复了他的名誉，使他又成为该国的一位英雄。

教育部同意修改中学里一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这本书说苏加诺接受外国公司酬金，并且偷偷在外国银行里存款数百万美元，一些教育工作者宣称，这本书玷污了印尼共和国的一位国父的声誉。

雅加达的新机场也重新被命名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这是采用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和另一位创始人、第一任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的名字。

1978年初，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兴建一座精心设计的陵墓，供放苏加诺的遗体，以取代只由一座凋零褪色的黄色亭子庇荫的简单坟墓。后来，这座花费了86.4万美元的苏加诺陵墓建在了东爪哇勿里达。这个五幢建筑物包括了一座清真寺，以及用大理石、玻璃和不锈钢建成的墓室，里面供放着苏加诺及其母亲的遗体。

萨达特遇刺前后

一个在家里收听外国电台的青年，名叫哈立德·伊斯布里，是埃及武装部队的中尉。1981年9月的一天，对他和对埃及都是命中注定的日子。这天早晨他奉命到炮兵333回团长阿勒处报到。团长对伊斯兰布里说，他被挑选参加庆祝1973年十月战争的阅兵，阅兵式在10月6日进行。他将率领以他的牵引车为先导的由12门大炮组成的方队。伊斯兰布里要求免除他这项任务，理由是要安排同家人过古尔邦节。团长不答应，伊斯兰布里只得接受，说了句：“那就按真主的意愿办吧！”这句话没有引起团长的注意。其实就在伊斯兰布里说：“那就按真主的意愿办吧”的一刹那，他就下了干掉安瓦尔·萨达特总统的决心。

这一暗杀小组在10月2日再次碰头。伊斯兰布里说，同车的牵引车司机可能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麻烦，因为他同他们的观点不同。他们商定在出发前让司机吃安眠药，使他无法驾车，而由伊斯兰布里代替。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买回安眠药，让哈密德试一下，结果这些药片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哈立德决定到时以恐吓的方法控制司机。

伊斯兰布里设法摆脱了自己车上的一名士兵。幸运的是车上另一名士兵病了，伊斯兰布里立即给了假。接着，他把第8个碍事的士兵派到别的地方执勤。他对连里的人说，将有3个人来补缺。他含混地表示，这3个人来自军事情报局，负责检阅时的安全。

哈立德·伊斯布里把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最后一次来到新开罗区的姐姐家，留下了一封信。他姐姐是在萨达特遇刺和弟弟被控谋杀而被捕后才见到那封信的。信上说：“我请求你们宽恕我，我没有犯罪。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要求提升和奖励。如果因为我的缘故，你们当中有人受到伤害，我希望你们宽恕我。”

阿塔·侯赛因和阿卜杜·哈密德进入受阅部队集结区时，门卫居然没有要他们出示许可证。

10月5日清晨，一名高级军官乘坐敞篷汽车，用扩音器宣布命令，要各连队将小型武器集中到指定帐篷中。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名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命令拆除所有武器的击发装置，集中到连队指挥官那里。伊斯兰布里命令新来的3名士兵负责上述命令的执行。这一点没有人感到奇怪。

10月6日凌晨3时，伊斯兰布里向连队发布命令，早晨3时准备行动。他到放武器的帐篷，取出4支机枪，装满了子弹，放进一个口袋，乘司机去餐厅取饭时，伊斯兰布里将枪和手榴弹等放入车内。向检阅场行进命令下达了，伊斯兰布里的牵引车在方队的右前方，即离主席台最近的一面，距离不超过30米。当车队到达主席台前时，司机被露出的手枪吓坏了，乖乖的刹车，牵引车由于惯性而偏向主席台一侧。

牵引车刚停下，伊斯兰布里朝主席台方向扔出第一颗手榴弹。侯赛因从牵引车里站起来，开始向总统所在的方向扫射，第一颗子弹便击中了总统的脖颈。那大概是致命的一颗子弹。由于对计划一无所知，牵引车司机及炮手们纷纷跳下车逃向四方。这一切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过了整整30秒钟之后，共和国卫队才开枪回击。此时，伊斯兰布里已经冲到了主席台的前面，侯赛因紧随其后，两人跃进到两侧，作压制性的扫射。伊斯兰布里朝着看来没穿防弹衣的萨达特的身体不断射击，不想自下任何可能的漏洞。他忘掉了

一切，只是决意结果他认为的作为一切暴虐的象征的人。当伊斯兰布里等 3 人被抓往时，萨达特及另外 7 个人被杀，还有 38 人受伤。

再回过头来看萨达特于 10 月 6 日检阅的当天的行动。他 8 时半在基札的家里醒来，像往常一样做体育锻炼，然后吃了些清淡的早餐，决定要成功地出现在检阅中。他穿上前几天刚刚从伦敦送来的由特剪裁师做的新军服。妻子吉汉注意到他没穿防弹背心，他解释说，那次在耶路撒冷访问，从电影里看，穿防弹背心后比实际要胖。今天由军队护卫，应该显得更文雅，应该向全世界证明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临出门前，他又回去取忘在桌子上的元帅杖。他妻子后来说那是个悲哀的警号。他显赫地来到检阅台，力图显示出高兴的神情。

在检阅中，萨达特同周围的人谈起受阅的新武器。主席台上大部分人随着播音员的评论观看着。当空军出现在检阅台的上空时，歼击机作特技飞行表演，并喷出彩雾，主席台上的人都鼓了掌。广播喊道：“现在炮兵来了，大炮牵引车靠近主席台了。”突然，一辆牵引车嘎然停下，看上去向右偏了些。当时有人以为车坏了，司机想为检阅队伍让路。

此后，观礼的人们冷不防看见空中飞着两颗手榴弹，接着响起了爆炸声和连续射击声。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马上躲到椅子底下。离总统最近的共和国卫队的军官是团长艾哈迈德·赛尔罕。调查时，他说，他不止一次对总统喊：“趴到地上去，总统先生！”慌乱状态继续了 40 秒钟，卫队里没有人在 30 秒内开过枪。卫队开枪后便击中 3 名刺客的腹部，但他们继续开火。

后来，就暗杀总统，保护他安全的责任等敏感问题进行辩论时，提到美国人——应总统要求——承担了保护他的职责，共花了 2000 万美元，装备了安全设备，其中包括反国际恐怖的特别分队。问题是这支队伍被安排在主席台后待命，不让他威严的样子损害主席台上的形像，给人以空气紧张的印象。这支队伍离萨达特约 60 米，而刺客们离他 30 米。当这支队伍迅速赶来保护他时，他们的努力实属徒劳。

射击时，吉汉·萨达特夫人在主席台后排包厢，包厢前有玻璃挡着，枪响后，她跑过去，悲伤的问：“总统在哪里？”她陪着他迅速登上直升飞机，12 时 40 分升空。

根据迈阿迪武装部队医院的记录，载着总统的直升飞机于 1 时 20 分抵达院内，即起飞 40 分钟后才到达。从检阅台到医院的距离不会多过 5 分钟的路程。怎样解释这种延误呢？有人看见那架直升飞机在中午 1 时以前，停在基札总统家前的停机坪上，有传闻说，他妻子在电话机旁同美国通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是同在美国的儿子杰马勒。杰马勒是个独生子，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吉汉被告知，她儿子去了海滨附近一个岛上。她和美国高层人士通了话，目标是“从他们那里确切地知道任何有关发生在埃及的事情的材料”。打完电话后，她才随飞机朝医院飞去。可以相信，吉汉夫人一定从看见丈夫的第一刻起就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医院的报告表明，10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2 时 40 分，心电图无波形，脑电图显示脑组织完全停止工作，证明死亡。总统的死亡原因表明，强烈的脑神经震荡，胸腔内出血，左肺、大动脉、左肺根开放性损伤。

吉汉夫人在检查室外等候，她知道丈夫已经死去了。她的儿子终于从美国佛罗里达打来了电话。她对儿子说：“杰马勒，我要对你说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你不应该表现出让你周围的人感觉到的激动的表情。他们朝你父亲开

枪，你应立刻回来！”

杰马勒·萨达特同埃及驻华盛顿大使馆联系，试图安排回国事宜；随后又同埃及驻伦敦大使馆联系，询问一个心脏外科医生，他想同这位医生一起去治疗父亲的伤。突然，传来了他父亲被杀的消息。杰马勒乘飞机到华盛顿，一家美国公司自愿包租一家私人飞机载着他回开罗。

总统的家庭成员迅速来到医院，其中有他哥哥塔勒阿特。总统有一次向公众表明自己恪守公正，便把塔勒阿特投入监狱，而塔勒阿特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现在他对着全身被纱布裹着，只露出一小部分脸的弟弟，说道：“去吧，愿真主怜悯你。我原谅了你做的一切。”

毋庸置疑，被抓住的刺客们受到了残酷的拷问，医疗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被铁链锁铐，被鞭子和水龙带抽打，有些人的头颅骨被打碎，股骨等部位被打碎或打断。审问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一开始在迈阿迪武装部队医院——总统的尸体停放在那里。一位调查人员试图瓦解他们的抗拒，对他说：“总统没有被杀死，只不过嘴部受了些伤。”尽管哈立德·伊斯兰布里当时被折磨得十分痛苦，但没有受骗，用被痛打而肿大的眼睛盯住调查人员的脸说：“你骗不了我，我朝他身上打了34发子弹，你还是找别的来骗我吧！”

在审讯期间，哈立德·伊斯兰布里被问及是犯了罪时，他的回答是：“是的，我是杀了他，但我没有犯罪，我做的是为了宗教，为了祖国。”

调查结束后。有5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后来，对原教旨主义的圣战组织进行了大型审判，其中有300多人被判死刑，另外有100多人被清洗出武装部队。

对于埃及民众来说，当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总的感觉是平静多于不安。因此，有人评论说，他死在其时。

阿基诺谋杀案秘闻

1983年8月21日，著名的菲律宾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结束了在美国的3年流亡生活，当他刚刚踏上马尼拉的土地不到几秒钟的时候，便突然遇刺身亡。由此，菲律宾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又一次掀起了新的波澜。

14个月以前，很可能是关于马科斯病危的谣传，促使这位正在流亡的反对党领袖在波士顿告别了家人，经过在东南亚一星期的周游之后，他登上了从台北飞往马尼拉的班机。

在飞机上，阿基诺兴奋地向记者们谈起了他预想中将要受到的欢迎。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飞机降落以后，他很可能还会在飞机场遇到一些麻烦。因此，在飞机降落之前的短暂时间里，他悄悄地走进厕所，穿上了他的防弹背心。

飞机缓缓地滑行着通过马尼拉国际机场的第八号通道。一辆军队的深蓝色“闷子车”正停在跑道旁的柏油路上。一队士兵挎着M—16式自动步枪成扇形阵势包围了飞机。

机舱里，阿基诺正以非常感人的语调对记者们说：“可别把我忘了呀！”

机舱门打开了，3个军官身穿土黄色卡叽布军服登上了飞机，并且迎上前来搀扶阿基诺。此刻，这位曾经作过参议员的阿基诺似乎突然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了。当他走到舱内行人通道的尽头时，几个身穿白色衣服的泰加洛人（菲律宾主要民族之一）在他身后出现了，他们把拍照的人群和记者们挡在后面，并且在阿基诺刚刚走下舷梯时，就迫不及待地想把舱门关上。几乎是与此同时，飞机下面传来了大声的喊叫：“依特奈（就在这儿），阿克纳！阿克纳（让我干吧）！”“帕斯拉（开枪）！”

仅仅是在阿基诺走出飞机11秒钟以后，第一枪便打响了。几秒钟之后，又连续响了三枪，接着是第五枪。

第一位趴到机舱窗口的乘客首先看到了在飞机跑道几码以外的柏油路上，阿基诺四肢伸张被打倒在地上，紧挨在他的旁边躺着另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男子。三个搀扶阿基诺的军官已经无影无踪，穿白色衣服的几个泰加洛人也早已不知去向。一个士兵正从“闷子车”里跳出来，把子弹一连串地射向躺在地上、穿蓝衣服的人。另外两个武装军人也同时开枪，和那个士兵一起，把枪膛里的子弹全部倾泻在这个早已死掉了的人身上。然后，他们使劲地把阿基诺拖到“闷子车”上。

车门紧紧地关住了。眨眼间，“闷子车”便飞快地消失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阿基诺一生的奋斗中，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他被刺身亡事件这样有力地唤醒了菲律宾反对党人。

在他遇刺之后，400多天的时日推过去了，菲律宾人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重大政治转折点的出现。

在马科斯总统的授意之下，由阿格拉瓦——一位令人难以捉摸的女首席法官组成了一个调查组，他们许诺，在阿基诺罹难一周年之际，将向人们披露调查审讯结果。

然而，被允诺的那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允诺并未兑现，人们心中的疑团却在时间的延宕中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议论和推测的消息也像涓涓细流一样，从官方和非官方的漏洞中渗露出来。街谈巷议，窃窃私语打破了政府内部的寂静，而那些既不愿意敷衍塞责，又不希望仓促行事的官员们却仍然再

次拖延时间。七个星期的时间溜过去了，新闻界也始终保持着沉默，一语未发。

在第八个星期里，一个最大的“漏洞”终于出现了。一本 479 页的备忘录——由调查组提供给阿格拉瓦作报告凭藉的证据——被出示给几个外国新闻记者。人们从中了解到，在调查时，菲律宾军队方面所作的关于刺杀现场情况的详尽叙述与照片和录像带提供的可靠证据存在着明显差异。调查组内部对此作了长时间的激烈辩驳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军队有关人员谋划和刺杀了阿基诺并且掩盖了罪行。调查组准备承认以下有关谋杀案的具有爆炸性的详细情节：

——罗兰社·加尔曼，被军队方面指控为杀害阿基诺，并在阿基诺被杀数秒钟之后亦饮弹身亡的人，只不过是替罪羊。

——刺杀阿基诺的真正刽子手是在阿基诺到达机场后，负责警戒工作，陪同阿基诺走下舷梯的 3 名军人。

——6 名警卫队员，包括其他 16 个军人、3 位将军和一个平民，也将因密谋杀害阿基诺或作为密谋从犯被带上法庭。

的确，一个刺客如何能孤身一人穿越一千多名菲律宾保安军的警戒线，在被卫兵簇拥着的阿基诺身后不到 18 英寸的近距离内开枪呢？为什么护卫阿基诺的军官们一瞬间便踪影尽无，而保安军士兵猛烈的射击却偏偏把这个早已死掉的暗杀者打得血肉模糊呢？

刺杀发生后不到 5 小时，菲律宾空防司令卢瑟·库斯托迪奥、大马尼拉市卫戍司令奥利瓦斯曾在机场召开现场记者招待会说，这是共产党分子策划的阴谋，凶手是伪装成机场运货工的加尔曼，已被当场击毙。然而，这种结论却给人们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

案件的审理开始了。负责机场警戒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站在那里复述着同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没有看到和听到关于这场谋杀的情况，更没有参与这场谋杀。在调查组手中的证据，除了提出更多的令人头疼的疑问以外，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恰在此时，一个自作聪明的证人露了“马脚”。他，就是菲律宾保安军的一名特等射手罗兰杜·德·古兹曼。在他的证词中，以超乎寻常详细地叙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阿基诺被带领着穿过柏油路时，他一直坐在紧闭着门的军用“闷子车”里，就在他一个同伴打开车门准备让阿基诺上车之际，他突然看到了持枪的加尔曼就在阿基诺的卫兵米萨身后，随着枪声，米萨挡开了加尔曼的手，并且把加尔曼摔倒在地。这时他迅速拔出了手枪，第一枪击中凶手加尔曼脑后，在凶手倒地的瞬间连发四枪击中后背，直到凶手匍匐在地，又追补了两枪。此刻，3 名菲律宾保安军士兵才开始向躺在地上的行刺者射击。于是，又在尸体上留下了 23 处弹洞。

这一番叙述与调查组掌握的情况实在是大相径庭了。首先，古兹曼的证词中根本没有提到那致阿基诺于死地的五声枪响，另外，在五声枪响中拍摄的照片以准确无误的画面说明，当时“闷子车”内外并无任何动静。再依次分析现场照片，还可以看到第一个从“闷子车”里出现并向已经倒地的加尔曼射击的人并非古兹曼，而是另一个士兵厄尼斯特·梅蒂奥。备忘录中由此判定，古兹曼这一段由 13 名士兵发誓承认属实的证词，无疑是捏造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特别是在 9 名非军方人士提供了证词以后，更使军方证人无法自圆其

说。菲律宾航空公司地面机械师塞尔索·罗特力纳，曾目睹刺杀现场情景，当受到军方严厉盘问时，他托辞说当时已被吓得扑倒在地，什么也没注意到，所以无法提供证词。但是，在7月中旬调查组即将结束正式审理工作时，他满心惊惧地同意了与阿格拉瓦秘密会谈。在密谈中，他告诉女法官，案件发生时，他正站在飞机机首下，首先听到的是舷梯上人们走下的脚步声，继而，他看到阿基诺身后出现了一只举枪的手。枪声响了，子弹射中了这位刚刚返回祖国的前参议员。

菲律宾航空公司地面机械师塞尔索·罗特力纳肯定地说，尽管飞机机首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没能看清凶手的面孔和全身轮廓，但他仍然看到了阿基诺是在飞机的舷梯上而不是在“闷子车”旁被枪击中的。这无疑是对军方证词的沉重打击。同时，另一位机械师拉蒙·白朗甚至比罗特力纳更生动地描述了阿基诺被刺后，加尔曼满面笑容地向军官们打招呼时的样子。因此，虽然备忘录上还未能确定凶手的名字，但是，它已经断定杀害阿基诺的人是陪同阿基诺走下舷梯的军官之一。

备忘录中提到的另一名高级军官是空防司令库斯托迪奥。他曾是马科斯总统的私人专机驾驶员，与贝尔关系密切，并且比其他人更熟悉机场地形。备忘录根据调查认为，在杀害阿基诺的阴谋中，他是首要的、无法推脱罪责的人物。

备忘录还表明，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贝尔也参与了掩盖谋杀罪责的活动。尽管他在证人席上表现得有理有节，简短而中肯地提供了证词。然而，他的证词中充满了令人不能宽容的借口，并对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使人大惑不解。

显然，应该作答复的人是非总统而莫属的。马科斯曾许诺他将重视调查组的工作结果。但是，在他的人民中，很多人熟悉他在政治上飞速变幻的“艺术技巧”，他们生怕总统再有什么妙算使调查结果失去意义。

齐亚·哈克总统罹难记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首都伊斯兰堡以南 330 英里的巴哈瓦尔布尔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拉菲尔陪同哈克去观看武器试验，这些武器是美国提供给巴基斯坦军队的。观看完毕后，哈克总统和一大批陪同人员乘坐美制 C—130 运输机，这架飞机将飞往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第军用机场。

当地时间下午 4 时 30 分左右，执政长达 11 年之久的 64 岁的哈克总统乘专机开始反航。然而刚起飞不久，机身就上下翻滚，数秒之后，爆炸坠毁。火烟滚滚，爆炸声震耳欲聋。飞机残骸和尸体分溅在方圆上千米的地面上。飞机坠毁地点在旁遮普省苏特里杰河岸边的卡穆·卡里尔村庄附近。

但是，正在农田里干活的人告诉记者，飞机是在翻了几个跟头之后才坠毁的。坠毁后立即起火爆炸。磨粉厂主人古拉姆·纳比说：“一架飞机突然朝着我的头顶俯冲而来，吓得我急忙向树下跑。飞机从河边飞来，突然又掉转头飞走。它再次腾空而起，然而不多会儿，就又落下来坠毁了。”

附近村子的农民闻声赶来，附近城镇的数千名军民也闻讯乘各种车辆赶来。直升飞机在空中不停地盘旋，寻找幸存者。附近村民赶制的 25 具棺木被急速送往现场。飞机上的 30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免。

许多尸体是通过死者生前佩戴的军衔、勋章和奖章才辨认出来的。一本古兰经在哈克总统的尸体附近发现。据说，他生前一直把这本古兰经带在身边。30 具尸体于 8 月 18 日晚分别用飞机运往死者家乡或首都。

令官员们怀疑的是，这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时，巴基斯坦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哈克在西南亚地区扮演了外交上的重要角色。哈克执政 11 年，他比其他巴基斯坦执政者在位时间都长。他在国内坚决压制反对派，很少考虑他的接班人问题。他解散了由他一手扶植的内阁，重新由他一人全面统治。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前总理布托的女儿贝·布托说：“对于哈克的死，我并不表示遗憾。”在调查分析飞机残骸之前，许多巴基斯坦人已确认这起飞机爆炸事件是恐怖主义分子造成的。官员们推测，飞机不是被地对空导弹打下，就是被事先安置的定时炸弹炸毁的。巴基斯坦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个人认为，不是 99%，而是 100%地相信这是一起阴谋破坏活动，哈克总统已成为一些人的攻击目标。”

18 日晚，一架载着哈克总统和美国大使等人遗体的 C—130 飞机从出事地点安抵伊斯兰堡。前一天晚间才宣誓就职的新总统吴拉姆·伊沙克·汗带领全体内阁成员前往机场迎接。在军乐队演奏的哀乐声中，6 名士兵抬着覆盖国旗的总统灵柩，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出机场。道路两旁伫立的人群中，许多人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哈克总统的灵柩已被安放在伊斯兰堡费萨尔大清真寺内，从 8 月 19 日凌晨开始，扶老携幼的市民们自发去为哈克总统致哀。他们以传统的宗教方式为这位忠诚的穆斯林祷告。据维持秩序的警察说，许多阿訇自愿来为总统诵经文。

8 月 20 日这一天，是为哈克总统举行国葬的日子，在这两天，已有 70 余架专机降落在伊斯兰堡机场，70 多个国家都派来了代表团。

葬礼在伊斯兰堡费萨尔大清真寺举行。哈克总统的遗体将安葬在这座清真寺的南侧。

12 时 50 分，哈克总统的灵车从新总统府徐徐开出，车上覆盖着巨幅巴基斯坦国旗，前有摩托车队开道，后有包括新总统伊沙克·汗在内的政府官员的车辆护送。灵车行至宪法大道第二个路口时，许多群众的车辆和行人自动加入了送葬队伍。随行的人群跑步紧跟车队前进，挥泪为总统朗诵经文。此情此景实是感人。

车队到达费萨尔清真寺时，总统灵柩改乘炮车，由两行士兵用手牵引前进。到停柩场时，已近下午 2 时，安葬仪式正式开始。总统灵柩再改为由 8 名士兵抬着前进。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和前来参加葬礼的外国官员步行随灵柩前进，三军仪仗队全体肃立致敬。

千余名阿訇齐声诵起下葬经，在礼炮的轰鸣声中，哈克总统的灵柩安放在墓穴中。伊沙克·汗总统首先为墓穴填了第一铲土，其他巴基斯坦高级官员相继填土。巴基斯坦三军高级将领也为总统墓穴填土。

填土仪式完毕后，巴基斯坦高级官员、三军将领和各国代表团依次敬献花圈，百余个花圈堆集起来使坟墓形成一座五彩斑斓的小山。

独裁者在内讧中丧生

——朴正熙总统之死

1979年10月26日晚7点半左右，按汉城的习惯，正是进晚餐的时候。

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所在的宫井洞部长办公室里，走进了前来赴约的南朝鲜陆军总参谋长郑升和。久候的中央情报部次长金正燮告知：部长金载圭正在陪突然到来的总统朴正熙，总统离去后，马上赶来有要事相商。郑升和点点头坐了下来。7点40分，忽听见“呼——呼”一阵枪响，郑升和站起来疑惑地说：“这不是枪声吗？”

金正燮也略有点吃惊，听见枪声已经停了，吩咐警卫人员到宫井洞外问问派出所，出了些什么事？

正在此时，金载圭赤着脚，衬衣上沾满血迹，摇摇晃晃地跑进自己的办公室，一把抓过桌上的酒瓶，往嘴里灌了几口，不等郑升和开腔，便把他拉向门口，推上了车。

上车后，郑升和不断追问下，金载圭伸出大姆指一弯，做了个阻击的动作，示意朴正熙已死，郑升和急忙追问道“总统阁下死了吗？”

“死了。”金载圭肯定地说。

郑升和再没出声，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一猝然事件。夜真静，只有车轮跟大地摩擦发出轻微的声音……1. 1979年10月26日的清晨。

南朝鲜忠清南道唐津郡的插桥湖防潮堤上，彩旗纷飞，待剪的彩带就像一条跃跃欲腾的长龙。

从昨天起就守卫在这儿的总统府卫戍部队的士兵们，端着美制自动步枪，横眉竖眼地驱赶着过路的行人和田野里来干活的农夫们。

朴正熙总统的侍卫长车智澈手搭凉篷，望了望正在用电子仪器搜索的侍卫人员，那双几乎从不转动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冷冷的笑意。他是个大高个，推着光头，两道刷把似的眉毛插在那张柿饼般的脸上。

车智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是9点钟了，离朴正熙飞到插桥湖的时间，只有1小时了，他向插桥湖纪念塔走去，这座庞然大物最使他放心不下。

其实这儿已不知检查过多少次了。车智澈首先命令工兵们用金属扫瞄器仔细探查过，为防止政敌使用塑料炸药，又用特殊的电子仪器反复搜索，纪念塔的罩布放在一边，连塔身上每条石缝都几乎被数清了，最后车智澈才放心了。

为防止亡命者驾驶汽车炸弹，车智澈把整个警戒线伸到一里以外，每五步站着一个特种空降部队的士兵，每人两颗反坦克手雷。

插桥湖的防潮堤上和纪念塔旁站了几十个身着便衣的总统府侍从人员，总统还将带来一批侍从人员，这样的防卫是第一流的。无懈可击，车智澈真正放了心。

一名侍从媚笑着说：“头，这儿决不会出差错的，您去休息一会儿吧。”

车智澈立刻下令将这名侍从抓了起来。

10点钟到了，他跳上汽车向飞机预定降落点驰去。

2. 阳光普照着大地，却很难照进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的所在地——宫井洞。身为中央情报部部长的金载圭，一反常态地让秘书助手们早早的离开了办公室，并吩咐贴身警卫员守住二楼的楼梯口，不让任何人上来。

金载圭将自己锁在寝室里，这里面除了他刚拖进办公室里的一张方凳外，就只有一张简朴的弹簧床，一部大型的录音机堆放在墙角的地毯上，深色的壁毯，沉重的窗帘，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他情不自禁地拉一拉领带，一只手哆嗦了一下，打开了录音机。他明知没有人，仍忍不住又向四周看了看，关系太大了，脑海里又突然掠过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递给他这盒磁带时那张苍白的脸，当时他还在心里嘲笑金桂元的胆小，但金桂元的胆小说明了磁带的內容后，他也呆住了，接过磁带盒，竟有接过一颗定时炸弹的感觉。

近年来，金载圭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了改革，将军队中跟着自己干了多年情报工作的数十名心腹军官，全部调进中央情报部，从而彻底掌握了中央情报部，工作很有成绩，博得了美国政府和朴正熙集团内部一部分人的支持和赞扬。在对外关系上，他推荐老乡郑升和当上了陆军参谋总长，使郑升和对她格外感激。

“哈哈……”。车智澈一阵发狂般的笑声，冲击着金载圭的耳膜，金载圭一惊，手中装着香槟酒的杯子掉到了地毯上，接着他发现原来是录音机里发出的笑声，紧张的神经一松弛下来，手毕竟攥出了两把汗。金载圭站了起来，点燃了一支“船牌”高级烟。

“金载圭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难道……。”这暗哑的嗓音分明是朴正熙。

“这些年来，金载圭用金钱内结军人，如参谋总长郑升和，第三军司令部李建荣，特种空降部队司令郑炳宙少将等，都与他结成了生死之交；外应在野党和美国政府的战略思想，在年、外政策上多次提出与您相左的看法，并要求废除‘维新宪法’。常言道‘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

“造反”这个词在金载圭的脑海中一闪即过，没留下痕迹，但他明自金桂元给他这盒磁带的目的了。

磁带又发出吱吱的过带声，金载圭感到朴正熙的沉默就是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3. 青瓦台正日益成为一个要塞。

青瓦台的正门，为防止暗杀汽车，在地下装有一块钢板，一按电钮，钢板会垂直冒出地面，封死正门。青瓦台后面的北岳山上密布着火力点。它周围的居民都被撵到汉江南边去寻找新的居住地了。

青瓦台为中心的航空禁区，几乎每天夜里都放射高射炮，说是有什么飞机闯入。现在离青瓦台远些的居民也不安全了，睡在家中，不知什么时候，没长眼睛的炮弹会破壁而入。由于经常发生伤亡事件，市民们对这种频繁发生的谜一般的事件已失去了耐性。

青瓦台每天有 500 名军人和 5000 多名警察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着。

青瓦台内所有的空地上全是水泥花盆，上面盛开的各色花卉，组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人们沿着花盆之间的空隙，蜿蜒穿行在花丑”丛中，倒是别有一番曲径通幽的滋味。别以为朴正熙这是有意在附庸风雅，这不过是他的保安人员设计的巨大水泥路障，据说连装甲车也能拦住。

朴正熙回到青瓦台总统府已经是 13 点 30 分。他今年 60 多岁，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肥不瘦，一付特号墨镜遮住他那双细小的眼睛，像狒狒般凸出的嘴巴，使人感到一种野性的凶残，实质上人类的贪婪、虚伪、狡诈和兽性的残暴，都十分奇妙地交织在他的头脑里，使他成为南朝鲜历史上少有的暴君。

回到青瓦台，朴正熙一直阴沉沉的脸上，才稍稍有点儿明朗。在举行插桥湖纪念塔的揭幕式上，他拽动揭幕的绳索时，不知为什么纪念塔上的罩布仅仅揭开了一半，十分迷信的朴正熙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起来，他心里嘀咕：难道路上要出事？难道预兆权力不稳？为什么我这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行使，居然会出现障碍？

车智澈在一边更觉得心惊胆战，也觉得奇怪，自己曾试拽过多次，怎么……。

11点，直升飞机载着朴正熙在道高温泉观光宾馆前的院子降落时，宾馆里饲养的一头獐子，被直升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吓得惊恐万状，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知道此事后，朴正熙更是不悦了，一迭声的叫飞机驾驶员立刻回青瓦台。不料飞机出了故障。朴正熙格外小心地吃罢了午餐，甚至连到温泉里泡一下的念头都没转，就上了飞机回到了青瓦台。

此刻，朴正熙对一切都感到释然了，插桥湖纪念塔的罩布只能拉开一半，正是在预先告警；飞机可能要出故障。飞机不在半空中出故障，而等降落到地面才出故障，可见自己真是属于那种命大福人造化大的人。十分迷信的朴正熙突然想起“圣天子自有百灵相护”这句中国古话，心里就像抹满了蜜。

回到自己一大片房间的隐密地下室，他摘下大号墨镜，随手扔到地毯上。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一个孤独的老头，一个权力欲极度膨胀的老头。他谁也不相信，任何自认为和他关系最密切，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总是被他不动声色地搞掉了。在他执政的18年里，他换了8个总理，13个内务部长，8个中央情报部长，10个陆军总参谋长。用没有什么基础的新人，替换掉根深蒂固的老部下，正是朴正熙控制整个局面的一种权术。他要当一个终身的总统，只要他活着，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凌驾于他之上，向南朝鲜发号施令。

门开了，车智澈端着盘生鱼片提着几瓶可口可乐和威士忌之类的饮料走了进来。四年多来，车智澈看朴正熙的眼色行事，投其所好，准得跟乌龟预感天气的阴晴一样。此刻看见朴正熙正陷入深思，便轻手轻脚地放下东西，转身要走。

“等一下。”朴正熙迟疑着说，但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狠狠地吸了口烟。

“中央情报部长的位置你打算让谁接任？”朴正熙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微微显得左肩高，右肩低。

“陆军保安司令金斗焕。”车智澈有点不安地望着朴正熙。

“嗯！”朴正熙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抬起头来，两道尖锐的目光盯住了车智澈。

车智澈眼里闪过一丝惊恐，立刻又做出一副坦率忠诚的样子。朴正熙放了心，看来车智澈是有意要搞垮金载圭，所说金桂元和金载圭在青瓦台搞窃听，多半是毫无根据的陷害，朴正熙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故意装糊涂：“金载圭搞窃听有实证吗？”

“物证是没拿到，但替金桂元搞窃听的人愿以高价提供窃听磁带。”

朴正熙有点紧张了，看来事情还不太简单，这个窃听器无疑是个可怕的人，他要价高，说明窃听内容一定价值高。朴正熙吸了一口烟，室内响起一阵压抑的脚步声。“立刻挂个电话给金载圭，今晚咱们都到宫井洞去吃晚餐，请他找几名女艺人陪客。”

车智澈一下子愣住了。

朴正熙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给你们两人和解嘛。”

车智澈仍没转过脑筋来。

4. 金载圭接到朴正熙今晚要来宫井洞吃晚餐的电话，呼吸有点急促起来，他狠巴巴地吸了口烟，用两根蕉黄的手指头，一下子将香烟掐灭了，烟头的火星炙得他的心一颤一颤的。他快步登上二楼，打开自己的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支西德制“尤尔塔”七连发 32 口径的手枪，这种枪瞄准器极佳，并有强大的冲撞力。他将子弹一粒一粒地压进弹仓，拉开枪机，推子弹上膛，又检查了一下，确信没有故障，便轻轻地把枪藏在书架后面，然后坐下来盘算行动的步骤。

刺杀朴正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几十年的情报工作经验使他懂得这种事决不能依赖别人去干。因为要保证刺杀的准确性和突袭性，首先刺杀者应是朴正熙不起疑心的；其次这类的刺杀应是既有预谋又是随机的，有机会就干，没机会就等；再次托付任何人，均不可靠，人心隔肚皮，就是亲爹娘也有可能出卖儿子的，到那时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决定自己亲手刺杀朴正熙后，金载圭反而定下了心来，他快步走到电话机旁，要接陆军总参谋部。当话筒里传来接通的讯号后，金载圭像往常那样拉长着声音“啊……郑总长，您好，今晚有空吗？我想请您来宫井洞吃晚饭。”得到郑升和十分肯定的答复后，金载圭满意的点了点头，吐出一口长气。

接着，他又拨通了中央情报部次官金正燮的电话，告诉他：“今晚我原约定郑参谋长在宫井洞办公室里共进晚餐，可是由于总统阁下的突然光临，我不能相陪，望你替我代陪郑参谋长，待总统阁下离去，我马上前往。”

布置好这一切后，金载圭驾着一辆小汽车，疯狂地开上了高速公路。

16 时 30 分，金载圭来到宫井洞。这是一座两层楼房，外有三米高的砖墙，砖墙顶端是白色锋利的箭头的金属栏杆。楼的二层是金载圭舒适的办公室和寝室，底层没有餐厅和会客厅，楼前是花园，里面的奇花异卉争奇斗艳，中间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养鱼池。

17 时 10 分，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来到了宫井洞。当他走进金载圭的办公室时，金载圭起身相迎，问：“总统阁下为何要来此晚餐呢？”

“总统大概是想缓和你跟车智澈的关系”金桂元说完叹了口气，“这能有什么用？车智澈这小子狂妄到了极点，到处伸手，处处逼人，真有点挟天子令诸侯的意思，谁能不头痛。”

金载圭冷冷地点点头说：“就是这个家伙，把事情闹到国愤民怨的地步，今晚我决定为民请愿，要‘清君侧’干掉这小子。”

金桂元神色阴郁地点点头，脸似乎变得更小了。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事后总统阁下追究。”金载圭看透了金桂元的心里，却不肯泄露自己的计划。

金桂元阴沉沉地说：“你这样干了以后，总统决不放过我们。”

“你大概觉得总统阁下是位不怕死的硬汉吧。”金载圭不无讽刺地说。

“你是说用武力……。”

金载圭迅速用食指堵在嘴上，轻声地嘘了一声。

突然，电话铃响了，金载圭刚拿起电话，就传来门卫急促的声音“总统阁下的车已离开青瓦台，正向宫井洞驶来。”

金载圭与金桂元会意地相视一笑，大步迎了出去。5. 朴正熙和车智澈在金载圭、金桂元的陪同下，脱下外衣和鞋子相继入坐。朴正熙坐首席，面朝正门背靠窗，在他与窗户之间有一幅屏风。他的两边各有一名著名的女艺人

陪席，年龄均在 20 岁左右，身穿半透明长裙，丰满苗条的体态依稀可见。

车智澈坐在朴正熙的右边，独据餐桌的一端，金载圭和金桂元并排坐在朴正熙的对面，金载圭在左，金桂元在右。

18 时 55 分，金载圭离开座席，四处察看了一遍，5 分钟后返回餐厅。

金载圭刚就座，车智澈便又开始发难：“釜山地区颁发戒严令，不是正好让那些反政府分子隐蔽下来，为什么不大搜捕？”

金载圭此刻已对车智澈恨之入骨，借故又离开餐厅。他快步来到距餐厅 50 米左右的办公室，见到正在那里吃饭的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金正燮，以抱歉的口吻说：“我正同总统阁下吃饭，望二位稍候片刻。”接着又补充说，“我吃完饭后，马上就来，望二位务必等候。”郑升和、金正燮点头应允。

随后金载圭又召来自己的心腹，中央情报部礼宾处长朴善浩和自己的随从秘书朴兴柱，对他们说：“国家沦亡，我们也无法生存，不知你们怎样想？今天我要干掉他们，你们听见第一声枪响，便立即解决他们的警卫员，明白吗？”

见二人仍有迟疑，他便给二人打气壮胆道：“这里有郑总参谋长和情报部次长，你们怕什么。”听到手握兵权的陆军将领也参与此事，朴善浩和朴兴柱当即表示愿意执行计划。

布置好这一切后，金载圭觉得心中恶气稍稍平伏了一点，就又回到了餐厅。

此时朴正熙正斜倚在一名女艺人身上，听她们弹奏吉他，一切部显得是那樣的平静和柔和。

19 时 30 分，餐厅厨房长南孝周端着盛满酒肴的盘子走出厨房。朴善浩走上前来：“我要见金部长，请你转达一下。”

南孝周点头，走入餐厅，将酒肴放好。走近金载圭说：“朴处长要见您。”

19 时 35 分金载圭再次离席。来到厅旁的一个房间，朴善浩低声报告：“都准备好了。”

金载圭满意点点头，再次提醒朴善浩以餐厅的第一枪为讯号。然后，他登上二楼办公室取出那支西德造的七连发手枪，插入右腰，用外衣盖好，返身下楼回到餐厅。

19 时 40 分，金载圭坐稳后，忽然语气强硬地向朴正熙说：“阁下搞政治要顾全大局呀！”

接着又指着车智澈，以挑衅和讥讽的口气对朴正熙说：“您带着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得好吗？”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朝车智澈就是一枪，转而又向朴正熙打了一枪。车智澈右手腕被子弹打穿，慌忙逃到厕所躲避；朴正熙应声倒下伏在左侧女艺人的膝上，两个女艺人大惊失色慌忙放下吉他，扶起朴正熙，用手掌堵着流血的前胸和背后的伤口，问道：“阁下怎么样？”朴正熙闭着眼，忍着痛说：“我没关系。”说着已耷拉下了半截身子。

外面朴善浩和朴兴柱听到里面枪响，也一起动手，把朴正熙的警卫人员全部击毙。

金载圭正在追杀车智澈，突然发现子弹卡壳，连忙出去换枪，他回来时，正碰上车智澈一边从厕所往外跑，一边叫喊：“警卫员，警卫员。”真是“冤家路窄”，金载圭一梭子弹打在车智澈的肚子上。接着金载圭又走到朴正熙的身旁，发现他仍没有咽气，就用手枪抵住他的脑袋又开了一枪。这位 62 岁的独裁者就这样死在了他的亲信手中。

郑升和背叛了金载圭。他也不想利用手中的兵权，企图填补朴正熙死后南朝鲜出现的权力真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保安司令金斗焕突然发动“肃军政变”。一场血战后，郑升和负伤被擒，三军将领被捕者 40 余人。至此，南朝鲜的大权落在了新的军事独裁者金斗焕的手中。

佩剑将军的覆灭

——国民党名将张灵甫之死

张灵甫，陕西长安人。1925年7月，21岁的张灵甫与刘志丹等陕籍青年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在第四期黄埔学生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将领的林彪、郭化若等。第四期黄埔学生按考试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邱维达与刘志丹编成同一个队，属于考试成绩较好的军官团。林彪、郭化若等也在军官团。张灵甫因考试成绩差编在预备军官团。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般都得入两次军校，即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张灵甫只进过一次黄埔，而且还是个预备军官生。在校学习期间，张灵甫成绩平平，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按规定，预备军官团要比军官团晚毕业三个月。1926年10月，因北伐军急需干部，两个团才同时毕业。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在胡宗南手下任营长、团长，是胡宗南“剿共”的心腹干将。后因无故枪杀自己的妻子，被蒋介石关了一年多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王耀武保释出狱，先任上校候差员，后任补充团上校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整编师师长等职。

张灵甫信奉的是暴力哲学，非常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他常常以中国未来的希特勒而自居，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传入中国后，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对希特勒的举止不仅极为欣赏，而且拼命模仿。他中等身材，长方脸，长相酷似希特勒，特别是他那往一侧耷拉的分头，更清现出一副希特勒似的模样。

张灵甫性情粗暴，对下属极为严厉，对同僚常常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但对上司却唯唯诺诺，俯首贴耳，很善于找靠山。他先是投靠胡宗南，后又投靠俞济时、王耀武，俯首听命。他平时寡言少语，也不善交际，性情孤僻，但很爱搞小团体，拜把兄弟，讲哥们义气，他当师长时，他下面的旅长、团长大都是与他盟誓喝过血酒的拜把兄弟。

张灵甫原名叫张宗灵。他是一个非常冷酷寡情的人，从他杀害自己无辜的妻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张灵甫先后找过好几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他家乡人，在父母的撮合下成的亲，起初还恩爱过几年，但自从他发迹之后，便瞧不起自己的结发妻子了，嫌她土气，不像官太太，特别是出入于社交场合带不出去，这样，硬是让人家当了“秦香莲”。后来又在郑州找了一个，时间不长又散了，他的第三个妻子是苏州人，虽不具备“沉鱼落雁之容，羞月闭花之貌”，倒也不乏苏州女子的秀气，颇有几分姿色。不仅长相漂亮，而且贤惠正派，通情达理。同事们都羡慕张灵甫娶了一位好太太。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奉命“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张灵甫就在胡宗南手下任团长，是攻打红军的急先锋。部队驻在陕北，军官们的家眷都在西安，每季度回家团聚一次。张灵甫的妻子也在西安。一天，张灵甫一个同事（也是团长）探亲返回部队后，张灵甫问他：“你可看见我的太太？”张灵甫的醋劲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这个同事想逗逗他，看他这个醋罐子究竟酸到何种程度。同事跟他开玩笑，打趣地说道：“看见啦，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位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两人可亲热哩。”张灵甫是一个遇事很认真的人。妻子的不贞，对他来说，不啻如五雷轰顶，气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便气冲冲地返回营房了。他一连几天闷闷不

乐，时而使劲地捶打自己的脑袋，时而在房子里急转几圈，羞辱，愤怒，烦躁，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不知怎样才能解脱和发泄。脾气变得也越来越粗暴，见谁骂谁。几天急风暴雨似的感情浩劫，眼眶猝然下凹，他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耻辱。他曾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或直接提出离婚，但怕成为同事们的笑柄。他拿出妻子的照片，妻子那娇美的容貌在他眼前丑陋不堪，秀气的双眼，在他看来，仿佛闪射着浮邪和罪恶的光。他不愿再多看妻子一眼，把妻子所有的照片都掏了出来撕了个粉碎。他不愿忍受这种感情的自我折磨，急切地向胡宗南请假回西安。胡宗南准假后，他除带一支手枪，什么也没带就回家了。妻子见到久别的丈夫回来，自然很高兴，把自己很好地梳洗打扮一番，使本来就很漂亮的地，愈加妩媚。妻子这样做以博取丈夫的欢心，这在过去，张灵甫认为是很正常的，但现在看来，他认为妻子变了，变得越来越爱打扮，当妻子把自己的柔情献给他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轻浮，风骚。妻子还是像从前那样周到地侍候他，给他打洗脚水，做可口的饭菜，但张灵甫却认为这是妻子心中有愧，假献殷勤。心灵龌龊，丧失了理智的张灵甫，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一天，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妻子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你为我包一顿饺子！”妻子听后爽快地说：“好啊，我这就去割韭菜来拌馅。”说完拿着一把镰刀就到菜地割韭菜去了。张灵甫提着枪尾随在后，待他妻子刚蹲下割韭菜时，他拔出手枪，朝妻子后脑就是一枪，妻子一头栽倒在韭菜地里，无辜地惨死在自己丈夫的枪下。张灵甫枪杀妻子后，既没声张，也没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了。

张灵甫枪杀无辜妻子的消息传出后，西安各界妇女愤怒至极，他们联名上书宋美龄（当时宋美龄任全国妇女部部长），要求严惩杀害无辜姐妹的凶手张灵甫。宋美龄接信后也很气愤，她把信往蒋介石面前一摔说：“看，这是你的学生，枪杀无辜，天理何在？！”蒋介石看罢信，气得脑门上青筋凸露，“娘希匹！不争气！”立即吩咐侍卫官摇通胡宗南的电话，对胡宗南说：“你部队有一团长，叫张宗灵，无故枪杀自己的妻子。我命令你将他解来南京，监禁法办！”口气异常的严厉和坚决。张灵甫粗暴、冷酷，寡情，作为他上司的胡宗南是清楚的，但想不到张灵甫会无故枪杀自己的妻子。胡宗南随后对张灵甫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随便枪杀自己的妻子，老先生来电话，要你立即去南京听候查办。”因为张灵甫是胡宗南的心腹干将，所以既役绑，也没派人押送，由他一人独自到南京。张灵甫知道闯下了大祸，也悔恨自己的粗暴和简单，只得乖乖地去听候校长的发落。

从西安到南京，沿途要经过洛阳、郑州、徐州等地，他由于带的路费少，加上自己平时挥霍惯了，走了不列一半路程就囊空如洗。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时的张灵甫不甘为乞，想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卖字。张灵甫自小就模仿于右任的字体练习写字，从军以后也一直没有歇过笔，因而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字写得越大越好看，解放前南京有很多商号的招牌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每走一段路就从集镇上买来宣纸写上几幅。沿路的人都以为是于右任的字，纷纷掏钱购买。就这样，走一路，卖一路字。到南京后，他请求校长的接见，但蒋介石拒绝见他，并把他关在了模范监狱。蒋介石并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张灵甫在监狱里仍能自由地活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并将所写的字送给监管人员作纪念，监管人员对他的管制也不严，允许其会见友人。关了一年多，蒋介石一直没有指示有关部门审理。1937年

“七·七”事变后，王耀武出于顾念旧情（王耀武与张灵甫同在一军共过事，那时王耀武当营长，张灵甫当连长，二人关系比较密切），向蒋介石为张灵甫求情：“张宗灵这个人作战很有本事，现在抗战正需要干部，莫不如让他出来带罪立功。”靠黄埔起家的蒋介石本来也不忍心惩办自己这个学生，便对王耀武说：“那就交给你，要好好教育他，让他重新做人。”就这样，张灵甫被秘密释放了，欠下了一笔没有偿还的血债。张灵甫被释放后，即到西安南镇74军51师王耀武手下任上校候差员，邱维达当时任51师参谋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51师奉命南进，途经郑州时，需要成立一个补充团。于是张灵甫便任补充团上校团长，因为张灵甫枪杀妻子的事件在部队震动很大，“张宗灵”这个名字很臭，于是他便从这时改名叫张灵甫。

张灵甫释放出狱后，为感恩戴德，更加效忠蒋介石。1939年在江西德安的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腿被日军的炮弹炸断，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到香港医治了半年，但仍留有残疾，右腿较左腿细，走路有点跛，人们都称他“张瘸子”。依靠王耀武和俞济时的提携，张灵甫的官衔也不断晋升，1941年11月任58师师长，1944年底，常德会战后，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1946年，国民党整军会议后，张灵甫被任命为整编74师师长。原74军组建于“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第一任军长是俞济时（奉化人），其后是王耀武、施中诚。这个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主力，一色的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可谓是国民党政府的“御林军”，宋美龄经常代表蒋介石到该部伙视察，抚慰官兵。王耀武任74军军长时，由于蒋介石的精心栽培和王耀武的励精图治，该军实力达到顶峰，与日军较量时，每每取胜，今日军也惧怕三分。全军人员曾达到5万多人，整编后仍有3万多人。在召开全军整编会议时，整编74师被蒋介石、陈诚捧为“国军模范”，命令各部队训练以该部为标准。张灵甫能担任这个王牌师的师长，可谓三生有幸。不过，他也险些当不了这个师长，当时蒋介石遴选这个74师师长时，曾有好几个人艳羡这个肥缺，其中李天霞（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的原型）就是一个，他依仗钱大钧作后台，但由于他为人奸猾，为王耀武、俞济时所不齿，遂力保张灵甫，才使张灵甫当上整编74师师长。李天霞为此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1941年4月初，国民党集中华东第一线兵力，共13个整编师，34个旅。25万人，由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3个机动兵团，沿临沂至泰安一线，齐头北进，企图一举摧毁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在蒋介石孤注一掷的“点攻势”战略的驱使下，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头脑发热，不待其兵团统一行动，即部署以4个整编师守备临沂、郯城、新安镇、海州，巩固后方，另以6个整编师分3路纵队向北进犯，中间的一路以整编74师居中，整编83师居右（师长李天霞），整编25师（师长黄伯韬）居左，向坦埠进攻，拟从侧面围击华东野战军主力。张灵甫为抢头功，自恃自己兵强马壮，又一式美械装备，瞧不起友军，突出冒进，与友军相距30华里。友军为保存实力，加上对张灵甫高傲自大不满，观望徘徊，行动迟缓。张灵甫率领整编74师在进攻中遭到野战军的迎头痛击，以为坦埠附近有解放军重兵集结，便立即部署向南面的孟良崮、垛庄方面仓皇撤退。华东野战军乘胜追击，并从侧翼袭击，使之伤亡很大。当撤至孟良崮地区时，张灵甫看到此地地形复杂，便想在此固守。这时，师参谋长魏振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向他建议：“此乃孤山，为兵家之大忌，不易固守。”副参谋

长率运良（东北讲武堂毕业），则向他建议说：“军座，此虽孤山，但地形险要，我们要置于死地而后生，临险境而逢生。”一向过于自信的张灵甫接受了副参谋长率运良的建议，不惜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在四周层峦叠嶂的孟良崮安营固守。

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野战军首长认为全歼整编74师的时机已经成熟，遂集中9个纵队（这9个纵队大都与张灵甫交过手），作如下的战役部署：用5个纵队将张灵甫的整编74师团团围困在孟良崮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同时分割两翼，待机歼灭；用4个纵队和鲁南地方武装分别阻击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这真是铁壁合围，盾牌林立，敌74师求生——插翅难逃，求援——无隙可应，张灵甫成为瓮中之鳖，只等华东野战军合手擒拿。

整编74师被围之后，蒋介石认为这个师是战无不胜的“精锐之师”，又处在有利地形，左右援兵都较靠近，正是同华东野战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一面命令74师坚守阵地，吸引解放军主力，一面调集重兵向74师靠拢，协同作战，实现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意图。国防部长白崇禧，总参谋长陈诚也飞到临沂督战，命令张灵甫的指挥所移到孟良崮山上，吸引解放军主力，居高临下，中心开花。

孟良崮，在山东中部的沂蒙山区，群山连绵，沟壑纵横，72崮，装点其间。这里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整编74师所占领的阵地，虽地势险要，但都是岩石山地，无法构筑工事，人员、马匹、辎重等密集在各个山头 and 山谷里，完全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炽盛的火力之下。且退路和交通运输都被切断，水源也被解放军控制起来，唯一的救命草是靠飞机从徐州、南京运来的馒头、米饭、弹药和水囊，但大多又落在了华东野战军据守的阵地。真是饿无食，渴无水，弹药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军心动摇，哀号悲鸣。外围的增援部队在蒋介石的严令逼迫和张灵甫的求救声中，一再想给张灵甫解围，但在华东野战军强有力的阻击面前，寸步难行。张灵甫率74师指挥所躲在一个山洞里，用报话机频频呼救，并对25师师长黄伯韬、83师师长率天霞说：“你们快快向我靠拢！”李天霞虽与张灵甫近在咫尺，但他和张灵甫素有隙，救援不力，只派了一个团作了一下象征性的增援，25师的黄伯韬虽竭力支援，但在人民解放军和山东地方武装强大的阻击面前不能前进一步。这真是，74师四面楚歌，各路援兵望崮兴叹。

孟良崮一战，74师输得精光。

张灵甫之死，一直是一个众说纷坛的话题。从《南征北战》的电影上看到的是“张军长”受伤之后躺在担架上，而电影《孟良崮战役》、《红日》告诉我们的是张灵甫被解放军击毙了。国内不少报刊载文也都说是被解放军击毙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张灵甫确实是自杀的，而且是集体自杀。

1947年5月15日夜，总攻之夜。解放军各纵队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发起了总攻，以强大的炮火向孟良崮群山轰击，74师虽只剩下几个孤立的山头，仍在负隅顽抗。深夜，隆隆的炮声如同阵阵的沉雷，机枪在泼水似的倾泻，曳光子弹连珠般的在空中飞舞，照明弹接二连三地升向天空，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整个群山，在火光与枪炮声中迎来了黎明。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解放军如猛虎插翅，扫荡山麓，突破山腰，奔向山巅，把密集的74师撕成碎片，各个击破。5月16日下午2时，74师已全线崩溃，师、旅、团、营都已失去通信联络。从师指挥所里，已能看到山脚下的解放军部队。张灵甫见败局已定，无力挽回颓势，友军解围亦无希望，就想扮演一出滑稽

的“集体自杀”把戏。他先用无线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诉说友军见死不救，尤其是李天霞没有遵照命令派出部队掩护右侧安全，指为失败主因，并将指挥所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姓名报告蒋介石说要“集体自杀，以报校长培育之恩”。张灵甫用文言文亲自起草了一份遗书，要他的把兄弟一一签名盖章或按手印，交给他的两个营长带出。参谋长魏振钺因为是国防部临时委派的，与张灵甫没有结拜把兄弟，不愿自杀，趁机逃出，后被解放军俘获。他的把兄弟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拿出自己老婆孩子的照片相向而哭，不肯自杀。这时的张灵甫仍然骄气十足，他不无哀丧地对他的几个把兄弟说：“我们抵抗已到最后关头，作为军人，要有军人之气节，战死最光荣，蒋校长授予我们佩剑，谓之军人之魂，就是要我们不成功便成仁。”说罢命令他的卫士：“来！从我开始！”“哒、哒……”一阵汤姆冲锋枪响过，张灵甫、蔡仁杰，卢醒及57旅副旅长明灿、57旅团长周安仪等军官都毙命于师指挥所的山洞里。

这时，解放军已经冲到了洞口，洞里的卫士负隅顽抗，解放军用冲锋枪、手榴弹还击。然后顺势冲进洞里消灭残敌。只见山洞里尸首狼藉，但张灵甫是否脱逃尚不得而知。后经被俘的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逐一辨认，确认一具是张灵甫的尸首后，将他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两天后将他埋在山东沂水野猪旺村后的山岗上，并在坟前竖一木牌，上写：“张灵甫之墓”。当时新华社曾播发消息，希其家属到该处收尸。

蒋介石的幕僚长

——陈布雷之死

1948年4月，蒋介石为了给陷于困境的国民党输氧，喧喧闹闹地召开了一个所谓的“行宪国大”，改组政府，并“选举”他自己为政府总统。六月，跟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

但是，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精力去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春季以来的种种迹象使他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蒋家王朝已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难以渡过的危机。那在不仅一般老百姓公开地骂蒋反蒋，积极地支持解放军，就连国民党内的几个民主派别也公开揭起了反蒋联共的旗帜。蒋介石为此暴跳如雷，多次命令陈布雷详尽地研究情况，提出对策。但是陈布雷急得汗流浹背，也说不出几句可供蒋介石参考的话来。

陈布雷觉得自己的脑神经快要崩断，头部如同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不动则已，若一动弹，头上的紧箍便立即收一收，使他痛苦不堪。他想抽身而去，以求解脱，却欲罢不能。于是，这头上的紧箍便越收越紧，越收越紧，把他折磨得简直要发狂。

1948年下半年，光明和黑暗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最后的决战。

陈布雷用黯淡的目光注视着国民党政权从滑梯上飞速下跌。

曾几何时，蒋介石在莫干山亲口告诉他，实行金圆券后必可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遵照“政府法令”，带头将手头的一点黄金、美钞兑换成了金圆券。岂料币制改革一败涂地，金圆券猛烈贬值，狂潮万丈。几万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而四大家族却早已私下将大量金银，美钞转移到国外银行。

曾几何时，宋美龄曾在总统府亲口告诉他：“美国朋友”保证支持国民党挽救危局。但是美国人眼看国民党连连吃败仗，已经准备釜底抽薪了。倘若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还能苟延残喘几日？更何况国民党已一蹶不振，许多高官大员正暗中订票准备逃往台湾。陈布雷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

历史的变迁对于陈布雷来说，无异于幻想的最后破灭，是对他投身蒋介石，充当十余年幕僚生涯的无情鞭挞。春秋更迭，风云激荡，地覆天翻，曾经以强权统治中国的蒋家王朝如今已“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二十一年前，当陈布雷年方三十出头，打一顶布伞，冒着漫无风雪从上海棋盘街报馆出发，去南昌普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尚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进步记者，怀着“文章报国”的信念，觉得凭着手中一枝生花妙笔，此生必定大有作为。但他今日反省，却痛楚地感觉到，一生辛苦，却还是将自己的魂体去实现他人之意志，满腹学问全作了暴君口中欺人之谈。落得如此一文不值的下场，真是欲叹无声，欲哭无泪！

“阿爸，认清形势啊！古语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有一天，陈璉语气恳切，单刀直入。陈布雷听懂了话中的意思，向女儿怔怔地瞥了一眼——眼神中包含着惶恐疑惑，但也包含着思索……然而他到底没有跨过这条新旧历史的界限！

解放军的炮声震落了南京总统府封积的尘埃，“宁国府”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蒋介石一面准备推出李宗仁应付残局，一面秘密筹划逃往台湾。

淮海战役刚打响，陈布雷沮丧的心情已难以掩饰。他连饭后与副官聊上几句的老习惯也丢掉了，放下筷子就独自一人蹒跚着走上楼去。一张报纸看不了两眼就摔下，摔下又拾起来。手中的香烟在烟灰缸里“啪啪，啪”要弹十来下子，仿佛上面有抖不脱的肮脏。

有人传说，陈布雷曾流着眼泪去劝告蒋介石停止抵抗，与共产党和谈，却遭到粗暴的拒绝，大约就发生在这期间。但陈布雷精神世界的崩溃却不止一天两天了。

半个多月前，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提出要陈璉夫妇陪他去拜谒中山陵。沿着长长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陈布雷心情沉重，始终一言不发。他向已故总理孙中山石像凝视良久，缓缓垂下头去，肃然行以长鞠躬。沿着长长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下去，陈布雷神情恍惚，依旧一言不发。

陈布雷能说什么呢？中山先生所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纲领，正是他陈布雷1927年在北平为蒋介石代撰的《祭告总理文》中公开推翻的，虽然国民党遇节逢年以至开会必诵必读《总理遗嘱》，但中山先生所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二十一年来已成英灵徒唤之语。于今，中国历史要国民党承担不可推托的罪责！身为蒋介石的幕僚长，奔走于黑幕，策划于密室，陈布雷站在中山先生灵前能说什么呢？

11月12日，淮海大战爆发后的第六天。北风卷起满地枯黄的落叶，冬色浓浓地染遍了南京城。在这座为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城市里，虽然处处可以嗅见恐怖森严的气氛，但一阵阵呼啸着奔腾而来的长江惊涛却大声告诉人们，盘居于此的独裁政府快要崩塌了。

这天上午，陈布雷突然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他要在那里工作的女婿袁永熙即刻就去湖南路寓所与他见面。数日之前，陈布雷已将夫人王允默派往上海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两日之前，陈布雷又通知守卫的卫兵，他一律不见来客，袁永熙是这期间他召见的唯一客人。

茶几上歪歪斜斜摊开一叠书报，陈布雷蜷缩在沙发里，比平日更显得瘦弱矮小。他神情凄楚，斑白的须发杂长蓬乱。

“您怎么也不理理发？”袁永熙坐下后问道。

陈布雷无力地苦笑了一下：“好吧，你就关照他们叫一个理发师来。”

理完发，随从掩门退了出去。陈布雷长叹一声，语气低沉他说：“唉，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于今悔之晚矣！”他咳嗽了，捂着头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你们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

室内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喔，怜儿近日如何？”陈布雷沉默了片刻，抬头望着女婿。

“还好。她照旧在休养，有时搞点翻译。”袁永熙回答。

“怜儿体弱，叫她好好保养身体。”陈布雷说完，苍白的脸颊微微抽搐。谁也没有料到，次日凌晨，陈布雷自杀了。

12日晚上，陈布雷默默地吃了几口饭便离开了餐桌。他踉跄着向楼梯口走去，在转弯处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一盏幽暗的壁灯映照着消瘦矮小的身影。他微微佝偻着背脊，像是承受不了充满内心的重负，苍老的、深深凹陷的双颊，散发出一股悲凉之气，一双失神但清醒的眼睛，似乎在望着室内熟悉而陌生的桌椅、书画，又似乎在望着虚空中陌生而熟悉的彼岸世界。他不知为什么，突然伸出手来拉了拉衣服的领口，接着扶着楼梯向2楼走去。

陈布雷像下午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面。

他坐在书桌前，将腹稿重又仔细地斟酌了一遍，便从笔筒里抽出那支用惯了的狼毫笔，往墨盒里狠狠地蘸了蘸，伏案写道：

“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恩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劲厉的晚风正无情地咆哮。陈布雷抬头望了望窗外猛烈摇动的树影，凄凉之情涌上心头，他搁笔自语道：“无价值。”旋即用机械的动作端起茶杯饮了口茶，使劲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又继续写道：

“凡此狂热之思想，纯属心理之失常，读我公昔在黄埔斥责自责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无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责，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早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陷此极不负责之结局。”

写下“结局”之后，笔下写出“书生”二字，陈布雷不禁仰面长叹。他呆呆地盯住满案书卷，苦笑了一声，颤悠悠地接着写道：

“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为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写完这封遗书，言犹未尽，又书一封，解释此举，“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这才舒了口气。他靠在椅背上吸了几支烟，便依次给家属、同事、秘书等人书留遗言。

陈布雷将全部遗书写完之后，又寻出致夫人王允默的那封遗书，再读一遍，读至“出此下策，无可奈何”一语，已如死井之水的心境，重又激起一道波澜。陈布雷扶住阵阵作痛的头脑，把隐没于心底的“上策”、“中策”、“下策”，重新摆出来，再作一番考虑，但最后结果却仍然是“进退无措”！他无限痛苦地摇了摇头，离开了书桌。这时黎明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之上。

陈布雷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两瓶进口烈性安眠药置于床头。他一生唯有两样东西要真正的优质，一是香烟，二是安眠药。这后一样优质的东西今天便要结束他的生命。

陈布雷躺上床去颤抖着连续吞服了一百六七十粒安眠药……

直到十三日上午九时许，国民党中央党部打电话催促陈布雷去开会，秘书和副官推门不开，爬上气窗这才发现陈布雷已死。

他直挺挺地仰卧在床上，嘴角悲惨地向下弯曲，似乎心里隐藏着说不出的苦衷。身上依旧是长衫一领，布袜一双。书桌上放着一叠遗书。墨盒上面搁着他那支常用的狼毫笔，没有戴上笔帽，仿佛他还要用笔写些别的什么似的。

陈布雷——这个曾为北伐和五卅运动鼓吹而名噪一时的进步记者：这个不愿从政却违心地为宦二十年的旧式文人：这个充当蒋介石的记录生，却幻想着扶助明君安邦治国的士大夫，当中国如同火中的凤凰即将新生、高飞的时候，他却因“错、错、错，莫、莫、莫”而用自戕演完了他的最后一幕悲剧。

当陈布雷的死讯报达蒋介石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杀”？蒋介石蓦地站起身来，两颗浑浊的泪珠从眼角愀然滚落。陈布雷的死讯象征着蒋家王朝的穷途末路。

中午，蒋介石来到陈布雷寓所。此时陈布雷唯一在南京的子女陈璉和袁永熙也闻讯赶来。在场的还有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

蒋介石仁立在陈布雷床前，他注视着幕僚长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脸色阴晦，可怕地沉默着。陶希圣向他递上陈布雷的遗书。蒋介石一页一页慢慢地翻阅，阅毕，低沉他说：“交国史馆制版永存，尔后交中央社发表。”

“发表？使不得，使不得吧？”陶希圣紧张了。蒋介石回过脸，简短地补充了一句：“可以，发吧。”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这是中央社1948年11月13日发布的消息。“陈布雷以死报国”——几天之后中央社才报道了陈布雷自杀的真实情况，并同时发表他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

国民党为陈布雷举行大殓。蒋介石亲题横匾“当代完人”。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李宗仁、孙科、陈立夫、何应钦、于右任、张群、邵力子等参加了祭礼。“油尽灯枯”——陈布雷生前写在杂记中的这句话，又由他的亡魂在灵堂里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着，使前来吊唁的国民党高官名将不寒而栗，心惊肉跳。

陈布雷的遗体根据他夫人王允默的愿望，安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旁边的梵村六亩半地，这便是陈布雷过去为退休隐居而预置的那块土地。蒋经国先生护送遗体离宁去杭。灵车所过，各地国民党军政要人垂泪相送，兔死狐悲。正如美国进步作家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对陈布雷自杀所作的评述：“这是封建主义向中国的专制寡头最后告别时发出的半夜里猫头鹰一样的凄厉的叫声。”

最后的生日礼物，死亡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之死

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生于商人家庭。当过剧场杂役、演员和偏剧。主要剧作有《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他的剧作多取材于历史传说或根据已有剧本改编，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剧作情节生动丰富，语言精练优美，对欧洲文学和戏剧发展有重大影响。

1612年，48岁的莎士比亚，在才思并未表现出任何枯竭的时候，突然激流勇退，停止了自己的创作活动。对此，历来的莎学家们作了种种分析，答案各异。

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有了名声和财富，想回家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

有人认为莎士比亚这样做，除了疲劳之外，还有失望。即为谁创作？为谁演戏？他同进戏院看戏的新一代是格格不入的。

另有人认为作家对于生活和周围环境感到厌恶，对于人生的一种厌倦感使他引退。

也许，各方面因素都有一些：疲劳、疾病、对人世的厌倦、对环境的不满……

“人生来自无生，复归于寂灭；和永恒比较，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这是莎士比亚后期佳作《暴风雨》中的一段人物独白。莎士比亚那种对生活感到厌烦疲倦，因而想到人生自然结局的晚年心理，在他后期的创作中，确实随处可见。

也许是为了给戏剧家的引退增加一点戏剧性，莎士比亚的最后告别舞台，竟同“环球”剧院的一场大火有关。

1613年，“环球”剧院准备上演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这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个戏。演出豪华而盛大，不少著名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当演到国王亨利八世驾到，人们向他鸣炮致敬时，用纸做的填弹塞由炮口飞出，落到于草屋顶上起了烟，但没有人发现。不久，火燃烧起来，很快蔓延到整个剧院。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剧场便被烧成一片瓦砾……

心情沉重的莎士比亚站在一旁，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这场吞噬了一切的大火。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写一个剧本。

没过多久，莎士比亚把自己在剧团的股份转让给了别人，并清理了他在伦敦的财产和一切有关事务之后，悄然无声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喜欢及时享乐的伦敦市民，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去，当然也不会有人为首都众多的居民中少了这样一位伟人而感慨叹息。

不过，从首都归来的莎士比亚，已不是30年前那个“破落家庭”中的穷小子了。现在，他拥有全镇最宽敞豪华的住宅和大笔动产与不动产，并拥有两个绿荫蔽日、风光美丽的大花园。如今，他已成了斯特拉福镇首屈一指的富翁。

莎士比亚晚年的心境平静而悠闲，如同那缓缓流去的艾纹河水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但是，在最后几年，他也遇到过一些恼人的事。小女儿天资愚笨，读书不行，婚事一直较难。1616年2月，已经32岁的小女儿却突然要宣布结婚，

丈夫比她小6岁。这种年龄逆差，简直是当年莎士比亚和妻子那不相称婚姻的再现。身为父亲的莎士比亚有苦说不出。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儿因婚事没有求得主教同意，受到教会传讯。女儿不出庭，结果被开除教籍。

这是1616年3月12日的事。当时，莎士比亚染病在身，已卧床不起。这件事无疑给莎士比亚已经有些郁闷的心境更添了一层烦恼。

然而，就在那个月下旬，卧病在床的莎士比亚突然心情愉快起来。他的老朋友本·琼生偕同德雷顿专程从伦敦来看望他。

席间，老朋友向莎士比亚谈起从伦敦带来的各种新闻轶事。这对已在小镇闲居多年的莎士比亚来说，自然感到新鲜有趣。三人回顾过去，畅谈人生，不禁感慨万分，加之莎士比亚近来愁情难解，这种故友对饮的欢悦气氛确实难得。于是，高兴之下，剧作家竟不顾自己身体不适，一杯又一杯地痛饮美酒。

送走琼生和德雷顿后，莎士比亚不适加剧，倒头便睡。第二天，竟起不了床。请来医生诊治，仍不见好转。一连几天，他都卧床不起。这时，他料到，自己可能大限已到了。

他让人请来公证人，说定了处置自己那一大笔财产的办法。他把大女儿苏珊娜定为主要继承人，分给绝大部分遗产，而把妻子嘱托给了大女儿和女婿。其他的亲人和朋友，以至剧团的同事，都得到了不同数目的财产和馈赠。

3月25日，莎士比亚用已经握笔不稳的手，在遗嘱上签了字。这以后，他病情日益恶化。

1616年4月23日，座落在英国中部艾纹河畔的斯特拉福镇，到处是一派明媚春光。

这天，在小酒店里喝酒的人特别多。春天特有的宁静气氛和灿烂阳光，让人们觉得心情愉快。正当人们对杯畅饮的时候，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在镇上那座气势恢宏的花园住窠里，一个中年男子，溘然长逝了。

屋子里乱作一团，一片哭声。比死者大8岁的妻子，痛不欲生。整个住宅里，一派悲痛忙碌的气氛。

事情非常凑巧，这一天，正好是死者的52岁生日。死者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5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他的去世既突然，又相当平静，即使是在这个小市镇上，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不过，他的生与死，却给世界文化艺术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巨匠，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

孤独散步者的梦想

——法国哲学家卢梭之死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积极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哲学上，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根源；在社会观方面，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受“自然”自由和平等：道德的败坏是由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教育观点上，卢梭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主张顺应儿童的本性。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小说《爱弥儿》、自传性的《忏悔录》等。

1769年2月1日，卢梭与妻子瓦瑟从布戈市迁往蒙魁镇的一座农场居住。那地方是希沙基侯爵的私产，此时的卢梭年事已高。

农场四周景色优美，虽然他们住的是一间旧屋，但地点适中，由屋里可以远眺蜿蜒而流的雷尼河和杰拉山的雄伟气势。窗外的树上经常栖息着一些燕子，呢喃地叫着。这种环境使卢梭感到非常愉快，但瓦瑟却渐渐对这种田园生活感到厌烦，想重过巴黎的都市生活。这种矛盾使卢梭感到非常苦恼。虽然他们俩之间产生了摩擦，但卢梭却一直努力使她生活快乐。不久，瓦瑟生了病，卢梭虽然年纪已大，却仍然帮助料理家务，直到她恢复健康。

第二年春天，卢梭决定迁往巴黎，瓦瑟终于实现了回巴黎的心愿。虽然巴黎的生活费用比较高，但有版税和舒瓦瑟尔先生寄来的生活津贴，足够他俩在那里花的。他们住在古老的布拉屈斯镇，平时卢梭誊写乐谱和作曲，并开始撰写《对话录》，他不声不响地写这本书，以免再遭受外界对他怀有恶意的人的攻击。卢梭写这本《对话录》的用意是要让人们知道他对自己的批判，采用卢梭同另一个卢梭对话的方式写成的。

这段时期内，卢梭的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然后立即到写字台前工作，誊写乐谱。吃完早饭后，又在桌前继续工作，一直于到下午，最后出去散步。有时，他和瓦瑟一起外出用餐；有时，他俩到山丘上欣赏夕阳或者和邻居们玩游戏。每次外出回来时，他们总是显得格外愉快。

卢梭写《对话录》时，显然心情比较舒畅，但性格却变得孤僻。他不相信任何人，变得疑心重重，不让别人进他的书房，很少接见朋友，也不大与过去的熟人联系。虽然他不愿见人，但外界的人反而更想见见这位隐居者。格里姆先生借机发表文章，捏造一些有趣的故事，叙述人们急于想见这位隐士的情形。其中有一个故事是：有一天，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

“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有一个人问。

“我们等着看一看卢梭先生。”另一个人回答。

“谁是卢梭？”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等一会儿将经过这里。”

虽然卢梭没有在这种大场合中公开露过面，但他偶尔也会在一些女士面前朗读他的新作，并申述他有权公开朗读，因为官方查禁的只是他的书。他分别在一些贵族王室家里朗读过《忏悔录》，有时从早晨一直读到半夜。朗读时，他并不删减任何细节，包括他在书中所叙述的自尊心及他所犯的错误，全部无一遗漏地表达出来。当他读到把子女送进孤儿院时，许多女士都同情地低下了头，流着眼泪。

他的读者不只限于妇女，也有一些贵族王族向他请教；立法者给他写信，

请求指导，或者亲自拜访他，例如有一位波兰贵族名叫维科斯基，因境内政局不安定，特地前来拜访卢梭，询问补救办法。

卢梭不知如何处理他的《对话录》，因为法院查禁他的著作，使这本书无法出版，他在法国没有一位挚友可以代为保管。一次偶然的机，卢梭遇见以前在英国的友好布司比先生，他便将已誊好的《对话录》的第一部分交给布司比保管。其余的部分誊写完后，卢梭也想将稿子交给布司比，但他已经离开。这时，突然有一个念头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将《对话录》包好，在外层纸上写着：“托付给全能之主保管。”还写了一篇祷词：

公理与正义之神，受害者的保护者，请你接受我的献品，我将这手稿置于你的祭坛前，寄托给上帝保管。我是个不幸的陌生人，孤独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而且还被人嘲笑、讥讽、贬损。在以往的15年中，遭受比死还难受的屈辱，贬损我的尊严，而且所受的这一切迫害，我无法了解其原因。

我没有辩解的机会，我与外界联系的权利也遭剥夺。我对于人关不存有希望。因为他们充满了欺骗、诽谤与谎言。

我将我的作品托付给你保管，让它传到一个较好的下一代手中，他们将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既无怨恨，也不欺骗别人的人遭受了怎样的命运。如果我的作品落入怨恨我的人的丰中，而将它毁灭或删改，我也不会在意的，因为我遵从我主的公正，遵循我主的意志。

卢梭带着《对话录》手稿前往圣母院，打算将把它放在圣坛前，置于主的脚下。他迅速地赶往大教堂，穿过了布满鹅卵石的广场，经过拱门，向圣坛走去，但走到栅栏前时，发现教堂已经锁门，无法进去。他的身体摇晃着，头也像挨了打似地晃动着，无法将作品呈献给主使他感到非常懊恼。

他头昏目眩地走回家，坐在桌前誊写其他稿子——《忏悔录》、《孤独散步者的梦想》。这些作品充满了清晰的理论，《孤独散步者的梦想》还蕴藏着和谐优美的音乐。

这时，卢梭内心的郁闷又再度发作，他激动地写了一篇《致所有美好正义与真理的法国人》宣言，并在街上散发给行人。

过路的人对卢梭这篇宣言并不感兴趣，没有人愿意拿，因为他们觉得宣言中所讲的人并不是指他们。社会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位标榜正义的疯狂者，虽然卢梭内心一直保持着对人类的爱，但民众对爱、真理和正义却毫不关心，只有少数几位理想主义者除外。他希望能唤醒大众去关怀别人，然而民众却不理睬。

1776年10月，卢梭正在美里蒙特镇附近散步，思考自己的作品，突然间一辆马车驶来，虽然卢梭及时躲闪，但路边的狗却朝他扑来，使他在惊吓之余跌倒在地上，他的嘴唇淌着血，全身都感到疼痛，他在地上躺了很久。当他忍痛回家时，瓦瑟见他这副样子，惊叫了起来。当地报纸披露了这条消息，有的编辑故意讽刺他而将标题写成“卢梭被狗践踏！”

虽然卢梭受到新闻界的刺激，无法保持平静的生活，然而，当他身体复原后，他像平常一样继续从事写作。尤其是他现在撰写的《孤独散步者的梦想》，使他重新沉醉于青年时代的愉快环境和感情波涛之中，他写的《忏悔录》也如实地向读者揭示了他的生平。

这一年整个冬天，他都隐居在家里，很少外出。1778年4月12日是圣棕树节。清晨，教堂的钟声响了，卢梭起床倾听着钟声，激起了他的灵感，他立即着手撰写他那本《孤独散步者的梦想》中的“散步之十”。

4月到6月，卢梭便迁往爱美隆美尔镇上吉拉丁侯爵的住宅居住。当卢梭听说伏尔泰已去世时，顿时表情沉重。这使吉拉丁侯爵深感吃惊，因为他知道以前他俩之间的矛盾很深，互相攻击。卢梭向吉拉丁解释说，“我与他的存在是相互连在一起的，他如今已死，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他们两人的思想虽然格格不入，但都照耀了当时的理性时代。

1778年7月1日，老友莫顿先生来探望卢梭，他便将《忏悔录》交给莫顿代为保管，并希望在他死后能出版。第二天清晨，卢梭外出采集植物，没有多久因脚痛回到家里。喝完咖啡后，他告诉瓦瑟，说他准备去吉拉丁侯爵家，给他小女儿教音乐，并嘱咐瓦瑟给锁匠付款。

瓦瑟付款后，回家时听见卢梭呻吟说：“我感到胸口一阵阵疼痛，大脑也像被敲打似的。”这时是早上7点钟，外面天气晴朗，卢梭告诉瓦瑟，说他要看看美丽的阳光，瓦瑟便扶他到窗前，他说：“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与世长辞了。

第二天，人们纷纷来到爱美隆美尔镇，瞻仰这位思想家的遗容。著名雕刻家赫顿为他做了面型。医生为他验了尸。证实他是死于脑溢血，但当时外界仍然谣传他自杀而死。随后，他被葬在波拉斯岛上。

诗人的第二次决斗

——俄国诗人普希金之死

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出身贵族。童年时代开始写诗。他的著名诗作有《自由颂》、《致恰达也夫》、《茨冈》等。1831年完成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流传很广。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别尔金小说集》等。1836年创办《现代人》杂志，发表政论和文艺批评。在创作活动上备受沙皇政府迫害，最后在阴谋布置的决斗中遇害。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

1836年冬天，诗人普希金心情极端苦闷，他同时收到几封内容完全一样的匿名信。

这些匿名信，满篇是对普希金的诽谤和侮辱。

在此之前，俄国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突然传开一些流言蜚语。说一个有着男爵身份的法国侨民丹特士，正在拚命追求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娜，而且两人似乎有了某种暧昧关系。

丹特士是彼得堡近卫重骑兵团的军官，他虽然是法国侨民，却充当了驻彼得堡的荷兰大使盖克仑的干儿子。

而盖克仑男爵曾受到过普希金的冷淡和蔑视，本来就对诗人心怀不满。但他把这种情绪隐藏在心里，处处想办法暗地里伤害普希金。匿名信事件一发生，盖克仑就一面当众作出和解姿态，一面暗中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成见和矛盾。这样一来，普希金和丹特士的公开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次决斗由于诗人的朋友们的调节劝告，于1836年底，丹特士和普希金的妻姐冈察洛娃的正式结婚而得以避免。但是宿怨难解。

随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彼得堡社交界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而那些反对普希金的人，又竭力要两人碰在一起，并故意举行各种舞会宴会，想让普希金的妻子意想不到地突然遇上丹特士，以给普希金带来难堪。

然而这时的普希金，不想忍让，也绝不后退，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决矛盾，摆脱困境。经过一段时间的克制，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愤情绪，终于不顾后果地向盖克仑男爵写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挑战信。

在信中，普希金用尖锐激烈的措词，对盖克仑痛斥一番。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诗人去进行那危及生命的第二次决斗。

那天饭后，普希金午睡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将自己的文件手稿略略清理一番。4点钟不到，他就一个人出门了。

双套雪橇驶到警备司令别墅附近时，远远望见一辆雪橇从另一条路向这边驶来。雪橇渐渐驶近，上面坐着丹特士和他的决斗副手达希亚克。

这一天，尽管天气晴朗，但气温却只有零下15度左右。郊外的风很大，阵阵寒风卷起地上的雪花扑来，更加砭人肌骨。普希金裹着他随身带来的熊皮大衣，冒着寒风伫立在雪地上，眼睛里挂着一丝忧伤。他看着丹扎斯和达希亚克在那商量着，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决斗地点。

普希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神情仍然像在路上那样镇静，始终默默无言，仿佛是在看着他们在寻找一个郊外野餐地点。

丹扎斯和达希亚克用脚步量定距离，再用各自的大衣标出射击界线，然后开始往手枪里装弹药。

“喂，到底好了没有？”

普希金急躁起来，再次大声催促说。

“好了，好了，马上就开始了。”

一切准备就绪，两个副手把普希金和丹特士带到各自的位置上，将装了弹药的手枪递给他们。副手丹扎斯退到一边，将手中的帽子挥了挥。

这是事先约定的决斗开始的信号。

站在两边的普希金和丹特士，见信号发出，就开始往前走。普希金首先走到射击界线，他停下来，屏住呼吸，举枪瞄准……

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这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激动。浑身的血液并没有加速奔涌，心脏也没有急剧跳动，相反，他觉得微微有些窒息感。透过手枪的准星，普希金瞧见丹特士那闪露着凶光的绿色眼睛，以及那张略带惊恐的、苍白的脸上的肌肉在颤抖。

“我这就开枪打死他吗？可他到底是一个生灵，一个人啊……”

普希金稍一犹豫，拿枪的手禁不住抖动了一下。这时，枪响了——

人们看见普希金身子摇晃了一下，扑倒在雪地里。他的那支没开过火的崭新的手枪丢在一边，鲜红的血从伤口里冒出来，浸染着雪地。

原来，狡猾的丹特士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举动，他离射击界线还差一步时就抢先开了枪。

“我觉得我的股骨被打碎了！”

普希金倒下去的时候，丹特士听见他这样喊了一句。两名融手立即向受伤的普希金奔过去。丹特士也想跑过来，普希金愤怒起来，对他大声喊道：

“别动！我还有力气开枪呢！”

普希金按事先约定的决斗规则，制止了丹特士想移动位置的企图。丹特士只好停下来。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普希金挣扎着，相当吃力地用左手稍稍撑起身子，右手接过副手丹扎斯递过来的另一支手枪，对着丹特士举枪瞄准。

丹特士无可奈何地站在原地，用右手护住自己的胸膛，等待普希金射击。

身受重伤的普希金一手撑地，一手持枪，显得力不从心。不过，他手中那支枪终于响了，丹特士应声倒地。

“丹特士先生，你伤在那里？”侧卧在雪地上的普希金向对方大声问道。

“我想……”丹特士回答说，“是伤在胸部。”

“太棒了！”普希金高兴得把手枪扔到一边，像孩子似的大声喊叫起来。

其实，诚实的普希金再次被丹特士欺骗了。丹特士在站着等诗人射击时，有意将身子侧着站，并暗中用手掌护住胸口。普希金这一枪，子弹只是从丹特士胸前擦过，打在上手，并没伤在要害。而普希金的伤却在身体的致命部位，子弹打碎了他骨盆处的股骨，并留在腹腔里，这是有生命危险的重伤。

副手丹扎斯叫来车夫，几个人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普希金扶上雪橇。丹扎斯特别吩咐车夫将雪橇赶得慢点，他自己则在旁边步行。丹特士乘雪橇跟在后面。一路上，伤口的剧痛折磨着普希金。此时，诗人开始感到死神的影子在向自己逼近，但他依然神色镇定，心地坦然。因为，他毕竟是按自己设计的方式去进行了决斗。

马车将普希金送到住所伏尔康斯基大楼。

丹扎斯首先走进屋子，那时，诗人的妻子普希金娜也刚回家不久。丹扎斯尽可能平静地对她说，普希金刚才和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受了点伤，但伤势不重。

“啊，我的天！……”普希金娜的脸色立刻变了，惊慌失措地奔向前厅。仆人们正七手八脚地将普希金抬进楼来。普希金趁妻子这会儿不在身边的机会，向医生阿连德询问自己的伤情。他要求医生说实话，并表示不管什么样的回答他都不害怕，只是自己必须知道点大致情况，以便作些安排。

“既然是这样，”阿连德沉思一阵后，神色严肃他说，“那么，我得告诉您，您的伤很危险。要治好您，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

普希金听罢，脸色仍然很平静。他感谢了医生的坦率，又请求别将这些话告诉他妻子。

天色渐渐发暗，彼得堡夜幕降临了，整个伏尔康斯基大楼被一种沉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诗人躺在沙发上，他那略带忧伤的目光注视着窗外渐渐浓重的夜色。他把丹扎斯叫到身边来。

“我要把我的债务口授给你，请你记下来吧，亲爱的丹扎斯。”

普希金在开始安排后事了。丹扎斯强忍着悲痛，默默拿着笔和纸，一笔笔记下那些债务。这些债务既没有期票，也没有借据。

晚上，普希金伤势恶化，剧烈的疼痛使他痛苦难忍。有一阵，他甚至想开枪自杀。趁屋子里没其他人时，他叫一个仆人把写字台的一个抽屉给他抽下端过来。普希金取出里面的一支手枪，悄悄藏在被子下面。然而，这个仆人出来时将情况告诉了丹扎斯。

丹扎斯听说后，立即进屋去，从诗人被子里取走了手枪。普希金把手枪交出来时，向丹扎斯承认说，他自己确实想到了自杀，因为伤痛太剧烈了，实在叫他难以忍受。

1月28日早晨，诗人的伤痛减轻了些。不过，他还是叫人把妻子，孩子们以及妻姐等亲人们叫来，一一作了告别。其场面催人泪下。

中午时分，普希金觉得稍轻些了。他的情绪明显好转，偶尔还同人们说几句笑话。

然而，到了晚上，普希金的伤情大大恶化了。那一整夜，他几乎没有入睡，呻吟不止。

第二天，几个医生宣布诗人的伤情完全没希望了。阿连德赶来检查后，更悲观地预告说，普希金最多只能活两个小时。

前来探望的群众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往大门里挤。为了维持秩序，丹扎斯不得不通知宪兵团，请求派人来将人群挡在门厅前的空地上。不过，为满足群众对诗人健康的关心，茹科夫斯基每隔一定时间，就走出去向住宅外面的人群公布一次诗人健康情况的简报。

守候在诗人身边的俄国作家兼医生达里，试图安慰诗人。他对普希金说：

“阁下，别担心，你一定能恢复健康的。”

普希金摇摇头，吃力地喃喃说：

“不，这里容不了我……是啊，显然是……应该这样的……”

到最后时刻，诗人想吃一点草莓。一直守候在床前的丹扎斯马上叫人去取来。普希金明白这是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了，他要妻子普希金娜亲自喂他。

普希金吃得很高兴，每喝完一汤匙，他就望着妻子说：“嘿，真好吃！”普希金娜为丈夫这种突然出现的好胃口感到异常高兴。她怀着兴奋的心情对旁边的人说：

“你们可以看到，他会好起来的！”

可是，当普希金娜一离开，诗人就进入了临死前的弥留状态。脸色一直

很平静的普希金，用他那开始失去光芒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书房周围，低声然而却十分清晰他说：

“别了，别了……”

一会儿，他就悄无声息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 1837 年 1 月 29 日，下午 2 时 45 分。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著名诗人普希金，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间喜剧》与人间悲剧

——作家巴尔扎克之死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学过法律，曾在公证人事务所工作。早期作品有浪漫主义色彩。先后发表《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小说，揭露金钱关系如何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活动的动力。1834年，计划创作一整套社会长篇小说《人间喜剧》。计划写137部，实际完成90余部，其中有《幻灭》、《贝姨》、《邦斯舅舅》等。

19世纪30年代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小说风靡法国后，曾经收到过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其中大多数是温情而热心的女读者。

在这众多的淑女，太太，小姐，夫人中，对巴尔扎克这位文豪一往情深的大有人在。然而，真正使巴尔扎克动情，而且追求了长达18年之久才最后如愿以偿的却只有一人，这就是那个署名为“一个外国女人”的，出身波兰贵族世家的俄国女地主寒斯卡夫人。

巴尔扎克开始成名之后，也曾和一些仰慕他的巴黎女人们有过一些罗曼史，但大都是萍水相逢的过客。因为巴尔扎克内心深处早就扎下了攀门阔亲以摆脱经济困境的根子，不愿找没有家产的贫寒女子。

青年时代就一心想“发大财”的巴尔扎克，为自己归纳出四条发财之路。他曾经信心百倍地对人介绍说：

“早晚我要发一笔大财：或者搞文学，或者搞政治，或者经商，或者娶一个阔寡妇。”

前三条路，巴尔扎克这些年都分别试过，似乎都不大行。到后来，他认定只有“娶一个阔寡妇”这条生财之道或许可以走得通。于是，这位小说家放眼巴黎，物色着合适对象。没过多久，巴尔扎克又终于弄明白，在巴黎社交圈子里，那些有钱有地位的贵夫人们，似乎都了解他巴尔扎克的底细，知道他负债累累，穷愁潦倒。所以，想要在这里高攀阔夫人的愿望是不大容易实现的。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这个“外国女人”寒斯卡夫人，突然含情脉脉地出现在他面前。这正如在茫茫暗夜里见到一丝亮光那样，叫巴尔扎克激动起来。他把这点亮光当做可以指引他通向理想爱情之宫的烛光，紧紧抓在手里不放。他和这个素不相识的贵族夫人开始书信传情了。

在此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巴尔扎克一面和寒斯卡夫人通过情书恋爱，偶尔找机会陪她旅行幽居一阵。同时，一面在心里暗祈上天，让寒斯卡那衰老不堪的丈夫早日去见上帝，以使他和情人早日结合。

整整八年，可怜的小说家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他时常在埋头写作之余，忍不住翘首东望，希望从辽阔的俄罗斯原野那边会有好消息传来。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1841年11月，老寒斯卡一命呜呼。然而直到第二年1月，巴尔扎克才得到确实消息。苦苦等待了八年之久的巴尔扎克大喜过望，立即向已经守寡的寒斯卡夫人正武求婚。寒斯卡夫人初交巴尔扎克之时，就抱定了一种逢场作戏的态度，只不过想从这位才华横溢的名作家那里，寻到一点从她老头子身上得不到的温情和欢乐罢了。因此，她尽管对巴尔扎克倾心仰慕，却根本不想和他真正结合，顶多把他看成一个可以旅

行同居 的情人。如今，当痴情的作家正式向她求婚时，她便露出了真意，推三阻四，躲躲闪闪，不肯点头答应。

为了进一步得到寒斯卡夫人的好感，巴尔扎克于 1843 年 7 月，专门坐船经海路赴彼得堡，同正在那里的寒斯卡相会，劝她 同意结婚。

第二年，巴尔扎克又两次陪寒斯卡夫人再次去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地旅行。在这个时间内，已守寡近五年的寒斯卡夫人虽然答应和巴尔扎克同居，却总是不肯正式成婚。

到了 1847 年，巴尔扎克已染病在身，眼看健康状况愈来愈差。因此，这年秋天，在他立下遗嘱还不到三个月时，就到底按捺不住，拖起有病的身子，专程到乌克兰向寒斯卡夫人再次求婚去了。他想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无论如何要让此事成功。寒斯卡夫人热情而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来自法兰西的情人，并让他在庄园里住了达五个月之久。但是巴尔扎克此行的主要目的——求婚，却没能如愿以偿。

对此仍不死心的小说家第三次远走俄罗斯。他要用自己的顽强和诚意，去打动这个此时似乎已成了铁石心肠的女人。可惜，巴尔扎克第三次赴俄罗斯的求婚也没成功。旅途的劳累艰辛，俄罗斯的严寒，特别是由失意而产生的颓丧和绝望，给作家的健康带来严重的损害，他从此大病不起。经医生检查，他的心脏已开始肿大，病情严重到“既不能起身，也不能行走”的程度。

整个 1849 年，巴尔扎克几乎都是在寒斯卡的庄园里度过的。此时，尽管巴尔扎克头脑仍很灵活敏锐，才思也没有枯竭，可是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已经使他拿不起自己的那支笔了。自从 1848 年 9 月离开巴黎后，巴尔扎克就永远告别了文坛。这颗曾光耀法国和世界文坛的明星，开始隐去了……

1850 年 3 月，已经徐娘半老的寒斯卡夫人突然动了善心，答应和巴尔扎克结婚了。这对于已病入膏肓的巴尔扎克来说，简直如同遇到天大的喜事一般。

1850 年 5 月 14 日清晨，巴尔扎克与寒斯卡夫人在基辅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然后立即驱车往巴黎进发。

然而，兴致勃勃的巴尔扎克万万没有想到，无情的命运偏偏要和他作对。马车在公馆大门前停下后，车夫上前叫门，却无论如何叫不开。一行人在大街上闹了好半天，也始终进不了公馆大门。没办法，巴尔扎克只好叫车夫去附近请来一位锁匠，将门锁撬开。

人们进去一看，只见四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再一寻找，才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找到仆人弗朗索瓦，他正在那里低头垂泪并不时说些谁也听不明白的疯话——他疯了！原来，这位忠实的仆人接到主人来信后，也确实按巴尔扎克吩咐的准备好了一切。这天晚上，正当他将各项事宜安排妥当后，却莫名其妙地患了疯症，遂将大门紧锁，一个人蹲在黑暗里向隅而泣了。新婚大喜，竟碰上这样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巴尔扎克闻知详情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默然良久。

上楼梯时，巴尔扎克差点晕倒。他扶着寒斯卡夫人的手臂，口里喃喃自语：

“多么不吉利的预兆啊！看来我是无法活着走出这幢房子了……”

“我再也不能看书写字了”。

这是 1850 年 6 月底，巴尔扎克在口述给作家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一封信中，最后用颤抖的手写在信尾的附言。也许，这是写了 100 多部书的大作家

在有生之年亲手写下的最后几个字。

从事了一辈子写作的作家，如今竟不能看书写字了，其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其实，使巴尔扎克最为痛苦的，除了病痛的折磨外还有来自感情上的折磨。在作家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他终于发现，他追求了十多年，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寒斯卡夫人，如今虽然做了他的妻子，却仍是和他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巴尔扎克健康恶化，卧病不起之际，这个“新婚妻子”对他更是冷若冰霜。

尤其叫人气愤的是，寒斯卡夫人这个相老色衰的昔日贵族夫人，竟然与巴尔扎克过去的的朋友，一个其貌不扬的画家过从甚密，打得火热。她经常在令人沉迷的巴黎社交场合寻找欢乐，却把有病的巴尔扎克丢下不管。

“如果说我不相信上帝”，巴尔扎克曾经在自己的小说中，借助一个人物的口说，“其实我是更不相信人类。”

这里，作家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感。

1850年7月的一天，巴尔扎克显得神态很清楚。正在这时，雨果专程来看望他了。

已经重病在身的巴尔扎克因为全身浮肿，一激动起来，说话就显得很吃力。

“我，可能明天就会死去，那我将实现我的梦想，这是很高贵的梦想！”

恰在这时，他的妻子寒斯卡夫人走进来。巴尔扎克看看寒斯卡夫人，迟疑了一下，终于脱口说道：

“由于联姻的关系，我如今是波兰王后玛丽·莱辛斯卡的侄女婿了。我说不出自己有多自豪！”

雨果听罢，默默无语。他用善意的目光，仔细端详了一下这对在他看来相处得并不和谐的夫妇，起身告辞了。

进入8月份以后，巴尔扎克的病势更加沉重。原来为他诊治的几个医生，出于职业上的自爱，纷纷退避，不再上门。唯有一直和他保持着友谊的纳卡尔医生还不时前来探望。

8月18日这天，在病痛中艰难挣扎的巴尔扎克自知大限已到，一清早，他就鼓足全身的力气，对走进来的寒斯卡夫人和他的妹妹、妹夫等人，声音颤抖但语调清晰地说：

“我，我坚决要求……把我埋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

过了一会，目无神色的巴尔扎克又强作欢笑，断断续续地说：

“我现在的想法跟……当年拿破仑一样……如果一个人热中功名……那只有巴黎……才是长眠的好地方……”

这时，纳卡尔医生来了。巴尔扎克用失神的眼睛盯住这位朋友，那神情好像看见了坟墓一样。突然，他喘着气，艰难地问纳卡尔：

“告诉我真相，朋友，我的病情怎么样了……我还能……活几个星期吗？”

纳卡尔犹豫一阵，终于说：

“您性格刚强，我可以把真情告诉您……朋友，您的确无望了。”

听纳卡尔这样说，巴尔扎克脸孔抽搐一下，轻轻地“啊”了一声。他沉默一会，再次问：

“几时？”

纳卡尔眼中含泪，悲伤地说：

“恐怕就在这一夜。”

房间里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过了片刻，巴尔扎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纳卡尔，喃喃说道：

“啊！是这样的……我知道……”

巴尔扎克倒在床上开始大口喘气。自此，他处于临终前的弥留状态，再没说出一句有目的的话了。

就在8月18日那天，雨果再次来到病榻前探望。可惜，此时巴尔扎克已处在半昏迷状态，两位当代大师再也无法交流思想和对文学、人生的见解了。

在生命离开躯体以前，巴尔扎克继续和死亡作着斗争。据守护他的人回忆说，巴尔扎克在昏迷中，有一次突然喊道：

“皮安训！……皮安训，快去叫皮安训来呀！皮安训一定能救我！……”

这是巴尔扎克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此后，他再也没出声。

这皮安训到底是什么人呢？原来，他是《人间喜剧》中的一个人物，一位心地善良正直，医术高明的医生。在巴尔扎克笔下，这位皮安训曾多次妙手回春，将不少病人从死神手里解救出来。弥留之际的巴尔扎克，气喘吁吁地呼唤着自己小说中这位最有才华的医生的名字，恰恰表明作家潜意识中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极欲战胜死亡的不屈努力。

显然，这位富有才气，曾经朝气蓬勃生活过的文学巨匠，已经跟死神作了最后的斗争。那以后，人们看见他安静了，头发蓬乱地躺在病榻上，双目微闭，张着嘴巴，作最后的呼吸……

巴尔扎克死亡时的形象，被一些人认为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伟人逝世中最动人，最令人难忘的形象。

当天夜里11点半钟，人们看见他的眼珠子最后动了一下，接着，就溘然长逝了。

8月21日，巴尔扎克的遗体，按照他生前的遗嘱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

为纪念这位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去后不久，他在巴黎的最后一处住所“保荣公馆”所在的福祿街，被巴黎市政府命名为“巴尔扎克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家生前购置下并用艺术品精心布置装饰的这所公馆。却被他的遗孀寒斯卡夫人糟踏得面目全非。巴尔扎克生前苦心保存下来的手稿书籍，也被她成箱地拍卖出去。作家费尽心思收集的各种古董和艺术品，也先后失散净光了……人们说，要是巴尔扎克九泉有知，则必定会在他的《人间喜剧》中增添一个寒斯卡夫人这样的人物。

他死后，又在世界各地复活

——诗人裴多菲之死

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生于屠户家庭。早年失学，当过兵，做过流浪艺人。1842年开始写作，1844年发表长诗《农村的大锤》和《勇敢的约翰》。1848年三月革命时，发表著名的政治诗《给贵族老爷》和《民族之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还完成长诗《使徒》。1849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除诗歌外，还写有政论剧本等。作品对匈牙利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在匈牙利革命的严重关头，裴多菲认识到，只有参加军队，才能够担负起拯救祖国的重任。

1849年7月18日，裴多菲把妻子尤丽姬安顿在托尔塔村一位牧师家里，就出发到特兰瓦尼亚去。这次同尤丽姬的别离，虽然气氛略带忧伤，但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托尔塔村的分手竟是两人的永诀。

裴多菲带着一种乐观精神走向战场。考虑到妻子的忧虑，他7月22日在半路上写信给尤丽姬。信中说：“要忍耐！要冷静！再冷静！”鼓励妻子对革命战争前景和个人家庭幸福要充满信心。7月25日，裴多菲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终于在拜莱兹克村找到了贝姆将军领导的军队。两人见面的情景是叫人激动和难忘的。当坐在快马车上的贝姆将军一眼认出著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时候，老远便大声叫喊，同时伸开两臂。已年逾五旬，须鬓斑白的贝姆，激动得两眼流泪。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7月下旬，局势进一步恶化了。沙俄军队几乎全部攻占了特兰西瓦尼亚，只有南部还有几个村庄留在贝姆将军手中。贝姆将军珍惜像裴多菲这样的天才，这个时期他深怕裴多菲遭到不测，决心不让裴多菲离开他的军部，并让裴多菲作为助手紧紧跟随在自己身边。

7月29日，贝姆同裴多菲率部队来到马洛什——瓦萨尔赫基。当天，诗人给妻子尤丽姬写去第二封信。这封在他牺牲前两天写出的信中，裴多菲以欢乐兴奋的语调向她叙述了匈牙利军队“一口气消灭了拥有4000名俄国士兵的一个营”的辉煌战果，信中还充满对未来前途和家庭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怀念。

第二天，战况愈趋激烈，贝姆部队同沙俄哥萨克兵之间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尽管贝姆将军再三嘱咐裴多菲留在自己身边，但裴多菲自己却总是不大愿意接受这种劝告。那热情果敢、血气方刚的个性和气质，使他很可能安静地呆在激烈厮杀的战场之外。每当战斗号角吹响，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冲上去，而且越是危险的地方，人们越是容易发现他。然而，情况毕竟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装备精良，剽悍残暴的哥萨克兵的强大进攻下，匈牙利自卫军弹尽粮绝，终遭惨败，几乎被全部歼灭。当天战斗结束时，仅有瑟克什堡还在贝姆将军手中，贝姆部队被沙俄军队层层包围着。

这天晚上，裴多菲给妻子尤丽姬写出了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战斗非常激烈，我准备为祖国牺牲。只有这样才是我最光荣的前途……我的妻子啊，咱们的儿子卓尔坦会走路了吗？你要教他说话，逗

他笑……” 7月31日凌晨，著名的瑟克什堡激战开始了。战斗一打响，贝姆将军就神情庄重地命令裴多菲留在后备部队里。但是，裴多菲却没有听从贝姆的命令。当将军率队离去后，有一支冲锋队开赴前线，裴多菲私下乘着一辆马车跟在部队后面出发了。

说起来，那天裴多菲的表现有些奇特，他没有战马，没有武器，甚至没有穿上军衣，只是随冲锋队一起行动。

激烈的战斗开始不久，正在指挥战斗的贝姆将军一眼望见了裴多菲不觉大吃一惊。他立即派人将裴多菲叫到身边来，带着愤怒的语气命令他赶快撤退下去。然而，裴多菲这次仍然没有执行将军的命令。他暗中瞒过了忙于指挥作战的贝姆，又悄悄地呆下来了。

裴多菲一个人来到菲尔艾基哈兹阵地，他怕贝姆发现他会再次命令他离开前线。在这个阵地上，一队仅有300人的匈牙利骑兵，一连打退了沙俄哥萨克骑兵的几次进攻。战况空前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裴多菲拿起军刀，参加了战斗。他衣服裤子都被划破了，浑身血迹斑斑。

在短暂的战斗间隙里，人们看到裴多菲少校独身一人站在阵地前的一条小河桥头，向远方凝望。

“少校，危险！”一位军医连忙大声警告道。他担心裴多菲会被敌人发现。“别担心，什么事也没有的！”裴多菲大声说，依然站在那里。不幸的是，裴多菲果然被敌人发现了。敌军开始向他射击，子弹从他身边不断飞过。

裴多菲没有被那些带毒的子弹射中，他立即隐蔽到旁边的玉米地里。

忽然，一阵马蹄声由远至近。两名哥萨克骑兵向他追来。先赶到的一名哥萨克骑兵扬起军刀，向裴多菲猛劈下来，裴多菲机警地闪身躲过。这时，第2名骑兵正好赶到，他凶狠地向裴多菲投下长矛。长矛穿透了裴多菲的胸膛，诗人应声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

伟大的民族诗人裴多菲，就这样牺牲在战场上。牺牲时，他年仅26岁。

瑟克什堡激战的第二天，收殓阵亡将士的尸体。裴多菲同在那次战役中牺牲的匈牙利爱国志士们一起，被埋葬在有1010名英灵的大家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被一起埋葬的有民族英雄和诗人裴多菲。

然而，在当年，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匈牙利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裴多菲不曾战死而仍然活着的传说，尽管那位在阵地上警告过裴多菲的军医，向人们讲述了他遥遥望见裴多菲被哥萨克骑兵追来，并用长矛刺死的全部过程，但那时很少有人相信这位军医的话。原因是，在战场上并没有找到裴多菲的尸体。这中间也掺杂着人们对于诗人的崇敬、怀念、盼望和幻想。

人们传说裴多菲被沙皇军队俘虏，同被俘的2775名匈牙利国防军一起，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劳动，并渴望刑满后返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斗争。而当时在西伯利亚的匈亚利战俘中，确有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山陀尔的人。有人说是曾经见过他，回国后就证明裴多菲活着。

另外，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裴多菲不曾战死，也不曾被沙皇军队俘虏的传说，一直在匈牙利各地流传。有人说裴多菲成了乞丐，在多瑙河两岸流浪。还有人说在乡下的酒馆里见过他。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些年来，各地先后出现了好多个“裴多菲”，报上也出现了裴多菲的名字。显然，这是一些冒名顶替者们所为。然而，热爱和崇敬诗人的普通群众，还是以款

待贵宾的礼节，热情接待着那些自称是裴多菲的人。

仁慈，使他选择了死亡

——因决斗而死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出身贵族。1837年因普希金被害，写出诗篇《诗人之死》，揭发凶手即沙皇政府，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1840年再度被放逐，次年在决斗中被杀害。一生写了400多首短诗，还写有长诗、长篇小说和剧本。著名作品有抒情诗《祖国》和《孤帆》，长诗《恶魔》，中篇小说《当代英雄》等。

1841年7月27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身着军装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骑马离开所居住的军营，沿着巍峨险峻的玛舒克山麓向约定地点走去。由于一场误会，他要去与同在军营服役的少校玛尔丁诺夫决斗，当时的俄罗斯，决斗风盛行，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年轻的莱蒙托夫也没有例外。此时，他身后的那匹马上，坐的是他挑选的决斗副手格列波夫。

两匹马离开大路，进入一个林木茂盛的峡谷。太阳刚从苍莽的山巅后面升起不久，金色的光芒还没有照到峡谷里来，生长在崖壁上的灌木藤叶上，滚动着迷人的露珠。莱蒙托夫一路上带着明显的好奇心观看峡谷山崖上的景致，那种悠闲自在，神色坦然的样子，好像是随意出来骑马散心，又好像是去赴一个朋友的野餐聚会。

峭壁越来越陡，山路也越来越窄。两匹马艰难地向山麓行走。

“上尉，”格列波夫突然回头问，如今他的马已走到前面去了，“你留下遗嘱没有？”

“没有。”诗人淡然一笑，“我不想写那玩意儿。”

格列波夫不出声了，只管策马前进，看得出来，他在为诗人担心。

两人走了一阵，莱蒙托夫对格列波夫谈了另一个话题。他说他正打算写一部以高加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要着重写叶尔莫洛夫任总督时的高加索，以及1820年的第乌里斯——高加索战争，最后以格利鲍耶妥夫被杀害的德黑兰惨案结束全书。

诗人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谈着，此时，他的整个心思都集中在自己那奇妙的文学构思上，似乎把决斗的事完全忘却了。

玛舒克山麓一带，地势险峻，风光雄奇。在一堵特别陡峭的崖壁下面的树丛里，系着两匹马。这是事先约好的决斗地点，玛尔丁诺夫和他的副手已经先到了。

“对不起”，莱蒙托夫看见对方，才突然从自己的美妙构思中回到现实里来了，他微微欠身，略带歉意地说，“我们稍稍来迟了。”

玛尔丁诺夫神情紧张，一直在那里不停地来回走动，显得分外烦躁不安。他冷冷地看了莱蒙托夫一眼，没做任何表示，便转过头去。

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要说，气氛相当令人不快。

“先生们，”格列波夫打破沉默，掏出一枚银币，高声说，“我们开始抽签吧。”

格列波夫把银币抛向空中，莱蒙托夫和玛尔丁诺夫各要了一面。结果莱蒙托夫猜中了，按决斗规则，该由莱蒙托夫先开枪。

“算我走运吧，少校。”莱蒙托夫向对方打趣说。玛尔丁诺夫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两名决斗副手量好二十步的间隔距离。

“开始吧，先生们！”

就在这一瞬间，诗人的心情突然变坏了。“上帝，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莱蒙托夫心里感叹道，带着装好子弹的手枪，不情愿地向射击界线走去。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痛楚感。

莱蒙托夫走到射击线，停下来，抬眼将射击距离和对方的位置打量了一下。以他的射击本领来说，在这样靠近的距离将一个不移动的目标击中，是很容易的事，可是……

他慢慢抬起右手，试图举枪瞄准，而心里的痛楚感也在加剧，一个可怕的念头紧紧压迫着他。透过枪口上的准星，玛尔丁诺夫那张粗鲁而且显得有些愚蠢的脸，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连那暴凸的眼睛里所含着的紧张，惊恐也看得清清楚楚……

“我这就对准他的胸膛开枪？百分之百地命中！……天哪，开枪杀死一个站着不动在等待死亡的人……这不是在枪杀无辜？……荒唐犯罪！……我不能开枪！”

莱蒙托夫持枪的右手渐渐垂下了，诗人发自内心的善良，同情和怜悯的天性不容许他这样做。直到此时，诗人才开始后悔起来，深怪自己不该凭一时冲动而同意这种令人痛苦的决斗。

“喂，亲爱的玛尔丁诺夫，”莱蒙托夫激动地高声叫喊起来，“我们停止这荒唐的举动吧？让我们重归于好，重新成为朋友吧！”

玛尔丁诺夫惊愕地瞪着他，显得困惑不解。诗人带着明显的诚意，继续解释说：

“亲爱的玛尔丁诺夫，让我们勇敢地消除误会吧！这场面多荒唐，多可笑，我们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啊！说真的，我从来不想侮辱你，甚至连侮辱你的念头都没产生过。然而，你看，事情闹到如此地步，这确实令人感到难过。”

因为着急，莱蒙托夫黝黑的脸膛开始涨红起来，语调也又急又快，那忧郁的眼眶里涌出泪水，并且神经质地挥着自己的左手。他怕玛尔丁诺夫不肯相信他的诚恳，进一步表明心迹说：

“既然我们双方都表明了决斗的决心，说明我们彼此都不是胆小鬼，这样，我们也各自保全了自己军人的荣誉。因此，我们可以将事情就此了结了。如此说，少校阁下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受了委屈的话，那我准备不仅在此时此地，而且还可以在阁下愿意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请求阁下的宽恕。”

可是，这时的玛尔丁诺夫，已经被挑拨者激起的仇恨溢满心胸，弄昏了脑袋。他暴躁地跺着脚，咒骂着，根本不愿听莱蒙托夫的任何解释和表白。而且，诗人的态度越真诚越坦率，则越是激起他那近乎疯狂的仇恨。

“开枪吧！你开枪吧！混蛋！”玛尔丁诺夫已经失去理智，他只是一个劲地狂暴喊叫。

莱蒙托夫见此光景，倒一时失了主意。他略一思索，想起上次同小巴兰特和平地结束决斗的事……。于是，他重新将手枪举起，紧接着，枪响了，然而，子弹却不是朝玛尔丁诺夫飞去——莱蒙托夫想用自己的善意行动证明他的真诚，从而友好地结束这场愚蠢透顶的纠纷。

像孩子一样善良诚实的诗人，以为人们都像他那样善良诚实。可是，他估计错了！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自私残忍的玛尔丁诺夫，如今脑际里只想着那些阴谋家在他耳边散布的谣言。由此而产生的对待人近乎疯狂的仇恨，使他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感和最起码的人性。而且当诗人已明确表示出友好和善意时，他却像一头发疯了野兽，表现得格外凶狠和残忍。他趁莱蒙托夫正微笑地望着他点头招呼时，突然对准诗人的心窝开了一枪……

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峭壁下出现了血腥的场面；随着枪响，莱蒙托夫侧身在崖壁前，殷红的鲜血从胸口不断涌出，渗进褐黄色的土地里。

格列波夫叫喊着向受伤的诗人奔去，他试图阻止那不断冒出来的鲜血。然而，他绝望了，因为他连最起码的救护器具都没有。

本来是晴朗的天空，阴云密布。不一会，高加索山区的暴雨来临了。大雨倾盆而下，雨水无情地冲浇着受了重伤的莱蒙托夫。格列波夫想用马匹把诗人送下山去枪救的希望也最后落空了。

诗人带着痛苦在暴雨中挣扎，渐渐地，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那颗曾经为正义和自由，为文学艺术，也为生活而激烈跳动的年轻的心脏，终于在暴风雨中停止了跳动……

莱蒙托夫死了。继普希金之后，又一位优秀的俄罗斯诗人被无辜地杀害了！

临终前的出走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之死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1851年从军。创作过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6年试图解放他自己领地的农奴，得不到农民的信任。次年游历西欧。1863年—1899年先后完成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通过历史事件、家庭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他的作品对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

1901年，73岁的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的住所，回到了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

距离莫斯科200多公里的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美丽庄园。这里地域广阔，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耕地和原野。托尔斯泰在这里诞生，以后又在这里成长、结婚、写作、耕种，他一直对这个庄园怀有深厚的感情。

可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庄园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对自己在其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的美丽庄园，由喜爱到感情淡漠，最后，简直有些憎恨起来。这种变化，反映了托尔斯泰晚年内心的极度矛盾和苦闷，而且，由于这种思想感情的变化，造成了他在波良纳庄园里的孤独处境。

晚年的托尔斯泰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与广大普通群众特别是那些终日操劳的农民生活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使他感到不安、忧虑，以至陷入不能自制的内心痛苦之中。

为了减轻这种内心痛苦和自我折磨。托尔斯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憎恶社会人情世故，讨厌亲友间的应酬，不再出席贵族集团的社交晚会等。为了给人类造福，他宁愿放弃名誉、地位、财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托尔斯泰，身穿最普通的衣衫，头上戴着草帽，腰上系着皮带，甚至穿着树皮鞋，完全像一个农民，在田野上干着普通的农活。

到后来，托尔斯泰甚至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交给农民。与此同时，他还想把自己作品的全部版权，无报偿地全部交出来，让大家自由出版。

1910年5月9日，他给家里唯一还比较理解他这种忘情的小女儿亚·里·托尔斯塔娅写信说：

“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受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都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

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年过八旬的托尔斯泰和妻子索菲亚发生了严重冲突。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妻子的反对，坚持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宣布放弃自己从1881年以后出版的任何作品的版权，也就是说，从这个时期后的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可以由任何人免费出版。到了1895年，托尔斯泰更进了一步。他在3月27日的日记中，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遗嘱。

托尔斯泰这种对试图放弃财产，甘愿生活在普通农民中的举动，索菲亚越来越觉得难于理解，以至内心痛苦不安。如基于整个家庭和出身的经济利益，对此表示反对，并开始顽强地试图要争夺这本来应当属于她的作家文学

遗产的继承权。

作为托尔斯泰的妻子，特别是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作家充当文学创作事业助手的索菲亚，这些想法和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由于她被托尔斯泰这番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以及她晚年形成的烦躁易怒的性格，使她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对策。她不满意托尔斯泰的苦行主义，并逢人就诉说自己的不满，还在书信以及日记里表述了这种情感。正由于索菲亚失去了当初那种克制，而且精神状态显得越来越不正常，极爱发脾气，因此，使得托尔斯泰对她那种基于从整个家庭利益考虑的动机表示出怀疑，认为她是否是出于某种自私心理，才这样激烈并顽强地进行反对的。

1909年，即托尔斯泰逝世的前一年，作家感到已有很多迹象表明索菲亚不会放弃这个继承权了，他觉得自己应当作出一个更明确的安排了。这年夏天，他的侄女婿杰尼先科，来波良纳庄园看望他。托尔斯泰要求杰尼先科替他起草一份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著作赠给公众，而不是继承给某个人。

杰尼先科明知这样的遗嘱不具备多大的法律效力，但他不想让老人感到不快，就答应起草一份这样的遗嘱。遗嘱写好后，托尔斯泰于1909年9月18日，偕同切尔特科夫一起去莫斯科附近的克廖西诺，在这份写好的遗嘱上签了字。

但是，办事精明的切尔特科夫对这份遗嘱并不满意，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份遗嘱不是将财产遗赠给某个确定的人或机构，而是赠给所有人的话，则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切尔特科夫想得到一个正式的合法的遗嘱，因此，他就极力让托尔斯泰另立一个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遗嘱。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作家周围所有的家人、朋友、追随者中，没有比切尔特科夫地位更特殊，对老人思想行为影响更大的人了。有些传记作家和研究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切尔特科夫从中介入并推波助澜的话，托尔斯泰是不会同妻子和家庭决裂，致使最后离家出走病死在异乡小站的。

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时期里，托尔斯泰正经历着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的那种特殊的社会观和宗教观，使他遭到某种程度的非难。原来的朋友不理解他，彼此疏远了，在家庭里，也时常为见解不同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社会舆论谴责他，报纸攻击他，沙皇当局对作家表示不满，连科学界和宗教界也对他发出责难之声。托尔斯泰被孤立了。正在此时，善于投机取巧的切尔特科夫就趁虚而入。

切尔特科夫曾经在国外侨居过一段时间，回国后住在离波良纳庄园不到两英里的捷利亚坚基庄园。这样，他接触托尔斯泰非常方便，有时候他上托尔斯泰的波良纳庄园去，有时候托尔斯泰又到他家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切尔特科夫取得了托尔斯泰的信任后，便开始逐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即最终能取得这位世界文豪那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学遗产，即使不是全部夺取过来，也要取得很大一部分。当时托尔斯泰周围的亲人、朋友、追随者中，尽管许多人对切尔特科夫的为人、品质都有较多了解，但极少有人能敢于直接向托尔斯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们都只是对托尔斯泰这样处理此事表示惊奇与不安。

托尔斯泰的前期日记，一直由妻子索菲亚保存着。晚年时，由于他对切尔特科夫的特殊信任，以及同索菲亚之间产生的思想裂痕，便一反常规地将他最后十年的全部日记交给切尔特科夫保管了。

1910年7月12日，苦于无计可施的索菲亚，找到托尔斯泰的私人秘书

布尔加科夫，请求他去捷利亚坚基庄园找切尔特科夫归还日记。

布尔加科夫失望而归。索菲亚对此伤心已极，整天哭泣不已。在这种打击下，她的精神显得越来越不正常。

7月14日，索菲亚甚至威胁说，如果托尔斯泰不去把日记要回来。她就宁肯服毒或跳水自杀。托尔斯泰为换得家庭的安宁，让这时已差不多快精神失常的索菲亚安静下来，也只好屈服，同意从切尔特科夫手中将日记索取回来。

托尔斯泰派小女儿李沃芙娜去执行这个任务。而李沃芙娜当时并没看清切尔特科夫的面目，她和父亲一样都深受切尔特科夫的影响，并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托尔斯泰取回了日记，但仍然没将这些日记交给索菲亚，而是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将日记存放在图拉省城的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显然，他对妻子还缺乏足够的信任。

自从被索回日记事件后，切尔特科夫感到有必要尽快将托尔斯泰的最后遗嘱落实，以抢在索菲亚之前采取行动，取得对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控制权。因此，他自己另外起草了一份遗嘱。他要竭力利用自己目前在老人面前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诱劝托尔斯泰在这份遗嘱上签字。

他几天之内曾三次派人将写好的“遗嘱”带到波良纳找托尔斯泰，让老人在上面签字，或是干脆让托尔斯泰用自己的笔迹重新抄写一遍。而且每次都是背着索菲亚和作家的其他亲人，在暗地里进行的。这种秘密行事的举动，连切尔特科夫派去的当事人斯特拉霍夫自己都觉得有点“搞阴谋”的味道，并为此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这最后一份遗嘱是1910年7月22日，切尔特科夫将托尔斯泰引至他庄园附近的一个树林子里，让老人坐在一棵树桩上抄清签字的。至此，索菲亚还完全蒙在鼓里。切尔特科夫在争夺这位世界文豪丰富的文学遗产的斗争中，完全占了上风。

托尔斯泰在那份最后的遗嘱上签字后，8月1日，他和他的俄文传记作者比留科夫在自己书房里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老人提到遗嘱的事，并讲了他抄写签字的经过。

比留科夫听罢，对于这件事竟然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谋色彩而深感吃惊。他对老人直言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他最好将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自己的意图并征求意见。

托尔斯泰接受了比留科夫的建议，第二天，他便给切尔特科夫写信，谈了这个意见。

切尔特科夫对此大为不满，8月11日，他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上万字的长信，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并在信中进一步施展他对老人的影响力，让托尔斯泰认为这样做是十分正确和必须的，没有重新改变决定的必要。

而索菲亚似乎也感觉到暗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情绪越来越坏，有时甚至发展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由于痛苦和悲伤，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同切尔特科夫等人斗争所引起的怒气和愤慨，统统发泄到托尔斯泰身上，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

8月3日晚，她和托尔斯泰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吵。据当时的目击者——作家的私人秘书布尔加科夫后来回忆说，当时，“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在她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缺乏体谅方面超出了一切限度，对他说了许

多愚蠢的话来为她对切尔特科夫的憎恨辩护。”

但是，托尔斯泰对妻子越来越暴躁的坏脾性，采取了一种宽容谅解的态度。

托尔斯泰晚年奉行的那种不抵抗主义的哲学，使他宁肯责备自己，也尽量避免责备妻子和旁人，并找出种种理由来原谅别人的过错。

不过，切尔特科夫却没有这样的好心肠，尽管他把托尔斯泰那种不抵抗理论推向了最远的极端，发挥到连托尔斯泰本人都感到不习惯的程度。他怕老人再受旁人的影响而改变他对遗嘱的意见，便千方百计将托尔斯泰留在自己身边，不让旁人接近，甚至不让托尔斯泰家里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9月，索菲亚要求切尔特科夫让托尔斯泰回到波良纳庄园来。但是，切尔特科夫拒绝这样做。愤怒已极的索菲亚写了一封长信怒斥切尔特科夫的恶劣行径。

在索菲亚的一再坚持下，托尔斯泰终于回到了波良纳。但是风波却没有平息下来。索菲亚由于对切尔特科夫不加掩饰的痛恨和恶感，以及她性格上的缺点，使她在托尔斯泰面前不断地抱怨和生气。波良纳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紧张，据布尔加科夫在“回忆录”中记录的：

9月22日：看来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非常激动和不安。她不但生切尔特科夫的气，也生列夫·尼古拉那雅奇本人的气。她大声说她不再爱他了，认为他是‘半个佰生’。她又说现在等待他的时候，没有一向习惯的那种欢乐的感受了。”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场意料不到的纠纷，使托尔斯泰十分难过，他心理上的压力更大了。

9月23日这天，是托尔斯泰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日，索菲亚要求托尔斯泰让秘书布尔加科夫给他们拍张合影照片，以志纪念。托尔斯泰答应了，不料却引起了小女儿李沃芙娜的不满。

在切尔特科夫的影响和挑动下，李沃芙娜早就和母亲反目为仇。当时，她正在为她母亲取下书房中切尔特科夫的照片以及她和父亲的一张合影照，换上索菲亚自己同托尔斯泰的合影照而生气。她向父亲要求将照片换掉，父亲还没照办，如今竟又答应和母亲合影。李沃芙娜觉得不能容忍，便同父亲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气愤已极的李沃芙娜坐在打字室里，正对自己的支持者大骂着父亲“背叛”行为，突然，托尔斯泰出其不意地走了进来。

“萨沙（李沃芙娜的爱称），你干什么那么嚷嚷？”托尔斯泰严肃地说。

李沃芙娜一向在父亲面前比较放任，她立即用不加掩饰的口吻发泄了自己的不满，甚至责怪父亲是“为了一个没头脑的妻子而牺牲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儿的利益”，等等。

托尔斯泰听罢，摇摇头回答说：“你真是非常像她！”就转身回自己书房去了。

几分钟后，他在书房打铃叫李沃芙娜来，但小女儿没有动，于是，听到铃声的布尔加科夫就去了。秘书刚转身离开书房，老人又打铃叫李沃芙娜，她仍旧坐着不动。托尔斯泰就叫秘书亲自把她找去。

托尔斯泰对小女儿说，他要口述一封信。当李沃芙娜有些不情愿地刚在书桌前坐下时，老人忽然把头伏在椅子的扶手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再也不要你的速记了！”他哭着对小女儿说。

李沃芙娜又惊又悔，她一下子扑在父亲脚下，请求他原谅。父女两人都哭了。

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说明，在托尔斯泰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他周围的环境气氛是多么恶劣和叫人难于忍耐。处在这种不能止息的斗争旋涡中，为了求得环境的安宁和心境的平衡，在老人看来，似乎只有离家出走，到俄罗斯广阔的原野里去求得一席栖身之地。才是唯一的出路了。

不幸的是，这一天终于到了。

10月10日，托尔斯泰同马科维茨基一起骑马出外散步。路上，老人突然对家庭医生说，他想带着男仆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一起走。当时，马科维茨基回答说：“要走，带我一起走更好，我可以照顾你的健康。”马科维茨基是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他跟随作家多年，一直做着托尔斯泰的保健医生和忠实朋友。

10月27日晚上，托尔斯泰回到自己的卧室，不久就上床了。夜里12点钟左右，还没入睡的老人突然发现邻近的办公室里有灯光，同时还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当托尔斯泰明白是妻子索菲亚在翻自己的东西时，顿时气愤起来。

原来，索菲亚这几天正为一种猜疑心折磨着，她猜想肯定已经有了一份将对她不利的遗嘱。所以，这晚上她想趁丈夫熟睡之际来办公室寻找。

可惜，索菲亚找错了地点。最后的遗嘱确实早已写好了，但不是放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而是在切尔特科夫那里。更出乎她意料的是，她这次深夜光临的举动，却恰恰成了溢满她丈夫那忍耐之极的最后一滴水！

夜深人静时，老人穿着睡衣，赤脚跟着双拖鞋，一手拿着蜡烛去敲开了家庭医生马科维茨基的房门。马科维茨基一看时间，是28日凌晨3点，他吃惊地望着满面愁容，但神情激动的托尔斯泰，只听老人说：

“我决定要走了。您跟我一起走。我先上楼去，您随后就来，小心别惊醒了索菲亚。我们不带很多东西。只带最必需的。三天以后，萨沙会来找我们，把必要的东西带来。”

说完这些话，老人就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

随后，他又去叫醒了和打字员瓦尔瓦拉住在一起的小女儿李沃芙娜，对她说：

“我现在就离开……永远离开。”老人脸上显露出一种非常美好的神情，表现出他的果断和内心的宁静，“来吧，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马科维茨基见托尔斯泰神情有些紧张，知道他是怕妻子醒来发现，想尽快离开。他走过去给老人测了一下脉搏，每分钟竟多达100次。马科维茨基尽量安慰着托尔斯泰，老人又走开去给妻子索菲亚写告别信。

信写好后，托尔斯泰又不得不回卧室去拿他那口大箱子，因为东西仍然很多。他的卧室同妻子的卧室间有三扇门，索菲亚为了便于听见丈夫晚间的动静，夜里总是把门都打开着。托尔斯泰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将这几扇门关上，才提着箱子离去。

他留给妻子索菲亚的信上写着：

我的离去一定会使你伤心，对此我很抱歉，但请你理解并相信，除此而外我别无他法，我在家里的处境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终于无法忍受下去。除了其它一切之外，我再也不能在我以前所过的那种奢靡中生活下去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这样年纪的老人所习惯做的事：离开世俗生活，独自宁静

地聊度暮年。

请你理解这点，如果你一旦得知我在哪儿，也不要来找我，因为你的到来，只会恶化你我的处境。感谢你同我一起生活了48年的真挚岁月，并请你原谅我对不起你的一切地方，正像我也由衷地原谅你可能对不起我的一切地方一样。我劝你顺应由于我的出走而使你所处的境遇，对我不要抱有恶感。如要通知我什么，可告诉萨沙。她会知道我在哪儿，并把需要的东西转交给我。但她不会说出我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已经取得了她不告诉任何人的诺言。

列夫·托尔斯泰10月28日托尔斯泰带着马科维茨基离开波良纳时，还不到清晨5点钟。他怕惊动妻子索菲亚，不敢叫车夫将马车赶到住宅楼前来，而是悄悄将行李搬到马房，直接在马房出发。

在路上，他们简单讨论了一下出走的路线。托尔斯泰为掩饰自己的行踪，提出先乘火车去土拉，然后再从土拉反向折回戈尔巴乔沃。他们计划先到卡卢加省的夏莫尔金女修道院暂住一阵，然后再走。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在那里当修女。

火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到站。等车的时候，老人一直神色不安地在离车站几百米的地方散步，样子显得很着急。他生怕索菲亚会突然出现在站台上。当他们终于在二等车厢的一个单间里坐定，火车缓缓启动时，托尔斯泰才觉得妻子再也追不上他了，那离家后的安全感和自在感使他显得很高兴。

“多好，多良由啊！”他坐在座位上说。

可是，当他稍微睡了一会，在同马科维茨基一起喝咖啡的时候，老人神情又忧郁起来。

“索菲亚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他说，“我可怜她。”

这种矛盾心理，使老人陷入不安和忧虑中。然而，这并未改变他离家出走的决心。

第二天一早，托尔斯泰找到了他那个当修女的妹妹，见面后两人都哭了。

陷入痛苦悲伤的索菲亚寻踪赶到谢金诺车站时，托尔斯泰已经离去。她和家人们一面到车站售票处打听老人买了什么地方的车票，以推测他出走的去向，一面派人去求见图拉省的省长，请求派人寻找托尔斯泰。

省长鉴于托尔斯泰的名望，也觉得事关重大，立即给全省的警察、侦探下达了紧急命令，要他们搜寻作家的行踪，发现线索立即报告，并跟踪行程，这对于一心想掩盖自己行踪的托尔斯泰来说，显然十分不利。

过了一天，他的小女儿李沃芙娜赶到夏莫尔金诺。她带来了关于母亲发现老人离家后企图自杀的消息。托尔斯泰不由地叹息起来，他虽然同情索菲亚的处境，却没有回家的意思。

本来，托尔斯泰打算在夏莫尔金诺多住一阵，但李沃芙娜怕母亲会追踪找来，就再三劝说父亲离开。

托尔斯泰打算到高加索去，找一间农舍定居下来；或者设法弄一张出国护照，离开俄罗斯，到保加利亚或是其它欧洲国家侨居。

动身的头天晚上，老人病了，但他还是坚持在早上5点钟起床出发。他们在柯泽里斯克买了去德沃里基的车票，然后在靠近德沃里基的沃洛沃都下车，又买了去南方塔依斯克的车票。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掩盖行踪。其实，他们的行踪这时已经被人发现了。

托尔斯泰没能去成高加索。连续不断的长途旅行，使老人那有病的身躯更加劳累不堪，俄罗斯冬天的严寒也叫他受不了。到中午时分，托尔斯泰在

车上病倒了。他不断地咳嗽，并开始发烧，体温接近 40 度。

家庭医生马科维茨基觉得，再这样旅行下去老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火车到梁赞省的阿斯塔波瓦车站时，他决定停下来。这个小站在托尔斯泰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西南方，仅距 50 英里远。

马科维茨基和李沃芙娜扶着体质已明显衰弱的老人，艰难地下了火车。他们说服他住进小火车站的站长家里，接受比较系统正规的治疗，待健康恢复后再走。

对中断旅行这件令人扫兴的事，老人居然还显得情绪很好。他半开玩笑地对小女儿和私人医生说：“好啦，这下快要死啦……别烦恼！”

令人遗憾的是，托尔斯泰的玩笑话竟不幸言中。7 天后，这位伟人果真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小站上离开人世。托尔斯泰染病停留在阿斯塔波瓦的消息，很快就被传开了。因为，当老人还在修道院里时，一个新闻记者即已打听到消息跟踪前往。后来，沙皇警察当局的侦探也发现了作家的行迹，并一直在跟踪他。在阿斯塔波瓦车站住下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叫人发电报给切尔特科夫，让他赶快来这里。就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老人也觉得离不开他这位最亲近的追随者。

李沃芙娜同时给在莫斯科的大哥谢尔盖·里沃维奇发了电报，要他将尼基京医生请来，谢尔盖在去自己庄园的途中听到这一消息，遂立即改变路线，于 11 月 2 日晚上 7 时左右赶到阿斯塔波瓦车站。他是托尔斯泰的亲人中最早赶到的一个。

不过，对是否去见老人，他自己却久久拿不定主意。因为那时托尔斯泰本人还深信家里人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见到儿子，他可能会十分激动。最后，马科维茨基说，应当去见面。10 点钟左右，谢尔盖走进了托尔斯泰正躺着的那个房间，听到叫声，老人睁开眼睛，用惊奇不安的眼光打量着站在床前的大儿子：

“是谢廖沙吗？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谢尔盖只好撒谎说，他是路过戈尔巴乔沃时，一个偶然碰到的列车员告诉他的。

“列车员怎么会认识你的？他难道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听完谢尔盖的回答，老人又闭上了眼睛，没再说话。第二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晚上谢廖沙来了，使我很感动。”

当天半夜 12 点钟，索菲亚从土拉乘坐专门包的列车来到了阿斯塔波瓦。随车来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及医生、护士等。她是从一位新闻记者那里得知托尔斯泰的下落的。不过，几个子女和医生们共同商议的意见是，在托尔斯泰自己叫她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会面。因为老人的身体十分衰竭，大家担心这种会面可能会让他送命。

由于对托尔斯泰封锁了消息，他并不知道妻子已经到来，因此不让索菲亚进屋的责任不在他。而且，托尔斯泰对妻子的处境一直很关心。11 月 3 日早上，老人见到女儿达尼雅时，就十分详尽地问到过她母亲的情况。

“跟我说，她在干什么？”他接连问女儿，“她做些什么事情？她收到了我的信吗？她看了以后觉得怎样？”

后来，在他病情恶化后的一次呓语中，还说过这样的话：“索菲亚的担子很重啊！”

不过，直到临终，托尔斯泰还是不想和妻子见面。11 月 2 日，他担心妻子听见他生病消息会赶到阿斯塔波瓦来，就口授了一份电报（他以为他们还

在波良纳)：“给几个儿子拍电报去，要他们阻止母亲，别让她来。因为我的心脏非常衰弱，与她见面会有致命的危险，虽然目前健康情况已经好了一些。”

接着，他又对身边的切尔特科夫说：“你知道，要是她来这里，我不能拒绝她……”说着，老人就哭泣起来。

这天一早，他还用英语给写《托尔斯泰传》的英国作家莫德口述了一封信：

“在前往希望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的路上，我……”

这封信他再也没写完。这是托尔斯泰生前口述的最后一封信。因为，这时老人身体已十分虚弱衰竭，上下床都得由旁人小心搀扶。有一次，他经过三个人帮助才在床上躺下，因费力而显得呼吸急促时，老人使用微弱而悲哀的声音说：

“农民……农民，他们是怎样死的啊！”

说这话时，他的两只眼睛里充盈着泪水。

11月3日，托尔斯泰最后一次写日记。其中口述的最后几句话是：

“我看出我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了……不管发生什么，总要做得正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那天晚上，托尔斯泰病情明显恶化，他不停地呻吟，说胡话，显得神志不清，脉搏达到每分钟120多次。

11月5日和6日，老人的病情继续恶化，体温时降时升，脉搏高达140次。沉重的病势使老人经常处在一种心烦意乱、辗转不安的状态中。他时而抓紧被子，时而又放开，时而把双手放在胸前慢慢摸索着什么……疾病造成的痛苦，使老人不时大声呻吟。

有一次，他突然坐了起来，说道：“我恐怕就要死了。”又有一次，他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没有人来打扰我，你们让我安静吧。”另外一次，他一下子从床上欠起身子，用坚决的口气大声喊：“走，应该逃走！”

这些话都给在场的人留下沉重而可怕的印象。

那几天，小小的阿斯塔波瓦车站热闹空前。大批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在此守候着，忙碌着，不断发出关于作家近况的各种消息和照片。电影摄影师则赶着抬摄各类镜头。沙皇政府总理大臣派来的专员，省长、宪兵军官、重要的铁路官员、密探等各类人物，挤满了这个乡村小站，负有秘密使命来给托尔斯泰行圣餐的奥普京修道院的院长，则焦急不安地在站台上踱来踱去……这一切，都使这个一向荒凉冷落的小车站充溢着一种不寻常的气氛。

11月6日夜里12点钟，托尔斯泰的呼吸显得急促而沉重，喉咙里出现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医生提议注射吗啡。不久，老人的呼吸从每分钟60次减到36次，脉搏也渐渐微弱下去。

将近凌晨两点钟时，根据医生们的建议，一直候在车上的索菲亚被允许进入屋里。

在只点着一支蜡烛的小屋里，索菲亚神情忧伤地站了一会，远远注视着躺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的丈夫，然后，她抑制着感情走过去，吻了吻托尔斯泰的前额，并跪下来，喃喃说道：

“原谅我……”

将近三点钟，昏迷着的老人又开始动弹和呻吟，但脉搏却几乎测不到了。

医生们开始打针急救。凌晨五时，托尔斯泰的呼吸越来越慢，接着，突然停止了。

“第一次停止呼吸。”守候在一旁的医生说，并当即进行了人工呼吸急救。

以后，又是第二次停止……后来，躺着的老人屈起膝部，似乎是想躲开移近的烛光。呼吸恢复了几次，又停止了。最后，从他口里发出一声低沉嘶哑之声，呼吸便完全停止了。

房子里一片沉寂。

“五点三刻！”医生中有人突然打破这沉寂说。

托尔斯泰临终前十分钟，索菲亚再次走到丈夫跟前，在床边跪下，口里低声说着什么……

家庭医生马科维茨基第一个走到死者身边，替他阖上那一直神情专注地睁开着的眼睛。

这位伟大作家对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医生们说的最后一句比较完整的话是：

“世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为什么你们只想到我一个！”

托尔斯泰的死讯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的电报线路和海底电缆，都忙着拍发关于这位伟人去世的电报，成百上千的专栏文章、社论在排版，付印。

“收到了电报……”当时正在意大利侨居的高尔基写到，“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痛苦懊恼得叫出声来！”

沙皇和政府内阁都为俄罗斯失去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各大报纸都加了致哀的黑框，各剧院都停止了营业。千百万俄罗斯人民，为托尔斯泰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

当天，火车载着这位伟人的遗体，从阿斯塔波瓦朝他的家乡缓慢驶去。沿途的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群众，纷纷向作家表示最后敬意。在离波良纳最近的谢金诺车站，聚集着大学生、市民和各方面的代表。站在最前列的是波良纳的农民，他们举着白色亚麻布做的横幅，上面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托尔斯泰的遗体按照他本人的遗嘱，安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森林里。送葬行列将近一英里长，其中有两个专程赶来的大学生唱诗班，一路唱着“永恒的纪念”的赞美诗。

托尔斯泰长眠在被古老的橡树和菩提树环绕的地方，墓上没有任何碑文。童年时，他常随哥哥们到这树林里来玩。大哥尼古拉曾经告诉他：在这里埋着一根“绿杖”，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秘密；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当时托尔斯泰不过五岁，但这个故事却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以后，乃至一生，他都在探求着这个秘密。现在，他就永远长眠在幽静的绿荫丛中，长眠在埋着“绿杖”的地方。他将继续在那里探寻如何使全人类得到幸福这一古老的秘密……

恶作剧的代价

——法国作家左拉之死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曾创作过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崩溃》等。还发表《实验小说论》，提出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德雷福斯案发生后，发表《我控诉！》一文，抨击法国反动当局，因此被判徒刑，后来逃亡英国。

1902年6月28日，是著名作家左拉告别人世的日子。在这之前不久，重新归国后的左拉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的法国；前总统弗利克斯·富尔在爱丽舍宫逝世，新总统卢贝宣誓就职；德雷福斯案件将在雷恩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本人也即将从被关押的魔鬼岛返回法国；而真正的罪犯埃斯塔拉齐却又潜逃国外……

按理说，左拉可以在梅塘别墅安心写作，同时静等着德雷斯案件重新审理的结果，而且法国政府和公众应当感谢这位作家，表彰他的功勋了。因为当年是他挺身而出，最早向世人指出这个案件的荒唐与错误。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左拉在此案中的立场，他被认为是“亲犹分子”，从而继续遭到社会上那些顽固坚持反犹立场者的仇视。

左拉和饶勒斯、克莱蒙索等人，以所谓“态度过敏”而被排斥在雷恩法庭之外。一天，他正在为此气愤时，一个人送来一份电报。

左拉打开一看，立刻大惊失色：

“拉布里被刺！他们向拉布里开枪了！”

左拉立即赶到医院。拉布里头上缠着绷带，呼吸急促。原来，拉布里在去法庭的途中，被人从背后开枪击成重伤。刺客的意图是清楚的，他们不受托拉布里律师上法庭为德雷福斯辩护，而他是左拉等人被禁止出庭后唯一可上法庭揭露真相的人。

果然，在没有左拉、拉布里等人参与之后，政府和军方向德雷福斯及家属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一项交易；以赦免释放德雷福斯为代价，换取他放弃向最高法庭上诉的权利。德雷福斯一家人同意了。

左拉对此感到失望，也感到气愤。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再次给总统写公开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那以后，左拉大部分时间住在梅塘别墅里，履行着自己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三大名城”早已写完，他正写着的是另一部连续长篇“四福音书”包括《繁殖》、《劳动》、《真理》和《正义》4个长篇。

左拉尽管年事已高，精力仍然旺盛，每晚差不多都要写到凌晨方肯搁笔。在梅塘别墅的这些日子，他已经写到最后一部《正义》，而且进展很快。秋风带着凉意从赛纳河上吹来，梅塘别墅的花园小径上落满发黄的树叶。巴黎的秋天来了。这年的秋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才9月份，天气就这么阴冷。左拉决定离开梅塘，住到市区去。

1902年9月28日，这是一个天色阴沉的星期天。左拉离开梅塘别墅，回到他在布鲁塞尔街的寓所。

走进这座久不住人的寓所，左拉似乎觉得特别冷。他叫仆人儒勒将壁炉烧燃，然后将稿纸摊开在书桌上，准备继续写作。壁炉里的炭火劈劈啪啪燃

烧着，越来越旺，房间里渐渐暖和起来。左拉夫人一面朝那张具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大床走去，一面劝丈夫早点休息。

“最后一章的中心思想我已考虑好了，”左拉像拍着他心爱的小动物似地拍着桌上的手稿，又像是向夫人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构思很令人满意。”

说罢，他又在书桌前坐下来。那晚上，他一直工作到深夜。躺上床，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半夜里，左拉醒过来，发觉屋子里气闷得很，连呼吸都有些困难。另外，他还感觉到头疼得厉害。

碎煤块在壁炉里继续发出沉闷的爆裂声。左拉突然想起，是不是炉门没有关严？于是，他挣扎着起身向窗口走去，想把窗子打开。

左拉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觉得四肢发软，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坚持扶着墙，支撑着身体，努力向窗户走去。

“无论如何要打开窗子……打开它……上帝，让新鲜空气进来……”

左拉快要走到窗口。然而，距离窗户还有两步远的时候，他竟再也支持不住，穿着睡衣直挺挺地倒在窗前！

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壁炉里的煤块依旧发出沉闷的爆裂声，像是在敲着丧钟……

第二天早晨，天已经大亮了，左拉和夫人都还没有起床。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左拉向来有早起的习惯呢。感到奇怪的仆人儒勒喊了几声，屋子里仍然没有人答应。顿时，一种不祥之感袭向这位忠诚的仆人。

9时左右，儒勒领来一个锁匠。

“砸开，把门砸开！一切由我负责！”

房门被砸开了，儒勒冲进房间，并打开了窗户。他看见，左拉穿着睡衣倒在窗前，他夫人躺在床上。

立刻叫来了医生。人们给这位作家做人工呼吸，进行各种急救处理。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左拉再也没有醒过来。

不一会，警察也来了。

“他，已经死了。”医生抬起头来说，“是窒息死亡，一氧化碳中毒……”

警察检查了一下屋里的情况，发现抽屉里的几百封恐吓信……。书桌上是一本摊开的手稿，未完成的那一页上，作家用潦草的字迹只写了一句话：

“通过真理的道路，重建一个比较高级、比较幸福的人类社会……”

这是左拉的梦想，也是他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可是，他不能亲眼看到了。

自左拉位于预政治，干预社会生活，亲自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以来，这位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一下子成了法国社会最有争议的人物。如今，左拉不幸逝世，也并没能平息这种争议。舆论对他的死亡的评价，仍然是针锋相对的。《震旦报》向整个社会发出呼吁：“左拉应当葬在伟人大公墓！”而《自由论坛报》则在头版刊登了醒目的大字标题：《一条自然主义的社会新闻——左拉窒息死亡》，同时还满带恶意地刊登题为《歌颂叛徒》的文章，说什么“法国人民永远铭记，是上帝惩罚了左拉，是大天使圣—米歇尔杀死了左拉”。

左拉之死果然是上帝惩罚的吗？不！以后披露出来的事实表明，那是顽固的反犹势力所干下的卑劣行径！

不久后，在巴黎布朗什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一个喝醉了的砌炉工在对人吹嘘说，是他们一伙人送了左拉的命。原来，9月27日，星期六那天，他们几个砌炉工在左拉邻居的楼顶上干活，认出了左拉家的烟囱。有人说：“咱们熏熏这头猪！”于是，一个人恶作剧地将左拉楼房上的烟囱堵塞了。到了星期一，那小伙子又悄悄将烟囱给捅开了。警察检查后，发现左拉家的烟囱果然有被堵塞后又捅开的痕迹，但并不想进一步查明真相。

10月5日，一支引人注目的送葬队伍在步兵第28团的仪仗队引导下，向巴黎的蒙马特尔公墓缓缓走去。左拉夫人（她终于被抢救过来）裹着黑纱，被人挽扶着，泪流满面地走在灵车后面。接下去是作家的一批朋友和官方人士。还有以饶勒斯为首的社会党人以及巴黎的许多普通市民、工人、邮递员和妇女。另外，还有一个不寻常的送葬者——德雷福斯。

左拉死后不久，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代表法国政府，通知左拉夫人，她可以为丈夫戴上荣誉军团勋章。同时法国政府决定授予左拉以军人的荣誉。1904年，法院撤销了雷恩法庭不公正的判决。两年以后，德雷福斯上尉在军事学校荣获荣誉军团勋章。已被晋升为将军的原情报二处处长皮卡尔，亲自出席了授勋仪式。

又过了两年，1908年6月4日，左拉的遗骨移入位于巴黎市中心拉丁区的“伟人公墓”。

生命已进入麻醉状态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之死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生于破产农民家庭。青年时代流浪各地，做过报童、工人、水手等。在《热爱生命》等短篇小说中反映人同自然界的严酷斗争。1902年以记者身份去英国，发表《深渊中的人们》，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活。1904年发表长篇小说《海狼》。自传体长篇小说《马丁·伊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

1913年，依旧是杰克·伦敦最有成绩的一年，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同时在杂志上连载。印成书的有包括《墨西哥人》在内的短篇小说集《夜生者》和一部拳击小说。同时，他还在60天内出版了《约翰·巴雷肯》和《月谷》两部长篇小说。在西方世界，这个名噪一时的大作家仍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他的身边，一如既往地围着若干亲眷和朋友。但是，他却感到极端的孤独，并为此深觉痛苦。

1914年5月，美国插手墨西哥革命，派军队和战舰占据维拉·克鲁斯。早先就一直渴望报道战事的杰克·伦敦很想大显身手。他从一家报馆获得了每周1100元薪水并供给一切开销的优厚待遇，24小时之内便动身前往墨西哥。但两个月的采访并没有让他带回战事消息，原因是那里的战争本来就没怎么打，作家本人反倒被一场严重的痢疾弄垮了身体。

以后，杰克·伦敦的病痛逐渐加剧，精神沮丧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难于每天挤出规定的那1000字了。尽管他的自信心并未丧失，创作的激情和技巧也未消失。然而，在14年的内生产了41部书之后，作家终于开始疲乏，而且渐渐失去理解力和活力了。他那部以模范农场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大房子里的小主妇》，出版后让读者感到目瞪口呆，大败胃口。

与此同时，杰克·伦敦喝酒的量越来越大。过去他喝酒是为了取得快乐，如今却是为了减轻痛苦。过去他很少在牧场上喝酒，这时却常常在那里喝。这个过去充满生活热情和工作劲头的男子汉。现在不得不用威士忌来消遣漫长的时间了。他不知不觉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他的痛苦使他喝酒。喝酒又加剧他的痛苦。他由于精神疲乏和沮丧而去喝酒，喝过酒后更觉得疲乏和沮丧……

总之，一切都开始变了。他不再畅快，不再年轻，不再新鲜而快乐，不再精力充沛地工作。过去人们看见他是在喝酒，如今却看见他是在醉酒。杰克·伦敦也不再从讨论中得到知识，不再以斗智为乐，不再参加角力等游戏和骑马进山。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眼神失去光彩。

不久，杰克·伦敦又受到命运的另一次打击。他用几千元修建的“猪宫”，以其现代化设备试图引起美国猪肉业的注意，并在以后建成一所屠场和冷藏厂，但全部猪只都因在石头地板上得了肺炎而死亡。作为牛群基础的得奖牛，在栏里折断了脖子。安哥拉羊群，被瘟疫扫光。几次得过奖的载重马，也莫名其妙地死在田里。此外，原先花了14万美元，以为20年后会自动成为一笔财富的14万株桉树，忽然间竟变得除了作柴烧外别无他用。总之，他想拯救加利福尼亚农业的“模范农场”是失败了。他知道

自己受了打击，却不肯承认。

为要赚钱应付开支和维持牧场，杰克·伦敦每天勉强写着那1000字。他

的脑筋在写作方面已消耗得太多了，但作为作家，活一天就得写一天。他由此害怕自己的精神在不断的重压下崩溃，就不只一次地恳求伊丽莎：

“假如我发了狂，答应我，不要把我送进疯人院。答应呀！”

伊丽莎每次都必须郑重地对他说，她不会把他送进疯人院，她会很好地照顾他的。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恐惧。

1916年1月，杰克·伦敦怀着希望阳光能再度医好自己病痛的心理，和夏米安乘船去了夏威夷。但这次夏威夷之行既未能医好他的精神，也未能医好他的身体。当他回到格伦·爱伦小村子时，人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发了肿，脸肿胀着，眼睛没有光采，连脚踝也肿起来。过去总那么年轻的杰克·伦敦，变得阴沉，沮丧，苦恼和徬徨不安。没过多久，有人看见作家在奥克兰醉酒。甚至在公共场所耍酒疯。

“这时，冒险的世界几乎已经过去了。”在杰克·伦敦看来，整个世界都似乎变老了。他不禁叹息说：“连那紫色的七海口岸也已经消逝了，变得平淡无奇了！”有一阵，他计划去东方旅行，已经买好了船票却又退掉。他想自个去纽约，但那批不友好的邻居因为用水权的问题告了他。在法庭审判终结那天，他作了4个钟头的供词。当时，杰克正患着尿毒症，离开法庭时他感到非常痛苦。几天后，他把所有签名告他的邻居都请来吃饭。在餐桌上，这些人一团和气地对他说，他们从来不希望限制他用水。

1916年11月21日，星期二，杰克·伦敦打算第二天去纽约，晚上单独和伊丽莎谈到9点钟。他说途中要去芝加哥牲畜赛会上买回良种牛羊。又吩咐伊丽莎说，给每一个劳动者家庭一亩地，在上面建一所房子：还要为民众学校选择地址，征聘一名教师。他还说他的野心是使牧场能够生产一切，除面粉和糖以外，一切自给自足。

杰克说这些话时，表情一直很平静。两人一起走过书房走廊。这时伊丽莎对他说：

“到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商店盖好。学校盖好，教师也找来了。我们要求政府设立一个邮政分局，还要竖起一根旗竿。我们就要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市镇，可以叫它独立村。”

杰克·伦敦听后，搂起伊丽莎的肩头用力挤了一下，十分诚恳地说：

“我赞成你，大孩子。”

说完，他便回自己的寝室去了。伊丽莎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杰克·伦敦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日本仆人关根，惊慌十足地跑进伊丽莎的卧室，叫道：

“小姐，快来吧，老爷的样子不对了！”

伊丽莎飞快地跑过寝廊，来到杰克·伦敦的卧室。她看到杰克·伦敦的卧室。她看到杰克·伦敦已经失去知觉，就立即打电话到索诺马找医生。

医生赶来时，杰克·伦敦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在室内地板上找到了两个题有吗啡和癩茄精的空瓶，桌子上有一个本子，上面写有计算药量的数字。医生立即通知索诺马的药剂师预备吗啡解毒剂，叫他的助手带来。医生和助手冲洗了作家的胃，一面用强心剂，一面按摩他的四肢。满怀悲愤的伊丽莎充当着护士。

在整个抢救过程中，杰克·伦敦只有一次似乎有过反应——他眼睛缓缓睁开，嘴唇作了个很像是“哈啰”的表示，又失去知觉。

那晚上刚过7点，杰克·伦敦就停止了呼吸。这位闻名世界的大作家，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第二天，尸体运到奥克兰，贝西同他的两个女儿都参加了丧礼。

一个星期以后，伊丽莎亲自将杰克·伦敦的骨灰埋葬在牧场附近的山岗顶上。这个僻静的安葬地点，是两周前他同伊丽莎骑马经过这里时亲自选定的。当时，他们刚跨过大圆丘，作家突然勒住马说：“伊丽莎，当我死了的时候，希望你把我的骨灰盒埋在这座小山上。”

伊丽莎吃惊地望着他，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没有料到，两个星期后，她就果然来亲手实现死者的遗嘱了。

“心，就想挨一颗子弹”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之死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学生时期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布）的地下活动，几次被捕。十月革命创作进入新阶段。长诗《列宁》、《好》、《穿裤子的云》、《放开嗓子歌唱》等都很著名。他的诗歌颂十月革命，颂扬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他的剧本《臭虫》、《澡堂》，短诗《开会迷》、《苏联护照》等也很著名。

应当说，促成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诸种因素之中，显然贯穿着一个世界观方面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诗人一生中，生与死的问题时常在他脑际徘徊。最后，诗人终于选择了死亡，这正是他自身的悲剧所在。

在早期的爱情诗里。马雅可夫斯基一再地而且是显得十分随便和轻松地提到过自杀和死。还在少年时代，马雅可夫斯基就写下过如此令人吃惊的诗句：

心就想挨一颗子弹，脖子渴求一尝刀片；
灵魂在冰墙之间战栗，它将永远逃避不了雪寒。

后来，诗人又写道：

“我经常在想——让子弹给自己的末日点上句点岂不更美？今天我有备无患，举行一个诀别演奏会。”（《脊柱横笛》）

“相信死后的世界吧！可以轻易地玩一趟。只要一伸手，枪弹眨眼间就可以划开一条通往死后世界的呼啸的道路。”（《关于这个》）

在诗人处境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个有点好事的年轻人曾经这样问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优秀诗人都没有好的结局，或者被人打死，或者他们自己……”

这个青年的问话是有一定依据的。仅从俄罗斯文学史来看，一批优秀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都先后死于非命。这个青年紧紧盯住诗人的眼睛，直截了当地继续问道：

“诗人，您什么时候开枪自杀？”

马雅可夫斯基身子顿时为之一震。过了一会，他才带着一种厌恶情绪，慢吞吞地回答说：

“如果傻瓜们老是要问这个的话，那么，开枪自杀当然要好些……”

这次谈话看起来似乎极其偶然，可是，诗人的结局却被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不幸言中。没过多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一代名诗人果然开枪自杀了，实践了他少年时代的“心愿”：

“心就想挨一颗子弹……”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来看，也对诗人选择自杀这条绝路产生过不良影响。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后来回忆说：

“那个时候，常有人们开枪自杀的事。……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一个接着一个地自杀了。” “那个年月的人们非常重感情，而且十分真挚。如果他们认为不可能生活下去了，他们就会自杀……”

当时，许多著名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自杀”。这种社会环境和风气，不能不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和最后抉择产生消极的影响。

4月12日，马雅可夫斯基写好了遗书。然后去同那时他正恋着的女演员波隆斯卡娅见面。那天，波隆斯卡娅已发觉诗人的精神和情绪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马雅可夫斯基当时对波隆斯卡娅说，他给政府写了一封信，信里专门提到了她，并把她当作自己的家人对待。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想说明自己同波隆斯卡娅感情深厚，关系特殊，以示好感吧。

不料，波隆斯卡娅却对此反应冷淡，只是说：

“您认为在哪里必须提到我，就在哪里提到我吧。”

马雅可夫斯基对此深觉失望。他在那里没呆多久就怅然离去。

隔了一天，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决定最后作一次尝试。他想和波隆斯卡娅就两人之间的关系深谈一次。诗人自己先在心里拟好了谈话的详细要点和方案，然后才将波隆斯卡娅约到自己在卢比扬卡大楼的住所来。

那天，波隆斯卡娅准时赴约。不过，她已经看出马雅可夫斯基显得心情沉重，情绪忽起忽落，话说得很多，而且非常感伤。

当时，波隆斯卡娅正在话剧《在那一边》里担任着重要角色。她是一个有较强事业心的演员，同时她和马雅可夫斯基相处的日子还不太长，对诗人的心境也并不十分理解。因此，尽管马雅可夫斯基再三恳求她留在他那里，不要离开他，而她却表示急着要去剧院参加演出，无论如何不愿缺席。

“难道你真的忍心这样离开我？”马雅可夫斯基带着少见的绝望情绪，向波隆斯卡娅苦苦恳求说，“别离开我！波隆斯卡娅，我求求你，千万别走！”

“我必须到剧院去。”波隆斯卡娅解释说，她已被剧院的工作深深吸引住了，不能无故缺席。

她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并没有十分在意这时已出现在马雅可夫斯基脸上的那种明显的绝望情绪。

“况且，”波隆斯卡娅进一步补充说，“作为一个演员，一旦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了艺术剧院的有趣生活，我就不能只做丈夫的妻子，即使丈夫是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巨人……”

“那……你走吧！”马雅可夫斯基脸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对波隆斯卡娅做了个手势。他完全绝望了，不单是对眼前这个把事业看得比爱情还重要的女演员，而且是对现实生活，对人生……。他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肩头在痛苦地抽动着。

波隆斯卡娅见此情景，心里也很难过。她看了看手表，排演时间快到了。她略一迟疑，终于一咬牙，毅然走出了房间。

然而，还差几步没有走到大门跟前的时候，她就听到背后响起了枪声。她吃惊地停住了脚步，只不过一刹那功夫，波隆斯卡娅就明白过来，连忙返身向马雅可夫斯基的房间奔去。这时，过道里已挤着不少被枪声震惊了的人。

波隆斯卡娅推门一看，几分钟之前还在向她表白爱情的诗人，已经倒在血泊中……

马雅可夫斯基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可怜天下女人心

——苏联诗人叶赛宁之死

叶赛宁（1895—1925），苏联诗人。生于农民家庭。早期诗描写农村自然景色，歌颂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生活。曾参加文学团体意象派。作品中流露悲观情绪。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部分诗中，反映新的革命生活如长诗《苏维埃俄罗斯》等，但仍留恋革命前农村的田园生活。最后自杀。

1925年8月，莫斯科的春天来到了。为了丰富生活，叶赛宁的恋人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家里举行了一次家庭晚会。在出席晚会的客人中，有一个颇具名门闺秀风度而且容貌出众的少女，她就是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列夫娜。

索菲娅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秉性聪慧，举止娴雅大方，在晚会上很引人注目。叶赛宁那天一见到她，就被她的容貌和举止吸引住了。

在叶赛宁看来，这个神情略显忧郁、腼腆、颇有教养的少女，那双智慧的眼里总是洋溢着丝绒般的柔光，仿佛大作家托尔斯泰遗传下来的深邃智慧，就蕴涵在那明亮的眼睛里和那妩媚动人的脸上。叶赛宁觉得，索菲娅太像自己心内一直膜拜着的理想女神了。因此，他不时对索菲娅投去脉脉含情的一瞥。

晚会结束后，叶赛宁即使是在别尼斯拉夫斯卡娅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索菲娅的好感。他那本来就易于冲动并常常表现出爱情狂热的心灵，又从此开始失去了平衡。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对此深觉苦恼和不安，可又无能为力。她深知索菲娅并不是叶赛宁所渴望的那种女子。而叶赛宁对索菲娅的爱慕，不过是藉以对自己想象中的美神膜拜罢了。但是，她从和叶赛宁较长时间的相处中又了解到，叶赛宁身上有一种既细腻又粗犷，既温柔又执拗的性格，当他决心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任何人也无法阻止他，无法改变他内心的主意。

1925年5月，叶赛宁来到巴顿，他给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寄回一封信。信中，他提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欠佳，需要疗养。信的最后是这样一句话；

“身体恢复后，我将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里，已暗示出他即将和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分手的征兆。

这也是叶赛宁写给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最后一封信。

这年9月，叶赛宁果然与索菲娅正式结婚。随后，他搬进了索菲娅那豪华而又古色古香的宽大住宅。

叶赛宁在索菲娅那里享受到拉依赫和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所不能给予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令他失望的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如他原来设想的那样美满，在这一点上，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估计是对的，索菲娅只能被当做理想中的美神来膜拜，却绝不是叶赛宁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如果叶赛宁以为会在索菲娅身上寻到他得以奋发振作的力量源泉的话，那他显然是大错特错了。事实证明，索菲娅虽则出身名门，天姿出众，但是她既缺乏同诗人相匹配的艺术才识和见解。也没有别尼斯拉夫斯卡娅那种温情。由此，叶赛宁对新的家庭生活感到压抑和束缚。他对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在莫斯科我无法平静下来。

家庭生活不顺利……”

1925年11月，叶赛宁情绪更加低落，精神抑郁症的症状也愈加明显。后来，他终于被送进了莫斯科的一家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虽经一系列治疗，但效果不佳。到了12月下旬，叶赛宁觉得呆在医院里很苦闷，不想再住医院了，甚至不想再呆在莫斯科了。他一心要寻找一个更安静，更舒心，更适合自己居住的环境。他竟然有了天真的想法：到了那种地方，就可以除忧解愁，无忧无虑。而他相信，这种地方是一定会有的。

主意既定，叶赛宁就全然不顾家人的劝阻和医生的反对，执意要求出院。出院没两天，叶赛宁就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了莫斯科。他这次出走的目的地是列宁格勒，不过，为了同自己的两个孩子见上一面，他特意绕道去克里米亚呆了一天。在同自己心爱的孩子们吻别后，重新踏上旅程。

12月下旬，列宁格勒严寒刺骨，在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中，叶赛宁孤独地出现在城市街头。诗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并不陌生，他曾经和自己的初恋情人拉依赫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现在，他情绪苦闷，意志消沉。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心里既带有对往昔的怀念，又暗自抱着对未来的希望。

叶赛宁动身来列宁格勒之时，曾经设想过他将在这里恢复活力和对生活的信心，然后，一个人安静地休养一个时期；而到1926年夏天将动身往意大利去，高尔基正在那里等着他。他和高尔基将继续在意大利疗养，共同探讨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当时，正在意大利疗养的著名作家高尔基，得知叶赛宁精神苦闷，健康状态不佳的消息后，曾多次写信叫叶赛宁到意大利去。

叶赛宁这些想法，无疑是美好而且可行的。然而，长期陷于孤独苦闷的抒情诗人已找不回昔日的安宁了。心境的恶劣使叶赛宁的忧郁感不断加深。以至造成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使他原来的想法再次落空，并最终使他走上绝路。

窗外，大雪不停地下着。叶赛宁由于心情不佳，终日呆在旅馆里闭门不出。他的情绪不仅没有恢复过来，反而愈加低落下去。渐渐地，他对生活和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一种极度苦恼、孤独、绝望的情绪整天支配着他，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12月27日，天气极冷，列宁格勒乌云密布，大雪纷飞。叶赛宁站在窗前，愁闷地看着那些枝条挂满雪花的松树静静地屹立着。大街上，行人穿着厚厚的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蜷缩起身子在冒着风雪急急赶路。前面，却是白茫茫的一片……

走到哪里去？何处才是归宿？何处才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尽头？叶赛宁摇摇头，沉重地叹息一声。他离开窗户，独自躺在床上闭目沉思。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已走完。

28日凌晨，当人们正沉入这个寒冷的梦乡里的时候，富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叶赛宁，在旅馆房间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叶赛宁自杀身死，震动了苏联社会和国际文坛。国内外一些著名人士都对此表示哀悼和惋惜。

但是，对叶赛宁的死感到震动最大、打击最大的还是诗人的亲人。以及他生前为数不多的几个挚友，其中包括他过去的恋人拉依赫、邓肯、别尼斯拉夫斯卡娅……

当时在莫斯科的拉依赫听到叶赛宁的死讯后，悲痛得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他不顾可能遭到的非难，毅然动身专程赶到列宁格勒，瞻仰了叶赛宁的遗容。拉依赫当时泪流满面地对朋友们说：“我们大家都没能照顾好他，他太孤独了，否则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在外国的邓肯惊悉叶赛宁自杀的消息后，立即给巴黎各家大报编辑部拍去这样一封电报：

“叶赛宁悲惨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

邓肯自己的命运也相当不幸。1927年的一天，她在大街上穿过时，由于身上的围巾被卷进汽车轮子而遭受车祸身死。这位西方著名舞星和一年多前自杀的叶赛宁一样，十分悲惨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

至于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她的结局就更加可悲了。当叶赛宁离开她投入索菲娅的怀抱后，她精神上就受到极大刺激。但她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命运的打击，既没有怨恨谁，也没有恳求什么，只是努力埋头于工作中，保持着自己素有的自尊。她了解叶赛宁的内心矛盾和性格弱点。便怀着同情和忧伤的心理忍耐着，希望并以为叶赛宁会再次回到她身边来。

1925年秋，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停止工作到疗养院去。当年12月，她又转到特维尔省一个僻静的农村去休养，指望这幽静安宁的乡村环境能帮助她恢复内心的平静。本来，疗养已使她的病情开始有了一些好转，但年底时，却突然传来了叶赛宁的死讯。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悲痛不已。她完全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

1926年1月，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回到了莫斯科。当时，她有一个设想，打算亲自写本书，描述叶赛宁的爱情观和她自身的不幸。可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不然就可以为后世留下一本研究叶赛宁的珍贵资料。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由于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开始显得神思恍惚，甚至到后来出现有精神失常的症状。她常常觉得，叶赛宁的身影似乎总浮现在眼前，自己的灵魂仿佛已随诗人而去，在广阔无垠的天际遨游。这时，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叶赛宁的死，使她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1926年冬，叶赛宁去世一周年之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一个人来到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瓦干科夫墓地。她悲伤地在叶赛宁墓前跪立了好久，最后，拿出随身带来的一支手枪，在诗人的坟头开枪自杀了。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殉情时留下一封遗书：

“1926年12月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残生。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休无止地狂吠，但是这对他，对我都已无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用殉情自杀，表达了她对诗人执着的爱。可以说是叶赛宁自杀悲剧中令人感叹的最后一幕。

请你帮我结束生命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之死

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他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主要著作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1921年7月，艾丁根请维也纳雕刻家保罗·柯尼斯贝格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员会”的成员为庆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寿辰，决定把塑像原型买来，送给弗洛伊德作纪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现，意味着“弗洛伊德时代”的开始。从此，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后，弗洛伊德成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对象之一。

1924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巴尔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来大学建校典礼上说：“对人类现代思想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

柏格森、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

1923年，当弗洛伊德六十七岁的时候，他发现右颞显著地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疾病告诉任何人。他自己并没想到这是致命的下颞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声不响地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晚上经常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颞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4个月后，他的下颞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恶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立志要在战后完成的事业和目标是很宏伟的，他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站住了脚跟的精神分析学能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各个有关的科学领域。1923年，当弗洛伊德发现了自己的严重疾病的时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伤的事情发生：他的小外孙、苏菲的第二个儿子海纳勒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这个孩子是弗洛伊德听见到的孩子之中最聪明的一个。

弗洛伊德于1923年7月告诉钟斯说，他遭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说：由于这一打击，“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说，海纳勒之死“给我一次不可言状的打击。”“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

1926年，弗洛伊德的下颞癌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经医生诊断，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过度忧虑和过量的抽烟。1926年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很多人来祝贺他。

与此相反，维也纳的官方学术和研究机关——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科学院和奥地利医学会却对弗洛伊德的七十岁寿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丧，反而感到光荣。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任何祝贺是真诚的。”因此，他们如此坦诚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兴。这件事集中地表现了奥地利和德国境内排犹势力的猖獗。

5月6日，弗洛伊德的几个学生捐献给他4200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献给“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献给维也纳精神分

析诊疗所。在感谢词中，弗洛伊德表示了从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引退的愿望。他说：“从今以后，必须全靠年轻一代来发展精神分析的科学事业”。

到了1927年，弗洛伊德本人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又投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到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1929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当1929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以坚强毅力度过了四分之三世纪。

1930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疾病迅速恶化。

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妙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1930年10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顎部。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弗洛伊德显然还没有估计到如果这些法西斯势力在维也纳得势的话，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满足于焚书，而必定是要焚烧弗洛伊德的肉体不可。

1934年，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书籍都烧光了，以致到20世纪50年代时，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纳粹分子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1933年6月，纳粹分子完全管制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原学会主席克列兹美被迫辞职。容格取代了他的职位而成为主席。许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都谴责纳粹的这些野蛮行为，也谴责容格的作为。

1933年3月，德国法西斯当局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没收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全部财产，但由于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该出版社仍能坚持工作，直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维也纳。

1936年5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80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

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

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他终于决定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

的衷心感谢。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的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1938年3月1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厄运——他要像他的祖先世代所走过的流浪道路那样，离乡背井、流离颠沛。

德军入侵后不到5天，钟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亲自飞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钟斯接触，安娜首先请钟斯去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钟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的是给德国一个印象：出版社的财产是国际性的。

当钟斯前往出版社时，德国的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地占领着这个地方。钟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已被武装监禁。当钟斯开口说话时，德国武装人员竟然也宣布钟斯“已被捕”，不许钟斯自由行动。只是在钟斯表示自己的国籍并要求与英国大使馆联系时，钟斯才被释放。钟斯从出版社出来以后，径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在弗洛伊德寓所，钟斯怀着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关怀，恳求弗洛伊德赶快离开维也纳，钟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弗洛伊德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一个人罢了。啊，如果我是独自一个人的话，我老早就报销了。”钟斯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他同意离开维也纳。接着，钟斯前往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同时，为了使纳粹政府同意让弗洛伊德出境，钟斯又同美驻法大使布利德联系。布利德本来就认识弗洛伊德，所以，他热情地进行活动。由于布利德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一方面，罗斯福通过国务卿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维利先生尽全力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

弗洛伊德临走以前，安娜和玛丽·波拿巴特清理了弗洛伊德家中的一切文件，把一切没有价值的文件都烧毁了。弗洛伊德在临走前，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79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话可说，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说：“再见，维也纳！”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到达伦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从车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车上指手划脚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导游”来了——其实，弗洛伊德对伦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启程前反复地翻阅了伦敦市区地图。

钟斯为弗洛伊德租到一间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对这个新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使他感到清新。他来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仿佛忘记了自己

是82岁的病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英国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祝贺他。

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伦敦的报刊热情地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的消息。

他刚刚到达伦敦不久，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打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还收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贺信。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兴奋。他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1938年秋天，他在家接待了几位高贵的客人：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生物化学家和犹太人著名人士魏斯曼。

6月23日，英国国王亲自访问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戴维斯带来了英国皇家学会自1660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在纪念册上签名。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7月19日，斯蒂凡·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访。达利是西班牙著名的现代画家。他早就崇奉弗洛伊德，特别是很爱读他写的那本《梦的解析》。达利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以潜意识的活动作为构思线索。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残痕》表现了活生生的原始记忆原料在心理深处的状态，使人感到记忆残痕的新鲜性和生动性。这次访问弗洛伊德，是达利多年的夙愿。达利为弗洛伊德画了一幅素描画。这幅画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弗洛伊德的头盖骨想象成一只蜗牛壳的残痕！达利曾把这次难忘的会见写进他的《自传》中，并附上两幅他自己绘制的画面。

弗洛伊德继续发挥他的全部精力，终于在1939年9月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经不能完成《精神分析学概要》。他还很谦虚地说，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时为自己没有创新的思想、不得不重复以往的观点而惭愧。

1939年2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钟斯夫人正夜以继日地赶译这本书。结果，1939年8月，该书英文版终于出版了。

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9月19日，钟斯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当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钟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睁开了眼睛，认出是钟斯。他伸出手，握了握钟斯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钟斯表示告别和致意。

9月21日，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亲爱的舒尔，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吧。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现在我万分痛苦，这样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肉体的痛苦已使他无法忍受，他祈望能安详地死去。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弗洛伊德很感激，接着，对他说：

“把我 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第二天，9月23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对准喉咙的双筒猎枪

——美国作家海明威之死

1961年春天，海明威简直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6月，他在妻子的陪同下，再次动身去座落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契斯特市的梅奥诊所检查治疗。在检查治疗后的返回途中，海明威始终显得郁郁不乐。妻子玛丽以为他是因为连续不断的治疗弄得很疲乏的缘故，同时在大热天里长途旅行也容易使人劳累，所以并不十分在意。她怕丈夫有病的身体受不住炎热和劳累，特地将路程化整为零，用了5天时间走完。

可是，玛丽估计错了。海明威对医生们这次不同寻常的检查治疗，已经产生了某种不祥预测。他似乎觉得，最后的关头到了。一路上，他仔细考虑了自己的事，决定采用他父亲的方式…… 7月1日，他们回到凯奇姆镇。尽管十分劳累疲乏，但吃晚饭时，海明威的脸色平静，气氛一如往常。

饭后，妻子玛丽因旅途劳累，想早点休息。盥洗后，她进了自己的卧室。在准备解衣就寝时，玛丽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过去唱过的一首古老的意大利歌曲《人人夸我是金发女郎》，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柔情。于是，他回身匆匆穿过厅堂。走进丈夫的卧室。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她说。

海明威这时正安静地刷牙，玛丽就站在他旁边，把这首歌轻声唱给他听。海明威听着听着，连忙漱了漱口，跟着玛丽唱完最后一段。

夫妻俩吻别后，就各自休息去了。玛丽绝没有想到这是她和丈夫的最后诀别。那一晚，她睡得特别香甜。 第二天，清晨6点40分，海明威穿着睡衣走下楼梯。

“死亡，只有在拖延时日，痛苦之至，令人难堪这点上，才是坏事……”

他一路思忖着自己曾经写在小说里的那些关于死亡的论断，心里完全拿定了主意。他把脚步放得很轻，怕惊醒玛丽。

在楼下的客厅里，海明威静默了一阵，他凝神聆听着清晨街道上的各种声音，脸上显出沉思的神色。

生命与死亡，这是他自己和别人都曾经探索过的永恒的存在。现在，他将跨过两者之间的界限，去寻求那一瞬间的秘密。海明威找出自己平生最喜爱的那支镶银双筒猎枪，轻轻擦拭抚摩了一会儿。他准备和这心爱的猎枪告别，也同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告别。

终于，海明威用手理理下巴上的大胡子，那带着深深伤痕和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阴郁的微笑。他长长地吐了口气，举起双筒猎枪，有些笨拙地将枪口插进嘴里——

他从容不迫地举起手臂，同时用手指勾动了两个扳机。

砰然一声枪响！震撼了整幢房屋。

被枪声惊醒的玛丽，仿佛根本没睡着似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她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飞奔下楼。还没下完楼梯，玛丽就停下了脚步——她被眼前那血肉模糊的可怕景象惊呆了！

楼下地板上，她心爱的丈夫，世界知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伸开手脚躺在那里？地上满是血迹。他的整个头部几乎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嘴，一个下巴和一部分面颊；躯体还在往外冒血；身旁是他生前最喜爱的双筒猎枪，

另外有一些碎骨片……

世界——那个巨大的斗牛场，在这伟大的脑际里不复存在了，永远消失了……

从龙须沟到太平湖、

——作家老舍之死

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戏剧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20年代至抗战前，历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员、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并从事创作。抗战胜利后，在美国计学并进行创作。解放后应召回国，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作丰富，有《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等，语言生动、幽默，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1966年8月里的一天，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来到北京太平湖公园，他的父亲此时正躺在草丛里，静静地睡着。一位市文联的年轻人，向他移交了父亲遍体鳞伤的遗体，并冷冷地交待了一句：“你必须把他赶快‘处理’掉！”然后就坐车走了。

老舍此时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涸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老舍遍体鳞伤。

前两天，在成贤街的孔庙，老舍遭受了红卫兵的毒打。那一247天，原定在这里焚烧京戏的戏装，无知的狂热的少年们把市文联的已经被揪出来的文化名人也顺便地装上了车。作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所有的好朋友和领导干部都被点了名，他自己便也主动站了出来。他的正直，或许是他的顶可爱的地方，但是这个顶可爱的正直却要了他的命！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这是1966年8月23日。

在孔庙，老舍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形势完全失控，老舍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闪着异样的光，这是一般叫人看了由心眼儿里发冷的光。由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温文尔雅的中国文人的眼睛里闪出了这直勾勾的呆板的目光，善良的人们全都害怕了。

一位女作家为了暂时的苟安，唆使无知的少年向老舍提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这些回答犹如火上浇油，再次招来了更加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

“低头！抬起牌子来！”

老舍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即被吞没了……市文联的人说他这一拼死的反抗是“现行反革命”，应该把他交到专政机关去法办。经过一番争夺，把他塞进汽车里，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们又将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轮番毒打到深夜……

老舍的夫人胡絮青被通知将老舍接回家来。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家。临走之前，老舍被通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凌晨，入睡之前，在胡絮青为老舍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长谈。实际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是真正的生死之谈。老舍死的决心已定，但是这一点不便对亲人直言。当老舍脱掉衬衫之后，胡絮青看见他被打成这般惨状，有心放声大哭，可是她不敢。她帮老舍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团沾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

老舍告诉她：“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老舍劝夫人去忙自己的事，不用管他，他绝不会出事。清晨，他硬是把她推出了门，她真的上班去了。胡絮青前脚走，不一会，老舍也出了门。

老舍走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当舒乙闻讯由单位赶回家来的时候，家里已大乱。提着皮带的红卫兵把家里的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每间房的顶棚上的检查孔都被破坏了，他们以为老舍藏在房顶上，而且是由不到一尺见方的检查孔中跳上去的！他到哪里去了呢？人们终于感到事情有点蹊跷，纷纷溜走了。他们走后。舒乙立即直奔国务院接待站。一位负责同志仔细地听了舒乙的陈述后说，“我们立即报告上去，请你们放心。”几小时之后，总理秘书处打电话给胡絮青，说总理已经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

一天一夜就这样过去了，音信全无。到了8月25日下午，市文联打电话叫舒乙去一躺。他们拿出一张证明信给舒乙，上面写着：“我会（指文学艺术联合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老舍是怎样走到太平湖来的？一个谜，为什么要到太平湖来？又是一个谜。

老舍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开湖边顶多有十几步。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围观的人们哗然，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

太平湖是个偏僻的小公园，没有名气，又不收门票，游人稀少。

太平湖没有进入老舍的著作，翻遍了他的书也找不到，虽然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北京的实际地名为背景。但是，他熟悉这一带。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的就是德胜门外。人和历史一样，有的时候，糊里糊涂，要走点小圆圈。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原处，虽然是螺旋式上升，但终究有点重演的味道。老舍是以写在德胜门外发生的故事而成名的，过了近50年后，他本人又还是在德胜门外，销声敛迹。

巴金先生1979年12月15日还说过：“虽然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一个伤心的故事

——作曲家莫扎特之死

沃尔夫冈·阿·莫扎特（1756—1791），是世界乐坛上一颗不朽的明星。在古今中外的音乐大师中，莫扎特堪称是无与伦比的“音乐神童。”他8岁开始学钢琴和小提琴，6岁随父亲赴英、法、德等国旅行演出，一时轰动全欧；8岁就写出了一部交响乐曲。在他35年短暂生涯中共写了600多部音乐作品，对后世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莫扎特光辉一生的另一个方面却是：他经常陷入贫困交加、病魔缠身的悲惨境地中，受尽各种黑暗及敌对势力的欺凌和迫害。恋爱遭失败，才能被埋没，家中连罹悲戚……但，他没有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无比欢乐的音乐、明朗的曲调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赞美和对正义和爱情的讴歌。沃尔夫冈·莫扎特的创作能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奇迹般地恢复了，这是冷酷的命运之神玩的又一个不可捉摸的把戏。他的思维能力没有得到增强，他的精神也没有振作起来，就在创作火焰越烧越旺，把他推向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他羸弱的身体枯萎了，他的脑子迟钝了，他那温柔、纯朴的天性仿佛觉察到在这样一个肮脏的世界上纯粹是浪费，干脆渐渐隐去了。他在内心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理想和准则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他

的才华所起的作用也小得可怜。他的妻子康施坦莎已逐渐习惯了长久的离别，所以她不但想办法来避免分离（她要是这样做了还能给莫扎特一些安慰），反而不太愿意和沃尔夫冈住在一起，理由是沃尔夫冈不需要她。她去巴登疗养也容易多了，用不着等病势沉重才说要去——稍有一点儿不舒服就成了足够的借口。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看来，驻扎在那里的一个军官很可能是她在巴登流连忘返的根源。单就这种行为本身来讲，它也许并不比莫扎特以前闹出的艳闻恶劣多少；但拿到莫扎特对她的爱情、莫扎特的处境和为她而负债累累的天平上一称，这样做就太残忍，太没良心了。康施坦莎约束不了自己固有的性格。她对孩子缺乏感情，不管和孩子分开多久她都不在乎，这一点她也无法改变。但是，她的性情轻浮和见识短浅竟然到了对莫扎特的看法和她姐姐相差无几的程度（她姐姐说莫扎特“只是一个矮小的人”而已），这是难以原谅的。不过，和刚结婚那时候相比，她大概并没有改变多少——她还是莫扎特所需要的那种妻子。她从来没有产生过强烈的排他心理，从不紧紫地约束他。虽然她丝毫不能帮助他稳定情绪，但她只要呆在家里，他就感到一种安慰，可是，这种安慰作用也随着她经常不回家而越来越小了。莫扎特无法预测他什么时候会碰到下一场灾难。他抱定了一种看破红尘的想法——“说不定明天就死了呢”——就这样任凭自己沉溺于各种消遣的游戏中，希图以此忘掉一切痛苦。

《魔笛》（K·620）的情节有些荒诞无稽。莫扎特知道这出戏实际上是多么荒唐。然而，他写出来的却是第一部名符其实的德国乐剧。他一动手谱曲就抛开了席卡奈德尔那蹩脚的诗句，也忘记了令人难以信服的剧情和拙劣的修改。他忘记了一切，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是他实现理想、用歌剧音乐来表达他自己始终不渝的思想感情的一个绝好机会。在这部歌剧的音乐里，这个德国人以坚定无比的信念抒发了自己的激情。在构思这部杰作时，

莫扎特疲倦的大脑正是从他心底的爱、信仰、友谊、以及坦然而不疑的纯朴性格中吸取了创作力量的。

莫扎特热爱他的《魔笛》。他像热爱他的《费加罗》一样全心全意地热爱着《魔笛》。在凉亭里写作了整整一天以后，他往往和席卡纳德尔、沙克、格尔（两位歌唱演员）一起喝酒到深夜，然后才跌跌撞撞地回家——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眼睛里闪出一股怒气。他紧靠在高脚桌上，双手捧住脑袋，苦苦地构思曲调。有时他会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觉得地板也倾斜、摇晃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凝视着，觉得地板仿佛扑了上来，给他猛然一击。有好几次他就这样晕了过去。

莫扎特常常戴上帽子，到席卡奈德尔的剧院去找他的女朋友格尔小姐。这位小姐坐在她的化妆室里，一副轻挑讨好的娇态。她相貌并不出众，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她有个丈夫，这个丈夫还和莫扎特经常见面。然而，如果该得到的安慰得不到的话，莫扎特就会想办法来寻找安慰的。这最后一桩不幸的情场纠葛，丝毫没有欢乐，没有嬉笑，也没有孩子气的热情，有的只是在小酒馆里一夜夜的痛饮。坐在里面的每个人都像失去了理智，不顾尊严、不顾体面地喝着酒。他不这么干，又该干什么呢？坐在家里，盯着康施坦莎的空床发呆，盘算欠了多少债？

一个名叫弗兰茨·克萨韦尔·居斯迈尔（一译许斯马勒，莫扎特之高足）的年轻人来找莫扎特，请求跟他学习作曲。莫扎特还从来没有收过学作曲的学生，便很高兴地收下了他。他现在身体不适和疲劳的时候太多了，简直无法进行日常工作。因此，他可以通过让这个年轻人替他干工作来教他。这样的教法非常成功，以至居斯迈尔自己的作品竟达到了酷似莫扎特的音乐风格的地步。当然听起来还是感到有些形似而神不似。这个学生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到巴登去为康施坦莎跑腿和办一些小事儿——坐快速驿车很快就能到那里。

有一天，莫扎特正昏昏沉沉的时候，有人不紧不慢地敲门，这吓了他一跳。

“进来！”他喊道。

一个高个子跨过门槛，关上了门。他是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身材瘦弱，神情庄重，从头到脚都穿着一身深灰色服装。莫扎特抬头看了看他。这个人奇怪的模样不禁使他打了一个寒战。

这时，他想起了应有的礼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个人冷冷地鞠了一躬，略略寒暄了几句，随后递给莫扎特一封信。信是由几张雪白的纸叠成的，外面打着清晰的火漆，沉甸甸的。接着，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回信应该送到什么地方，随即打开门，消失在门外了。莫扎特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由于受了惊吓而微微颤抖着，心里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几乎像预感一样……他茫然地向空中望着。此刻，他想起了那封信，把它拆开了。信的末尾没有落款。莫扎特又翻回来，仔细看着。无从辨认它的来源。他摩娑着前额，开始看信。

突然，他挺直了腰，全身一阵紧张……他仿佛变僵硬了。

这封信开头以通常的恭维口气提到了伟大的乐队指挥莫扎特的成就，表达了寄信人的深切仰慕。接着，信中要求他就创作一首安魂弥撒曲提出酬金的数目——刹那间，莫扎特全身就像凝固了一样。在这个炎热的下午，一股不知来自何方的寒风似乎在刺透了他的肌肤。莫扎特很快摇了摇头，一口

气把信看完。信里说，如果他愿意创作这首弥撒曲，那就应该讲明最快能在何时写完。还有一个条件，莫扎特不得以任何方式去调查是谁委托他创作这首乐曲的。所有这种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的。就是这些。

莫扎特尽量迫使自己把这一切都当作一项交易来考虑。他站起了身，在屋里来回踱步，拍了拍几张乐谱，喝了一口酒。他向窗外望了一眼，冲着金丝雀吹着口哨，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可是，那件事还留在脑子里。这其实算不上什么事。扯淡。来的那个也不是人。见鬼……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这样的事是不能一耸肩就算完了的。它就在眼前。最后，他不愿再想了。还不如去控制自己不愉快而又疲倦的脑子呢。这件事就是从阴间来的消息。它是死亡的召唤。

莫扎特来到巴登看望康施坦莎。他没有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告诉她。不，现在，死亡已经变得那么美妙了。死亡是一位朋友，一位遥远的、高尚的朋友，他正在向这位朋友缓缓走去。他谁也不能告诉，这是他的秘密，他心底的爱和渴望。像变精明了的疯子一样，莫扎特从一开始就把这位神秘的朋友深深地埋藏在内心深处。他不想把它暴露出来——以免与眼光短浅的蠢人发生争执，让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他只告诉康施坦莎说他准备接受这项委托，除此之外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值得写的东西。

他回到城里，和那个高个子、灰衣服的陌生人取得了联系。他提出的酬金是 50 个金币。由于《魔笛》尚未完成，莫扎特无法确定交稿日期。再说……再说……他懂得，这决不同于一般的委托创作。有些事他不能保证——现在——还有好多事都难以预料。那个陌生人很快又出现了，付给莫扎特 50 个金币，同时告诉他，条件很令人满意，总谱完成之后将另外付给他一笔报酬。对于音乐的风格和内容没有任何限制。然后，他用灰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莫扎特，重申了不准打听委托人的禁令。说完他就消失了。

莫扎特当然不可能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可以找到一个极简单的解释。维也纳有一个瓦尔泽格伯爵，此人异想天开地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个作曲家。他能拉大提琴，但从未写过任何乐曲。于是他经常注意那些富有才华而又穷愁潦倒的作曲家，找他们匿名为他作曲。他给他们以优厚的报酬，然后将得来的作品据为己有，在自己家里进行演奏。他打算把这首安魂曲说成是自己为纪念新近去世的妻子而写成的作品。那个穿一身灰衣服的高个子是他的管家莱特格布。不过，即使当场把这一切都告诉莫扎特，他也不会相信的。在他眼里，那个人的来访是一次神秘的经历，仿佛是虚幻之中发生的一件事。只有这种印象才能使他的思想进入那样超凡脱俗的境界，才能激发出他构思这首安魂曲的灵感。

然而，他刚要动手创作，又被一件恼人的意外事情打断了。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将于 9 月初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布拉格的全国国民议会来函委托莫扎特创作一部庆典歌剧。莫扎特不忍心拒绝。但当他听说他们要求他为麦塔斯塔西奥的脚本《狄托王之仁慈》（K·621）写一部新的总谱时，他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拒绝了。这个脚本写得死板、枯燥。它是一部意大利悲剧，故事大约发生在莫扎特幼年逗留在那不勒斯的那个时期。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带上康施坦莎——孩子都寄养在佩希多德斯朵夫的别人家里——他于 8 月中旬动身于布拉格。

莫扎特刚要跨进写本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脚，浑身一颤。原来是有一只手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猛地一转身，那个穿灰衣服的陌生人站在面前。

“你要出远门？”那人说。“安魂弥撒曲怎么办？”

莫扎特吃了一惊，心里非常害怕，觉得浑身发软。

“不去不行，”他喘着气说。“去写一部歌剧——为皇帝写的。不过我很快就能回来。”

“很快？”陌生人问。

“很快，”莫扎特重复道。“我一回来就马上动手写安魂曲。告诉——那个——那个——”

陌生人鞠了一躬。“我去告诉他，”他说：“我想他会感到满意的。”他转身走了。

莫扎特脸色苍白地爬进马车，无力地倒在靠垫上。康施坦莎望着他，心里一惊，但不完全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9月中旬，他回到维也纳。席卡奈德尔立刻找上门来，盯住他不放。席卡奈德尔准备公演《魔笛》了。莫扎特准备好了吗？还没有。还有一些合唱队部分没写，序曲也还没动手呢。席卡奈德尔把他拽到剧院，硬要他对布景提出建议。他还成天给莫扎特灌葡萄酒和甜酒，一个劲儿地催他快干。28日，他完成了美丽动人的序曲——他的赋格曲中最令人激动、也是最受人喜爱的一首。首场公演定于30日举行。

由于写了《魔笛》，他坠入了音乐界的最底层，再也无法从这个泥潭里爬上来。

然而，这地位上的一落千丈却对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挑起了大众艺术的担子；他只知道自己的生活十分悲惨，美好的日子已经永远消逝。然而，他又以一种深刻的本能感觉到他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他的脑子里成天想着那个让他写安魂曲的高个子陌生人，他固执地拒绝了所有到维也纳以外的地方去工作的聘请。假如他投奔了柏林的弗莱，德里克·威廉，假如他跟着那个朋友去了伦敦，或者更糟一些——假如他得到了任何一个爸爸要给争取的舒适职位，他就再也不会向漆黑的未来迈出这最后的一步，也无从进入不朽的境界了。《魔笛》会因此而失去为歌剧领域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的机会，那首超凡脱俗的《安魂曲》也就不可能诞生了。不过，由于他的生活条件非常悲惨，这种对生活的新感受也就对思想和感情产生很大的压力，因而不可能避免地会带来死的念头。他已经进入了那种超脱于生死之上、于生存中思虑死的含义的奇异境界，那是只有真正的伟大才能达到的境界。可以肯定，利奥波德当初在钢琴边指导他的幼儿时绝对不会想要把他培养成这样一个人的。

莫扎特十分担心观众会对《魔笛》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自己明白，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优秀作品，但他早已有有了经验，懂得不能轻信浅薄的维也纳观众。第一幕演完了，观众沉默着，无动于衷。他心里一阵惊慌，急匆匆地从布景后面跑过去找席卡奈德尔。

“等一等，”席卡奈德尔说，“沉住气。我知道这局棋该怎么下，给他们一点儿时间。”

他说对了。这部歌剧完全新颖的形式使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一时根本无法作出反应。从第二幕起便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首场公演虽没有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席卡奈德尔懂得，这种歌剧必须让人们多接触才行，因此他安排了十天的连续上演。不久，它就开始引起了反响；还没到几个星期，这部歌剧便成了人们竞相观看的热门戏，上流社会人士也

在透过夹鼻眼镜注目而视了。领着客人去那家古怪的小剧院欣赏一番那新奇而令人惊讶的音乐竟成了城里消遣的新花样。住在维也纳的音乐家也都去听过了。然而，最叫莫扎特高兴、最使他感动的还是萨里埃利的称赞，他只是谈到这部德国歌剧时才第一次对莫扎特说了几句褒奖的话。

莫扎特这时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他仍然常常晕倒，有时还有剧烈的头痛；他的脸色越来越白，神经也越来越紧张；眼睛变得暗淡无光，老是奇怪地盯住什么东西出神。要《安魂曲》的那个灰衣陌生人没有再出现过，但莫扎特依然焦灼不安地记着自己的诺言。《魔笛》刚一完成，他就动手写安魂曲了。一个朋友正在去伦敦的途中，他写信给莫扎特，再一次恳求他同去。莫扎特神情恍惚地看完了这封信。英国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就连这个朋友也像一个隐隐绰绰、似曾相识的人物。“我真想按你的意见办，可我怎么能够办得到呢？我感到头晕目眩，连作曲都有困难。我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陌生人的影子。他总在我眼前晃悠；他恳求我、逼迫我、不耐烦地催我把他的活儿干完。我不停地写着，因为闲下来比工作更难受。除了这些，我就一无所虑了。我现在受到的痛苦使我明白：我的时辰已活到了，我站在死亡的门槛上。我还没享受到自己才华结出的硕果就走到了尽头。过去，生活的确是那样美好，我的音乐生涯开始时也是那样的顺利，然而，人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活多久。人必须听天由命，让上帝去安排一切吧。我得停笔了。眼前摆着我的死亡之歌，我必须把它写完。”

莫扎特再也没有做过这么清楚的自我表露。他显然以为他前不久已经把那个陌生人的事情告诉过这位朋友了。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集中到这几个细小而可怕的问题上了：那个陌生人，生活中的痛苦；死亡之歌；死。

康斯坦莎无论如何也应该知道这一切，然而，《魔笛》首次上演一结束，她又回巴登去了，把孩子们扔在别人家寄养。此时她正在巴登。她的病已痊愈——只是还有一点儿不舒服。她似乎据本没想到，以前从不需要别人照顾的莫扎特现在很可能需要一些照顾，需要吃点儿富有营养的好食品，需要爱人作伴，还需要安静。这一切他都没有得到。他呕尽了最后一份心血，天天谱写安魂曲。他有什么就凑合着吃什么，他抽时间消遣一下，可刚玩一会儿就倦怠了，再就是不断给她写信。莫扎特一生热爱友谊，渴望得到友谊和纯朴的柔情，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却是在空无一人的家里孤零零地度过的，照顾他的只有一位店老板和一个笨手笨脚的仆人。

如果说莫扎特把自己的真实情况都瞒着康施坦莎，那么别人还是告诉她了。霍费尔常来看莫扎特，回去以后，他告诉康施坦莎，说莫扎特病了，孤苦伶仃的，十分可怜。于是康施坦莎在11月底回到家里。为此莫扎特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更令人感到他处境的可怜。他那苍白的小脸瘦得不成样子，大脑袋上的骨头都明显地突了出来——尤其是那深陷的眼眶和长鼻子。看见他瘦成这个样子，她吓了一跳。然而，更使她焦心的还是他说的话。他不断提到死后怎么样、死的时候又怎么样；他一阵阵地现出绝望的样子，任凭泪水淌下面颊——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天气仍然十分美好，康施坦莎雇来一辆马车，把他拉到郊外公园兜风。那里秋高气爽，从多瑙河上飘来的新鲜空气格外温馨、纯净。他们下了马车，坐在草地上。莫扎特想起了上一次到郊外公园来的情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正值秋天，他把樱花花编成结，塞进她胸脯里，吻着她；他们互相拥抱着躺在地上，嚤嚤地悄语着他们心爱的私房话。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天——那时她是多么可爱、多么温柔！

那正好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那个孩子死了。

突然，莫扎特抽泣起来。他蜷曲着身子，双臂交叉，把头埋在里面。康施坦莎一惊，扭头望着他。

“沃尔费，亲爱的，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他呐呐地说。“我只是疲倦极了，伤心极了。”他抬起泪痕满面的脸，注视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康施坦莎不愿看到的神色。她想把头扭开。但莫扎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不能再动了。

“沃尔夫冈，”她缓缓地说，“你在想什么？”

他的眼神变温柔了，拿起了她的手。

“亲爱的小施坦齐——玛丽妮，”他轻声地说道，“我在考虑死。”康施坦莎浑身一震。“你知道，我现在是每时每刻都在考虑死。这就是我必须写完我的安魂曲的原因。”他把脸颊贴到她的手上，抬起眼睛望着她。“我是在为自己写这首曲子，亲爱的。难道你还不明白么？”

康施坦莎吓坏了。莫扎特显得那么平静。他谈到死时好像是在谈一件早已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她把他搂在怀里，使劲抱紧他。

“不、不，沃尔费，”她哽住了。“别说这些可怕的事情……别说了……”

“这些事情并不可怕，亲爱的施坦齐。它们美妙极了。死亡是非常美丽的。我不是说过，我觉得死亡才是生活的真正目标吗？”

她又摇了摇头：“我求求你，沃尔费，求求你……”

“别伤心，亲爱的，”他说。“它的确很美丽，真的，几乎是尽善尽美了。可还有其他的一些事——那些事……”他的声调变了。康施坦莎飞快地瞟了他一眼。他那扭歪的脸突然变得冷漠、严峻起来。他在茫然直视。她怯生生地碰了碰他的胳膊。他回头看着她。他的眼神变了。那双眼睛似乎变大了。看见他这么紧紧地盯着自己，康施坦莎不禁倒退了一步。她瞥见了某种可怕的神色。

“康施坦莎，”他用紧张的口气低声说，“我的心头压着一件事。这件事我已经感觉到很长时间了。”她的下巴颤抖起来，但她仍然望着他。他向前凑了凑。“康施坦莎，有人给我下了毒。”

“不、不、不”她硬咽起来。

“是的，”莫扎特肯定地说。他的眼眶又充满了泪水。

“肯定有人给我下了毒，”他说。“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

康施坦莎想说些什么。她张开嘴，蠕动了下嘴唇。可她怎么也说不出口“谁”这个字来。

莫扎特明白了。“别管是谁，”他摇了摇头说，“我不会讲出来的。”那奇怪的神色又回到了他暗淡的眼珠里。

当然，这只是一个痛苦的幻觉。没有人给莫扎特下过毒，这个幻觉是他那极度烦躁的大脑在陷于绝望的时候臆造出来的。他在心底猜想下毒人是萨里埃利。当这个可怕的猜测传到萨里埃利的耳朵里时，那个可怜的意大利人吓坏了。从那以后，这个念头始终缠绕着萨里埃利，一直到他老朽无用、奄奄一息时，他还是无法摆脱这个想法。他临死时望着一个朋友，可怜巴巴地说：“我可没有给莫扎特下过毒啊。”莫扎特还活着的时候，萨里埃利用了多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真实的、诚挚的（尽管有些为时过晚）敬慕之情。他必须这样做——有一些人说不定真的相信了传闻。

康施坦莎终于认识到，折磨着莫扎特的决不限于一般的身体不适。她请

来了综合医院的医生克洛塞特。医生对他进行了一番检查后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必须把《安魂曲》(K·626)的乐稿从他身边拿走。莫扎特答应了。他疲倦不堪，身体虚弱，在作曲时都很难支持得住，干别的事就更没力气了。他的共洛会弟兄们正在过音乐节。他和席卡奈德尔一起为他们写了一首大合唱，在11月中旬进行了演出，受到听众狂热的欢迎。几个星期来，康施坦莎第一次看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他的心情很好，甚至显得有些淘气。他央求她把《安魂曲》还给他。康施坦莎看什么事情都是只看表面现象，从不多想。她觉得莫扎特好多了！她把还没完成的那份乐谱还给了他。

然而，这首安魂曲注定是写不完的。但莫扎特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这种可能性。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而且相信它即将来临。为了写他的死亡之歌，他以无比的激情争分夺秒，倾下了最大的赌注——他生命尽头的最后时刻。他失败了，但他年轻的学生居斯迈尔忠心耿耿地尽力设法弥补了这个缺陷。沃尔夫冈缓慢地、终日不辍地写着《安魂曲》，把脑子里的全部深邃思想都溶进了他笔下的每一个音符里。

对于这首安魂曲，讨论分析者有之，拆散整理者有之，撰文批评者有之，妄加注释者更其有之。其原因何在？就因为它是—首人类永恒的史诗。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使他的亲属产生痛不欲生的念头，但这首安魂曲却给死者亡灵带来了无比的安慰，竟使死亡升华到了一个比生存更高的境界。有生必有死，这是世间的普遍现象。因而这首安魂曲也就有了普遍的意义。它是超脱了空间的限制而与我们同在的一种东西。它没有须臾的始终，除非我们说它随着那个羸弱的婴儿在萨尔茨堡的第一声啼哭而诞生，伴着那个疲惫的音乐家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声长叹而结束。即便如此，它也决不只局限于35年短暂的时间。它上溯到生活体验的起源，下至触及现实问题的本质。

要理解《安魂曲》，就应当明白，这首乐曲以结尾时明朗、欢快的空心弦表明：莫扎特这位决不愿在朋友面前垂头丧气的音乐家是带着欢乐的心情结束了他那备尝艰辛的一生的。

11月21日下午，天色昏灰，寒气逼人。莫扎特漫无目标地踱进了“银蛇”咖啡馆。他焦躁不安地扫视了一眼宽敞的主厅，看见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不禁厌恶地耸了耸肩。他挤过人群，来到后边的房间里，挑了一个角落，疲惫不堪地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他在桌上伸开了右臂，把隐隐作痛的脑袋靠在上面。大理石桌面冰凉冰凉的——谢天谢地。到了这个地步，即使他刚刚收到匈牙利、荷兰的崇拜者们寄来的报酬丰厚的聘请书，那又有什么用呢？他就这样坐了很久，半闭着眼睛，瘦小的肩膀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地随着呼吸起伏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向侍者打了个手势。

“给我拿点儿白葡萄酒来。”他冷冷地说。

那个侍者认识他，听见他要葡萄酒，不禁有些惊讶。乐队指挥莫扎特在下午一般都是喝啤酒的。那侍者放下葡萄酒，擦了擦酒杯，叮叮当地挎上几个调羹，转身走开了。莫扎特坐在那里，呆呆地凝视着酒瓶子。他觉得它好像是画在桌子上似的。他没有碰它。约瑟夫·戴纳出现在他的身旁。在这愁肠百结的一年里，这个好心的老板一直对他十分关怀。他望着莫扎特，慢慢地摇了摇头，噘起了嘴唇。那张瘦小的脸盘比一个星期以前更削瘦了，在平日苍白的神色之外，又添上了几分阴郁、憔悴的样子。而且，两边的颧骨上都浮现出一块明显的红晕——也许是午后的阳光照的？他那浓密的金发

(戴纳知道莫扎特是很以此为自豪的)蓬乱地缠成了一堆,随随便便地扑了一些粉,系了一半的辫结松散地垂着。他的辫子乱得很——显然有好几天没编过了,莫扎特抬起头,看着戴纳。

“嗯,你今天怎么样?”他问。

“我觉得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戴纳说,“你看上去像得了大病一样,乐队指挥先生!你9月份去的那一趟布拉格——你知道,我觉得那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那儿的空气你不习惯。”

莫扎特烦躁地蠕动着。这个忠厚的好人在惹他心烦了;可是,他见了谁不烦呢?

戴纳继续说着。“我看见你在喝葡萄酒了。这样好。你在布拉格喝的肯定是啤酒。那对胃不好,吾……伤胃的。”

莫扎特从椅子上扭过头,温和地笑了笑。

“我的胃比你想象的要好,约瑟夫。我很小时就教会了它消化一切食物。”他叹了一口气。

“哦,那是件大好事,”戴纳说,“所有的病都是从胃里开始的,洛顿元帅(奥地利陆军元帅)说是——”

莫扎特突然感到一阵难受。他抿紫了嘴唇,抓住桌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约瑟夫,”他说,“我——我觉得浑身发冷……真怪。我要回家了。把我的酒喝了吧。拿着这17个盾,明天上午到我家来帮个忙。冬天已经到了,我们需要木柴。我妻子会买的……我现在就叫人生火。”

他巡给侍者一个铜币,走了出去。他跌跌撞撞地走完卡思特纳大街,穿过斯蒂芬广场。等走到劳亨斯坦巷时,他连那一层楼梯都走不上去了。哦,上帝呀。哦,上帝呀!——

索菲·海布尔正好和康施坦莎在家,她俩急忙把他扶到床上。他呕吐了,浑身直打抖,两颊烧得发烫。他仰面躺着,双手紧紧抓住床垫的两边,只觉得天旋地转。那天晚上,康施坦莎帮他翻身,突然发现他的小手奇怪地变了样子,她问他疼不疼。不疼,可是——她看了看他的双脚——和双手一样肿。康施坦莎叫醒了女仆莉泽尔,让她赶快跑去请克劳塞特大夫。

第二天上午,戴纳来了,想问问莫扎特要什么东西。康施坦莎把他领进卧室。莫扎特身上盖着白床单,平躺着。他无力地睁开眼睛,但被刺眼的灯光一照,他又难受得把眼使劲一闭。不过他还是努力对约瑟夫笑了一笑。

“今天不行了,约瑟夫,”他轻轻地说。“今天我们得跟医生和药剂师们打交道了。”……(“还有死亡,”他安详地对自己喃喃地说道。他心里非常清楚。)

下午,朋友们开始来看他。莫扎特病倒了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席卡奈德尔剧院里的人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每天下午都来陪伴莫扎特。他现在只对音乐还有兴趣,别的什么都不想说。居斯迈尔在床边放了一把椅子,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莫扎特心里十分感激他,他病得不能写了,但他还能指导“居斯迈”写总谱,教他管弦乐法。床上到处都摊着《安魂曲》的乐谱。每天下午陪伴的人来了以后,他们四个人(通常是沙克、霍费尔、格尔和莫扎特自己)就一起演唱已经基本写完的部分,居斯迈尔在早已搬进了卧室的钢琴上弹伴奏。

莫扎特几年前得的一次病影响了他的肾功能,现在肾疼得非常厉害。他

的手和脚越肿越粗。11月28日，克劳塞特请扎拉巴大夫来一起会诊，但这些症状使他们迷惑不解，因此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莫扎特在床上动了一下，翻个身都疼痛，索菲和她妈妈只好“给他做了几件不用翻身就能穿上的睡衣，还找了一块布垫在他身下，这样不用费多大劲就可以把他朝上拖一拖了。她们没料到他的病会那么重，还为他做了一件垫棉花的晨衣，准备等他能坐起来时穿。衣服料子全是他那温柔的妻子给的。他看着她们一点一点地把衣服缝起来，觉得非常有趣。

每天，剧院的人一来，莫扎特就硬要他们讲头一天晚上演出的全部细节，到了晚上，他就把表放在枕头边，想象着《魔笛》的演出情况。“现在，第一幕完了。”“伟大的夜女王现在出场。”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他还想唱《我就是捕鸟人》。前来看望的人中有一个叫罗泽尔的走到钢琴旁边，为他弹了这首歌。莫扎特竭力想伸出手来。

“啊，谢谢你，”他说，“太谢谢你了，罗泽尔先生！”

康施坦莎的身体也垮了下来，医生在给她治疗。要不是她妹妹索菲每天都来帮助看护，她真是一筹莫展了。索菲还照顾着家务。莫扎特最后几年里交上的朴实的朋友们都围坐在他的身旁，他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望着他们，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叫康施坦莎的次数不多。卧床一个星期以后，他的病情变得非常严重，实际上是部分瘫痪了。晚上他往往痛得非常厉害。白天一整天他都很平静、安详，很少说话，最多只谈谈音乐，或者安慰安慰替他担心的人。他的眼睛里那种狂烈的神色已经隐去，他那疲倦的大脑里的紧张状态也消失了。他很快就要去见他的朋友了，对此他的心里十分满足。

12月4日，星期日。下午，他要人把他用枕头支着坐起来，示意朋友们围坐在他的床边。他把《洒泪经》递给他们，让他们唱。还像平时一样，他自己唱男声最高音，沙克唱女高音，霍费尔唱男高音，格尔唱男低音。居斯迈尔钢琴伴奏。他们唱了起来，声音很轻，因为莫扎特已经非常虚弱，只能唱得刚好让别人听得见。小调旋律渐渐地升到了高潮，他那平静的表情和下垂的眼睛突然一变，换上了明显的痛苦神色。啊，他实际上还年轻，不能那么轻易地死去！还有多少事没做完，还有多少事等着做哪！他苍白的脸痛苦地扭曲着。两只浮肿、柔软的小手松开了捏着的乐谱——莫扎特的眼泪夺眶而出。刷刷地往下流。

过了一会儿，他激动的情绪慢慢平息了。将近傍晚时，索菲照常来看望他。吓得手足无措的康施坦莎跑到门口去迎接索菲。

“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她说。“他昨晚病情非常危险，我都以为他可能活不过今天了。要是再来那么一次，他肯定会死在今天晚上的。”索菲克制住内心的恐惧，轻轻地走到莫扎特身边。她碰了碰他的手。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声音微弱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今晚陪着我吧，看着我死。”索菲颤抖起来，差一点流下了眼泪。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安慰着他：亲爱的莫扎特，你会好的。

他用极为细小的声音平静地回答道：“死亡的味道已经在我的舌尖上了——我在品尝死亡；如果你不来陪我亲爱的康施坦莎，还有谁会来帮助她呢？”

索菲看他静静地躺着，就悄悄地离开了。她急忙赶回家告诉凯西利亚·韦贝尔。她出门时，快急疯了康施坦莎追着她跑了几步，叫她“看在上帝的份上，在圣·彼得堡教堂停一停，去请一位牧师来。”莫扎特在最后几年中

对他的宗教义务不太认真，因此也没有个固定的忏悔牧师。索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了一位牧师，让他答应来一趟。她回到莫扎特身边时，看见他正在和居斯迈尔小声说话，《安魂曲》的乐稿又摊在了床上。莫扎特睁开模糊的双眼，注视着乐谱。“难道我没有说过，我是在为自己写《安魂曲》吗？他声音微弱地问。

他没留下什么请求或遗言，只是让康施坦莎暂时不要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别人，直到通知了阿尔布雷希兹贝格（斯蒂芬教堂里可以接替他的职务的副手）以后为止。康施坦莎在绝望中派人去请克劳塞特大夫，但他去剧院了，直到很晚才来，他看了看莫扎特，把居斯迈尔叫到一个角落里，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让人给他的头上做冷敷。凉布敷了上去，莫扎特立刻浑身发起抖来。没过一会儿，他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偶尔发出一声谵妄的尖叫。人们看见他举起了双手，仿佛握着什么东西，还鼓起了腮帮子——他想吹出《审判经》里的小号声来。

康施坦莎、索菲、居斯迈尔——三个人跪在床边，各自反复念诵着为弥留者祝福的祷告词。深夜 12 点左右，莫扎特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漆黑的昏迷状态中，他最后一次睁大了两只模模糊糊的灰色眼睛。片刻，他那佝偻的瘦小身躯倒在了床上。他把脸扭向了墙。

凌晨一点，莫扎特与世长辞了。

他的葬礼在斯蒂芬教堂草草举行，冷清得很可怜；威势赫赫的凡·斯维登男爵从他的豪华社会回到贫穷的圈子里，但他安排的却是一次三等（贫民式）葬礼，只花了 11 个弗罗林又 26 个克鲁策，还是康施坦莎付的；聚在教堂听神父给死者祝福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居斯迈尔、斯维登和萨里埃利；然后，他们缩在雨伞下前往墓地，可刚走了一半就受不了凄风苦雨的袭击而四散离去了；廉价的薄片棺材受着肆虐的雨点和雪粒的恣意抽打，那个孤零零的掘墓老人把它放进了马尔克策坟地的贫民墓坑；他知道，这口棺材里装的东西和这里其他毫无生气、毫无用处的黄土坯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的音乐是永存的！

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眼睛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之死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自幼从父学音乐。以教学、演出及创作为生。1798年起听觉渐衰，1820年后两耳失聪，但仍坚持创作。毕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少作品反映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及其理想中的英雄性格。他的创作成就，对近代西洋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主要作品有交响曲9部（以第三[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第九[合唱]最为著名）。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拉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后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对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残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做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羽管键琴前面（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结构大致与钢琴同——编者注），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讨厌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争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当大风琴手。1787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此病魔更残酷的忧郁。17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

1792年11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此系指法国大革命后奥国为援助法国王室所发动之战争），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维也纳去。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国与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然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发展。

1796年，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25岁！不是已经临列了吗？……就在这一年年上，整个人应当显示出来了。”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后便永远不再退隐。1796年至1800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益作响，他内脏也受到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疾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作品里有所表现。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上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医生说他从没见过

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请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和密友兴特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地倾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以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都尔第，为她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27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1802）而知名于世的。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11月，她嫁了伽仑堡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有这一次，似乎到了颠簸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多活了25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再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化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嗯！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那多美妙！”显然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挡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1806年5月，他和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订了婚。她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初期，和她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上他的。1806年，他们在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作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

这一年贝多芬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调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们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塞弗烈特和葛里巴扎（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他耳聋。他们说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勒曼替他画的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谛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然的愤怒。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地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还爱着贝多芬。

爱情把他遗忘了。1810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此时贝多芬四十多岁）。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上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特发里亚王奚洛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1809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尔夫太子、洛勃高维兹亲王、凯斯基亲王，答应送他4000弗洛冷（奥国银币名，每单位约合先令半）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转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败坏了，时尚所趋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1816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关于1822年费德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记述可寻。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下，无疑是干不下去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忽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后，他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

表情。晚饭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意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 11 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一幕的印象。”

两年以后，1824 年 5 月 7 日，他指挥着《合唱交响曲》时，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把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塞尔，1825 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安慰。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1818 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作品第 106 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斯普尔（当时德国的提琴家兼作曲家）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 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 7 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 3 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 30 至 40 杜加。伽列青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 127、130、132 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殆尽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 1815 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中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然后，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儿，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基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像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怕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法，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 1826 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不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事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卡尔痊愈了，他自使至终使伯父受苦，而这对于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时，他竟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之为“儿子”的人。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振撼了一刹那。这都城当时完全是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曲》。象 1809 年一样，

几个高贵的朋友又要求他不要离开祖国。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因此他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坠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

史比勒医生于1826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4个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130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希尔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1826年11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我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3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1827年1月3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该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美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1827年2月17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场”，——我们都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精神病院——音乐家的归宿

——德国音乐家舒曼之死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书商之子。从青年时代起，即受到以海涅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和以霍夫曼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1834年创办《音乐新报》，对当时保守的学院派和庸俗的市侩艺术加以抨击，宣传“用艺术的理想来代替现实的理想。”1840年主要从事歌曲创作；所作200多首歌曲大多成于这一年。其它重要作品有《春》、《莱茵河》等交响曲4部，为拜伦诗剧《曼弗雷德》所作的序曲和插曲，《A小调钢琴协奏曲》等。

1850年夏天，40岁的音乐家舒曼异常兴奋，他收到了一个聘请书，聘请他担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城的管弦乐队的指挥职务。这对于一个有5个孩子家庭的困窘状况来说，无疑是个大喜讯。在此以前，舒曼在德国另一个城市德累斯顿栖息了5年，在这5年里，他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但是这个城市对舒曼的态度并不友好。舒曼一直站在以官庭为中心的德累斯顿的音乐生活之外，他梦寐以求的剧院指挥职务，在瓦格纳离职后，也被另一个人接替了，正在他意志消沉之时，杜塞尔多夫城的聘书到了。

杜塞尔多夫城是莱茵河流域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莱茵河和南德的优美风景一向是舒曼所向往的。久远的青年时代和无忧无虑

的快乐的海德尔堡学生生活的回忆都重新涌上来……市乐队指挥的职务带来了稳固的地位和生活的保障。在接受了聘请以后，舒曼和妻子克拉拉怀着最乐观的希望开始准备起程。罗伯特·舒曼的离去，在德累斯顿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是市参议会或是行政当局都没有采取行动来挽留这位作曲家。

在杜塞尔多夫，舒曼生平第一次担任一个卓越的管弦乐队和合唱队的领导。在他写作这么多交响乐的时候，目前这次工作对他特别显得重要。

在这几年内，舒曼的健康大大地衰颓了下来。神经错乱和忧郁症的发作使他很久不能工作。他惯常的沉默和孤僻与年俱增，而且大大妨碍他执行指挥的职务。

不久以后，在乐队队员和合唱队员中产生了不满情绪，舒曼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演奏的乐师；他不能使乐师们听命于他，同时他也不能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似乎不注意到演奏上的错误和音不准的地方，当他要求乐队重复某些片断的时候，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喜欢和不喜欢什么。有时候在练习中途，他陷入深远的冥想中，这时他对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是机械地击着拍子，渐渐地乐队丧失了自己原有的演奏能力和信心；合唱队员常常荒疏练习，漫不经心地工作，在音乐会上也常常唱得不入调和弄错节奏。

在最初的一些预约音乐会之后，杜塞尔多夫的人们才懂得：原来有才能的作曲家并不常常是卓越的指挥。音乐会的演出一次不如一次。听众的不满殃及到克拉拉身上，人们对她的演出非常冷淡。她感到气愤。她深深地爱着罗伯特，竟不愿看见他的缺点。

情况更加严重了，在听众的压力下、行政当局建议舒曼单指挥自己的作

品，而其余的音乐会则让给那位受人欢迎的杜塞尔多夫乐队指挥屠什来指挥。舒曼很生气，因此完全拒绝了指挥工作。在这个城里，由于人们非常尊敬和器重作为一个作曲家的舒曼，所以大家都不愿与他公开决裂，人们向他建议不要废除合同，由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指挥音乐会，把屠什看作是代理的副手。舒曼和克拉拉被这些事情搅得很不愉快，于是他们便在夏天离开那里出外旅行。

舒曼周围的人认为他在指挥方面的缺点是：动作迟缓、演奏时喜欢大大减慢速度、心不在焉、辞不达意，——而这些缺点中有许多是大病将临前的征兆。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时候，舒曼一连好几天到处听见低音区的A音。在神经错乱的时候，一切事情都要惹他生气：无论克拉拉在音乐会中弹得多么好，他总表示不满意。克拉拉哭了，完全不晓得怎么办。如果她自己觉得弹得很好，那末这时丈夫的责难特别使她痛苦……

尽管健康情形很坏，但舒曼的创作欲并未减退。相反地，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即将来临，因而鼓起最后的力量，创作出许多新而又新的作品。在杜塞尔多夫，他写了一首规模宏大的交响曲、五首序曲、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几首规模宏大的给独唱家、合唱队与乐队演唱的乐曲和许多室内的声乐曲与器乐曲。他所写的这些作品并非全部都达到从前那种水平，但有时，他也创作了一些艺术规模极其惊人的东西，譬如他的优美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河》。

1853年夏天，舒曼的情况稍稍好转。他们结婚十四周年的纪念庆祝得很动人，舒曼瞒着妻子买了一架赫尔杰尔厂的豪华大钢琴，并且把它搬进她的房里去。克拉拉从郊外快快活活地散步回来，刚打开房门，就有人用四重唱来欢迎她，这首四重唱的歌词还是十三年前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时舒曼所写的那一首！在装饰着鲜花的钢琴上，放着舒曼献给她的作品——《钢琴协奏曲》的快板乐章、新写的小提琴幻想曲和根据歌德的《浮士德》而写的序曲。

秋天，那位已经成为舒曼一家人的密友的小提琴家约希姆给他们介绍了青年作曲家勃拉姆斯。根据自己的批评的敏感性，舒曼在这个青年的身上正确地看到了很高的天资。从前他曾经撰文讲到年轻的肖邦：“请脱帽，朋友们，在我们面前是一位天才！”现在，在多年搁笔之后，他重新提起笔来庆贺一位伟大天才的出现。他为勃拉姆斯所写的文章叫做《新的道路》。这是舒曼的最后一篇文章，刊登在《新音乐报》上。

1854年2月，舒曼开始病了——听觉器官发生了错觉；有时候一个延续音又像从前一样成天成夜缠着他，有时候他又好像听到整整的几句旋律；一切外在的噪音都变成了用罕有的乐器演奏出来的美妙的音乐。有一天半夜里，他从床上起来，索取纸张来记录了一个音乐主题，说这个主题是舒伯特口授给他的。后来他根据这主题写了些变奏曲。有时梦幻逼得他哼叫不已和辗转不安。他已经不能理解周围的一切。在有一次清醒的时候，舒曼开始收拾东西，同时请求把他送进病院去。

“在那里我可以好得快些”，他对悲伤万分的妻子说。

伟大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年纪还很轻（不到44岁）便已丧失了理性。他很久以来就怕这个，而且意识到自己可怕的病况。这种意识折磨得他无法忍受。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穿着一件单衣和一双便鞋，悄悄地从家里溜出去，然后从桥上跳到莱茵河里。及时赶到的渔夫救起了这个可怜的人，还把他送回家去，他那样子很可怕。医生建议把病人送到波恩附近的安德尼赫的

精神病院去。舒曼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安静地听任人家把他扶进马车。孩子们和克拉拉他都不记得了。

克拉拉度着苦闷的白昼和通宵失眠的长夜。她一连好几小时地逗留在舒曼的工作室内，翻阅着他的手稿；并且每天在桌子上放些鲜花，因为舒曼喜欢花。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她的两位青年朋友——作曲家勃拉姆斯和小提琴家约希姆满怀热忱地分担着她的痛苦。他们常常来探望她。当克拉拉从最初的激动中稍许平静一点时，他们便一起合奏舒曼的作品——小提琴奏鸣曲、三重奏、四重奏等。克拉拉开始教授学生，因为家庭必须有人来赡养。工作缓和了她的心情，同时也转移了她的忧郁的思想。

舒曼生病的消息传遍了全德国。可惜，当他的音乐终于开始获得普遍赞赏的时候，他刚好患病了。克拉拉到处受到非常殷勤的招待。人们都尊敬这位刚毅地与不幸作斗争的青年女子，勃拉姆斯和约希姆有时陪伴她去旅行，而且与她一起举行联合音乐会。

1856年夏天克拉拉回到杜塞尔多夫后，得到病人情况恶化的消息。她急忙赶到他那里去。医生允许他们见面。罗伯特认出了自己心爱的克拉拉，开始和她谈话，但是不久便感到疲劳。而且陷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中。第二天，1856年7月29日，罗伯特·舒曼便逝世了。

许多朋友和崇拜者把伟大的德国作曲家舒曼的灵柩送到波恩的墓地上。

克拉拉·舒曼在丈夫去世后虽然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和几个小孩子，但她仍然光荣地完成了母亲的职责，给所有的孩子受教育。并且把自己的音乐会活动贡献给罗伯特·舒曼，作为对他的作品的宣传。

艺术大师的最后三天

——徐悲鸿之死

徐悲鸿（1895—1953），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少时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抗日战争期间，屡以己作品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祖国难民；并参加民主运动。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所画花鸟、风景、走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驰誉中外。北京有“画家徐悲鸿纪念馆。”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徐悲鸿从早至晚参加会议。在第一天下午的会议上，周总理像往常一样，迈着刚健的步履，目光敏锐，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讲台，会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徐悲鸿一直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中间休息时，他陪伴周总理到休息室。周总理担心徐悲鸿身体不好，劝他不必听完，可以先退席回去休息。但徐悲鸿怎能舍弃这样精辟动人的报告呢？而且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自己有密切的联系。当时，周总理还不知道徐悲鸿是从早晨就一直参加大会的。

会后，徐悲鸿又赴国际俱乐部参加欢宴波兰代表团的晚会。在宴会中，他突然感到不适，一位女干部走过来，扶他走到休息室里，躺在沙发上。

285

又是脑溢血！

他的左半边肢体瘫痪了！

急救站的两位大夫赶来了。田汉、洪深等许多同志也都来到他身边。

当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正在家中等待徐悲鸿回来。这是中秋节的前夕，她忙着准备和徐悲鸿一起过节的饭菜。忽然，她得到徐悲鸿患病的通知，慌忙赶去。只见徐悲鸿面色苍白，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他深情地望着廖静文，问：

“孩子们为什么没有来？”

同时，用右手示意，要廖静文拿笔来，他要写下遗嘱。但是，当时在场的医生却说，他的脉搏和呼吸都正常，认为没有太大的危险，还是让他安静为好，以免加重病情。因此，廖静文又将拿起的笔放下了。

紧接着，北京医院来了急救车。大家将他抬上车，还没有来得及等廖静文上车，急救车就关上了门，飞驰而去。

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同志便用他的车送廖静文到北京医院，但医生却阻拦他们进病房。廖静文心急如焚。等了约半小时，终于不顾胆拦，冲进了病房。这时，一位外国专家正在给他检查身体，叫他张口，同时用一块压舌板伸进口中，大概是检查嗓子红肿了没有。徐悲鸿突然感到恶心，见廖静文进来，急忙叫她给拿个盆，他便俯身呕吐起来。显然，病情继续恶化了。

“医生，他不是别的病，是脑溢血。请您赶快采取抢救措施吧！”廖静文声音发抖地恳求说。

这位从未给徐悲鸿看过病的外国专家是被医院临时从西郊的友谊宾馆接来的。自徐悲鸿送进医院后，医院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接来的这位外国

专家对徐悲鸿的病史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检查。这时，他不仅未重视廖静文的话，反而产生了反感，不耐烦地说：

“治病是我的事，你不必管。”

眼看着徐悲鸿的生命垂危，廖静文的全身猛烈地颤抖起来，感到烧灼一般的痛苦。

徐悲鸿的呼吸急促，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不多时，就陷入了昏迷状态。

医生终于开始了抢救，从手臂上放血，用冰袋放在头部，注射强心针……

但是，得救的希望已经很微小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廖静文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痛苦地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整整两天三夜，廖静文守在徐悲鸿的床侧。他一直睁开眼睛，在痛苦地挣扎，但眼珠是呆滞的，他已听不见夫人的呼唤声。

9月26日清晨2时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廖静文痉挛地扑过去，紧紧抱住他那还未冷却的遗体，失声痛哭起来。

她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她不能没有他！他们曾一同走过那么艰难、痛苦的道路，他们的家庭需要他！许多工作需要他！他怎么能死呵？

人们拥上来，对廖静文说着温存的话。是谁将她的身子、她的胳膊、她的手从徐悲鸿身上拉开了。她声嘶力竭地呼喊，向苍天向大地呼喊，她要索回徐悲鸿，决不能让他走进死亡的大门……

徐悲鸿的长子伯阳从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赶回来了。而可怜的丽丽却因正在医院生产第二个孩子，家里将她父亲去世的消息瞒着，怕她受刺激，她就这样不幸地失去了和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廖静文含泪拖着艰难而沉重的脚步，如同走向自己的坟墓似的，一步一步走向太平间。徐悲鸿静静地躺在那里，像在默默地等待她。他的脸色惨白，太阳的光影轻轻地在他脸上颤动，他好像又复活了。他那双深澈而好看的眼睛依旧张开着，仿佛仍在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串一串绞心的泪水，从廖静文的眼中滴到徐悲鸿的脸上和身上。

她开始最后一次替他换衣服。哆哆嗦嗦的手指解开他身上的灰色斜纹布上衣，她想替他换上一件干净的贴身背心。这是她亲手替他缝制的一种特别的棉布背心。因为他长期患肠痉挛症，廖静文担心他受凉犯病，腹部是用双层棉布缝上的。但是，他那一向灵活的手臂僵硬了，背心套不上去，廖静文哭着对徐悲鸿说：

“亲爱的悲鸿，你让我替你穿上这件背心吧！不然，我不会放心的，离开了我，有谁替你换衣服呢？”

但是，他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她，什么也不说。

廖静文流着泪，将这件背心盖在他的腹部。

然后，她替徐悲鸿穿上了刚才买来的一身新的灰色斜纹布中山装和一双新皮鞋。这是徐悲鸿来到北京以后，第一次穿新皮鞋。

一个对自己永远这样严格和节俭的人，他曾经慷慨地帮助了许多人，为国家创造过巨大的财富，临死之前，他身上穿的只是一套洗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和一双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周恩来总理和周扬同志来了。他们的面容异常沉痛，久久地站在徐悲鸿的遗体旁注视着。

几位画家在默默地描绘悲鸿的遗容，雕塑技术工人吉文升提着石膏和工具，站在一旁，准备从悲鸿头上翻制面模。

周总理低声问他：“你有没有把握翻好？”

吉文升肯定地回答：“有！”

周总理又亲切地嘱咐他小心仔细。然后，他极其沉重地说：

“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至晚开会？以后决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的声音发着微颤，既沉痛，又严峻。他缓慢地转过身来，嘱咐身边的周扬同志，要他守候悲鸿的遗体入殓。

接受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的要求，徐悲鸿的遗体被送至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停放。全院的师生、职工日夜轮流守灵，许多人在流泪、痛哭。

许多领导同志和来自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代表们来到灵前悼念，并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职工们一起，护送他的遗体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他离去的地方，水面浮着花瓣

——《义勇军进行曲》作者、音乐家聂耳之死

聂耳（1912—1935），现代中国作曲家。自幼爱好音乐，能演奏多种乐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工作，从事创作及艺术评论活动。1935年取道日本赴苏联。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作品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毕业歌》、《大路歌》等30余首，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除歌曲外，还作有《金蛇狂舞》等民族乐队改编四首。

日本相模湾内的鹄沼海滨，面对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背靠千年积雪的富士山，迷人得很。从藤泽市或其它地方涌来的人们踩着车辙、压着野花，嘻嘻哈哈奔向细软白净的沙滩。黎明前刚刚洒过一场小雨，空气特别清新，滨田先生檐前的松柏翠得耀眼。午睡都不愿睡了，聂耳放下手中的小提琴，挥动手臂，鼓动滨田全家：“走，到鹄沼海滨去，游泳去！”

滨田先生微笑着，摇摇头，这个中国青年太喜欢大海，就如他对音乐的喜爱一样，才来这儿几天，不是拉琴，就是泡在海水里，有时还像孩子似的在海水里又跳又笑。他瞥了一眼正起劲鼓动的聂耳，推开屋门一看，哟，红灿灿的太阳正悬在中天，屋前山坡上的虎杖和夜来香一簇簇困在一起，好茂盛，野草荡从中俏皮地探出头来，红艳艳的，真逗人，几里外，大海扑弄着太阳和它的金光。“好哇，好天气，对，是该游泳去！”滨田先生不禁脱口而出。全屋的人都高兴得欢呼起来，拿起游泳裤，争先恐后向门外挤去。“你们先去吧，我办完这件事就来。”滨田先生笑吟吟看着这伙欢呼的人们。滨田小姐和9岁的厚走在前面，聂耳和李样尾随在后，大家都兴高采烈，走向海滨。

这一天——1935年7月17日——聂耳原计划去京都。“17日起赴京都、大阪、神户参加‘新协’的旅行公演，并参观剧场和摄影。”然而，就在这一天，同行的李样要等一个朋友，只好将行期延后一天。李样又名李相南，是朝鲜人，日本著名摄影家远近雄的门生，与聂耳在东京相识，成了朋友。这一天，晴空万里，海风习习，真是盛夏的好天气，聂耳本该去京都，却留在了这里，下海去了……

海滩上，海水里，密密麻麻的人头，有刚放暑假的学生，有出来纳凉的市民。海浪叠着浪，涌向人们，涌向沙滩，急匆匆来，散落成白色的浪花，缓缓而去；不停地来，不停地去。李样急不可待地脱下衣服，大喊一声，挥舞双臂，率先冲下海去。聂耳微笑着，手搭凉棚，遥望着波光粼粼的万顷碧波，等待滨田小姐换好游泳衣。然后，而人向大海走去。来到齐大腿深的地方，聂耳停了下来，弯下腰，将一只耳朵贴近水面，脸上渐渐浮起微笑，“厚，快听，大海在唱歌。”9岁的厚也学着他的样子，听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抬起头，嚷嚷：“聂叔叔骗人，大海没有唱歌，也不会唱歌。”“厚，大海会唱歌，在唱一支雄壮的歌，轰轰隆，隆轰轰！”滨田小姐笑了起来，说：“聂君，你听什么都在唱歌，大海在唱歌，松树在唱歌，连山都在唱歌。我们就在这儿游泳，你去听大海唱歌吧！”聂耳一点头，厚却不答应，“不在这儿，不在这儿，我也要随聂叔叔去听大海唱歌。”聂耳抬起一只手放在孩子头上，另一只手指着远处在起伏的波浪，“厚，再往前，水可深哩。”他感到太阳

在背上炙烤得那么厉害，海水在腿间擦来擦去多么惬意。远处，大海在它胸膛深处轰鸣，那么深沉、有力、诱人，就如《命运交响曲》里的叩门声。一种兴奋的感觉弥漫全身，聂耳两眼微眯，眺望着涌动着金光的大海，自己眸子里也闪耀着金光，心里想起普希金那句诗：“大海，你这自由的元素！”他转过头，亲切地对厚说：“厚，你在这儿等着，我到海里找东西给你玩！”说罢，他双手一上一下拍打着海水，两腿在水中跳着，哈哈大笑，向变幻莫测的大海走去，游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厚玩得乏味了，就站在水里一个劲地叫嚷：“聂叔叔说，到海里找东西给我玩，怎么还不回来？还不回来呀？”滨田小姐抬头望望海面，海面上东一个西一个搏风击浪者，谁是聂君呀？她安慰厚说：“厚，聂叔叔就要回来了，在海里找东西不是挺难吗？他不是说要听听大海唱歌吗？——走，我们上岸等他。”此时，已是下午3时多，他们下水已经一个多钟头了。

太阳还那么红，软绵绵的沙滩有些烫脚，人们都躲在阳伞下、树荫中。滨田小姐同厚正准备寻个地方坐坐，突然看到最先下水的李样，便走了过去。“李君，在海里见到聂君了吗？”“没有。没在岸上？我还以为他在岸上哩。”两人说着，眼睛便四处搜索起来，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头，聂耳再喜欢游泳，也不可能在波浪里连续游上一个多小时呀！李样和滨田小姐不约而同地决定：找，赶快找！李样踏水下海，在海里找。

滨田小姐和厚在海岸边找。

“聂君，聂君！”

“聂叔叔，聂叔叔！”

千呼万唤无回音。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三人还没见到聂耳。他们真正觉得事情不妙了，急速通知海岸监视所，请求帮助。

“李君，你说，聂君会不会有事，先回敝所去了呢？”从监视所出来，滨田小姐这样推测。

“那怎么会，他哪会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呢？聂先生不是这样的人。唔，不过，还是回去看看为好，我就去。”

怀着侥幸心理，李样朝几里外的滨田先生家跑去。

聂耳果真不在。滨田先生也一同赶到海滨。

太阳已缓缓西坠。海潮已经上涨。海滩上的人们几乎走光了。

聂耳依然没有踪影。

夜笼罩了大海。明月高悬。灰蓝灰蓝的海水微微发光。它在不停地涌动，连续地呼响。

半夜时分，大海没有睡，还在拍打岩石，浸蚀沙滩。寻找聂耳的人们只好回去了，监视所的人说，除了等待早潮消退之后再寻找，别无它法了。

人们难以合眼，坐等天晓，心情如同那海潮，消涨，涨消。

清晨，潮退了，大海把他送回岸上……他溺死的地方，在游泳区西南三十公尺处，那儿海底的海沟纵横，犬牙交错。他出水的地方，岸边散落地开着鲜花，水面上浮着花瓣。

李样跪在聂耳身旁，泣不成声。他和聂耳相交才两个月，成为莫逆。聂耳曾这样对他说：“你的祖国被人霸占，我的祖国正被人侵占，我们是被压迫的、不愿做奴隶的弟兄！”搞戏剧创作的滨田先生叹息再三，天，老天，你太不公平，稀世之才，天不永寿！滨田小姐和厚捧来一个贝壳，那是和海

浪摩擦的贝壳，壳中，海浪留下一泓清波。

聂耳的遗体停放在滨田实弘家。他安息地面对徐缓的山坡，还有那生气勃勃的虎杖、夜来香，红艳艳的野草莓。

聂耳是中国公民，依照惯例，滨田实弘先生通过日本警察厅与中国驻日大使馆交涉，希望妥善处理善后问题。而国民党当局的驻外机构以聂耳未到大使馆登记为由，拒不认领这位名震海内外的音乐家的遗体！。

7月18日，聂耳的同乡和好友张天虚闻讯赶来，与滨田先生等日本友人一道，隆重火化了遗体。然后，骨灰由张天虚、郑子平护送回国，安葬在景色秀丽的昆明西山上。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发生重大转折，同盟国胜利在望。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提议，并经美国国务院同意，决定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的各国音乐中，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定为代表中国的音乐。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声，在万里晴空冉冉升起。

自此，《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奏响。

真理，被判处火刑

——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之死

布鲁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他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他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构成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单子”。单子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他肯定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离，自然界具有内在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即自然界本身的本原和原因。

1600年12月21日起，哲学家布鲁诺便掌握在意大利多米尼克僧团刽子手的手中。宗教裁判所指望在大庆年年初，能迫使布鲁诺签署弃绝异端邪说的悔罪书。

所以要庆祝大庆年，其目的是要增加教会的收入，提高它的国际威望，加强它对信徒的影响。考虑到历届大庆年的经验以及新教徒在朝圣者将汇聚罗马这件事上新作的恶意宣传，克莱门特八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严禁小酒馆、赌窟和妓院的老板过多地提高价格。开设了三家大饭店以接待朝圣者，备办了各种食品，其中还有成群的牛，粮食的输送也得到了保证。

凡是在大庆之年来到罗马的人，其罪过都可以得到宽恕。但是，他必须拜谒15座主要教堂，并四肢着地地沿着“神圣阶梯”爬上去，这个阶梯象征着灵魂沿着善的台阶步步升高。

烧死异端分子是大庆年庆典的节目之一，是宗教仪式的必须有的最为庄严的一部分。罗马当时必须证明：它对悔过的有罪者是慈悲为怀的，面对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则是严厉无情的。有罪者在这个时机悔过——这对教皇政权有利得多。如果能够作到使布鲁诺穿着悔过罪人的衣服走上街头，领着他在游行队伍中边走边用鞭子抽打他，然后再在一些主要教堂里凌辱他、作践他给众人看，那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可是，1月20日宗教裁判官们得知，布鲁诺坚不可摧，他断然拒绝签署弃绝己见的文件，拒绝忏悔。

有宗教裁判官们出席的高级主教会议是在教皇宫举行的。它的召开不是为了研讨案情，而是为了让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发出关于将布鲁诺用篝火烧死的庄严命令。

布鲁诺的书遭到与这位被判有罪的人同样的命运。

16世纪的刑法把处决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用烧红的钳子把罪犯活活撕成碎块，把身体的各个部分一一分开。另一种情况是烧死。

根据教会信仰，消灭了肉体就使被处决者没有希望从死中复活了。他的灵魂既已失去肉体，似乎就应该在永恒的痛苦中飘荡。

判决书是在红衣主教马德鲁齐的宫院里宣读的；这宫院位于纳沃纳广场，与圣阿格涅萨教堂相毗连。在这座宫院里举行宗教裁判所的高级主教会议，而在地下室则是死刑囚犯的监牢。死刑判决都是在这里宣布。圣阿格涅萨教堂在举行这类仪式时便把大门打开。

当宣布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死刑判决时，圣阿格涅萨教堂响起了钟声。布鲁诺在刽子手的押送下走了过来。他身穿僧衣，脖子上系着绳索，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在教堂敞开的大门口站立着宗教裁判所的书记官弗拉米尼·阿

德里安，他身穿紫色长袍，头戴小角方帽——这是宗教裁判所法庭官员的服装。他周围是教皇警卫团的士兵，他们戴着西班牙式的头盔，肩背前膛火枪，腰挎巨大的双柄剑。

红衣主教们和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站在宫院的阳台上，当书记官宣读完判决书时，布鲁诺从跪着站了起来。一个刽子手从他手中夺去那支点燃的蜡烛，将其吹灭，这表示犯人的生命已经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凶险的沉寂中，布鲁诺突然冲着宗教裁判官们发出清晰而威严的声音：

“大概你们宣读判决书时比我听取判决书时更加恐惧吧。”

布鲁诺冲着宗教裁判官们喊出的这些话表达了深邃的思想。教会确实是带着恐惧的心情作出有罪判决的。领导宗教裁判所的人既是刽子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可以杀死自己的敌人，但是他们消灭不了自由思想、进步科学，而且他们将给自己树立千倍万倍强大的反对者——全体进步人类。

教士们架着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胳膊生拉硬拽地把他拖到教堂，他穿着发给他的、与他过去得到的各级僧职相应的所有法衣，从见习修道士的衣着直到修道士的各种标志。主持解除教职仪式的主教，穿着镶有花边的白色法衣，戴着披肩，围着红色围巾，衣服上还有神甫的金属衣饰。他头上戴着一顶朴素的法冠。手里拿着主教的权杖。走近祭坛时，他面对世俗法度和群众在可移动的主教席位上坐了下来。

他们迫使乔尔丹诺·布鲁诺把通常做礼拜时使用的教会器皿拿在手里，就好像他准备要举行宗教仪式似的。然后，他们又迫使他在主教面前叩头。主教说出规定好的一套话：“我们凭全能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权力和我们的教职的权力，从你身上剥去修道士的法衣，废去、革除、勾销你的所有教职，剥夺你的所有封号。”

然后，主教用适当的器具从乔尔丹诺·布鲁诺两手的姆指和食指上切下一点皮肤，似乎是要消除掉授予教职时所行涂油礼的痕迹。此后他便从布鲁诺的身上扒下修道士的法衣，最后，把天主教僧侣都留有的那种剃成圆饼形的秃头顶的痕迹加以消灭，同时又说了一套在解除教职仪式上必须说的话。布鲁诺的火刑被精心安排在教皇于耶稣会徒教堂进行祈祷的日子举行。

布鲁诺在被处决焚烧前，刽子手们将他的舌头拉出来，用特制的钳子或一块劈裂缝的木头夹住，使他不能向人群讲话。

宗教裁判所指示，凡是向着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和圣母挥舞利剑或发出亵渎言语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刑罚。

在布鲁诺濒临死亡的时刻，当有人把刻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伸给他时，他以阴森的目光拒绝了它，并把脸扭到一边去。

处决是在临近清晨的时辰，在火把的光亮下进行的。篝火分置两处，一处是为布鲁诺准备的，另一处是为契普里阿诺·克鲁齐费罗准备的，后者也是个异端分子僧侣，不那么有名，与布鲁诺同时被判罪。

刽子手们扒下布鲁诺的衣服，并给他披上一块浸透了硫磺、画满了火舌的粗布片，意大利文叫作“桑别尼托”。“桑别尼托”的下沿连膝盖也不到。此后，使用铁链子把他捆在火刑柱上，除此之外，还用湿绳子将他周身勒紧。在篝火燎烤之下，绳子紧缩、深陷肉中。为了延长被处决者的痛苦，通常先点燃起火势不大的篝火，然后逐渐添加干树枝，加强火势。

布鲁诺的著作，也堆在他的脚下跟他一起被烧掉。

烧死布鲁诺那一天，恰巧赶上由于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引起的强烈地震。大地的震撼传到了罗马。当时在纳沃纳广场上有一大群牛。吓惊了的牛群挣脱绳索，沿街四处奔跑，对迎面来的人连挤带撞，以致死了150人之多。

大庆年伊始的这场地震，跟袭击罗马的那次洪水一样，都是令教会大伤脑筋的事。教会点燃起来的迷信现在把矛头指向它自身。在愚昧无知的群众中间传开了这样的流言：上帝对罗马教皇发怒了。

布鲁诺表现得始终是坚定不移、英勇无畏、铁骨铮铮、毫不妥协的。在宗教裁判所刑讯室度过的漫长岁月，各种各样的刑具，以及残酷至极的种种折磨，都未能从精神上摧毁他，未能迫使他哪怕用形式上悔罪的代价来换取个人的生路。他作为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真正战士死了，他向刽子手们发出了挑战，他确信他的理想将取得胜利，他知道：英勇的死去将回满完成英雄的一生。

1889年，全世界进步人士集资在宗教裁判官们烧死布鲁诺的地方——鲜花广场，为他立起了一个纪念像。

宗教蒙昧势力以及各种反动分子当时曾群起鼓噪、进行抗议。

其中有一个名叫施到德的德国教授，于1889年7月7日发表了一道这样的言论：“他造反造到上帝本人的头上，他在他那狂热的谬论中否定上帝的旨意，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在他的书里宣扬最粗卑的泛神论，在自己的生活中奉行最庸俗的唯物主义。这样一来，他就毁掉了一切道德秩序和宗教秩序、一切教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唯一基础。他力图通过自己的论题不仅推翻宗教，而且也推翻王位。由此可见，他乃是人类社会的公开敌人，因为，哪里没有上帝，哪里也就没有权威；哪里没有权威，哪里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秩序，哪里也就为极端急进的社会主义敞开大门……乔尔丹诺·布鲁诺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脱群的僧侣，免去教衔的教士，行为不道德的人，反对基督和教会的叛乱分子，上帝的否定者，王位和宗教的敌人，一句话，是个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革命分子。”

这个企图屈辱布鲁诺的狂热教徒甚至不能理解，他这些话恰恰是赞扬了布鲁诺，把布鲁诺摆在为使人类从愚昧、压迫和暴力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先行战士行列之中。

国难当头，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井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清代学者王懿荣之死

80多年前，在北京东城锡拉胡同一口极普通的水井旁，突然盖起了一座精致的小亭子，还竖立了一座碑，上刻“福山王文敏公殉节处”9个大字。建亭立碑者，是清朝顺天府（今北京市）的府尹陈夔龙，而“王文敏公”又是谁呢？他就是清朝光绪年间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团练大臣王懿荣。

他，学识渊博，对金石文字有精深造诣，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为甲骨文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著名学者。

他，忧国忧民，在国家危难关头，投笔从戎，请缨杀敌，为抗击八国联军的野蛮侵略而以身殉国，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者。

王懿荣，字正孺，号廉生，谥文敏，山东福山县城西古现村人。近代著名小说家曾朴在其小说《孽海花》中提到的那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重修《四库全书》的“山东大名士汪莲孙”，就是指王懿荣，汪莲孙乃王廉生的谐音。

同治元年（1862年），年仅18岁的王懿荣首次参加顺天府乡试，然而出师不利，未能考中。此后15年，他7次应考，竟7次名落孙山。这并不是因为他才疏学浅，学问不如人，而是他对死记硬背儒家经典中那些教条和束缚思想的八股文毫无兴趣。再说，当时科场极为腐败，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极为严重。特别是主考官们，多不学无术，他们只注意空洞无物的八股文，只讲求华丽的词藻和繁琐的格式，而并不重视真才实学。所以王懿荣屡试不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懿荣终于科场告捷，中了顺天乡试副榜第一，光绪五年（1879年）又中顺天举人，第二年，金榜题名，中了进士。此时他已35岁，可谓大器晚成了。再经殿试，以优异成绩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乃当时中央最高学术机构，是人才荟萃之地。自明朝中期以后，就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因而王懿荣被“点翰林”，就意味着仕途不可限量。然而他并不想飞黄腾达，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从此再不必为应付科考而违心地经营八股文了，可以专心致志于他喜爱的金石文学了。不久，他又升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南书房行走，并三次出任国子监祭酒。他的博学多识，不仅名噪学术界，连官居高位、名重一时的人物如翁同龢、潘祖荫等人都很敬服他。

王懿荣博通经史，尤在金石文字之学上有精深造诣，这和他一生酷爱古文物有很大关系。

为了搜寻文物，北京的大小古董商店，他三天两头，必去光顾，当时北京的古董商人，深知他精于鉴别古物，不但不敢用假古董欺骗他，而且把他奉为严师，纷纷将收购来的古物请他鉴定。以售卖古书、字画、碑帖、金石文玩而闻名的北京琉璃厂。更是他经常流连忘返之处。因而好的古书画、古器物常常被他捷足先登，精选而去。

为了购买心爱的古物，他不吝金钱。常常把官俸花得精光，有时古董商捧来珍贵文物，恰值囊中钱不足，他就把家中的衣物典当，甚至连妻子遗留的嫁奁、首饰也统统送进当铺，这也就是他“官日崇而贪日甚”的原因。有一次，古董商捧来一件古物，王懿荣接过来一看，心里不禁狂喜起来，这是

一件难得的珍品，狡猾的商人见王懿荣情不自禁的样子，自然索价很高，王懿荣遍寻家中，仍未凑足这笔钱，他毅然将裘衣脱下典当。夜已很深了，冷风嗖嗖，寒气逼人，然而王懿荣还在和朋友对着这件宝物摩挲切磋，真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举世闻名的甲骨文，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代表着中华文化的远古盛世，它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而第一个发现这颗明珠的，就是王懿荣。说起他的这一重大发现，充满了传奇色彩。

话说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代后期盘庚迁殷到纣王时期的都城，周灭殷后，这里就荒芜了，秦汉以后此处被称为殷墟。自宋代以来，当地农民在翻土地时，经常挖出一些龟甲和兽骨。当时，他们只是把这些甲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药店，或者把它们研磨成粉，当作止血治创的“刀尖药”在庙会摆摊出售。久而久之，大批“龙骨”源源运进京师北京，作为一味具有涩精补肾功效的名贵中药出现在“同仁堂”、“达仁堂”等药店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天，正任南书房行走和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突然患了疟疾，一会高烧，一会寒战，闹得阖府不安。于是立即请来一位名医诊治。这位老中医童颜鹤发，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他一手捋着胡须，一手细细诊脉。过了一会，他慢慢站起来，在八仙桌上正襟危坐，一面思忖，一面开出一张处方来。把医生送出门后。王懿荣挣扎着起来，拿过处方来看，只见上面除了白芷、苍术、肉桂、川芎等普通中药外，竟有一味称为“龙骨”的药，这使饱读经史的王懿荣不免有些吃惊。龙，在古生物学中，本指距今二亿三千万年到七千万年前的爬行动物——鱼龙、恐龙、翼龙。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心目中的龙却不是指这些早已绝灭了的动物，而是专指那种角似鹿、眼似暇、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成武暴烈，犷厉可畏的神物，它腾云驾雾，无所不能，威力无比，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因而长期以来，封建帝王们都把龙作为统治的绝对权威的象征，并自命为“真龙天子”，以此来震慑万民百姓。如今，这处方竟有一味：“龙骨”，王懿荣不能不刮目相待了。他急忙命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从明代就开张的老字号药店“达仁堂”将药买来。当他亲自打开药包，小心翼翼拿起一块“龙骨”审视时，突然大吃一惊，他发现“龙骨”上竟然刻着一些似篆文又非篆文的古老文字。素有考古癖好，“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的王懿荣立即判断这是一种尚未被人认识的古文字，他激动万分，马上派人去“达仁堂”将该店所有的“龙骨”悉数购回。经过他仔细考释、鉴别，终于辨识出这些“龙骨”上的文字正是商代用于占卜的“龟骨文”，它是商王室珍贵的档案。王懿荣意识到这些“龙骨”有着极重要的价值，于是开始大量收购。他不惜重金，以每字二两白银高价收购。由于他是当时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他对“龙骨”的鉴定和重金收买，立即使“龙骨”身价百倍。一时间里，京津等地掀起了一个收购“龙骨”的狂潮。北京的各个中药店，“龙骨”成了热门货，很快被抢购一空。大官僚端方，竟出价到每字二两五钱白银。著名的古董商人范维卿、赵执斋等人，经常携甲骨出入王懿荣的门庭。他们见贩卖“龙骨”有利可图，都蜂拥至安阳小屯村抢购。当地农民见“龙骨”如此值钱，不惜毁地翻挖，挑灯夜战来搜寻“龙骨”，甚至出现了因侵犯地界面大打出手的事。

过去，药店不喜欢收购带字的“龙骨”，所以农民出售时常常把上面的字刮掉。有不少“龙骨”因字太多刮起来麻烦，就随便把它们抛入枯井之中。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不知抢救了多少商代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王懿荣万万没想到，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在他这一场病中被偶然发现，揭开了千百年来“龙骨”之谜，一门中外瞩目的新兴科学——甲骨学就这样诞生了。

王懿荣苦心搜集的 1500 多片甲骨，在他死后第 3 年，就被他的儿子王翰甫转卖一空。其中 1000 片卖给《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字铁云），成为他《铁云藏龟》一书的主要资料来源，还有一部分被天津新学书阮得到，由美国人方法敛摹写，编入他的《甲骨卜辞七集》之中；另有一部分在 1939 年由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编为《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王懿荣的心血总算没有白流。

在通往山东的崎岖驿道上，几名轿夫抬着一乘轿，急奔而行。虽然此时正是三九寒天，然而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轿中的王懿荣，一脸焦急的神色，他不时探山头来张望，似乎仍嫌轿夫走得太慢。

这是 1895 年初，日本侵略者攻占朝鲜，出兵我国东北，又在山东荣成登陆，直逼清朝北洋水师困守的威海卫军港。消息传来，京师为之大震，形势极为严峻。这时，身为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如焚，寝食俱废。半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慈禧太后不顾前线清军连吃败仗，急需武器装备，却大肆铺张地准备自己 60 大寿的盛大庆典，甚至将海军经费挪来人修颐和园，大搞搭彩亭、彩棚、扎戏台等所谓万寿“点景”。当时王懿荣就不畏太后淫威，仗义执言，吁请太后以国家民族为重，停止不合时宜的“点景”。如今，侵略者又进犯自己的家乡，他怒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连夜奋笔疾书，慷慨陈词，要求朝廷准他回籍办团练。光绪帝看了他的奏折，情词恳切，爱国保家之心，跃然纸上，不禁大受感动，立即准奏。

王懿荣星夜兼程，奔向山东。当他风尘仆仆赶到登州府（今蓬莱）属海防前线后，马上开始了紧张的联络组织工作。他亲自奔波在莱阳、栖霞等许多州县，将各地民团组织起来。凭着他在山东缙绅中的声望，立即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响应，使他深受鼓舞。

然而，正当他积极备战，率领家乡子弟兵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之时，李鸿章却在日本签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王懿荣悲愤满腔，他请缨杀敌的努力，只好付之东流。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五月，英、法、意、日、俄、德、美、奥八国联军 40000 人，推德国将军瓦德西为统帅，以“保护使馆”为名，大举侵略中国。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腐败的清军则闻风丧胆，一触即溃。清廷上下，一片惊慌。欲战欲和，举棋不定。在此危难关头，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挺身而出，再次请缨，出任团练大臣，誓师保卫京师。作为一名职掌教育的文臣，为了杀敌御侮，保家卫国，多次请缨杀敌，这在清廷一班尸位素餐、庸碌无能的官僚中，确实难能可贵。

但是，王懿荣到团练局上任后，所见京师团练仅 1500 人，且良莠不齐，老弱参半，尤其是枪械奇缺，几乎到了赤手空拳的地步。这如何能抵御敌人的洋枪洋炮呢？王懿荣为此四处奔走，呼号。然而腐败的清朝官衙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使他一筹莫展。他只得写信向张之洞求援：“此一千百人，赤手白战，即有钱也无处筹买。公能稍为捐置否？此垂涕而道之者也！”真是字字苦情，声泪俱下，可见他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面对强大凶悍的敌人，再看看腐败无能的朝廷和不堪一击的清军，王懿

荣深知回天无力，他抱定了与敌人以死相拼的决心。他让家人速将庭院中的一口水井深挖，淘净。家人们都很奇怪，在这兵慌马乱，极端危急的时刻，他如何还有闲心浚井呢？对家人的疑问，王懿荣避而不答，只是用手指着水井，意味深长地说：“此吾之止水也。”（意即：此井就是我的归宿地）说明他早已作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7月20日，兵临北京城下的八国联军分别从朝阳门、东便门、广渠门攻入外城，10万守城清军不战自溃。所谓旗兵精锐“神机营”、“虎神营”等更是闻风丧胆，弃枪而逃。王懿荣怒不可遏，亲率团练兵勇在东直门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而败下阵来。王懿荣知大势已去，匆匆赶回家中。此时，全城只有威武不屈的义和团还在和敌人浴血战斗。而平日作惯威福的慈禧太后此时已吓得魂魄俱丧，连忙换便服挟光绪帝向西安逃窜。许多贪生怕死的文臣武将也慌作一团，纷纷敛财逃命。北京城顿时成了恐怖的世界，杀红了眼的洋兵犹如一群饿极发疯的野兽，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大街小巷，尸骸枕藉，浓烟滚滚。

夜半，侵略军攻入内城东安门，王懿荣在家中，徘徊长叹。此时门外乱兵塞途，平民百姓，扶老携幼，狂奔乱逃，哭号惨叫，撕裂人心。他知道自己以身殉国的时刻到了。他把家人招集到眼前，痛心地说，“国家遭此蹂躏，我还有何面目苟活下去！”说毕，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金子往嘴里塞，家人苦苦相劝。王懿荣怒目圆睁，大声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们不必再劝。”一仰脖，将金子吞下，但不死，他又拿出一包毒药吞下，立时，腹痛如刀绞，口吐白沫，全身大汗淋漓，但仍未死。最后他迈着虚弱的步子，来到庭院中，手拿一支毛笔，在壁上从容写下绝命书：“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写完掷笔于地，翻身跳入井中，壮烈殉国。

自杀？他杀？

——鲁迅之友范爱农之死

鲁迅先生的好友，光复会早期会员，徐锡麟和秋瑾的学生，原绍兴山阴师范学堂监学范爱农离世已有75个年头了。对他的死，众说纷纭，有人曾怀疑他是自杀，更多的人却是说他酒醉后失足落水殒命的。可他的后裔和亲属出示的大量资料却不是这样……那末，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912年7月11日（农伍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是传统中的韦陀菩萨生日，绍兴小皋埠照例举行会市。白天小贩云集，地上排列着吃、穿的摊子，五花八门样样齐全，穿着虽简陋，可也花花绿绿的人们来来往往、摩肩接踵。

绍兴《民兴日报》的编辑马可兴（是鲁迅、范爱农在绍兴的朋友，参加过民主革命，《民兴日报》的创办人）早就有去一观会市盛况的打算。他不仅邀报社的职员，又再三邀请了被新任山阴师范学校校长傅励臣的爪牙、绍兴自由党头目何几仲逐出学校后，暂时在报社帮忙的范爱农一同前往。

范爱农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因几件小事有过误解，但回国后二人已冰释，在绍兴府中学堂、山阴师范学堂相处好几年，二人情同手足。自鲁迅北上后，范爱农少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谈话的人，就在绍兴鸡头山丈人家混日子。失业后就上城来老朋友处走走，又帮助报社改改稿子，写写社论。当马可兴一再邀请他去看“社戏”时，他自愧并作报社正式人员，就扯扯那件褴褛的灰布马褂，低头望望那双露出脚趾头的破布鞋，自感寒酸相十足，苦笑着，摇摇头，觉得难以出门。可又经不住老朋友们的相邀，心想，难得的，一年中才一次，衣服破点有啥关系，反正是晚上去，再说，又不是去当新女婿……这时又有几个编辑在一旁撺掇：

“范监学，你若一道去，我们不会忘记带坛陈酒去，大家边吃边看路上景致，肯定别有风味！”

范爱农一听此去路上能开怀畅饮，喜出望外，所以在头天晚上，吃过晚饭就跑到都昌坊口新台门的鲁迅家里。向鲁老太太告知了此事。

鲁迅的母亲因与爱范农是同乡，加上他与鲁迅的关系，所以平时待他很好。只要他一上城，就留他吃饭喝酒，常向他打听一些自己亲戚的情况。过去鲁迅在绍兴时，二人无话不谈，有时还说一些愚不可及的小孩子话，常使她在后房听了也忍不住要笑。今天，范爱农一到，她倍感亲切，就泡了茶递给他。说后间，鲁老太太听说小皋埠会市看戏的事，她起身走到天井里，不时的望望天空，只见黑洞洞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就回身进去，再三嘱咐范爱农：“这几天是暗星夜，行船走路都要小心，依最好别去赶热闹场，免得惹祸崇。”

听着鲁老太太的话，范爱农再看看天色，心里不觉也起了波浪。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还在日本留学时，因徐锡麟、秋瑾遇难，自己不得被逼转校。回国后，自己头上有顶“革命党人”的帽子，衙门里的人也常来纠缠他。他寻思着也不想去了，觉得鲁老太太的话很有道理。可他毕竟是个老实巴巴的人，平时报守信用，觉得既然已有的在先，况且船已早早租定，若突然变卦不去会扫他人之兴。再说，自己是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风风雨雨的事也见识过了，难道去看看社戏，这么一条小小河江却去怕它？所以主意打定，

还是决定一同前往。就对鲁老太太说了句：“我晓得的，我也会格外小心的。”又闲话了片刻，告辞出来，径直回到了家弄的《民兴日报》社去睡觉。

第二天傍晚，一艘七明瓦大船在欸乃声中载着马可兴、范爱农等一行及一群欢呼雀跃的山阴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人，缓经驶离了河埠头，向小皋埠进发。船的中舱放着一张小方桌，桌上又放着茴香豆、香瓜子、豆腐干之类沽酒的小吃食，旁边果真是一坛未开封的绍酒。

船一出城，夜色就浓起来。五月，绍兴正是黄梅季节，空气潮湿，傍晚更甚。人坐在船中，感到特别气闷。这时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喊叫着：“来来来，大家动手，把这酒开封吧！免得‘鱼挂臭，猫引瘦’，喉咙里翻筋斗！”人们一齐朝那声音望去，见这说话的正是马可兴先生。今天此行是他的发起人，当然是他的东道主无疑了。

这一声，犹如军令下，话音未了，早有几个眼明手快的学生蜂拥而上，七手八脚把封口开了。顿时，船舱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绍酒香气，使人馋涎欲滴。连在船艄头摇船的两个船头脑都禁不住连咽口水，连赞“好酒、好酒”。

学生们更是兴致勃勃，在六个前辈面前多放上一只饭碗，又满满为他们斟上。他们自己不敢太放肆，几个人才拼一大碗。真凑巧，范爱农面前放着的不是只饭碗，却是一只装菜用的红花碗，一个学生对他说：“范监学，你酒量最好，就喝这大碗吧！”范爱农口中客气：“哪里哪里！”可手也就接住了。招呼过后，就喝了起来。

夜，黑沉沉的，天上没有一线光亮。船在环城古河道中慢慢走动，既可乘凉，又可谈天说地，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尤其乐了几个学生。他们一方面轮流为先生们斟酒，另一方面，此时此地，“师道尊严”暂搁一边，像大人一样可以开怀畅饮。这群学生中有来自新昌、嵊县、诸暨的，有的会唱绍板、高调的笃板，他们自己唱了还不算，还要先生们也唱，不会唱就罚猫狗叫，不然，罚酒一大碗。编辑先生哪里肯罚猫狗叫，就情愿罚酒喝，自己不会干，又劳范爱农代干了。范爱农的确是海量，他端起碗后，往后一仰脖，一口气干了，还咂咂嘴，赢来一阵喝采声，接着又是一阵叮叮 的碰碗声……

“监学，真好酒量，再喝，再喝，反正今天不用付钞票，来呀，不醉不休！”一个学生更是翘起大姆指劝酒。范爱农很高兴，心里热乎乎的，脸热心跳，醉眼朦胧，望着这群过去曾因调皮捣蛋而被自己严厉斥责过的学生，心中倒有点内疚。这其中就有马可兴的儿子。而这些人平时对范爱农监学早有怨恨情绪，苦于无法发作。现在见他已被斥逐出校，加上何几仲在背后又大讲范监学坏话，挑拨他与学生的关系。这些无知的学生们总想找机会报复一下。

真的冤家路窄。此刻，这班学生中早就有人在暗算他，他们见范爱农已有了醉意，且又把过去之间不愉快的芥蒂早丢到九霄云外，拿过来的酒全当好意，不管三七二十一饮而尽。他们悄悄一阵耳语后便萌生了恶作剧的念头。

当船驶到瓦窑头时，船舱里的人已能隐约听到从小皋埠戏台上传来的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了，人人都立起身来往那边戏台下张望。这时的范爱农也觉得肚内胀鼓鼓，就向众人一拱手说：“对不起，我要去后舱小溲来。”说完，他就挤出人群，向船头走

去。那几个冤仇很深的学生就立即打了个赔号，蹑手蹑脚地一同走出中舱，乘他解开裤子时，突然一拥而上，将一点没防备的、又有了醉意的范爱

农推下船去。为了不让人发觉，他们又悄悄走到船尾，催促船头脑：“快摇，快摇，那边的戏已经开场了！”

夜空黑得像一口锅，除了远远戏台下的一线汽灯光线，仍看不清周围的一切。船头脑也不知就里，一听催促，就一个劲地摇了起来。这时中舱内的编辑先生，都伸出脖颈，双眼紧盯戏台，纷纷议论今晚由谁上场唱主角的事。有人还讲起了“戏子”们的隐私，根本没人留意范爱农。直到好一会儿，有人说了句：“怎么，范监学的尿解不完了？这一句提醒，大家才忙回头找他，却不见了人。马可兴慌了，忙问几个学生，他们都连连摇头，矢口否认，一迭声地说“不知道”，“没看见”。只有一个人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人管他，他一定是酒醉掉进河里去了！”人们的眼光都对着那说话人，这，正是马可兴的儿子。

马可兴着急地追问儿子缘由，他儿子就说是随便瞎说的。他不再追问，就忙命船头脑住了桨橹后下水去摸。可船头脑说：

“五荒六月，河面又宽，不便下去。”人们迟疑着。这时有人说：

“介黑的天，到哪里去找？死了一个不够，要死一双哉！”有人忙附和：“对，对，他已好一会儿了，就是摸到了也早断了气，要是活着他自己会游回来的，这里所有人都比不上他的水性好！”马可兴也没了主意，说：“算哉，算哉，明日一早再说。”看戏的热情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就随手拿起旁边一圈蚊虫药，往河中一扔，作为明天打捞的记号。口中说：“但愿他还活着。”

再说，范爱农冷不防会在此时此地遭人暗算，一惊吓，酒全醒了。他用力地在水面上浮着回想起刚才的事，真像作了一场恶梦。他用力地咬了下嘴唇，伸开那结实的双手，在夜色中迅速划了起来，心里骂道：“丧天害理，这班畜牲，看我不同你们算帐！”心中不免懊悔刚才不该肆无忌惮地喝那么多的酒，更不该不听鲁老太太的忠告而来赶热闹场，真应了绍兴人老话：“皇帝发沸天下要造反，穷人发沸自身有灾难！”真是“人心难托，鸭肫难剥”啊！

他使出了所有力气猛地游着，不时地抖动头部，甩掉头上的水。

原来，他确是个水性极好的人。小时在老家皇甫庄，逢端午节赛划龙舟，他也算是个角色。有一次，划到中途船翻了，他着急得很，就用力浮在水中，一个人又把龙舟翻过来再湿漉漉跳进舱里划起来，仍把别人抛在后面而得到冠军。乡里人服了，“这魁官（范爱农的小名）力气真大，又有胆识。”后来他入赘到鸡头山做了上门女婿，又在城里执教，才在这种场面中少露面了。

今晚，在黑夜中他辨不清方向，只好一个劲地游，已游到了皋平江口，河面更是开阔了，他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块黑黑的地带，以为那是河岸，于是，双眼一亮，飞速地向那边靠近。可是，一游近，用手一摸，糟了，软软的，原来，那不是岸，却是大菱蓬。“啊！误入了大菱荡。”他知道这是极危险的，心中一惊，就忙挣扎着游出来。可是，已经晚了，那盘根错节的菱藤已紧紧缠住了他，他越是挣扎，越是缠得紧紧的……终于，渐渐的，他的力气用尽了，手脚发软了，眼前一黑，紧闭着的嘴唇不能自制了，大口大口的水吞进了肚子，慢慢地往下沉到了河底。

这个在人间历尽了坎坷，受尽了饥饿、冷眼、排斥、打击的范爱农才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就这样抛下了满腹救国救民的大志，抛下了年仅24岁的妻子沈荷英和一个嗷嗷待哺的一岁女儿范莲子，就这样痛苦地结束了一生。

第二天，许多农民用捻泥船经过大半天的打捞，才在皋平江找到了他的尸体。

范爱农突然猝死的消息一经传开，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和同情。特别是他的乡亲，都知道他水性好，力气大，人又忠厚，况且捞起来的地点又在大菱蓬里，离那圈蚊虫药很远，觉得甚为蹊跷，再加上死后脸上发青，有乌青块，他们都怀疑他是被人害死的，都撺掇他丈人沈尧成和妻子沈荷英去衙门里告状伸冤。

可是，这旧社会的“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们一无社会地位，二无钱财，三无好亲好戚，哪有力去打官司呢？再辗转一想，那晚上人那么多，事后又都一口咬定是酒醉后不小心掉下河里去的，说是被人害死，到哪里去找证人呢？就是找着了，怕吃官司，也投人敢担风险来证明，这还不是“老鹰啄田滕，多坏嘴唇皮”。

马可兴等相帮料理完范爱农的丧事后，听到许多人都在议论范爱农之死，他就多次责打儿子，要他说出实情。儿子起先死咬住是他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可后来又慑于父亲的棒威，只得吐露了真情：大家早有怨恨情绪，乘去看戏之机想给他喝几口水，不想他却……儿子又再三说这是大家预先串通的，大家又保证不外露秘密。马可兴听了这话，知这事背后肯定还有人，也许就是何几仲之流，这又与官场息息相通，此事若张扬出去，肯定不好收场，为了避免惹祸，就在同行中说他是酒醉误入江河死的，隔不多久，马上又在《民兴日报》上登报声明，以安定群众舆论。

死讯由范爱农表兄叔浩传到他舅舅汪梅峰先生那儿，汪先生一听以为是叔浩传错了，后知确有其事，甚为痛心，当即写了一篇诔文，详细介绍范爱农生平及被人害死的事实。这汪梅峰老人思想倾向与其甥一致，早就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有“救斯民于涂炭”之宏愿。一向治学严谨，言行一致，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育家。后也因贫病交加而死。此诔文直到最近才由他的后裔汪国泰同志在家中发现。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范死的当天（1912年7月12日）即把情况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鲁迅。鲁迅接到信后，“不怡者累日”，心情十分悲痛。

7月22日，北京倾盆大雨，鲁迅没有赴部上班，“希饌皆素”。夜晚，他独自坐在绍兴会馆，回想着与范爱农的交往，不禁悲愤交加，提笔写下了题为《哀范君也》的诗。

《民兴日报》收到此诗及鲁迅的信后，于8月18日登了出来。这三首诗是鲁迅最早公开发表的诗歌，表达了他对范爱农的深厚感情及对吃人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

1926年11月18日，鲁迅离开北京后到厦门大学任教，在图书馆楼上又专门写下了回忆散文《范爱农》，详细叙写了和范爱农的相见相识，并写出了二人曾在日本横滨闹误会，后来冰释后终成挚友的情况，形象地提出了范爱农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遗憾的是，范爱农死时鲁迅远在北京，他对范爱农死的具体情况不够清楚，仅从弟周作人的信中略知一二，因而认为范爱农是“独沈清冷水”，是迫于穷途潦倒，长期失业，以致绝望，这是难怪的。

血泪铸成的箴言

——影星阮玲玉之死

阮玲玉，我国30年代著名影星。出身贫苦，曾主演过几十部影片，1935年3月7日午夜被逼服毒自杀。这是她第二次自杀。当时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艺人阮玲玉追悼会”，数十万人为这位女演员送葬，吊唁，灵柩经过之处，万人空巷，观者如潮，惋惜唏嘘声连成片。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愤然写了《论人言可畏》的文章，声讨社会的黑暗，为阮玲玉鸣不平。

1935年3月8日，上海各报以显著位置登载一条惊人的新闻：名倾一时的电影女星阮玲玉服毒自杀！她走完了短短25年的人生历程，留下了20多部各具特色的影片，留下了她那清丽哀婉的形象与幽怨深沉的目光。人们慨叹：这位明星在银幕上多次扮演悲剧主角，而她一生则是一场更大的悲剧。

阮玲玉是被逼死的。

阮玲玉同张达民分手后，成功地演出了朱石麟导演的《归来》，塑造了一个贤淑妻子对忘恩负义丈夫感化的形象。

为了庆祝影片成功，联华公司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举行宴会，有电影界内外人士参加。在阮玲玉隔座有一个彬彬有礼的中年男子。林楚楚向阮玲玉介绍说：“这就是茶大王唐季珊。”

他们握手致意。阮玲玉注意地观察这位早闻其名而初次见面的人物，他前几年曾同电影演员张织云结合，一同到美国，后又翻脸分手。

阮玲玉与金焰合作拍摄《再会吧，上海》的第一天，只有一面之交的唐季珊竟来到摄影棚，送给阮玲玉一只精致的花篮。

几天后，剧组去杭州拍外景，唐季珊又出现在车站迎接。

返回上海不久，唐季珊亲至阮玲玉家中拜访，不但带了茶，还带了人参、燕窝等名贵补品。

唐季珊委婉地向阮玲玉求爱。阮玲玉觉得他还热情诚恳，便向好友林楚楚征求意见。

林楚楚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

过了几天，唐季珊张惶地跑来见阮玲玉：

“真是岂有此理！这些小报记者真是造谣！”

“怎么啦？”阮玲玉吃惊地问。

“他们造我的谣倒无所谓，竟造到你的头上来。说我和你一起在杭州，还说我早与你同居，好多低级下流的话！阮女士，我真对不起你。”说完垂头丧气，无地自容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我还配得上你，”唐季珊企本地望着阮玲玉：“我们干脆正大光明地宣布同居，那些谣言也便自生自灭，对我们也无损失。如果你不愿意，那我，我只好远走美国。我在上海也没脸见人了。”

阮玲玉心事复杂，垂头想了一会儿：

“你先回去，容我多想一想……”

唐季珊悄然离去。不一会又打来电话，问：“你想好了吗？”

“你……那么你来吧。”阮玲玉回答。

唐季珊在新闻路沁园村买了一幢三层楼房。这房子精致讲究，前面有阳台和小花园。阮玲玉母女搬进以后，为了防止外面的闲话，两人决定在经济

上独立，阮玲玉的汽车和司机都由自己负担。鉴于阮玲玉答应给张达民为期两年的补贴，决定这事了结后再宣布结婚。

《新女性》试映前不久，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少妇来到沁园村阮玲玉住处，自称是张达民的亲戚为张达民索要津贴。那少妇蛮横地说：“达民要做生意，急需500元，要你把5个月的津贴提前支给他。”

阮玲玉怕当着唐季珊的面使大家难堪，拿出500元给了那女人。

没想到不几天，又有一个“小滑头”来找阮玲玉，说张达民最近很困难，要阮玲玉每月再支给他50元，还说：“阮女士是大明星，唐先生是大老板，50元算个啥？”

阮玲玉气得浑身发抖，唐季珊也对“小滑头”下了逐客令：

“这是我姓唐的家，你给我出去！”

回身，他又埋怨阮玲玉：“张达民一辈子要缠住你啦……”说完，气呼呼地出了门，阮玲玉赶出来送大衣，但汽车已经转弯。她将大衣拿回时，发现一封信从口袋里漏出来。

晚上，唐季珊回来，阮玲玉将信交给他，他像被刺了一下似地急问：

“你看了吗？”

“我还没有拆封”。阮玲玉从不偷看别人信件。

唐季珊上了楼，销毁了那封信。从此以后，一连几天心神不宁。一天，突然有人打来电话，阮玲玉一听，是同唐季珊同居又分手的电影演员张织云。

张织云说：“你可能想不到我给你打电话吧？不要和我一样上当……”

“怎么啦？”阮玲玉惊问。

“当初去美国是唐季珊要我当明星挣30万。为的是付给他妻子赡养费……”

“他有妻子？”阮玲玉真是如坠雾中。

“当初报上登了我与她同居的消息，他妻子来信要捣乱，因为唐季珊是靠妻子娘家发的财！”

阮玲玉没有再听下去，头轰轰直响。

“玲玉，我们是同行，无仇无恨，我不过是提个醒，别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千万珍惜自己啊！”

后面的话语重心长，张织云分明已经声音呜咽。

阮玲玉心神不宁地观察着唐季珊几天来神情的变化，却没想到张达民找上门来。他腰揣一张小报，向阮妈妈一抖，念道：

“红女星被富商金屋藏娇，原丈夫只落得人财两空”。看，我被阮玲玉弄得身败名裂啦……”

阮玲玉同唐季珊商量对策。唐季珊轻藐地说：“这是张达民串通小报记者造谣，我见得多了！”

阮玲玉为他的态度惊奇，唐季珊解释说：“这有什么？去年小报报道你和我同居的消息就是我和记者……”他自知失言，立即把话岔开了。

阮玲玉还是听了出来，利用小报记者造谣，制造舆论，迫我同居。为什么他也像张达民使用这种手段呢？

阮玲玉让妈妈拒绝了张达民的要挟。

接着，报上登载张达民、唐季珊争夺阮玲玉的新闻，许多情节明显是编造的。

为了澄清是非，阮玲玉决定抛头露面，请律师代她在报上郑重发表声明。

这件声明只有数百字，但字字血泪，述说一个弱女子的屈辱与不平，包含了对张达民的忍让与规劝，表现了阮玲玉的柔弱与善良。

唐季珊请了当时有名望的律师江一平作辩护人，阮玲玉觉得唐季珊的律师还不能代表她，又独自请了同乡律师伍澄字为她辩解冤屈，伍澄字又约来好友谢居三合作，同阮玲玉一起研究对策。

这案件远远超出了私人纠纷，一些“软性电影”和黄色小报大肆渲染，把大量肮脏的话像污水一样泼向阮玲玉。于是，一向为人赞赏的女明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中心。

面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阮玲玉只好依靠唐季珊，希望在危难中得到理解、信任和支持。然而，唐季珊连续几天都阴沉着脸，并不时与阮玲玉抢白：

“我完了，堂室的茶叶大王，老板、经理，全都被毁了！”

阮玲玉强压住心中忧烦，安慰说：“他们是血口喷人，我们手有凭据，等打赢了官司，我和你……”

“和我什么？”唐季珊打断她的话：“当初张织云害得我倾家荡产，你又招我吃官司！你们这些演员都是害人精……”说完，他猛掀起俚在他腿边的小狗，一下扔到了窗外。那小狗是阮玲玉心爱之物，唐季珊的火是向着阮玲玉发的。

阮玲玉绝望了，心碎了。25年来，她幻想过幸福，命运却无情地折磨她、抛弃她。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却被张达民欺骗瞒哄，又被唐季珊视为玩物。她渴望新女性的觉醒，却落得个不明不白，遭人非议。即使官司胜诉，也无法平癒心灵上的创伤，黑夜茫茫，望不到尽头，看不见光亮，在悲苦的生涯里，倔强不屈的阮玲玉感到自己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这一天，她接到朋友黎灼灼的邀请，去黎家赴宴，并要她和唐季珊同去。她急盼会见自己的朋友们，是去告别也是去寻求。她穿着自己置买的织锦旗袍，戴着红宝石耳环，脚蹬闪亮的黑皮鞋，风度翩翩，楚楚动人。一到黎家，林楚楚第一个从门里冲出来迎接：“玲玉，你今天真漂亮，是不是仙女下凡？”

离开饭时间还早，客人们在聊天，喝茶，打牌。阮玲玉约了小黎铿一起玩。这黎铿在电影中多次扮演她的儿子。她和他打球，唱歌，从来没有这样惬意过，似在追求那“母子情深”。

开宴了，阮玲玉与女明星同桌。她过去很少喝酒，今天却热情奔放，一再举杯，神态真挚。

向黎的敬酒时，黎的感到有些诧异地问：

“玲玉怎么今天这样高兴？”

“当然应该高兴”，旁边的黎民伟把话接过去说，“我们联华公司已安好设备，将来要拍有声片子啦，阮女士能在影片中开口讲话，当然要高兴啦！”

阮玲玉似乎无暇顾及有声电影的兴起，又有所追寻地向导演费穆祝酒：

“祝您长寿！”然后悄悄问：“费导演，您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好人？”

费穆了解阮玲玉的处境，但不知道她下了必死的决心。他说：“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了解你：你是一个大好的人。”

阮玲玉有些想哭，朋友们对她的评价是多么珍贵呀，这是她离开人世前听到的最后赞美。

宴会结束了，阮玲玉再也笑不起来，那流盼深情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每一个人的面孔，紧紧握手。朋友们说：“再见。”她点头致意，心里却默默

地说：“永别了，永别了！”

刚出门口，她猛又回头，突然想起了黎铿，她吻了吻这银幕上的“儿子”，才依依而别。

唐季珊喝多了酒，回家倒头就睡。阮玲玉过去问候阿妈，妈妈在炉火上为她烧八珍粥。这是阮玲玉最喜欢吃的。她望望慈祥的母亲，她们相依为命，饱受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割舍之情在揉搓着她的肺腑。在这诀别之际，阮玲玉不敢多有流连，怕失去死的勇气。于是，便匆匆端下八珍粥，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了安眠药瓶。阮玲玉对这凄楚的社会已无所留恋，但又感到有千言万语要留给这可畏可憎的人世间，她提起笑，写下了控告张达民的遗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送给他 100 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呢？想之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吧！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死了，总可以如他所愿，……”

她想起唐季珊，特别想着身后母亲与养女的生活，又写一则遗言给唐季珊：

“我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请你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

不住你，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然这样百般地陷害你我，但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看他又怎样活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看他们又怎样判决你我之罪！……

“我死之后，请你拿我的余资来养活我之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吧。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之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

“好了！有愿我们来生再会。还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阿囡，共 2050 元，至要至要。

还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不宣布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阮玲玉把八珍粥和着几十片药片吞了下去，昏沉沉地倒下了。

唐季珊发现阮玲玉服了药，赶快上楼叫醒阿妈。立即把阮玲玉送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不巧没有医生值班，耽搁了二三个小时，阿妈急着要求转院，唐季珊说：

“这里是日本医生，不认得阮玲玉，别处人家会认出来，我是名誉攸关……”

阿妈急了，赶紧打电话给林楚楚，半小时后，林楚楚同黎民伟赶来，叫救护车送到中国疗养院会诊救治。第二天，阮玲玉呼吸微弱，下午 2 时半，她失去知觉，傍晚 6 时 30 分，也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日子，阮玲玉停止了呼吸——一代影星殒落了。

她只活 25 岁，留下了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留下了幽怨深沉的人生悲歌。

阴间？阳间？

——影星舒绣文之死

舒绣文是我国影剧坛屈指可数的几位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她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的王丽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还曾在话剧《骆驼祥子》、《伊索》、《北京人》等十几台话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十年浩劫中，舒绣文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心脏病严重恶化，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69年3月17日逝世，终年54岁。10年以后，舒绣文的追悼会才得以举行，追悼会由邓颖超同志亲自主持。

十年浩劫犹如一场狂风暴雨。刚刚动过心脏大手术的舒绣文在这场大风雨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一天下午，在人艺楼道里的一间空屋中，气势汹汹地来了几个“革命派”，他们冲着楼上狂吼：“舒绣文下来接受批斗！”当时不知谁说了句：“她病了，恐怕不能下楼了！”“不能下楼？爬也要爬下来！”舒绣文听到叫喊从楼梯上走下来了。才几天不见，人们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脸色灰暗，双目深陷，两颊深深地凹陷了下去，胸部以下却鼓鼓的（此时她已有腹水）。她一只手扶着墙壁，张着发青的嘴唇，移动着颤抖的双腿，她每走下一步台阶都那么困难、吃力……她什么人也不看，低着眼皮被那群人拖进了空屋，紧接着怒吼、嘲骂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剥夺了舒绣文养病的起码条件。她每天要去剧场向夺了权的“革命组织”报到，要参加劳动，随时接受批斗……对于这段经历，当时还是舒绣文儿子舒兆元的女朋友的曲青云，用她饱含血泪的笔，将它记述下来：

弄不清人艺有多少群众组织，只是每天都看到一些新面孔来逼婆母写认罪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不知重复写了多少遍。批斗她时，这个组织还没结束，那个组织又来揪斗。特别是有几天，批斗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无论婆母怎样低头认罪，怎样挨打，他们还是说婆母不老实，勒令每天到剧院去劳动改造。婆母患风湿性心脏病，刚刚在上海做过大手术。大夫不同意她出院，她硬是坚持着出了院，还承担了许多工作。不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精神上的打击和长期没有得到治疗和休息，婆母得了肝硬化，两条腿肿得象两桶水，脚也穿不得鞋了，想躺一会儿也躺不下去，只能坐着。大夫给她开了“长期卧床休息”的证明，但无人理会。有人还说：“不管你能不能走路，就是爬也要爬来！”在那种情况下，谁敢不服从，婆母急得没有办法。兆元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婆母达到人艺。造反派看见她从车上下来，过去就打了她两个嘴巴：“你真会享福呀！为什么不走着来？”“我走不了。”“走不了就爬着来，听见了没有？”说着又给婆母一脚。婆母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元钱给蹬车的工人。“混蛋！”啪的一声，棍子正打在婆母的手上，疼得她跌倒在地上。随后，“舒绣文还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大标语，大字报，漫画等等贴了满墙。广播里一个劲的喊叫着，“舒绣文要低头认罪……”夜幕降临了，婆母还没有回来，我和兆元悄悄地去寻找。啊！那不是婆母吗？她正在艰难地往回爬着。“妈！”兆元几步跑过去将她扶起来，使劲一背，把妈妈背回家。婆母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只喝一口水便趴在桌子上了。她躺不下去呀！后来就由兆元用自行车推着她去挨批斗，才免邀更多

的麻烦。

1968年的冬天很冷，北风呼号，人们都在屋子里取暖，唯有像婆母这样的“黑帮”在外面接受劳动改造。一天，他们叫婆母在外面替他们刷大字报，她刷呀，刷呀，直到冻僵了也没人理。婆母终于昏死过去了，手里还死死握着浆糊桶和一把掉了毛的扫帚。

婆母进了同仁医院。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们当时都在忙忙碌碌地搞运动。

给婆母看病的老大夫由于够上了“权威”，被揪斗了，给婆母换了一位年轻大夫。有一天婆母突然排不出尿来，肚子胀得油光瓦亮的。婆母难受极了，满头大汗珠子，她哼哼着，两手使劲抓住我的手叫我救救她。我急得没办法。一位好心的护士把这个年轻大夫找来了，大夫背着手看了看又走了。我急忙追出去。“大夫，请千万想办法，行行好吧！她会胀死的！”我哭着请求。一会儿，这位大夫突然喊护士准备给婆母做手术。他们在婆母的肚子上打了一个洞，黄色的水立刻就像喷泉似地向外喷，流了好多好多。婆母那难过的脸上浮起了笑容：“好多了，谢谢大夫！”我们也都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可第二天，婆母的肚子胀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她难受得喊啊，叫呀！我的心简直快碎了。我又跑去找那位大夫，他说：“我已经给她动了手术。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难道就让她这样等死吗？”我大声抗议，他理也不理就走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婆母胀死，不顾一切地去找那位被批斗的老大夫。他正在打扫厕所，我跑过去，喊着：“老大夫快救救命吧！”我含着眼泪将婆母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听后带着歉意告诉我，婆母的病，绝对不可手术。既然已经弄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注射“汞撒利查碱”，不过得到外面去买。我感激得恨不能给这位老大夫下跪，可他没等我拜谢，就走进厕所去干活了！我深深地给老人家鞠了一躬，便快步走出医院。

为了买这种针药，大小医院我全去过了，回答都是没有。直到天很黑了，才在一个小门诊部买到一盒药。付过钱，我飞一样地跑回了医院。一针打下去，没过半小时的工夫，尿就排出来了，婆母苏醒过来了。这盒针药来之不易，不到特别难受时，婆母决不动用。这盒针药，婆母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凉在窗户外面，怕在屋里放坏了。直到她去世，还有三针没舍得用！“汞撒利查碱”，我至今记得这药的名称。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们都下乡插队去了，我的身体不好，一直没去。后来，在婆母的支持和鼓励下才到河北省插队落户。

快到春节了，我心里惦记着婆母，提前回京，放下行李就赶紧奔医院，到医院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病房，看见婆母安静躺在床上，两手抱着枕头，头支在枕头上，随着呼吸微微地颤动着。我一阵心酸，说：“阿姨，给兆元打个电报叫他回来吧！”“是啊！按说是该让他回来的。可他们能让兆元回来看我吗？不要拍电报叫他了，省得不安心。”听了这话，我更难过了。

我在医院时，有一次来了几个说是外调的人，他们让我把婆母带到小会议室。婆母自己不能走，他们就把婆母架着走，我跟在后面。他们不让我进小会议室，把门“呼”地一声关上了。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先是听见他们粗声大气的喊叫：“说不说……快说……”随后就是“啪啪”打耳光的声音。这声音撕着我的心，我不忍心再听下去，哭着跑了，在离小会议室不远的拐

角里等着。约莫过了两个小时，这些人才出来走了。我赶紧跑进小会议室，看见婆母跪在地下，蓬头垢面，老泪纵横。“阿姨！”我哭着跑过去，一下子抱起她放在沙发上，母女俩哭作一团。婆母边哭边告诉我说：“他们逼我写周总理的材料，我死活不写，他们打我，骂我，我就是不知道。”

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下午，忽然来了一大群男男女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军装的男同志，年纪大约40岁左右，胖胖的，怀中还抱着一个毛主席的全身像。不知是谁作了介绍说：这是咱们的军代表。“舒大姐，你好啊！”“啊！我好！您这是……”婆母惊奇得睁大了眼睛。“舒大姐，我是代表人民艺术剧院的全体同志看望您来了，并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解放了……”

“啊！是真的吗？”婆母问。“是真的。”大家一齐回答。“解放了！”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啊！它就像一声惊雷，把婆母震得一下子站起来，紧紧握着军代表的手，热泪夺眶而出：“啊！我解放了，解放了！……你们都听见了吗？”婆母放下军代表的手，又摸着毛主席的像，呜呜地哭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着婆母。突然，婆母大笑起来，这带着哭味的笑声，使旁边的人都心酸地流下了眼泪。我害怕婆母精神失常，一个劲儿劝她冷静。

兆元突然回来了。母子见面，真是亲热极了。婆母含着眼泪搂着儿子亲了又亲，这天兆元陪着婆母在医院呆了一夜，第二天告别回去了，那儿只准他一天假！

春天来到了。听人讲，病重的人如果能拖过春节，冰消河开后，就没有多大问题了，我真希望是这样。婆母这几日身体见好。精神更佳，每天吃得很多，见别人吃什么，她就想吃什么。不仅胃口好，而且还要上床睡觉。这也有点奇怪了。别人偷偷告诉我，这不是好兆头，是回光返照。我有些紧张，赶紧给兆元拍了一个电报，让他赶快回来！等了几天，不见兆元回来，我没有主意。

“青云，你看我脚底下哪来的这么多的水？”我低头一看，可不是吗？我没有多想，赶快用拖把拖干净了。到了下午，婆母又说脚下有好多水，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婆母的裤腿已经湿了大半截了。我赶快找来了大夫，检查发现是婆母腿肿得太厉害了，把皮撑破了，黄水从里面像小溪似地向外淌着。太可怕了！“大夫，请想办法治一治吧！”大夫说：“这还怎么治呀！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快给她准备后事吧！”“什么？准备后事？”我一下懵了，半天才缓过劲来，又给兆元拍了封加急电报。

3月16日这天，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我的同学到农村办插队落户手续，没带介绍信，公社不给办理，让我赶快坐火车送去！我只好到婆母那里打一声招呼就准备走。我发现婆母的精神不对，她坐在凳子上直打颤，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也不说话。我心里害怕婆母会不会……。可同学的那件事也是非办不可的，只好一咬牙便乘火车到琉璃河送介绍信去了。本想乘下午4点的火车赶回来，谁知没有火车，一直等到晚上8点40分才坐上火车，到北京已经是10点多了。医院肯定进不去了，我也累坏了，便回家睡觉去了。谁知，这造成了终生的遗憾，我没能给婆母送终。

8月17日一大早，我穿好衣服，脸也没洗，拿起头巾就乘车去医院，一下车，我就跑起来。跑到医院的大门口时，看见一群人正在往平板三轮车上搬东西。我一眼就认出是婆母的东西，特别是那个解放军同志送来的毛主席全身像。啊！婆母！眼泪一下子蒙住了我的双眼，我顾不得问什么，撒腿跑

到病房。晚了！护士已在用拖布拖婆母流在地上的血水。“阿姨……”我喊着趴在门上，哭得喘不过气来。护士们全都过来扶着我，不让我哭，怕影响其他病人。好久，我才平静了一些。婆母的病友扶我到屋子里坐下，将昨天发生的事，你一言我一语地叙述着。从我离去后，婆母一直坐在那里，脸朝着门口，两眼一动不动地向外看着。中午送饭来了。护理员把饭放在面前，她看也不看；劝她吃饭，她也不理睬。后来婆母走到行军床前（这张床是我从婆母家里拿来的），坐在行军床上，把自己最喜欢的黄色毛衣穿上，还梳了梳头发。别人问她：“你是不是等人哪？”婆母点点头，说：“青云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婆母躺下了，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好像睡熟了。大家也都慢慢地睡下了。突然，婆母坐起来，大喊：“兆元！兆元！”这一下可把大家吓坏了，一下子全都坐起来，看着婆母瞪着大眼，向窗外看着，喊了“青云”，又喊“兆元”，喊完了躺下，一会儿又坐起来喊。就这样，一直到天黑，把护理员也吓跑了。大家看着她，都为她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快到半夜12点了，婆母突然坐起来，大喊道：“快开门！快掀帘子！我弟弟赶着马车来接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往外看，哪来的马车？婆母折腾了一夜，早晨7点15分去世了。

上午10点钟左右，兆元才回来。我母亲一见他就哭了。此时兆元方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了人间。他哭着跑到医院，医院的大夫不让他看遗体，原因是面部很难看，怕他受刺激。无论他怎样求情，都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回家。婆母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常务理事，但当时却没有可能给她开一个追悼会，而且不让留骨灰。我和兆元只好趁他们不合，用手帕包了一些骨灰带回家。

时间如流水，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中，我们一直为婆母的平反奔波，直到打倒“四人帮”后的1979年5月15日才终于为婆母召开了追悼会，由邓颖超妈妈亲自主持。啊，可盼到了！那时，我们的大女儿已经6岁了。我不迷信，可我相信婆母一定会知道这一切的。

凋谢的“金嗓子”

——影星周璇之死

周璇，我国30年代著名影星。从小没有家、一生寂寞、凄零、孤苦。步入影坛后，以在电影中的出色演技和歌技红极上海滩，她在影片中演唱的歌曲，曾灌制多套唱片，为人们所流传。她主演的影片多达近百部，其中著名的有《马路天使》、《忆江南》、《渔家女》等。1957年9月25日在精神分裂症之后，死于急性脑炎。在周璇病重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她的病情。1934年是金嗓子周璇的成名期，但是成了名麻烦也就来了。上海金城大戏院的老板之一柳中浩，看中周璇是棵摇钱树，暗暗打下了鬼算盘，执意认周璇做干女儿。柳是大流氓杜月笙的门徒，有钱有势有打手。万般无奈的周璇，只好俯首认下这个干老儿，从此种下了镜破钗分的根。

1937年，周璇在袁牧之执导的《马路天使》中扮演主角小红，又唱又演。她演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伴着她的哀愁，曲折地表达了东北人民家园沦丧的痛楚。一时家传户晓，也成了她一生的代表作，至今在歌坛舞榭流传不息。周璇大大红了。她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销售额比任何一位歌星都要多。而且在她主演的片子里，每片必歌。在南洋，凡是以周璇为主角的影片，往往以插曲多寡定票价。

然而，悲剧在等着她。

1938年夏天，上海沦入日寇之手。这一年，金城大戏院的老板柳中浩、柳中亮兄弟，拉上垮台的明星公司经理张石川成立了国华电影公司，后来改名叫国泰。柳中浩以推举周璇做台柱子为诱饵，欺骗她同国华签订了合同。从此，不许周璇参加舞台和电台的演出，唯恐别人把他柳家这棵已经到手的摇钱树挖走。不料，这时严华（他已同周璇结婚）已经以经理人的身份在爵士音乐社为周璇签订了另一份合同。

柳老板闻听大怒，强令周璇拒演。

周璇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干爹：一边是国华，一边是爵士音乐社。哪个能得罪呢？哪个又得罪得起呢？本来她生性软弱，逆来顺受，这时又急又们，惊吓之中出现了流产的征兆，匆忙住进上海红十字医院。

谁料想，就在住院的当天晚上，两家老板已经沆瀣一气，联成同盟。钱能通神，也能通鬼，干爹立即一个电话：“只要有口气，晚上就得去电台演出！”她哭了，电台里低回地响起了金嗓子凄迷的歌声。一曲方罢，电台突然沉寂了，传来轧轧的噪音。与此同时，电台的大门突然向两边分开，蹿出一辆乌黑的汽车，飞驶医院。

周璇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严华比周璇大6岁，他因演唱《桃花江》而出名，并且得到了桃花公子的绰号。他既是歌手，又是作曲家，讲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严华与周璇最初的媒介就是北平话。周璇在上海土生土长，养母是广东人，耳濡目染，南腔北调。不会讲普通话，怎么能登台演出呢？于是周璇拜严华为师。

1940年，周璇与严华镜破钗分。

导火索是韩非。

1944年以后，香港《银色世界》一篇回忆文章写道：

“韩非是个乐天人物，平时喜欢说说笑笑，他在车上低哼着流行歌曲，一路逗笑，把周璇送到了门口，这才原车独载，打道回寓。

“韩非‘千里送京娘’的镜头，给等候中的严华看到了！”

“严华实难忍耐，醋意立时发作……”

“当众侮辱周璇，也许是‘欲加之罪’的夸张说法，目的在描写周璇的不幸遭遇，事实可能并不如此。

“但，严华的沉不住气，则正是他的个性。周璇因一幅广告画而受责，并非不可能。

“至于韩非送周璇回家，自然更容易引起严华的妒恨。

“韩非是婚变的导火线。自周璇与严华分离后，韩非并未进一步与周璇结为情侣，可知其实是无辜的。”

周璇感到心灰意冷。

第二天，周璇离开家庭，乔装化名在八仙桥旅馆订了房间，准备像阮玲玉那样告别人世，她买好了来苏水。

柳中浩闻听大惊失色，生怕倒了柳家这棵摇钱树。急忙跑来相劝，软硬兼施：朋友们也来劝。这样，周璇才幸免于死。

周璇提出离婚。

严华极为恐慌，求助于老画师丁悚。丁悚与新闻界多有交往，示意他请求新闻界主持正义。严华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中，当众报告了周璇离家出走的经过。他诱过于柳家人的挑拨离间，而把自己干涉周璇自由行动隐瞒起来，诉说着周璇背弃了他的痛苦。

柳中浩为了达到彻底控制周璇的目的，极力割断他们的关系，甚至派流氓用匕首威逼严华，砸他的窗子，不许他睡觉。严华做了种种努力，终于无效。其实，周璇离严华，虽因韩非而起，却也有着不可避免的趋势。

由于周璇在严华的眼中，本来是个黄毛丫头，在日常生活环境里，不可能如珍宝那样地爱护她，这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周璇已大红大紫，成了银幕上的偶像，收入亦远较严华为多，她不必依靠丈夫生活。并且被丈夫“瞧不起的阴影，一直缠绕着她，她也极想摆脱”。何况爱情的花朵本来就像玻璃那样脆。

至于周璇，则于《夜深沉》之后，专心从影，也没有再抱琵琶，直到一个叫朱怀德的男人闯进她的生活圈。

朱怀德是上海协大样绸布店的商人，逐渐获得周璇的信任。由于当时物价浮动，周璇委托他在棉布花纱方面进行投资。先是赚钱，后来又亏了。1946年周璇在香港拍片，朱怀德追踪而至，把亏蚀的消息告诉了她。多年的积蓄化为流水，对周璇是个不小的刺激，自此精神有些恍惚。这时候她与朱怀德已经有了恋爱关系。朱怀德立誓：“只要老婆一死就和周璇结婚。”周璇虽然年近30，在舞台上演了不知多少戏，却看不透生活这个舞台上那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终于以身相许，并有了一个小小的男婴。朱怀德此时却逃之夭夭，对孩子的养育不闻不问，甚至把孩子的摇篮也送给与他姘居的新新舞台的舞女。周璇极为气愤。要找朱怀德论理。早已被朱怀德收买的秘书劝她，在报纸上登篇声明，朱怀德就会告饶了。这正中密谋已久的陷阱，第二天报纸上赫然登出朱怀德与那个舞女的结婚启事。

周璇疯了。她张大了痴呆的眼睛，又一次陷入了绝境。

1941年秋天，贺绿汀从香港途经上海前往苏北解放区。周璇找到了他，

要求带她去苏北，她认定只有解放区才是光明的天地。贺绿汀也接到于伶“可以带周璇去苏北”的嘱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周璇懊悔不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熬煎。

后来，周璇跑到了香港。1950年，祖国大陆已经解放。当周璇在香港病重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党和人民向她伸出了援救之手。于伶同志委托在九龙的朋友转告周璇，欢迎她回到祖国大陆来！

秋天，周璇回到上海。

1950年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迁回上海，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新中国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影片。

周璇欣然应约，主演该片。她十分喜欢这个反映护士生活的剧本，也能为能和陶金、顾而已、顾也鲁搭档而高兴。

在拍片过程中，周璇很用心，但总感到脑子不好使，总好像有一根弦断了似的。记不住台词。她焦灼、忧心、失眠。她那围着青晕和睁大的眼睛里——闪着惊疑，人们担心她又要旧病复萌了。

不幸而言中，就在《和平鸽》即将停机时，一个检验血型的镜头刺痛了她伤痕累累的心。她联想到《一滴血》的故事，进而又联想到那个男人，高高瘦瘦的，同人家握手只轻轻滑过的家伙——朱怀德，还有他的孩子。一天，她突然把水泼在镜子上，镜子歪歪扭扭的，出现了朱怀德和那个舞女蓬乱的头。两只血红的嘴咬到了一起，一滴血，二滴血，三滴血，滴滴嗒嗒……

周璇拒绝拍片了，她要求大光明在报纸上登出启事：此片与周璇身世无关！

导演只好请一位与她体型近似的演员，以背影完成了最后一组镜头。

周璇丧失了理智。医生诊断，精神分裂症（兴奋型）复发。她把水龙头打开，把一切东西都扔下楼，甚至把孩子也要扔下去，幸亏一位女工看见抢下。她不能用料自己亲生骨肉了。在吴茵的安排下，赵丹和黄宗英接走了还在吃奶的小周民，后来又从上海救疗院找回周伟，把他们抚养成人。

周璇的病牵动了千万人的心。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曾亲自过问她的病情。

然而，这一病就是6个春秋。

1957年春天，周璇的病情渐有好转。兴许是春风的缘故，周璇的脑筋慢慢清醒了，她恢复得很快。为了告慰关心她的人们，5月21日，周璇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演唱了《马路天使》和《天涯歌女》。当人们听到金嗓子还是那样圆润优美，无不欣喜之至。人们多么希望在银幕上早日见到周璇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决定给她拍摄一部纪录片，赵丹和白沉还准备给她编一个故事片，一部短片，为的是早日和观众见面。

夏天好快就走了。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周璇来到郑君里家中，初试纪录片镜头。

但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会是周璇留给人间最后一个镜头。

急性脑炎悄悄地向她伸出了魔爪。

然而，顽强的生命力还是拖到了秋天。

周璇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

医生们束手无措，亲朋们面面相觑。周璇的小儿子哭着扑向妈妈的怀抱，但被人拽回去。

秋雨布满了玻璃，有时被汽车前灯照亮，仿佛燃烧的栅栏。

此时此刻，周璇在思索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也许她在想，风雪之夜，小小的尼姑庵，明月歌剧社，桃花公子……也许想起来了 20 年前她唱过的那支歌，天狸海角觅知音，她找到了吗？也许她轻轻唱起，也许她没有唱，或者只是一丝意念。但是她的欢乐毕竟还是太少了，行云流水一闪就过去了，而不幸从她出生那一天就像一根沉重的绳索把她紧紧捆绑。如果说她在事业上是成功的，像一组辉煌的交响乐，而生活却像一支凄楚哀怨的歌。

起风了，落下一片叶子，叶片仍是翠绿翠绿的，叶柄却有些发黄，这是上海早秋第一片落叶。

周璇合上了她楚楚动人的眼睛。时间： 1957 年 9 月 25 日。那一年她才只有 39 岁。

闪电小生，殒落尘寰

——著名越剧演员马樟花之死

马樟花，我国三四十年代著名越剧演员，曾出色地主演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越剧，红极上海滩，被誉为“闪电小生”。她出身贫苦，一生受尽磨难，1942年2月19日被旧社会逼迫致死。

1941年8月，马樟花像一个骄傲的公主，捧着一颗纯净的心，在上海东亚饭店举行了圣洁的结婚典礼。

婚后，马樟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文文静静，温柔恬淡，很少与外面交际，衣着也朴素起来。她在重新塑造自己，决心要过正正经经、平平稳稳的日子。

可是，她要平平稳稳过日子的想法，很快就被污浊的社会给搅乱了，少妇的美梦被打得粉碎。她想躲开魔鬼，魔鬼却死死地纠缠住她，无论是白天和黑夜，都要将她拖进可怕的梦魇里。原来根据合同，马樟花在1941年的夏天，就要离开大来剧场转到别的戏院里去。她在临走之前，对大来剧场的老板陆根棣说：“陆老板，我们客客气气地分手吧！我已经为你赚了不少钱，你就让我好好地离开吧！”陆根棣是一个无孔不入，在鸡蛋里也要下蛆的恶棍，他本想霸占马樟花，但没有成功。后来马樟花与茶商的儿子结了婚，他更是妒火中烧，想要伺机报复。当下，看到马樟花又要离开大来，少了一棵摇钱树，心里冒起无名火，于是，便阴阳怪气地说：“哼，我是什么老板？在你眼睛里我算个啥！”种种阴险的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并渗入到骨髓里去，使他不能自持，浑身都剧烈地痉挛起来。

他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把一个不争气的女演员弄到手，然后唆使那个女演员散布流言蜚语，用种种污秽不堪的语言来诽谤马樟花，甚至寻找一切可能觅得到的机会，当着樟花的公公、婆婆和丈夫的面去诽谤樟花，去中伤樟花，肆意地给她清白的身上泼污水。那个女演员把编造的瞎话说得那么认真，那么绝损，那么下流，让谁听了都要气愤难忍。而马樟花又是那么一个性格的人，如何能够忍受得住呢？当她听到那些严重地中伤和侮辱她人格的话时，气得几乎晕倒了，饭也吃不下去，夜里常常哭醒，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

陆根棣看到他的毒计生了效，越发地变本加厉起来。他像着了魔似的，接连不断地把一只只带毒的响箭，向着一个弱女子的身上射去。他给马樟花的公公、婆婆写了几次匿名信，后来，又花钱买通了一个小报记者，让他专门写恶意中伤马樟花的造谣文章，于是，这个无耻文人就在一份《越剧世界》的小报上连载了一篇《“补丸小生”的浪漫史》，编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离奇古怪的丑闻，一股脑儿地都加到马樟花的名下，把她说成一个自小就淫乱不堪的荡妇，一个满身污秽的下流女人。这种催命的文章，在别的小报上也不断地出现。马樟花陷入陆根棣所摆设下的毒火阵中。

谎言多了，会使最坚定的人也产生动摇。那些恶毒的匿名信和小报使马樟花的公公、婆婆由不安到困惑，由恼怒到猜疑，由漫不经心到处处留意，不和的阴影笼罩住这个家庭。生不完的闲气使马樟花终日悒悒不快，情绪沮丧，陷入到苦闷的泥潭里。有的亲属对她的婆婆埋怨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讨什么样的不成，硬要找个戏子？！”马樟花在背地里听到了，脸色一

下子变得铁青，浑身抽搐，摇摇欲坠，几乎不能自持。她的自尊心被打得粉碎，从此，她就被深埋在痛苦和哀绝的冰水里，再也站不起来了。她在九星戏院总共演出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病倒了，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和肋膜炎，每天只有用泪水和药水来打发她那愁云黯淡的岁月。

到年底封箱的时候，袁雪芬和剧团里的几个姐妹去看她，她已经病得不成人样了。姐妹们想起过去那样一个机敏、俏丽、一身胆气的人，竟被伤害得这样惨。莫不对着她那憔悴的青春，衰微的精力，枯竭的才华，流下痛心的眼泪。袁雪芬看见她的床上还放着一个剧本《还是依》，知道她的心很好强，还在翻看剧本冀望病好了之后再去演出呢，于是便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病会慢慢地好起来的！等将来大会串时，我们再在一起合演！”马樟花摇摇瘦得只剩下儿根粗筋的脖子，凄然地说道：“唉，还要演？看来难了！我的肋膜已经抽出5磅半的水了！”

她的丈夫鲍辛锄扶着她从病床上坐起来，她像一个纸人似地摇摇晃晃地依靠在枕头上，坐也坐不牢。鲍辛锄又拿来一个小小的案桌放在床上，让她刷牙漱口。她现在连刷牙漱口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没有漱过两下，便不住地喘气和咳嗽，俯在案上有半个时辰抬不起头来。

死，好像一个黑洞洞的万丈深渊，她已经站到那个边缘上了。她感到一阵恐惧和疲惫，她的心还没有冰冷到对于生死都漫不经心的地步。她望到脚底下的那片空虚，想到她很快就将跌倒其间，她的尸体将在那无垠的凄凉冰冷的幽冥里漂流，她的全身战栗了。她想伸出痉挛的手把握住什么，但手不听使唤，什么也把握不住，只能听凭身边虚浮弥漫的冻云随意地将她飘卷。

过了好长一阵子，马樟花又抬起头来，拉住了袁雪芬的手说：“我的命好苦呀！我好冤呀！在这个世界上，我太冤枉了：我有什么错，竟遭到了这样的毒害……”

袁雪芬看看周围投人注意，悄声地问她说：“你自杀过吗？外边的人都传说你吃了来沙尔！”

马樟花听说，眼圈又气得微红了，她咬紧牙关说：“你听他们那些挖舌头根的话？他们恨不得我马上去死的，我倒不肯去死，让他们再挖空心思去编排编排吧！我若真吃了来沙尔，他们还不拍着手乐啊，我才不那么傻呢！”

情深义重的姐妹们，在生离死别的门槛上悲惋缠绵，像有千万条割不断的乱麻在她们各自的心头上，每欲摘断一根便如割开一道伤口般地疼痛，喉头咽硬，谁也说不出话来，只有眼泪在默默无声地流着，流着，湿透着她们各自的衣衫。

马樟花的丈夫走过来，同样酸心地望着大家说：“你们是来看望病人的，怎么部哭起来了！你们哭，她自然也要哭，可怜她，哪里还哭得动呢？她的眼泪已经都流光了！”他我来毛巾给别人擦拭眼泪，他自己却背过脸去偷偷地暗洒泪珠。

直到午饭过后，袁雪芬和众姐妹才告别出来。临走时，她们又一再劝慰她，让她好生地养病，不要烦恼，要海阔天空地去看望这个世界！等病好之后，姐妹们再一起登台。

可是，命运之神不再等待她了，她的生命期限被压得短而又短，姐妹们走后不到半个月，马樟花就含屈饮恨地合上了眼睛。这一朵名贵的鲜花，急如闪电地在人寰之中开放，却又不等人们细看就倏忽凋谢了。他死的那一天是1942年2月19日，农历正是正月初五。这个才华洋溢的女子，才只有21

岁。2月22日，马樟花的遗体停放在徐家汇路的上海殡仪馆里。这朵已经枯萎了的名花经过整容，依然显得清秀俊美，宛如沉睡一般地安详。可是，她的香魂早已随风飘散，无有寻处了。上海越剧界的演员们都来了，袁雪芬最先来到，她一脚踢开绿纱门，冲到停放遗体的地方，一下子就扑倒在马樟花的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过去她们多少次在台上表演《梁祝哀史》，都曾流过伤心的泪，想不到今天假戏变成了真情，她心如同被绞碎一般，哀痛欲绝地恸哭在自己的好搭档“梁山伯”的尸体上。

上海的许多越剧观众也都来与遗体告别，大厅里站不下，人群一直排到门口外面。有不少的人放声恸哭，不少人咽便落泪，人们无不痛心地哀悼这早逝的才华。她凋谢得太早了，让大野感到空寂，让长空感到凄迷！

香港影后林黛死亡之谜

林黛，香港著名影星，17岁献身影坛，从影10余年曾主演电影几十部，其中著名的有《金莲花》、《貂蝉》、《千娇百媚》、《不了情》等，这四部片子在亚洲影展中获最佳女主角奖。林黛连续四届高踞亚洲电影皇后宝座，影迷数以万计，遍及全球。1964年7月17日，林黛在香港自杀身亡。著名电影导演李翰祥称林黛的自杀，是中国电影界继阮玲玉自杀后的最大损失。

1964年，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先生说：“我听章士钊先生说过你们家林黛女士的情况，我很挂心。祖国文艺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如果她愿意回到内地来，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贡献力量。”

程思远先生感动地说：“我一定转告，一定……”

唉，如果真的及时转告了这番美意，那就不但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对千千万万的影迷，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电影事业来说，也许就可能避免一场不该出现的损失。

遗憾的是，一切都来不及——

1964年7月17日，香港的晚报首先宣布：“影后林黛自杀身亡”，“艺苑名伶香消玉殒”！接着，台北，新加坡，马来西亚，整个东南亚及海外华侨社会都震动了。港台报纸为此专门出版了号外，各报发行量剧增。林黛死后第二天，成千上万的香港居民顶着烈日，拥集在湾仔道的香港殡仪馆门前，排了一里多长的人龙，争睹林黛的遗容。据港报所载，“获此殊荣者，三万而已。”出殡之日，香港万人空巷，约10万人涌上灵车经过街头，为林黛送葬。“林黛所获哀荣，为香港开埠以来所罕见！”

著名电影导演李翰祥说：“林黛的自杀，是中国电影界继阮玲玉之自杀后的最大损失。”香港知名人士姚克先生也说：“自阮玲玉之后，中国影星之死，没有一个能像她这样感动人心的。”

林黛，这万人痛悼的第二颗殒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她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盖棺论定”的话——

“林黛女士，本姓程，名月如，广西省宾阳县人，为政海名宿程思远博士及蒋秀华女士之长女。1949年来港，17岁献身银坛。十余年来，月如先后主演国语片凡数十部，以《金莲花》（1957）、《貂蝉》（1958）、《千娇百媚》（1961）、《不了情》（1962）等四片在亚洲影展中获最佳女主角奖，连续四届，高踞亚洲电影皇后宝座，影迷数以千万计，遍及全球。此一辉煌伟大成就，不仅为中国电影史上空前未有，且为世界影坛所仅见。”

香港是这样一个社会：一方面有着代表现代文明的尖端科学技术，同时又保存着中世纪甚至蛮荒时代的愚昧和迷信。前几年，制片厂里闹“鬼”，搞得人心惶惶。这本是一些人的恶作剧，公司本可以查明真相，惩处闹鬼的人。可是，堂堂影片公司却请来巫师，念经捉“鬼”。

巫师中有一人，自称精于相法。林黛请他看相，只见他故作玄虚地捣腾一通之后，便断言她“四七之年开花，六五之年结果。可能在劫难逃。广行善事，可以消灾降祥。大难不死，后福无量，起码当上4届影后。”

林黛当时疑信参半：她身体正好，说她30岁要见上帝，那真和蝉联4届“影后”一样。是不可设想的！但后来，第4届影后当成了，当年的阴影

也就罩上心来，可不是，自己生宗翰那年不正是四七二十八岁么！她越想越愁，这时，那位预言的巫师因为行骗露了馅，砸了饭碗，登门向林黛道歉，声明当初纯属胡编，后来不过巧合，请她不要相信。但，谎言的影响是收不回了，它像个魔影般地潜伏着，到1964年7月17日，终于攫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林黛与龙绳勋住在渣甸山花园大厦4楼1号，雇有8名女佣人，一名做饭，一名带小孩，一名管理杂务。林黛对佣人一向是尊重的，从来不对他们发脾气，就是在佣人做得不对的时候，也能忍让。有一次，他们夫妇领着两个朋友回家，恰好两人都没有带大门钥匙，按了10多分钟门铃，还没有人出来开门。龙绳勋到附近借电话打回家，只听到一串“忙音”，他们拍打着大门，甚至用脚踢，闹得隔壁四邻都出来张望，佣人这才睡眼惺忪地出来开了门。林黛仍然没有生气，把客人领进屋，又赶紧把佣人为了不影响睡觉而拿开听筒放回电话架上。客人忍不住说佣人太懒，林黛却说：“她也是人嘛，累了当然要睡。她也许以为我们不会那么早回来，原想打个盹，谁知一睡就熟了。”

林黛有了孩子之后，下班回家便将全副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家庭帐目由管理杂务的老佣人阿带兼管。一天阿带说，一年来家用超支约6000元。林黛建议算算帐。阿带是跟随龙家多年的老佣人，以为林黛不相信自己了，顶撞了她一句：“你不配。”这句话，伤了林黛的心。龙绳勋又为阿带说了几句好话，林黛觉得丈夫竟不站在自己一边，更伤了她的心，因此吵了起来，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到了母亲家里。

7月16日，林黛在母亲家几次给家里打电话，要家人接她母子回去，但接电话的佣人却不大客气。林黛忍无可忍，积了多时的怒火爆发了，赶回家里当即开除了阿带。待龙绳勋回到家里知道阿带被开除，两口子又发生了冲突。

林黛说：“佣人欺负我，可你总护着佣人，你心里有没有我？我死给你看！”

“你不要总是拿死来吓唬我！”

“好！你等着吧！你别后悔！”

说着，林黛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屋门，当晚再也没有出来。龙绳勋叩门三四次，都没有叩开房门。他只好到一家酒店去过夜。第二天下午1时，龙绳勋回到家里。他敲着林黛的房门，大声叫着林黛的名字，但没有应声。他慌了，破门而入，只见林黛卧在床的右侧，样子安祥，左手握着儿子的照片，右手握着圣母像。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在林黛的化妆台上，发现了她留下的一封遗书，遗书上写着——

“绳勋：万一你真的想救我的话，请千万不要送我到公家医院去，因为那样全香港的报纸都会当笑话一样的登了，只能找一个私人医生。谢谢你。林黛”

救护车风驰电掣地把林黛送到医院抢救，可是，一切都晚了。

林黛的死，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的谜：她为什么自杀！是因为青春消逝？是因为事业失败？是因为家庭地位受到挑战？……

都像，然而都不像？她年未及30，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走。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是牢固的，前不久，她主演的《白蛇传》仍像往常一样叫座。邵氏公司与她签的合同已订到1970年……她的片酬年年增加，已达到每片5.7

万元的高峰。她财产总超达数百万元，影星中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她与丈夫一向伉俪甚笃，即使小有摩擦，又何至于舍弃爱子 自寻短见！龙绳勋和林黛的母亲认为，林黛的死可能是一次“弄假成真”。她留下的字条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还举出林黛将要在那几天办理的许多事情作证明，她并没有自杀的动机。香港的法院对林黛的死因作了调查和裁定，认为她不是自杀，不是彼杀，而是死于意外。结论是：“林黛死亡时间约为当日上午7 时半至 9 时半之间。陪审员以多数裁定死者因为服食过量的巴比妥引起意外死亡。”这一结论也不够明确。林黛的父亲程思远先生分析林黛死因时说：“最主要看到她精神生活的空虚。她后来在电影圈里所接触到的一切，都不会对个人的修养有多大帮助。一受感触，易走极端。”许多人认为，程先生的分析是中肯的。

林黛死了。她的死是社会的悲剧，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一个脆弱者的精神崩溃。

荒野中的孤女坟

——评剧皇后白玉霜之死

白玉霜，我国著名评剧演员，电影明星，曾被誉为“评剧皇后”。1942年被黑暗的社会迫害致死。白玉霜出身艺人家庭，从小学艺，一生受尽磨难，在她红极一时时，曾想隐退山村，过平民生活，但未能成功，人们由此又把她称为“豆腐西施”。

一霎时，她——倾国倾城的一代名伶，气息微微，眼神散乱，沉重的病躯骤然变得像纸一样的轻薄，一缕香魂飘飘悠悠地向永恒的黑暗里坠落下去。

顽疾已经用痛苦的枷锁将她捆绑一年多了，她像古希腊悲剧中的墨勒阿格，被一种超自然的毒火日夜地焚烧着，无休止地承受着浸入骨髓的痛楚折磨。每逢痛到极点全身麻木之后，她孱弱的身躯才得走入无知的梦境，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在睡梦中略微恢复一下疲竭的体力，然后再去忍受那无法忍受的折磨。

团团灰暗阴冷的迷雾从她身边擦过，意识的火花忽暗忽明。她回首望望，她所走的是一条泪痕斑斑的曲径。凄楚迷乱的人生，这使她更加无望，更加情绝。她孤零零地来到了这个凉冷的人世间，如今，又孤零零地从这个冰冷的人世间离去。

她慢悠悠地又睁开了眼睛，在暗淡的光线里摇晃着几个人影。她痴滞地凝视着那些似曾熟悉但又陌生的面孔。

白玉霜的继母胖李奶奶还俯在她的身上，用手帕为她擦拭着额角渗出的汗珠。

她微微地仰起了头，用畏怯和乞怜的眼光在灰暗的屋子里搜寻着。她搜寻到了，在屋角里坐着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满脸忧伤，一身泪痕。他也是个风尘中踽踽独行的旅客，租籍广东，为了避灾弭难来到了北平，寄寓在王府井美白理发馆经理、他的乃叔的门下。白玉霜第二次回到北平唱戏，在美白理发馆里理发时结识了他。从此，便在罪孽的人寰里建立起感情。

“妈妈！”她声音颤抖地说。

“孩子，你还有什么话？”胖李奶奶凑过身来。

“妈妈，我为您出了一辈子的力，现在，我只求您一件事，希望您能够答应我……”

“什么事？”

“我想要结婚！”

“啊？！”老太太惊呆了，屋里的人也都惊呆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病人昏迷中的呓语，还是那倍受侮辱的生命所迸发出的痴情的绝唱。

“我想要结婚！我想要结婚！”她又寻望了一下坐在屋角里的中年人邝某，期待地问：“你同意吗？你同意和我结婚吗？”

屋子里的人都沉寂无声，心头上比压着一块石头还要沉重。中年人走到她的跟前，默默地拉住了她的手，向她点了点头，酸心的泪珠簌簌地滴在她的手背上。

她满意地笑了，眼里滚动着感激的泪花：“你，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

“咳，我活到了今天，总算有丈夫了，有自己的丈夫了！这不是演戏，

不是在舞台上，不是与人假扮夫妻！”她咳嗽了一阵子，气息越来越微弱，但嘴里仍在呢喃：“不是演戏，不是假扮夫妻……”

人们哀叹，伤心，悲泣，用难以描述的复杂感情，为她操办着婚礼和葬礼所需用的物品。

她为什么在临终之前，又蓦地想起要结婚呢？

难以理解的事，说起来也很容易理解。评剧舞台上另一朵奇异的名花，自号为“评剧大王”的刘翠霞病死了。在那个社会里，一个女伶不管名声有多大，才艺有多高，但雨打飘萍的生活和凄凉卑微的身世，使她们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的结局。刘翠霞看到了这一点，临死前曾向与她同居的陈某提出了正妻的身份问题。那个姓陈的还算是个仗义的男子，刘翠霞死后果然以正妻的名份厚葬了她。一些老艺人看到了无不感叹地说：“刘翠霞总算有眼睛，我到了个有良心的人，死后没有被葬到孤女坟里去！”

什么是孤女坟？在有鬼神的世界里，那是个荒凉凄冷的海隅，被人遗弃的孤岛。按照封建礼教的世俗规定，一个成年而未嫁人的女人，就不能埋列祖坟里去，只能在荒野的地方孤零零地起个孤女坟。

白玉霜在弥留之际想到了这可怕的结局，全身吓出了冷汗。她真的要像戏曲里唱的“天尽头，何处觅香丘”吗？她为了寻觅一杯净土，寻觅一杯不被遗弃在荒野的角落里的净土，才在生命最后的刹那，做这一番绝望的挣扎。

她在邝某的手里，满意地合上了眼睛。但是，等待她的不是笙管笛箫的花烛洞房，而是咽暗掩泣，阴风惨惨的灵堂。她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做新娘子的甜情蜜意，魂魄便已飞到虚幻的鸿蒙太空。人生。多么短暂的人生呀！1942年8月10日，这个评剧皇后便悄然地离开了人间。

命运之神是不肯轻易向人妥协的。白玉霜生前竭力挣扎想要摆脱掉的悲剧，死后依然落到悲剧之中。没有哪家的黄土垄中，肯收留她那副“轻贱”的骨头，没有哪家的坟茔肯收留她那荡荡孤魂。她到底还是作为孤女坟主而被埋在天津公墓里，墓前一块小小的石碑不明不白地记着：“李桂珍之墓”。甚至连评剧演员或者是白玉霜的字样都没有留下。仅仅这一块荒凉的石碑，就给人一片荒凉之感。

“咳，又是一个无亲无故，孤苦伶仃的女人！”路经此处的人不免要唏嘘感叹地说。

有谁知道，她就是那红盛南北，赫赫有名的评剧皇后，电影明星白玉霜呢？

1937年2月，正当白玉霜红得发紫，人人倾羨的时候，一条奇特的新闻又在白玉霜身上发生了！白玉霜与人私奔了！

白玉霜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并为这种追求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如今她唱红了，人们看到她红衫翠袖，车接车送的好不福气，可是人们看不到她内心里的痛苦。不知道在那欢歌笑语的生活里一个女伶所受到的蹂躏和摧残。她的身心无时不在污浊中淌着血，淌着泪。

在那个年月，一个女戏子越是唱得红，越遭来更多的妒忌、中伤、暗算和烦扰。

最使她感到痛苦不堪的，还有她与继母李卞氏之间的关系。李卞氏生得胖乎乎的，一身是肉，因此外面都叫她胖李奶奶。她视财如命，刁狠贪谄四个字让她都占全了。白玉霜戏班表面上挂的是白玉霜的名字，实际上是她一人当家作主。她把白玉霜当成摇钱树，一心只想搂住这棵树不断地给她摇下

钱来，至于女儿的婚姻、恋爱、个人幸福，她则一概地遮拦。

1937年，白玉霜已经整整30岁了。在那年月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很难听的岁数；特别是像她这样身世的女人。在生活上，她也曾有过热烈的追求。女性的柔情，倾心的爱慕，颤抖的激情，她不只是在舞台上才有，在戏里面佯装，奔放的个性不会饶过她在这方面的渴求。她渴求女人的一切，她要有女人所应当有的一切权利。可是胖李奶奶不会轻易地放过她，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巫婆，她知道该用什么魔法缠住海的女儿，缠住她那颗奔放的女人的心。

“你不能嫁人！有丈夫就别想唱红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谁会花钱去捧一个有丈夫的旦角？”她用无数的实例拦住女儿一颗奔放的心。

对于艺术上成功的渴望，还有那些浮浅的虚荣之心，紧紧地羁绊住她，羁绊住她在生活上勇敢追求的思念。

久而久之，内心的失望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她必须毁弃自己，毁弃艺术，毁弃她呕心沥血所争得来的一切。成功，名望，虚荣，都不能满足她了，她要追求生命的真谛，要求返本归原于自然的本体。

她被俗念的灰尘蒙蔽的心灵得到了净化，眼前的景物豁然开朗。于是，她不顾一切地与人私奔了。旧历年底封箱后的那一连串表演，一半是用来掩饰她内心的慌乱，一半是用来遮人眼目赌中安排好她出逃的计划。

更为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与白玉霜私奔的人，既不是风流小生，也不是洋场阔少，而是白玉霜戏里班里的一个乐工——打饶钹的李永起。

李永起是个乡下人，自小就来到戏班里做事。他的一对饶钹打得有声有色，很受人欢迎。他为人老实厚道，对于母亲极其孝顺。有一次母亲生病，他背负着母亲步行了几十里路出外投医。白玉霜喜欢这个淳朴的人，她浪迹江湖几十年，什么风雨没经过，什么样心肠的人没见过，与那些口蜜腹剑、朝秦暮楚、信口雌黄、指山卖磨的人相比，她在李永起的身上找到了人的本性。她要冲出那丝竹粉墨的牢笼，虚情假义的巢臼，不正是要依托在这个人的身上吗？

“勘破三春景不长，素衣顿改昔年装。”白玉霜与李永起回到了他的农村老家，在依傍田野的小屋子里，在爬满青藤的瓜棚架下，在崎岖狭窄的田垄上，心境平和地去寻觅那青春的残阳。白玉霜换了一身村妇打扮，隐姓埋名，想在这个被人遗忘的恬静角落里，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生活。他们夫妻两个开了一个豆腐坊，李永起做豆腐，白玉霜卖，倒真的做起“豆腐西施”来了。这也是她的一种追求，是对她过去受侮辱受损害的身世的洗涤。总之，她想凭借自己的大胆和梦幻，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一个红遍南北的名伶，本来就不容易隐匿起来，而她自己又不注意隐匿。任性、大胆和过于泼辣，又破坏了她那恬静的乡间生活。

然而，最使她得不到安生的，还是她自己内心里的烦躁。她曾下定决心要抛掉艺术，告别舞台。那是她在两种追求中间所做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如今冷静下来了，一种追求得到了满足，那丢掉了的一种刮心绞肠地牵惹她的心思。她的生活不能没有戏，虽然她早已厌倦了那逢场作戏的人生。

自从白玉霜出走之后，胖李奶奶在上海单靠一个小白玉霜支撑不起门面，几天之后就收拾起戏装返回天津老家了。

小白玉霜逐渐成长起来了，她吸收了养母的许多长处，唱得也很好听，观众逐渐喜欢起她来。白玉霜听到小白玉霜渐露头角的消息，心里就更不是

滋味了。田间的小路，潺潺的流水和屋角的桑榆，再也留不住她勃然兴起的雄心。1937年夏天，她又自动地返回故里，找到了她的戏班，登上了已经久别的舞台，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但是，在那个污浊邪恶的社会里，不会因为一个女演员是个名人、红角，她的地位就可抬高几尺，黑暗势力就会放松对这个柔弱可欺的女子的侮辱与欺凌。相反，他们还正因为她有钱、有名、有姿，要想着法儿来讨她的便宜，橡胶欺侮一个小尼姑那样显勇敢。示阿Q们的在旧社会里那些唱戏卖艺的人除了要受官绅士豪的欺压之外，还要受一些报屁股文人和下流记者的敲诈勒索。哪一个关节没有打发好，他们就会搬弄起事非，无中生有地给你登上那么一小段。等你出来抗议，他们过两天来一个更正或辟谣。可是这种事情是更正不了的，一般的人看那些无稽之谈的多，看那些辟谣和更正的少。而且谣言一出，舆论大哗，你的人格、名誉以及营生都要受到损害，所以，一般的艺人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一点，也要按时按节地把银子送到报界那些老爷手里去。

有一次，白玉霜不知怎地忽视了这个关节，没有按时把银子孝敬过去，无形之中得罪了一些人。于是，在《新民报》上就登出了一篇半诬半骂的狗屁文章。白玉霜自知得罪不起，便托人请《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到前门外同和轩里去吃饭。这真是那座庙不烧香也不行，哪位菩萨不拜也不灵。白玉霜只好认了这场破费，恭恭敬敬地请了酒席，并在席上递过去一个不大不小的钱包。吴总编辑接受了这双重的厚意，谁知得意没有多久，刚刚离去那里不远就被抗日除奸的人开枪把他打死了。

总编辑该死该活，是他自己的气数。他花了昧心钱，做了昧心事，死心塌地给日本鬼子效劳，被打死是他的报应，原本得不着花钱请他吃饭的白玉霜的事。可是当天，白玉霜就被抓走了，扣押了一天之后，被当作政治犯给监禁在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里。

白玉霜演过《可怜的秋香》、《可怜的芸娘》，可是谁也没有她自己可怜。她在日本宪兵队里受到了惨不忍睹的酷刑。日本人把她的下身扒光，由两个凶手用棕毛绳子拉磨她的阴道，血流满地，白玉霜凄厉地惨叫了几声，就昏倒过去了。

白玉霜在日本宪兵队里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受尽了折磨，不仅使她花也似的容颜被摧残得不像人样，而且那次酷刑，竟使她落下了致命的病根。

旧社会的艺人都有自己一部酸心的血泪史，但还没有听说过谁，比白玉霜受到的摧残和凌辱更多。她那顶皇后加明星的桂冠，给她带来的却是更多的不祥和灾难。

后来又是花了很大一笔钱，买通了宪兵队里一个姓金的人，才算把她从狱中解救出未。白玉霜出狱之后，身体便孱弱下去了。从前那丰腴膏润的肌肤已荡然无存，鲜艳的脸色也黯淡下去，只剩下一双大眼睛空空荡荡地转动者，让人看了更感到心酸，可怜。她还是照样地唱戏，一天两场风雨不停。这一方面是她继母胖李奶奶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不让她空过一天地给她挣钱，另一方面，也是她自己刚强，不肯向命运低头。一旦不登台演戏，她也觉得生活空荡无味，没有意思。有时，她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要靠人搀扶走上台去。可是一旦上了台，她就完全变了样，对艺术的酷爱会把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调动出来。

1942年，白玉霜彻底地病倒了。摧残和劳累，冲垮了她体内最后一道健

康防线。她住进了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经医生检查，得的是子宫癌。

当时的人们对于癌的可怕性还不甚了解，因此，白玉霜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病情稍微稳定之后就出院了。回到天津之后，她仍然照样坚持演戏。不仅演出，还要排练新戏。那时尚小云正在上演《梅玉配》，她看了戏后便想法子托人找来了本子，自己每天背台词，练身段，甚至连唱腔都设计出来了，要不是因为后来病危，她一定把这出戏移植过来。

有一天，她正在天津北洋戏院里演《闺门劝婿》那出戏，还没演到一半，癌细胞突然破裂，血流了一腿，艺人们看她实在可怜，劝她底下的戏就别唱了。白玉霜惨淡地对大家笑了笑，有气无力地接过人们递给她的一杯水。喘吁了一阵子之后，仍然让人将她搀扶到戏台上。她说：“我死，也要死在戏台上！”

不久，白玉霜病情就恶化了，重新住进了医院。生命，跌落到无望的深谷里。

她病体枯槁，形消骨立，在病床上忍受着痛心的折磨，忍受着痛心的毁灭。

她曾几次昏迷过去，一身无主地向那永恒的黑暗中沉落下去。

最后，她终于在那灰茫茫的无垠中消逝了。

话剧皇帝和他的妻子

——金山、孙维世夫妇之死

196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刚刚入睡的金山夫妇唤醒，金山的妻子孙维世坐起来望望窗外，天刚刚发亮，这么早，会有什么人来呢？

金山拉亮电灯问：“找谁？”

“金山在家吗？”

“干什么？”

“剧院让我们来通知他去参加批斗会。”

孙维世穿好衣服，打开房门，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吹了进来，而跟着这股寒风进来的却不是剧院的群众，而是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公安人员。

“你是金山吗？”没等发愣的孙维世发问，他们抢先到了金山跟前问道。

金山点了点头：“是。有事吗？”

金山说着拉了两把椅子，他的“请坐”两字还没来得及出口，一个公安人员便抢先一步，“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孙维世扑了过来，厉声质问：“干什么？金山他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逮捕他？”

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掏出逮捕证，朝孙维世一亮：“对不起，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随即把手一挥，两个人把金山一架，推进了等候在大门外的吉普车。

金山被捕后，孙维世托朋告友，公开和秘密地投人奔走，打听，结果几天下来，谁都无法知道金山的下落。因为逮捕是秘密进行的，根本没有告诉家属他犯了什么“罪”，何时审判，关押在哪里？

此时，金山被关进了北京郊外一座特殊的高级监狱里。许多无辜受害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都秘密地关押在这里。金山住的是单人牢房，只有6平方米，为了防止自杀，电灯高高悬在天花板上，即使弹跳最好的运动员也无法摸到；暖气片也安装在天花板里，室内除了一个大小使用的抽水马桶，没有任何床椅板凳，只是在水泥地上铺着一块特制的厚厚的草垫子，作为睡觉之用。这里，终年见不到阳光，整日整夜都在惨白的灯光下受到监视，为了让门外的看守随时能看到“犯人”的脸，睡觉时不许来回翻身，只许脸朝牢门侧身而卧。

金山一进监狱，便被推光了头，穿一身黑色的囚衣，没有钮扣，胸前只用一根短短的带子系绑着。由于见不到阳光，他脸色苍白，往日那漂亮的发式，连同他那翩翩风度，谈笑风生的神采，都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金山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作为地下党员，半生闯荡出入虎穴，当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李宗仁的座上宾，可还未尝过铁窗风味。如今，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却被陷害投进监狱。他越想越气，大声疾呼：“我不是囚犯！”

可惜的是，能听到他这激愤声音的，除了发着寒光的刺刀和铁窗，就是警卫冰冷的面孔。

渐渐地，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金山只有沉寂下来，默默地在这单人牢房里昔度着岁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申辩、说理均已失望，每天唯一能

做的事，就是面对铁窗，暗暗地为他日夜思念的妻子孙维世祈祷……

而此时的孙维世，也正处在危险之中。人生好像什么都有预感似的。1968年春节前夕，孙维世和妹妹孙新世的相会，显得格格外难舍难分。姐妹俩沿着北京南长街，慢慢地走着，突然孙维世停住脚，庄严地说：“妹妹，请你记住，无论遇到什么打击和摧残我都会挺住的。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

此话不幸被言中，在那以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孙维世被捕了。而陷害她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她和金山婚礼上赠送漂亮床罩的江青和林彪的老婆叶群。

孙维世因系烈士子女，又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亲自抚养下长大的。这种特殊身份、地位的孙维世，全国有那么多的高级人物追求她，可她却偏偏看中了与江青有过矛盾的金山，和他给了婚，这当然不能不是孙维世遭受江青记恨的一个原因，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原因。江青之所以要迫害孙维世，还有更阴险的政治目的，那是企图通过搞孙维世，栽赃诬告，往周总理脸上抹黑，进而整周总理。另外，江青感到，孙维世在文艺界崛起后，对她桀骜不驯，一贯不买她的帐。

而林彪的老婆叶群，对孙维世就更加恨之入骨了，早在孙维世在苏联留学期间，林彪就曾是孙维世的热烈追求者，尽管他回国后与叶群结了婚，但对孙维世仍然很感兴趣，这一切，都没有瞒过叶群，因此，当“文革”中，江青对叶群提起孙维世这个名字时，她马上妒火中烧，咬牙切齿地说：“她是我的仇人。现在趁着乱，你去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1968年3月1日夜晩，也像去年12月逮捕金山一样的神秘，只不过这次动用的不是公安人员，而是清一色的空军打扮。天彻底黑下来之后，两辆军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开进了北京饭店西侧南夹道，车上跳下9男1女，他们迅速地将孙维世的住宅包围起来之后，先派一人去叫门。与逮捕金山时一样，他们谎称是剧院的同志，门一开，他们便亮出了逮捕证，孙维世看着明晃晃的手铐，一切都明白了。她略略拢了拢头发，顺手捡了几件常用的衣物，便默默地随同他们走近停在外面的汽车……

1975年，金山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在单人牢房里，关押了将近8年。释放那天，当金山刚刚从监狱里走出来时，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那红极一时，饰演过宋丹萍、屈原、保尔、施洋大律师的风度翩翩的大明星。由于长期强制睡觉时脸必须朝外，他的一只耳朵压聋了，两只眼睛也失去了炯炯有神的光芒，他面容枯槁、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耳聋眼花。这时北京已进入暑期，但金山依然穿着一条丝棉的棉裤，他拄着拐杖，两眼发直，一瘸一拐地走出了监狱大门。他以为，孙维世肯定会在监狱门口迎接他，可是直到看守人员催他上车时也没有见到孙维世的踪影。

原来，孙维世一进监狱，便被定为“关死对象”，把她的名字改为“孙伪士”，一直戴着手铐。这令人窒息的铁窗生活，使得孙维世一天天郁闷在胸，蚕食着她的健康。而牢房中，故意日日夜夜亮着特别刺眼的灯光，又使她头晕目眩，无法入睡。当她实在支持不住，刚要合上眼的时候，天花板上安装的一种自动审讯仪，便突然鸣响起来，发出一种声嘶力竭的叫喊：“交待！你快交待！老实交待！不交待死路一条！”如此歇斯底里地不断重复，震耳欲聋，又使她的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她不肯揭发父兄的“罪行”；

不肯诬陷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就不可避免地招致拳打脚踢，车轮批斗。孙维世在入狱之前，正是年富力强，身体很好，没有病过，但关进牢房之后，经过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加之她心情悲愤，仅仅7个月的时间，孙维世便于1968年10月14日被折磨死去。直到死时，她的手铐都没有取下来，据同狱人讲，她的尸体赤裸着，遍体鳞伤，让人惨不忍睹，可怜！可叹！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女导演，年仅47岁，竟这样死于非命！

金山万万没想到，出狱后迎接他的，竟是妻子惨死的消息。他连着许多天闭门谢客，独坐在孙维世的遗像前，时而追思往事，时而放声大哭。金山哭得是那样伤心，那样凄楚，以至许多人听了都禁不住泪湿衣襟……

在很长的时间里，金山还是沉浸在对孙维世的哀伤中。有一次，他竟把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误认作妻子，因为她们俩人确实长得很像。

以后，丈夫病故后一直寡居的孙新世，就常来照顾家破人亡孤独一人的金山，渐渐地，由于对孙维世的共同怀念，这两个不完整的家庭合成了一处，这两个同样饱受风霜的苦命人结成了夫妻，互相关顾，以度天年。

“四人帮”跨台之后，金山的健康出现了奇迹，精神上的解放，使得他枯木逢春，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他又恢复了原先精神抖擞、思路敏捷，两眼变得炯炯有神了，六月天不仅不必再穿丝棉裤，就连拐杖也索性扔掉了。他一头乌黑的头发，又变得风度翩翩了，尤其是谈起话来，更是恢复了原有的幽默、激情、滔滔不绝。

1978年，中央任命金山为我国戏剧艺术的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从此，他又不顾一切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有人劝说金山，应该注意身体，可金山认为，这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只有全力冲刺，鞠躬尽瘁方能对得起中央领导的重托。

金山曾说：“我要陆续出五本书，其中最后一本，就是我的自传。”

遗憾的是，金山的这番话讲完还没有一个星期，他便溘然与世长辞了！过去。因为金山不愿宣扬自己，同时也是因为他在解放后政治上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他没有留下详尽的文字。

1982年7月6日晚上6点半，紧张工作了一天的金山从北影回到家中，感到十分疲劳，但想到晚上8点，还要到赵寻家开会，讨论电视剧艺委会的机构及人员安排问题。所以他没有顾得休息，就匆匆走向餐桌。当他吃了一半时，突然感到有些痉挛，从菜盘里夹起的黄瓜掉在了桌子上，待他再去夹时，双手开始不听使唤，那块黄瓜怎么也夹不起来了，接着筷子脱落，半边身体感到麻木……

可金山此时想到的依然是工作，他低声叮嘱孙新世：“你给赵寻打个电话，晚上的会我可能去不了，请他明天一定去北影谈《路》的意见吧！”

孙新世正在给赵寻打电话的时候，金山突然晕倒了。赵寻意识到情况危急，敦促孙新世立即送医院急救。

金山被送进北京一所高干医院。虽然病情万分危急，但是却不能立即住进病房组织抢救，只许停放在观察室内进行观察。因为这里是有级别限制的，金山这位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虽然有着电视剧艺委会主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一系列高级职务，但据说这些均只是相当于部局级的待遇，而这里接收的必须是现任部长职务的干部。

十万火急，百般哀求，均无法改变这里的规定。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孙新世及其同事们心焦如焚。8点钟，赵寻从家中赶到了医院，他一

见金山的两只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只能用两道幽光默默地注视着他，而两片嘴唇微微地颤动着，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嘴张着，却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这是生命垂危的象征，再不住院抢救，就来不及了。赵寻当即抓起电话，打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了金山的病情以及在医院的遭遇。赵寻最后手握话筒，含着眼泪恳求邓力群同志：“文艺界三十年代的干部，至今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像金山这样海内外有影响的老艺术家，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地抢救啊！

邓力群听完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卫生部长崔月犁。崔月犁一听这般情景，也很着急，他转而又给医院打电话……可是，经过这样的几次辗转交涉，待金山获准从观察室送入病房时，已是将近夜里11点钟了。整整延误了3个小时！这3个小时，对于一般人来讲，也许不算什么，对于像金山这样生命危在旦夕的暴病老人来讲，一分一秒都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啊！如果没有那么多繁琐的手续，如果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金山经过这3个小时的及时抢救，也许还可能多活上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年，试想那样的话，金山又能给我国的艺术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然而，这3个小时却无可挽回地消逝了。金山脑血管破裂，终于在7月7日凌晨4时，因脑溢血而猝然离去……

一颗巨星陨落了。作为一代名流，他虽然永远离开了舞台，离开了影幕，但是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却将永远留传于世。

阿丹在音乐声中长眠

——著名影星赵丹之死

赵丹,我国著名电影演员。从30年代起,由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以及解放后拍的《李时珍》、《海魂》、《烈火中永生》、《林则徐》等影片普遍受到国内外观众的赞誉,在国际电影节上逐为我国争得多次荣誉。赵丹一生曾两次入狱,一次是遭到反动军阀迫害,系狱5年。另一次,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关押5年多。1980年10月10日,赵丹死于癌症。在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逝世前的几个月里,他的许多老朋友都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的回忆文章,记述了赵丹的最后岁月。

著名作家李准听到赵丹同志有病的消息,是1980年6月,当时李准在河南,曾两次打长途电话到医院询问,黄宗英让赵丹亲自和李准讲话,回答还是那个豪爽的声音:“没有事,排除了。7月间他从安徽拐到上海去看赵丹,到上海后,先打电话给黄宗英,想不到她听到李准来了之后,竟在电话里哭起来,一直哭了两三分钟说不成话。李准像一个兄弟批评嫂子那样大声地说:“你这样不能控制,能经得起大事吗!”黄宗英哭着说:“下午你见他就知道了。”黄宗英替黄宗英解释说:“这事情,太大了!她确实担当不起……”

下午,他们一起到医院,第一眼看见赵丹,床上像躺了一个消瘦的青年。三个月前,他们在一起时那种豪纵奔放、高谈阔论的神情不见了。这不由使李准一怔。大家约好都不要流泪,黄宗英嘱李准多给赵丹讲些笑话。李准勉强讲了在黄山的笔会上大家起绰号的笑话,赵丹努力大声地笑着,当时大家心里都比刀子割还难受,他们想安慰赵丹,赵丹却在用笑声安慰他们,李准清楚地知道赵丹这个人害怕看见别人哭,害怕别人心里痛苦,即使在生命临终前,也害怕别人哭,赵丹写的“天下都乐”这四个字,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生命“宣言”。

那次在医院临别时,他们又握了一次手。赵丹小声对李准说:“李准,我对不起你!”李准忙说:“不,不,我对不起你。”他们讲这些话,内心是十分沉痛的,刚打倒“四人帮”后,李准在北影见到赵丹,十五六年没有见面,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李准说:“只要你还活着!”赵丹说:“只要你还活着!”在“文化大革命”前,赵丹想演李准写的《吉鸿昌》,没有实现,成为憾事。后来又约李准写一个《三兄弟》喜剧,把赵丹和谢添、魏鹤龄三个人写在一个戏中,由沈浮导演,这个计划又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后,大家重逢在和煦的阳光下,都想着要大干一番,为国家为人民真正做点事情,没想到赵丹竟是如此坎坷,如此薄命。

著名作家曹禺1980年9月12日的半夜,接到电话,他听到张瑞芳急促的声音,说第二天下午4时在北京医院门口,她托人在门前等着,可以一同进去看赵丹。

翌日,他们来到医院,宽宽的甬道上,寂静无人。找到赵丹的病房,他的门上悬着“严禁会客”的木牌。他们在门前倏然停下来,揣测着进门后,他已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轻轻敲门。赵丹躺在病床上,左边挂着输液瓶,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年前曹禺在和平宾馆里遇见赵丹时,他的身体极好,脸似乎园园的了,穿一身漂亮洒脱的西装,从楼上跑进饭厅,笑呵呵地招呼曹禺,浑身的

精力鼓得要爆出来。像是个生气勃勃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现在，一脸胡茬子，清癯的面庞黑黑的。虽然瘦了，两颊凹下去了，但气色还好，神态安详，不像病得那样重。

他们轻轻挨着赵丹的床沿，他忽然睁开眼。一看出曹禺和张瑞芳，便紧紧抓住他们的手：“你们来了！”他顿时笑了起来，谈这问那，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阿丹，你气色很好。等你出了院，再见面时，一定要给我一幅你的画！”曹禺不知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记得张瑞芳曾当着赵丹对他讲过，“你说他画得好比夸他演得好，他要快乐得多！”

“一定！一定！我正要开展览会，你看哪幅画满意，你就拿哪幅去。”赵丹大笑起来。

赵丹不肯谈他的病，大家也不肯问他的病。见着老朋友，赵丹仍是很开心的。平时，他们见面常常互相笑谑；这次，曹禺就在他身边犯傻。张瑞芳找话说了一阵，其实，不知有多少心里话想说出来安慰他，但还是没有说够，终于被护士长催出去。

临行，赵丹定要和大家一个一个地握手，使大家心里难过极了。

著名戏剧家吴祖光 1980 年 10 月 8 日接到黄宗江电话，说阿丹病危，说阿丹本人和宗英都希望吴祖光去看看。

当吴祖光推开病房门时，静卧在床上右臂正在输液的赵丹低声叫出他的名字。赵丹手心滚烫，显然正在发着高烧。然而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拉着吴祖光很久没有松开。他问新风霞的病好些没有，甚至还问到吴祖光儿子小欢写的电影剧本的情况。黄宗英说他有时清醒，有时昏迷，而吴祖光最后看见的赵丹是十分清醒的。

接着赵丹让儿子赵劲拿来一本赵丹新出版的《银幕形象创造》，并以绿色水笔用左手在扉页上写了八个字是：“凤霞祖光纪念阿丹”。

赵丹用了意味深长的“纪念”两个字，教人心酸。

赵丹的老朋友，在中国工作的苏格兰女专家白露（帕垂希娅·威尔逊去看望赵丹时，赵丹和他全家的好友方大夫和黄宗英正在那里。他们在病房里呆了一会儿，发现赵丹神色疲惫不堪，就准备离开。但是赵丹让他们别走。他用尽全力在他的刚出版的新书《银幕形象创造》上为方大夫夫妇签名留念。他平躺在床上，由孩子帮他捧着书，艰难地写下了他的题词和签名之后，又打算在送给白露的那本书上签名。可是那时，他已精疲力竭了。

“行了，”他的亲人们劝阻他。但是他却坚持要写下去。“行了，别写了！”他们再次恳求他。赵丹对他们的恳求毫不理会，坚持继续写下去。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写完他的签名。据黄宗英说这是阿丹最后的手迹。赵丹是个出色的书法家，这一点可以从他即将开幕的绘画书法展览上得到证明。但是那天晚上他的字歪歪扭扭，难以辨认，完全可以看出是出自一个垂危病人的手。

白露最后一次到医院去看望赵丹时，只能从窗外窥探他几眼。他的生命正在慢慢离开他的躯体。他说一两个字都很困难，但是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天，他在昏迷中却断断续续，清清楚楚地说到：“形式，内容……《王昭君》是女主角的戏（赵丹曾被邀在电影《王昭君》中扮演匈奴王）……‘一盘棋’剧本还粗糙……坚持……”

著名电影演员金山 10 月 9 日午夜，听见电话铃声，他跳下床接电话，电

话铃中断了。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神态恍惚听错了，但又放心不下，想到8日晚上接到赵丹病危的电话，连忙打电话到北京医院病房探问，没想到赵丹是于3时40分逝世。这时，差不多已将近4点钟，他急忙赶到医院，赵丹的一些老朋友丁峤、袁文殊、黄宗江等已经仁立在赵丹的床前，接着，司徒慧敏、童大林等也赶来了。金山看见赵丹安详地躺在床上，周围围着他的孩子：赵青、赵矛、周民、（周伟没有赶到）赵桔、赵左和赵劲。孩子们有的抓着他爸爸的手，试看还有没有脉搏；有的将电筒的玻璃片放在他们爸爸的鼻孔前，试看还有没有呼吸。黄宗英泣不成声地告诉金山说，孩子们不相信爸爸已经死了。他们执拗地以为他们亲爱的父亲仍然活在世上。

病房里，轻轻地响起了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这是孩子们按照赵丹弥留时的要求放的音乐。阿丹曾说，他不喜欢听哀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的音乐。黄宗英说，人停止呼吸之后，脑子最后才死去。他们让阿丹在音乐声中安静地长眠。

阿丹，你弥留时曾表示，不要开追悼会。人们懂得，你要的不是死后的哀荣，而是生前的工作！

凌晨，她在楼前告别人世

——影星上官云珠之死

上官云珠是我国40年代崛起于影坛的著名电影演员，一生经历了异常坎坷的生活道路，曾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岛风云》、《枯木逢春》等电影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68年11月21日午夜。

夜，静寂得瘆人。没有风声，没有车鸣，没有人语。白日里喧嚣了一整天的各种音响，此时都死寂了，只有摆放在墙角边紫檀方木几上的猫眼绿大理石座钟“咔、咔、咔”地走着，仿佛在数记着一个神秘的数。

上官云珠静静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她宛若一尊木雕泥塑。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睡衣，在这初冬寒气袭人的午夜，她丝毫没有冷的感觉，仿佛已经冻僵了，似乎连血液都凝固了。惨淡的月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上官云珠的身上、脸上、像是铺上一层寒霜。

上官云珠什么时候醒来的？又是什么时候睡下的？或是她今晚原本就没有睡？没有人知晓。

白天在厂里，上官云珠又被单独带出去过。这次提审的时间很长，几乎整整一天，直到傍晚了，才被送回“牛棚”来。

上官云珠同黄宗英、王丹凤、白穆蹲一个“牛棚”。近几天来，黄宗英她们似乎有一种预感：他们如此频繁地提审、逼问上官肯定是为着一宗极不寻常的事情：从上官每次被提审回来后的木然的神情，她们明显地感觉到上官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许这压力是上官很难负担的了。

上官云珠抖抖颤颤地走进“牛棚”来，两眼直勾勾的，似乎在望着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望。王丹凤上前搀扶着上官。黄宗英让上官坐在自己身边，白穆关切地问上官：“他们是不是又打你了？”上官紧紧地闭住嘴唇，什么也不说，仿佛她已经失去了听觉，又仿佛有一把无形的铁钳钳住了她的口，只是身上索索地颤抖着，颤抖着……”

对于上官云珠这时的情形，黄宗英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详尽的记述：

“此时，她是被带出去过，刚回‘棚’。我们发现她浑身颤抖，仿佛是冻得发紫的嘴角边有一丝血迹。丹凤为她倒了一杯开水，她好像没看见，不喝。我用手重重地压着她靠近我的那只腿，我想，这样，也许她会好受些。她张了张嘴，眉毛突然拧在一起，又渐渐舒展开。我望着她的脸，她不看我……”

“我见上官云珠还在颤抖。我问她：‘你怎么啦？’上官不说话。我当时不知道她又遭毒打。我只当是勒令她不许和任何人说话，只当是重病夺去她说话的能力，我只好安抚她说：‘上官，你别怕，快下班了，没人来，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哪儿不舒服？告诉我们，你说话啊！’她似乎根本没有听见。她，在苦想。她那惨白呆滞的脸上，半点表情也没有，像一座石膏像；只有一滴冷泪，从她冰雪般的面颊上，冷冷地流落下来……”

在这以前，上官云珠遭受了不堪忍受的人身凌辱与挞罚，一些平时叫她“同志”与“老师”的人，不但抄了她的家、批斗她，逼她写交待材料，还动辄打她、摧残她。打她的头，打她的脸，打她手术后没有愈合的伤口，用脚踢她的腿与小腹。住进“牛棚”之后，他们单独提审她，早晨去，晚上回来。凡是厂里开批斗会，都把上官拉去陪斗。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样

样都落不下她。他们还勒令上官不准与他人讲逼她交待的问题与内容，不准说在审问时挨打。上官不论在厂里受到什么样的折磨，都不能跟人倾诉，回到家里也不敢说。只有她嘴角边时常残留着的血迹与身上新添的伤痕在向人们述说着她在厂里又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毒打与凌辱……

这天白天她被提去审问时，确实又遭受了一次野蛮的毒打。提审者逼她写一份异常重要的交待材料，写不出来就打。晚上，丈夫贺路到车站接她，从下公共汽车到回家，她一句话没有说。贺路端上热在锅里的饭菜，怎么让她也不吃，嘴里喃喃地说着：“给我写材料，给我写材料……”问她写什么材料，她又不说了，木然地坐在那儿，昔日那双妩媚灵透的眼睛好像干涸了的枯井，没有一点光泽，没有一滴眼泪。

贺路看到她嘴角上的血迹，知道上官又挨了打。贺路轻轻解开上官的衣裳，只见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旧伤痕上印着新伤痕……贺路心里一阵寒栗。他用卫生棉蘸着温水为上官擦拭伤痕和血迹，说：“上官，你难受就哭吧，哭吧。哭出来也许好受些……”

上官云珠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月光已经从上官的身上，脸上悄悄地退去了，屋子里幽暗、静谧。

窗外，一辆汽车“轰麦”吼叫着疾驰过去，那是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武装民兵在夜间巡逻，强烈的白炽光束划过夜空，像是骤然掠过的恶魔的飞翼。屋内，睡在上官身边的贺路“哼哼”着睁开眼，喉咙里咕哝了一句：“睡吧，上官……”侧过身又睡去了。

上官云珠慢慢扶床下到地上，慢慢扶床站起来，慢慢环视一下屋内：曾经摆放过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她的留影照片的写字台，曾经挂着齐白石、徐悲鸿、叶浅予等著名画家送给她的字画的墙壁，曾经无数次地照过她的姿质丽容的穿衣镜，依然在“咔 咔”走着的猫眼绿大理石座钟“——！——！——！”声如敲罄击鼓般地响了三下，此刻是公元1968年11月22日凌晨3时——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清晨，当纷纷攘攘的人世间重又开始喧嚣的时候，上官云珠已经静静地躺在楼前的水泥地上——一颗影星就这样殒落了。

一个好莱坞性感女星的毁灭

——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之死

玛丽莲·梦露，美国40年代好莱坞影星。个人生活辛酸，苦痛，但在银幕上总是明眸皓齿，巧笑嫣然，绰约可爱而风致宜人。因此有人把她的形象奉为二次大战之后到50年代期间美国富裕社会的象征。她曾主演过多部影片，如《王子与舞女》、《不合时宜的人》等。1962年8月4日午夜，她死于洛杉矶她的住所。对于她的死，一直争论了20多年。

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玛丽莲·梦露的艺名和身世，几乎是无人不晓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名从孤儿院出来的姑娘红透整个好莱坞，使多少羡慕虚荣的女孩子羡慕；而她在36岁的风华之年突然自杀身死，又使万千影迷困惑不解。

从红得发紫到香消玉殒，这个薄命的好莱坞女演员的身世沉浮，已可写成一本悲剧气氛浓烈，触及美国明星制度阴暗深处的醒世小说。

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15磅，金发、碧眼、身材苗条，含情脉脉，这就是19岁的诺玛·琼，一个有着美好向往和追求、虽然十分漂亮但身份普通的美国女孩子。她是一个遗腹女，母亲有精神病，因而从小就被孤儿院收养。从少女时代起，她做过裸体模特儿，这就引起了制片商的注意。她不了解好莱坞腐朽堕落的一面，而当她成为玛丽莲·梦露而出名之时，这位号称“性感女星”的女郎，便难以自拔了。

刺激观众的感官，便是制片巨头们的无穷财源。梦露只好丢掉她在斯特拉斯伯格演员训练班学来的表演才能，而听从导演、制片商、经纪人的摆弄。旋风般的崛起，疯狂的广告宣传，千百万张性感的招贴画，一部接一部用低级趣味招来观众的影片。梦露走红了，她主演的电影的票房价值屡屡打破纪录。梦露就以“大腿艺术”成为好莱坞一棵永不枯竭的摇钱树。

在她“飞黄腾达”的日日夜夜，梦露在哪里出现，便招来如痴如醉的喝彩、狂叫和口哨声。她的表演不是没有特色。在摄影机前，梦露以稀有的傲慢伴同着随和的气质，以她相当完美的体型，自然弯曲的睫毛、洁白无瑕的牙齿和偶尔挑逗的动作，赢得了无数影迷。“回眸一笑百媚生”，她使观众倾倒，使好莱坞的老板们倾倒，甚至使美国的政界人士，包括堂堂总统，也把梦露引为座上客。

玛丽莲·梦露一跃而成为美国的一代红星和社会名流，也招来了数不清的流言蜚语。一个靠色相走红的女星，人们的七嘴八舌是可以想见的。

为了追逐超额的金钱，别人利用梦露的美貌和肉体；而梦露为了当一名红星，也利用别人的资本和声名。她陷入了苦闷之中。

梦露为艺术灵感的泯灭而自责和痛苦，她在短促一生中接受最后一次《女士》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介意开玩笑，但我不喜欢被人当作开玩笑的对象。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坦诚的艺术家，但我好像站在一个没有基础的庞大结构上。”这个“庞大结构”就是好莱坞的重重黑幕以及要控制她的强大势力。梦露辛酸地陈述：“他们要你哭，但只准你掉一滴眼泪。如果你掉了两滴，便被认为是拙劣的演员。一个演员不是一副机器，但他们却把你当成一副机器，一副赚钱的机器。”

精神的压抑使她经常失眠，不时服用安眠药，她不得不聘请格林森大夫

作为她私人的精神病医生。

药物和医生无法治好她的病。她的病根在于人生的追求和现实的距离太远了。梦露尽管在银幕上活蹦乱跳，强作欢笑，但她的私人生活却充满了坎坷和不幸。她多次对记者说：“我需要的是一个男人，一段婚姻，一个家庭和孩子。”这个最朴实的女性和母性的愿望都没有如愿。她结过三次婚，却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更没有孩子，她第一次和海军商人詹姆斯·多尔蒂短暂的婚姻破裂时，才十六、七岁；1954年和迪·马吉奥的结合又失败了；1956年她嫁给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到1960年又告离异。

落落寡欢，忧郁伤神，她在同她的好友、诗人卡尔·赛特伯格喝酒闲谈时吐露：别人负己甚于己负别人。

梦露不喜欢梦露，而是喜欢已经逝去的诺玛·琼——她从影前的名字和形象。一次，梦露把自己的一帧照片赠给她的友人，一反她在电影银幕上的作态，她不施脂粉，不露大腿和胸脯，而是身穿晨衣、头发自然，还有点睡态惺松。她在照片旁题字：“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要的是朴实无华的诺玛·琼，这才是她的真情流露。

梦露的真情只能有瞬间的展示，作为一个感情浓烈的女子，她怎能不悲哀呢？！

1962年8月4日是一个周末，这是梦露悲剧一生的高潮。

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有两个来历不明的人秘密窃听、录制她的来往电话谈话。有消息说，她曾扬言要揭发一个重要人物的丑闻，并声称要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显然，她受到了外人不得而知的威胁。梦露早就立下过遗嘱，以防不测。

死前一大，她对人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被人当做玩物。”

周末这一天的早晨，人们还看见梦露脸庞鲜艳。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临终前的最后光彩。

玛丽莲于前一天傍晚5点15分，曾打电话给她的精神病大夫拉尔夫·格林森博士，说她失眠。博士建议她去附近海边兜兜风。她转身对看护妇尤妮丝·默丽太太说：“不想去海边，要不就在这附近转转？”接着说了一声“晚安”，便走进卧室。据说当时没有什么异样之处。

默丽太太说：“我是半夜里睡的，那时，她卧室里灯还亮着，我也没在意。可是，三点钟醒来时，看她房里开着灯，我便起来去看看。门锁着，没一点动静，我心里发慌，跑到院子里，凑着窗帘缝往里瞧，看她样子像是过去了，便赶紧叫格休森博士来。”几分钟后，博士赶到，用拨火棍打破玻璃，进了房间。

玛丽莲一手拿着电话，趴在那里。身上裹着单子。博士看她已经不行了，便立刻请内科大夫思格尔贝格来，确诊已死亡。于是，在清晨4时20分，电话通知警方。

据警方调查，“无任何外伤，房间亦无骚扰痕迹，未发现遗书。床头柜上有瓶倒放的安眠药瓶。估计梦露女士进房不久，约在晚8时左右死去。”

发现的当时，玛丽莲除了“香乃尔五号”之外，身上未著一物。

于是叫来验尸官。遗体给裹着粗蓝布，抬进运尸车里，送到魏斯特伍德停尸场。到了停尸场，是这样登记的：

验尸号码：81128。姓名：诺玛·琼·培克。白人。女性。年龄36岁。身高166.4公分，体重53.2公斤。胖瘦适中，十分健康（按此比例扩大，则

成米洛的维纳斯矣！)。

乔·迪·马吉奥闻讯，由纽约飞抵洛杉矶。

玛丽莲死后第三天，即8月8日，在魏斯特伍德举行了简朴的葬礼。

葬礼由乔·迪·马吉奥主持。按“故人生前遗愿”，影星名流，一律未请。出席者，共23人。均是她生前熟人，裁缝店老板、美容师、司机、广告人、经理人、律师以及迪·马吉奥的儿子。

迪·马吉奥一个人伤心地走在灵柩之前，痛哭流涕，连连说：“我爱你！”她的第一个丈夫装作不知此事；第二个丈夫则一人关在康涅狄格州自己家的农场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律“无可奉告”，赶走了事。如果梦露不遽尔辞世，有人说，她可能同迪·马吉奥破镜重圆。

葬礼上，令人伤心落泪的，是宣读李·斯特拉斯伯格从纽约发来的唁电：

“她创造了一个神话，那只有生平受人欺凌的少女才能完成。对于全世界来说，玛丽莲·梦露无疑是‘永恒的女性’的象征……”

玛丽莲死后的第12天，即8月17日，公布了她的遗嘱。她有不动产合50万美元，将其中的一半（约合25万美元）遗赠给李·斯特拉斯伯格。

看来，玛丽莲内心的唯一支柱，便是她的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

玛丽莲死后，关于她的书和影集，数量之多，在演员中是少有的。在她生前，莫利斯·索洛托夫写过一本她的传记。后来，本·海克特、弗莱德·劳伦斯、李奇兄弟等人都写过，美国至少出了她八种传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宗师之一，诺曼·梅勒写的《玛丽莲其人与死》。

梦露已矣，她离开世界差不多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但梦露热至今不衰。关于她的生平，她的秘闻，她的死亡，她的真相，不断有人在写，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

自杀还是谋杀的争论，进行了20年。就在1982年，又就梦露之死进行了五个月的调查。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据说当时搜集的物证的一部分，特别是梦露的日记，后来不见了。更有爆炸性的是洛杉矶《环球报》的题为《我目睹玛丽莲·梦露被人谋杀》的报道。一位前救护车人员追述说：“我当时正在设法救活因服过量药物而昏迷的梦露小姐时，被一名‘医生’推到一边。这名‘医生’，将一种神秘的注射液注入她的心脏。”

虽然说得活灵活现，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连总统的死因都查不清的国度，恐怕梦露的真正死因，也将永远是一个谜。

如果她是自杀，也如鲁迅所说：“自杀也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

如果她是被谋杀，那么，这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梦露的最后一部影片，名叫《不合时适的人》（摄于1960年）。在这之后两年，她终于愤而离开了她早已不适应的“环境”。她是那个“环境”的美丽的牺牲品。

在她身后，美国有人拍了一部《成名泪》的电影，描述梦露为了拍戏、成名而出卖色相的秘闻。情节是否真实，人们难以判断，但是，美国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女星在一举成名前后的种种辛酸，倒可以从中窥见一个社会在怎样毁灭着一个人，而且还在继续演出着这种悲剧。

昨日风流，今已白头，一副骸骨谁人收？

——名妓赛金花之死

赛金花在中国女性历史名人中是排不上号的。但她毕竟是在“庚子”（1900年）前后风靡一时的人物，而且她一生的遭遇，在女性来说，确是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罕见的奇人。

提起赛金花，人们仿佛有一种既好之又恶之，欲弃之又招之的矛盾心理。有人说：赛金花是屎克螂坐花轿——既臭又美。人们为何对赛金花有这些看法呢？事情很复杂，因为她既受害于人，而又害之于人；她既是身价很高的状元夫人，又是不齿于口的卑贱妓女；她既是身盈万贯的贵人，又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她既会用四国语言，又是认字不满斗的文盲；她既是能歌善舞的艺人，又是鼠目寸光的庸人；她既是银屏上和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又是被人任意唆使的仆人；她既是为国家作出一定贡献的好人，又是失去民族尊严的罪人。如此等等，可泣可歌，亦艳亦凄融合到赛金花一人身上，或许也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她放纵不羁的思想品格和浪荡行为，有悖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不无关系。因此，她的功过是非，不屑历史学家一顾。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尤其苏、鲁、皖、京、津、沪地区——在赛金花身上编出了许多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故事。有的把她作为一代绝世美人加以赞赏，有的把她视成一身肮脏予以谴责，有的把她看作名噪一时的政客，有的斥她为卖身求荣的娼妇；有的说她是冲破封建礼教的英雄，有的骂她是伤风败俗的祸根。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赛金花之所以未被遗忘，除上述种种因素之外，自然与当代文学家夏衍写的《赛金花》六幕话剧有关，与《赛金花》电影有关，与《孽海花》小说有关，与粉碎“四人帮”后的江青、赛金花、蓝萍这两朵“造孽花”融合到一起有关。

赛金花是赵灵飞的花名；赵灵飞是赛金花的乳名。因此，叙述赛金花应从赵灵飞的根本家乡说起。

赵灵飞生于清同治七年（戊辰）二月十四日（公元1868年3月7日），原籍安徽歙县，家境贫寒，其父赵八官（浑号八哥），母曹氏，弟兄三人，灵飞最小。同治八年，皖南地区发生水灾与霍乱流行，赵八官一家五口，背井离乡，外出逃荒。8岁的男孩于杭嘉湖途中夭折。赵家夫妇领着5岁女儿凤灵，1岁的灵飞来到苏州。在城内萧家巷小住一年后，迁至城外木读镇南小街，凑凑合合开了一爿“老虎灶”，以五个小钱一瓶水，一个铜板一客茶，过着艰辛的生活。

同治十二年初冬，因邻居家起火，一下烧掉半条街，赵八官的两间茅草屋也烧成灰烬。在这走投无路时，他想起苏北盐城乡下有位叔伯哥哥赵银官，于是把凤灵过继给苏州城内同乡洪家当婢女，夫妇俩带灵飞渡江北上，灵飞8岁时，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续弦潘氏寡妇，系一轿夫之妻。潘氏生性温和，聪明贤惠，为人厚道，把灵飞视为亲生女儿一样。

灵飞从小聪明过人，她虽则一天学没上，但记忆力特强。5岁时在苏州已学会许多歌谣，能讲不少民间故事。到了10岁左右，已显示出她那灵心四照，妙舌连环的才华，加上长得肌莹肤润，樱口桃颜，举止文静，一身秀气，绽出了春天芍药，冬日腊梅般的风韵。每逢民间庙会或大户人家的婚丧之事，

她总想去献歌弄舞，讨回几个铜板留作自己零用或给家里买点油盐。她有时手拿盘，筷当作敲打乐器，有时带着莲湘，或是一柄竹剑，连歌带舞地唱着《孟姜女哭长城》、《烟花女子告阴状》、《月沉西厢》、《闺宫怨》、《杨八姐游春》、《千里寻夫》、《蜂飞蝶舞满园春》等数十个曲子，名振乡里，遐迩四方，委实讨人喜爱。13岁时，其姐凤灵已解脱洪府的缰羁，成为苏州《春茗荣新》有名的歌女。她把灵飞从乡下带回苏州，改名为赵彩云。她与凤灵姐一道，进出荣社、戏馆，卖唱侍人。不久，姐妹俩便成为姑苏城内公子哥儿们关注的人物。随着岁月的推移，彩云含笑斜睇，嫣然倾城，被誉为苏州的“花榜状元”，招来许多豪门公卿，江湖骚客，沦为名妓。

光绪十二年（1886年），赵彩云被苏州状元、兵部左侍郎洪钧（号文卿）看中，遂纳为妾。洪钧授名为洪梦鸾，以掩去赵彩云妓女之讳。但由于同代文人樊山已作《彩云曲》，洪梦鸾一名并未被社会所承认。光绪十四年，洪钧受朝廷之命，出使德、俄、奥、荷四国为公使。状元原配张夫人，因身体弱多病，又是小脚，不愿飘洋过海，远离故乡，遂以妾代之。求之不得的赵彩云，竟一跃戴上公使夫人的桂冠，兴高彩烈地于“戊子”年五月十九日（公历1888年6月29日）由上海乘上德籍“萨克森”号货船，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上岸坐车，于8月16日到达柏林。为到国外交游方便，出国前半个月，彩云曾向一同出国的两位翻译学习德语、英语。上船后又遇到德国驻上海商务会馆打字员夏雅丽小姐，二人一见如故，于是彩云花了125个马克学费，拜她为师，潜心学习德、英口语会话。她以惊人的速度，超凡的天赋，过耳不忘的记忆力，只短短的40多天，加上出国前的半个多月，总共只两个月时间，竟掌握了德、英两国日常生活和官场方面的用语。但她只是鹦鹉学舌，对文字却是一窍不通。

彩云与状元公使在德国住了四年零四个月，中间曾与公使到了俄、法、奥等国，会见了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她不但见到了德皇威廉二世，伸斯麦首相，柏林城防司令瓦德西，她还多次会见了威廉皇后菲特丽，并曾多次到她行宫里赴宴，与皇后合影。她与俾斯麦宰相、瓦德西司令一起吃过饭，一起跳过舞。1891年2月，她曾与公使到了俄国圣彼得堡。由于她在柏林期间学会俄语和法语，能不用翻译与有关高级官员直接交谈。4月，她与公使一同会见了俄国彼得大帝。是她通过俄国特工人员，从毕叶士克手里用一千英磅买得帕米尔中俄边界地图，随后与公使一同返回柏林。她在柏林学会弹钢琴，能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1892年的9月中旬，公使任期已满，依然从柏林动身经热那亚港乘上“萨克森”号货轮回国。这艘船的质克船长，当公使于四年前第一次踏上他的甲板时，他如同馋猫一样，嗅到公使夫人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腥味。彩云则顺水扬帆。当时她从公使手里要得的125马克，并没有直接交给夏雅丽小姐，这笔钱由质克代交了。这次相会，是旧友重逢，船长当然决不会慢待她的。公使虽是兵部左侍郎，但终归是位书生气十足的史学家（以一般人看来是位庸人）。当然，他对彩云的身世、举动，无论在婚前婚后，国内国外，并不是闭目塞听，只是他的兴趣不在寻花问柳上。不管燕落谁家，而他只是潜心倾注在《元史补证》上，期望成为一名有造诣的史学家。于是任凭爱妾飞天风流，他仍以“知之”为“不知”，并曾对友人说：“天下之卿士，焉得缉妻于枕乎？”这就是洪文卿洞悉世事皆学问的处世哲学。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892年11月30日），他

们顺利地回到了上海。当他们一踏上黄浦江岸时，受到了上海县知事与各界的盛大欢迎。彩云一方面以状元夫人自诩，远足海外，见多识广，目空一切。同时又以羡慕的心情，渴望与上海花榜姐妹一起过自由自在、蜂飞蝶舞的生活。但她外表上仍以公使夫人自重，竭力压抑住“风情妾有分，花丛任蝶飞”的轻佻行为。因为她身边除老妈子、小个头外，还有阿福、贵儿二位赏心悦目的男仆。在上海小憩后，即与状元回苏州祭祖，把带回来的那架钢琴安设在春在堂，曲园里不时飘荡出第五交响曲，以及江苏民歌、小调等优美动听的琴声，给洪府带来了异样的生机，但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麻烦。

12月中旬，刚刚吃过“迎春”馄饨，朝廷下旨，要状元回京供职。在“寒风凄送伊人行”的傍晚，彩云、张夫人、男女仆佣十五、六名，陪同状元一起登上官人画舫，沿着大运河北上。在西北风夹鹅毛大雪的十二月末，船到了通州。朝廷派来八辆大马车装行李，六辆坐人，另有两顶花轿，一顶大红轿，十二人开道，排了一里多长，煞是威风。第二天踏雪走进东单左侍郎府。这是彩云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帝王故都。她把东西归拢好后，在男女仆人陪同下，时而乘车，时而坐轿，时而蹒跚而行，只半个来月时间，即把京师有名的大小公园，热闹场所，花界行当摸得一清二楚。并利用游玩，结识了不下百名卿卿相相和斗鸡玩狗的纨绔子弟。过了半年时间，声名大振，誉满京华的状元夫人，宛如樱桃沟上的春花，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骚客，严重地干扰着状元郎《元史证补》的校订工作，使他伤感不已。加上他带回那份上当受骗的中俄边界图，被朝廷杨御史弹劾，扣上“识浅昏庸”、“里通外国”的奸细帽子。在这内纷外扰的情况下，洪钧郁郁成疾，于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含恨死去。

彩云对朝夕相处七年之久的状元归天，内心矛盾重重。她回想起自与洪状元成亲后，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造化了生性喜欢快活的秉性，并从温文尔雅的丈夫身上得到宽容和抚慰。而且还依仗着夫人的身份，获得了大批金银珠宝，受到如此众多的官场名人赏识。于是她跪在丈夫的灵柩前，含着晶莹的泪花，从头顶上慢悠悠取下那根不寻常的簪子，放在手里掂了掂——这是官人花掉7000马克从威廉皇宫走私买到的。她又轻轻地摘下耳垂上的坠子，这也是公使花了5500块大洋从圣彼得堡买来的。她手上那副镶上三色翡翠、72颗五光十色的宝石的玉镯，依然是状元从奥地利购得的18世纪塔雷西亚女皇的遗物，为此花了50两黄金、50匹苏州轻缎和元末苏州吴王张士诚的一枚玉印。还有各式各样的宝物装了八只檀木箱子。想至此，一阵伤感与悔愧交织在一起，无法用理智来控制自己。但当她离开灵堂以后，却别有一番情思。她坐在豪华的卧室，翻出压在箱干底下那形形色色的合影，往事如花似锦地一幕幕从脑际掠过。在文卿两个多月的病痛中，她依然去茶社、酒楼、戏院与哥儿们寻欢作乐。她思想上早已盘算过，一旦官人归去，则重操旧业，另辟蹊径。在文卿去世前三天，她给丈夫喂药时，进士及弟的洪钧，望着春满桃花、红颜欲滴的爱妾，并未以三从四德、严守洪家孔孟遗风加以制约，而是深明大义地规劝她一俟“断七”之后，即可再插新技。彩云望着瘦骨嶙峋的丈夫，抿嘴一笑，毫不掩饰地说：“请官人放心，我是爱热闹、喜欢快活的人，我不会步‘怒沉百宝箱’人的后尘的。”洪钧死后，“三七”刚过，彩云就向张夫人提出与洪府脱族，另立门庭。张夫人流着泪规劝她要尽妾之道，但也不勉强挽留，因为她洞悉赵妾的底细。她只要求地实现官人遗言，等到“断七”，将灵柩一同护送到苏州后，听其自便，以免在京城造

成更大的笑话，有辱官人的面子。并答应，除彩云原有的私房财产归她所有外，另外从老爷存款中拨出五万两银子，作为生活开销。彩云总算“不看僧面看佛面”，表示同意。

“断七”后第五天，灵柩在朝廷安排下，经天津水路运往上海，再移回苏州。但彩云一到上海，即与洪家断绝关系，留在花界营生。这个行动她早有安排。当洪钧刚病后半一个多月，从宫廷医生那里打听到洪大人凶多吉少的讯息时，她就把许多贵重物品托交情夫孙少堂运往上海，并在静安寺虞园租下一幢五间一套的住宅，又在燕庆生租了十三间一套二层楼房，公开挂牌，改名曹梦兰，花名傅（富）彩云。她与上海名妓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芳名列上海花界四大金刚。因为她具有状元夫人头衔，又出过洋，会说儿国外语，徜徉官场多年，并有一大笔私产，这就理所当然地推她为“花榜状元”。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苏州状元陆润庠，为了维护苏州人的面子，串通上海知府，强迫伤风败俗的娼妇傅彩云离开上海，赶出江、浙、皖三省。

傅彩云与情夫孙少堂领着两位花界姐妹，由申迁至天津，在滨江北道旧“金花”妓院挂牌，改名为赛金花。孙少堂与赛金花都是“明知不是伴，情急且相随”，同居多年，就是不结婚，同枕异梦，互相利用。孙少堂到了天津后，适逢义和团运动，凭籍他出身京剧武生班底，能翻会蹦，耍刀弄枪，堪称能手，因此成为大刀王五手下一位干将，久出不归。赛金花在京畿王公大臣、卿相名儒荣禄、袁爽秋、李鸿章、卢玉舫、谭钰飞、伍廷芳等人策动下，移花插柳地再次来到了北京。这对赛金花说来，“故都别后整六载，旧情一曲度春秋”，再满意不过了。她给孙少堂留下一些日用杂物，把可动的东西，连同上海带来的两位和天津两位花界姐妹一起搬来北京。她的家安在西单石头胡同，另在大栅栏后街租了一套九间小院，挂牌营业。牌一挂出，则车马盈门，她则与趋之若鹜的来客，歌舞相伴、酒肉同欢。她为了寻找靠山，与京城名儒、巨商卢玉舫结拜成把兄弟。因排行老二，又常女扮男装进出豪门大府，故“赛二爷”的浑名不胫而走，倾城男女老幼无人不知。因此有人给她写了一首打油诗：“嗡嗡苍蝇戏彩蝶，状元有灵九泉泣，自古红颜多薄命，女扮男装赛二爷。”打油诗印证了她凄凉的晚景。

1900年，“庚子”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在此前一个多月，西太后要挟光绪帝，偕王族首领及众多的“威严堂正”的大臣，在兵勇簇拥下，丢下黎民百姓不管，只顾往西逃命。这时，赛金花正在天津小住。当她看到八国联军已经到了天津，随即与孙少堂取道通州赶回北京。当她到北京时，洋鬼子已经进城。如狼似犬的敌寇，到处烧杀掠夺，任意奸淫，满城焦烟弥漫，残垣断壁，殷血斑斑，鬼泣狼嚎。人民生灵涂炭。这时赛金花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得知联军魁首系12年前曾在柏林会过两次面的城防司令瓦德西。她看到同胞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情况，就到中南海联军总司令部找到了瓦德西将军，劝说他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不要烧毁古代建筑，并要求他说服克林德公使夫人，不要执拗她的过高要求。而且她亲自多次劝说过克林德夫人，以配合李鸿章和庆王奕劻和谈，斡旋于清廷与外军之间，为保护北京城和减少人民的损失，出了很多力，作出了一定贡献。因此城里百姓对赛二爷都怀着一时的崇敬心情予以歌颂，当然，赛金花在为联军筹粮草和“夜宿仪銮殿”等方面，是出卖了灵魂，丧失了民族气节的。此外，据说她还从瓦德西手里拿了3000两银子，因而受到后世人的谴责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曾有人写了一首描绘她的诗：“仪銮殿内叙旧情，誉满京华第一人。马背赢

得三千两，彩云袅袅脱俗尘”。

但也应看到，国家处在危难之时，满朝文武倾巢逃命，唯有生逢其时的状元遗孀留下来，参与义和团中的外交事件，成为一时社会上的显赫人物，仅此一点来说，赛金花也是值得史学家舞文弄墨的。至于“夜宿仪銮殿”的淫贱勾当，也仅仅是推测与传说。即使是事实，对一个妓女来说，还要求什么贞操呢！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定以后，为官的照样为官，而在庚子年为黎民百姓出了力的赛金花，并未得到皇上和太后的赏识，所以她只好依然去重操旧业，过着受人调情摆布的生活。1903年4月，一个经赛金花从河北廊坊买来的少女凤玲，不忍卖淫为生，遂在妓院服毒自杀。这一事件引起那些情场失意的绅士们妒恨，背后告她“逼良为娼，迫害至死”人命案，由巡城御史高弟桷把赛金花逮捕，送至刑部狱待审。

5月中旬，赛金花由京起解押到苏州问罪。经常州、元和、吴县三堂会审，赛金花矢口否认她虐待凤玲自杀，同时拿出巨款贿赂衙门内外办案官丁，遂于7月下旬不明不白地出了狱。有苦难言的是，自赛金花入狱后，无情无意的孙少堂，拿走了赛金花足有三分之二的珠宝首饰，并宣布与赛金花正式脱离关系。赛金花的私产，一下损失过半。幸好存在“法新钱庄”的12000两银子和那副手镯、耳环、簪子三件宝贝的钥匙，存放在花界挚友金小宝手里，这就是赛金花仅有的全部家产。

出狱后，她又一次回到上海，再次与李萃香、林泽雪、花翠琴、林黛玉、陆兰芬等一起挂牌。宣统元年，41岁的赛金花，与宁沪铁路段督办曹瑞忠结婚，不幸，第二年曹死。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经历了267年的清帝国，在辛亥革命冲击下烟消云散。50岁的赛金花又于民国七年（1918年）六月二十日与江西民政厅长、参议院议员魏斯耿结婚。为了表示对丈夫的敬重，她特意在自己的姓名前冠上魏姓，名曰“魏赵灵飞”。可是，好景不长，魏斯耿于民国十年六月初八与世永诀。赛金花门庭冷落，成天忧心郁郁，就在这百无聊赖、厌倦人生的“金花书寓”里，染上了吸鸦片烟的恶习，以致把所有家产全部卖光。子身孤影，生活艰难，最后只好把原来的住宅卖掉，与相依为命的老妈子顾蒋氏，一起搬到天桥居仁里16号。她以每月28块大洋，租得四间平房，摆弄着虚无飘渺的佛堂，“招待良家闺秀莫踏红尘覆辙，逗得豪门阔妇幻想西天修心。”指望挣得几个香火钱聊度残年。

当她实在揭不开锅时，则请求当局减免房租、杂税，或乞求慈善机构救济，或伸手旧友给予赐赠。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1936年（丙子）新春，幸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京，路过天桥看杂耍时，见到赛金花流落街头卖花线，见其年老堪怜，令副官赏给她100块大洋。

赛金花感激涕零，用了两三天时间，歪歪扭扭地给韩写了一封信：“……赛金花老矣，谁堪顾问，蒙齐鲁大师，江湖义士韩主席不弃旧情，慷慨解囊，赏洋百元。不胜铭感，谨呈小诗一首，聊表谢忱：‘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鬃鸭。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

赛金花死于1936年11月17日（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死前曾写下一支《悠悠曲》，回顾与忏悔她那放荡的一生，倒是很耐人寻味的。曲曰：

天悠悠，地悠悠，风花雪月不知愁，斜睇迎来天下客，艳装袅娜度春秋。度春秋，空悠悠，长夜尽成西厢梦，扶疏深处唱风流。唱风流，万事优，一

朝春尽红颜老，门庭冷落叹白头。叹白头，泪水稠，家产万贯今何在，食不果腹衣褴褛。衣褴褛，满身垢，一副骸骨谁来收？自古红颜多薄命，时运不济胜二尤。胜二尤，深海仇，纨绔王公皆猪狗，赏花折柳情不留。天悠悠，地悠悠，贞操牌坊万世流。

赛金花到底是见多识广的人，她居然在快要离开人世时，能回首一生放荡坎坷的恶果，从中看到炎凉的社会环境给她带来的悲惨命运。她明智地预料到，不但死后棺木无着，连个葬身之地也不知在哪个黄土岗上。确实，在她死后第二天，由北平市市会会长孙晋卿出面，偕同杜润之，刘多文，曲宪亭，唐友诗，吕训钦等 13 人发起募捐活动，三天后入殓。陶然亭寺中长老，于香妃塚旁献出一分八厘地，这才草草入葬。

魔鬼城的葬礼

——希特勒之死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他 56 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末日会来得这样快。

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 1945 年 1 月 16 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 50 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2 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

“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尽。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4 月 16 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 12 年以上。正如有人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 4 月间来到了柏林。

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有个完的打扮，为那远离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

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离之苦，他们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莱契这样说。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4 月 22 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 8 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

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它，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以还话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末日了，他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决定。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莱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4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4月26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

在这3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

4月26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给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

4月26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剥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

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30小时以后，即4月30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末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

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生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月29日凌晨1点到3点之间，希特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二，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槟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宾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

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为人民服务 12 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用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4 月 29 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着他死去的还有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他是在 4 月 26 日企图从科摩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天以后处决的。4 月 28 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他们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来扔到路旁阴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能够在那个安息日尽情地糟塌他们。劳动节那天，本尼托·墨索里尼与他的情妇合葬在米兰的玛基欧尔公墓的贫民墓地里。意大利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就是以这样悲惨的结局成为历史陈迹。

墨索里尼不体面的下场到底有多少详细情况传到希特勒耳中，现在还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如果他知道得很多，那不过更加强了他的决心，不让他和他的新妇或他们的尸体，如他的遗嘱中所写的那样，成为“犹太人导演的一场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希特勒在获悉墨索里尼的死讯以后，马上进行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其他两条狗。他将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当野蛮的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如果她们想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他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他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夜已降临，阿道夫·希特勒生命的尽头到了。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人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不能入睡。大家解释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认为他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到了。但是，据几位在场人的回忆，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大约是 4 月 30 日早晨 2 点 30 分，元首才走出他的私人房间，来到作为饭厅的过道上，在那里等候他的约有 20 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嘴里叽叽咕咕，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他眼里含着泪水，据荣格夫人的回忆，“他的视线好像越过地下避弹室的墙，看着很远的地方。”

在他退回私室以后，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地下避弹室里已经达到今人不能忍耐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了，有几个人到饭厅来跳舞。这个不可思议的舞会发出的喧嚣声音很大，以至使元首那边下了命令叫他们安静一点。俄国人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后就打进来，把他们都杀光。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直在考虑如何逃命的问题，但是由于元首对他们生命的严格控制已经结束了，在这短暂的片刻，只要可能，他们也想寻欢作乐一番。这人看来真是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竟跳了个通宵。

俄军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城市。总理府已成了瓮中之鳖。希特勒和鲍曼在4月30日中午的最后一次情况汇报会议上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俄国人已经打到柏林动物园的东边，进入波茨坦广场。他们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了。阿道夫·希特勒实现他的决心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的新妇这一天显然没有心思吃午饭，希特勒同他的两位秘书和素食女厨一道进餐，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餐饭。大约在下午2点30分，他们快要用完午饭的时候，管理总理府车房的元首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运200公升汽油到总理府花园来。要弄这许多汽油是有困难的，但肯普卡终于搞到大约180公升，找了3个人帮忙把汽油运到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

为维金式火葬收集汽油还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已用毕最后一餐。他把爱娃·勃劳恩叫来，与他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这些人是戈培尔博士、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他的秘书们和女厨曼齐阿里小姐。戈培尔夫人没有在场。这位刚强而美丽的金发女人，同爱娃·勃劳恩一样，觉得下决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杀死她那6个年轻的孩子们，她就感到缺乏勇气了。这些天来孩子们整天在地下避弹室嬉戏，丝毫不知有什么可怕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

“亲爱的汉娜”，两三天以前一个晚上，她曾对莱契小姐说，“当最后一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对孩子们缺乏勇气，你必须帮助我……他们是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国和元首不存在了，他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我最害怕的是在最后一霎那变得太软弱。”她现在一个人呆在她那小房间里，正在努力克服她那最大的恐惧。

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结束的只是自己的生命。与大家告别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了枪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

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这是阿道夫·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10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整整12年零3个月。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多活一个星期。

接着就进行维金式火葬。没有人讲话，唯一的声音是俄国的炮弹落在总理府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希特勒的侍从，党卫队中队长海因兹·林格和一个勤务兵将元首的尸体抬出来，尸体是用军用灰绿色毛毯包裹的，以便遮住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肯普卡从露在毯子外面的黑色裤子和皮鞋认定这是元首的尸体，因为希特勒总是穿着这样的裤子和灰绿色上衣的。爱娃·勃劳恩死的干净一些，身上没有血。鲍曼将她的没有包裹的尸体抬出来，到了过道之后交给肯普卡。

“希特勒夫人，”这位司机回忆道：“穿着一件黑色衣服……我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伤口。”

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趁机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点燃汽油。以戈培尔和鲍曼为首的送葬人退回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当火焰上升时全体肃立，举起右手行纳粹告别礼。仪式很短，因为红军炮弹又

开始轰击花园，这些人赶紧退回地下室的安全处所，让汽油引起的熊熊烈火去完成消灭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夫人的遗体的工作。

戈培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意图告诉新的领袖。在5月1日傍晚，他执行了自己的意图。第一件事是毒死6个孩子。他们的游戏终止了，每人打了一针毒药，显然是头一天毒死希特勒的几条狗的那个医生干的。然后戈培尔将他的副官、党卫队小队长古恩特·施瓦格曼叫来，要他去取汽油。

“施瓦格曼，”他说，“这是最可恶的背叛。将军们都出卖了元首。一切全都完了。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他甚至对他的副官也没有说，他已叫人将他的孩子们谋杀了。“你必须烧掉我们的尸体。你能这样做吗？”

施瓦格曼向他保证，他能这样做，于是叫两个勤务兵去弄汽油。几分钟以后，大约8点半钟，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博士夫妇走过地下室，与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然后走上花园。在他们的请求下，一个党工队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放了两枪。4桶汽油泼在他们的尸体上，然后燃起火来，但这次的火葬搞得并不太好。地下室里还活着的人都急着要参加马上就要开始的大逃亡，没有时间花费在焚烧已经死去的尸体上。苏联人第二天就发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马上就认出它们是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子的尸体。

第三帝国比它的创造者多活了7天。

1945年5月8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静。

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

经过12年4个月零8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之外，这段时期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

倒吊在广场上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

——墨索里尼之死

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早年为新闻记者，社会党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人为骨干，组织法西斯党。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40年追随法西斯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7月，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垮台。墨索里尼被囚，9月旋被德国伞兵劫走，1945年4月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决。

自从希特勒在阿登地区发动的冒险进攻失败以来，墨索里尼显然精神失常了。特别是1945年4月11日，他接到梵蒂冈的来信说，盟国断然拒绝他的建议。墨索里尼觉得万念俱灰。“他一直在梦想，全靠梦想，在梦境中生活，”他的年轻的文化部长费尔南·梅扎索马说：“他根本不正视现实，他在一个完全由他臆造出来的幻想世界里生活和行动。他脱离现实。他对事物的反应，他的欢乐和颓丧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那些感情都是莫名其妙地突然迸发的。”

对于墨索里尼临终前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的生活和狂暴情绪，西方记者们作了引人入胜的记载和描述。伊瓦诺·福萨尼在加尔达湖以一个小岛上同墨索里尼交谈时，发现“领袖”似乎濒于发狂。他向这位记者谈到自己的错误，同时指责其他人犯的错误更大。英国“毒辣的外交政策”迫使他卷入战争，希特勒不听他的劝说，入侵苏联。他激烈攻击国王、总参谋部和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工业财团。然后，他以悲伤的口吻承认，自从王宫被捕以后，他一直是被监禁的人。“我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生命只是永恒之中的一刹那。斗争结束时，他们将唾弃我，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会来抹去他们的唾沫。那时我将微笑，因为我同我的人民言归于好。”

福萨尼认为，墨索里尼的不正常行为与情绪是由于他的部长、卫兵、整天大喊大叫的夫人多娜·拉凯莱和总是哭哭啼啼的情妇贝塔西一时不在他身边的缘故。

另一位记者马德莱娜·莫勒觉得他犹如一名“苦役犯”。因为他脸色苍白，脑袋剃得精光，两颗黑眼珠毫无生气。他不单是屈服了，而且自暴自弃。“你了解什么？”他问女记者，“我记得七年前，你到过罗马。当时，我是风云人物。现在，我已经过时了……今天上午，一只小燕子闯进我的房间，它飞不出去，在屋子里拼命挣扎，最后精疲力尽，掉在我床上。我轻轻捧起小燕子，生怕惊吓着它。我打开窗户，松开手。小燕子起先不知如何是好，向四周看看，然后张开翅膀，愉快地鸣叫一声，飞向自由。我永远忘不了那愉快的鸣叫。但是窗户永远不会为我打开，除非是让我走进地狱……”“是的，女士，我完了。我的星夜已经不亮了……垂危的时间太长。我如同一名处在风暴之中的船长。船沉了，我坐在一条根本无法控制的舢板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飘荡。没有人听得见我的声音。但是可能有一天，人们将听到的。”

4月13日晚上，也就是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的第二天，他在每天召开的军政例会上叫嚷，要到瓦泰利内进行最后的顽抗，拼死一战，博得好运；但是他的意见几乎遭到全体与会者的反对，反对最厉害的是意大利军队总司令

格拉齐亚尼元帅。最后墨索里尼不得不让步，他说：“没有人强迫你们到瓦泰利内去，你们每个人应该决定自己的行动。”现在几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领袖”的权威荡然无存了。

他准备亲自出马，动身去米兰，打算同全国解放委员会（游击队）或西方同盟国谈判，继续寻求他结束战争的“意大利解决办法”。如果不行，他还可以返回北方的瓦泰利内进行最后防御。“总之，”他对格拉齐亚尼元帅说，“法西斯主义将在那里英勇地倒下。”

这天，当多恩·潘西诺神父来看望他时，墨索里尼好像有点预感似地说：“你现在向我告别吧，我的神父。谢谢你为我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我知道，我将被枪毙。”

太阳快要落山时，墨索里尼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的花园里同妻子告别。他还同姐姐埃德维杰告别。他说，他准备“迈进死亡的寂静之中。”然后，他带领一支小车队动身去米兰。

当墨索里尼来到总主教府客厅时，红衣大主教劝他投降，以免使意大利遭受不必要的破坏。墨索里尼为了讨价还价，故意夸张地说道，他将率领三千名黑衫党员在瓦泰利内战斗到底。

“领袖”，红衣大主教说道，“不要存在幻想，你最多也不过能集合三百名黑衫队员。”当红衣大主教对他说起拿破仑下台的情况时，墨索里尼疲倦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线光亮。

“我的百日帝国即将灭亡。我应该像波拿巴那样听天由命。”

随后，游击队的三位代表被引进客厅，谈判就这样开始了。“好吧”，墨索里尼迫不及待地说，“你们有什么建议？”

“我接受的命令是简单明了的”，游击队的发言人马拉扎说，“我只要你投降和接受你的投降。”

墨索里尼极力克制着自己，稍微停了片刻，他说：“我不是为此而来的！他们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开会讨论条件。我是为了保护我的人，他们的家属和法西斯民兵。我应该知道他们将来的命运如何。我的政府成员的家属应该得到保护，可有人对我说，民兵将把他们作为战俘交给敌人。”

“这些都是细节”，另一位游击队员插话说，“我认为我们有权解决这些问题。”

“那太好了”，墨索里尼说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达成协议。”

这时和墨索里尼一起来参加谈判的意军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说：“不行，不行，领袖！请允许我提醒你，我们对自己的盟友承担着义务。我们不能撇开德国人进行这种单独投降的谈判。我们不能忘记义务和荣誉。”

“恐怕德国人也没有这种顾虑，”游击队的将军卡多纳说，“前四天，我们同他们讨论了投降条件。我们已经就所有细节达成了协议，我们希望在某一时间签定一项条约。”

马拉扎看见墨索里尼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他问道：“德国没有通知你的政府吗？”

墨索里尼意识到他又被他的盟友出卖了。“德国人背着我干这种事！”他气得直跺脚。他扬言要发表广播讲话，揭露德国人。说完，他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客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月27日下午，沃尔夫代表驻意的德军司令部又

同盟军进行了接触。双方商定，4月29日，驻意的德军将在亚历山大总部同英、美、苏三国签定无条件投降书。至5月2日，在意大利陆上和海上的100万法西斯军队和后勤人员，将全部阿盟军投降。到此，意大利战争就要彻底结束了。

墨索里尼的心全凉了，脑子里的幻想曲彻底地破灭了。但是，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仍不愿束手就擒，特别当他想到最终将被送上绞刑架或送入美国动物园供人展览时，更是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了。因此，他又怀着侥幸的心情出走，决定到瑞士去避难，或列意大利北部山区去打游击。有人建议他带情妇贝塔西飞奔西班牙，有人劝他到瑞士去避难。他想时局多变，迟走不如早走，于是在4月26日带着一支小小的车队出发了。

墨索里尼来到科莫不久，就急于安排后事，他先给发妻多娜·拉凯莱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他正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历史的最后一页，”并请求她原谅他一生中做下的“一切错事”。在墨索里尼所做的错事中，其中就包括他与情妇贝塔西的关系，自从他和这个浪漫的女人厮混以后，他同拉凯莱的关系就冷淡了。这个曾经和他共患难的夫人，几乎被他气疯了。现在墨索里尼恳求她原谅他过去的过错，并要求她把安娜—玛丽亚和罗马诺两个孩子带到瑞士去，她可以在那里“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后来墨索里尼又给拉凯莱打电话，让她带着孩子前来话别。墨索里尼给了她几份文件，其中包括丘吉尔的来信。他希望这些信件能帮助她越过国境线。“如果他们要逮捕你或找你麻烦的话，”他说，“你就要求把你交给英国人处理。”墨索里尼最后用一种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声调说：“我现在是独自一个人了。拉凯莱，我很明白，现在一切都完了。”说完就带着身边的随从上路了。

夜晚，墨索里尼和他的随从，下榻在格朗多拉小镇上的米拉瓦莱旅馆。他们在这里等待党的书记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其他死党。他们除了少数在外面值勤放哨外，其余的人在屋里闲坐着，沮丧地听着电台广播的关于克拉克将军的胜利推进和北部地区游击队起义的消息。在“领袖”的随从中，有一位长得迷人的名叫埃莱娜·库恰蒂的姑娘，她是墨索里尼昔日的一个情妇的女儿。她向“领袖”建议，骑自行车去科莫探听一些死党迟迟未到的原因。当贝塔西无意之中听见他们在花园里窃窃私语时，她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起来，要人们把这姑娘打发走。即使在危难时刻，这个淫荡的女人还在争风吃醋。墨索里尼左右为难，力图使她平静下来。她竭力争辩着，双脚钩在地毯缝里、摔倒了，哭成了泪人儿。有些“官员”看到这种情景，不辞而别，离开旅馆，各奔前程去了。

面对这般情况，黄昏时，焦急不安的墨索里尼对他的德国党卫队保镖比策尔中尉说，停在这里很危险，他要立刻出发去瓦泰利内，不再等帕沃利尼了，他们也许会到那里去找他。拂晓时，墨索里尼和留在他身边的人，又与行驶在湖边公路的一支人数不多的法西斯流寇会合在一起。装甲车里坐着法西斯党的书记帕沃利尼和几名部长，还有两个皮箱，内装大量文件和金钱。走在车队后边的是一辆挂着西班牙牌照的小汽车，里面坐着墨索里尼的情妇贝塔西的哥哥马切洛的一家。

在这支丧魂落魄的车队里，墨索里尼的轿车行驶在前面。到达梅纳焦市郊时，他叫住一个行人，问附近是否有游击队。回答是：“到处都有！”墨索里尼停住了车子，径直钻进了装甲车。当车队穿过离车戈一公里半的地方时，突然一棵巨大的绕有铁丝网的树干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正是游击队设置

的路障。游击队员打了一梭子鸣警，命令车队停住。随即一支由八人组成的游击队巡逻队走下山来。

为首的一位叫贝利尼，是游击队的队长，一个留着魔鬼摩菲斯特式胡须的 22 岁英俊青年。他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法律系。他父亲是位骑兵上校，1944 年被德国人和法西斯抓去，受尽虐待，在监狱中死去，他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为光复意大利而战，为惨死的父亲报仇。

贝利尼命令车队停止前进，立即投降。这时为首的一个德军指挥官用非常流利的意大利语自我介绍说，他是奥托·基斯纳特上尉。“我奉命率领我的人去梅拉诺，从那里回德国，在本土继续和盟军作战，我们无意与意大利人作战。”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和你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并且在他们中间是否有意大利人？”贝利尼说。

基斯纳特上尉承认在装甲车里有些意大利人，其他的车里也有。“他们不属于我负责。我只负责我的人。你决定怎么办吧？”

贝利尼和他的同伴商量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当即决定：德国人可以放行，但必须接受下一站检查，意大利人必须留下归游击队处理。

这时躲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用毛毯裹着肩膀的墨索里尼，急忙竖起军大衣的领子并压低头上的钢盔。一个名叫拉扎罗的游击队员，看见此人行迹可疑，很像墨索里尼，他走上车来，敲敲那人的肩膀说：“同志！”那人没有理睬这种法西斯式的招呼。拉扎罗第二次拍拍他的肩膀讽刺地说：“阁下！”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拉扎罗火了，他大声叫道：“本尼托·墨索里尼骑士！”那人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拉扎罗确信他就是墨索里尼了。他凑到那个蜷缩着的身子旁，摘掉他的头盔，一个秃顶露了出来。拉扎罗取下这人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此人正是把意大利人民推向深渊的法西斯魔首。

墨索里尼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在两膝之间，枪管对着胸膛。拉扎罗抓住了墨索里尼的武器，使劲地将他提起。“你没有其他武器了吗？”墨索里尼一言不发，解开大衣纽扣，递给他一支口径九毫米的“格利森蒂”长管自动枪。两人互相打量着。拉扎罗像一只雄鹰，死死盯着这个他曾经崇拜过但同时也诅咒过的人。墨索里尼面色蜡黄，呆若木鸡。拉扎罗说：“我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逮捕你！”

这时，一位游击队员前来报告：“有一位西班牙领事要马上动身，他要立即去瑞士，因为他有一个约会。能放他走吗？”

对敌人一向怀有警惕的拉扎罗有点不放心，他说，“等一等，我亲自去看看。”这个机警的年轻人，一直走到挂有西班牙牌照的阿尔法·罗米欧车前。开车的是一个魁梧粗壮、满头金发的男人，胖胖的下巴长着一颗胎痣。在他身旁，坐着一位漂亮的少妇，她神经质地盯着拉扎罗。后座上坐着另外一位妇女，一半脸藏在皮衣领里，身边带着两个孩子。

拉扎罗登上脚踏板，问：“您是西班牙领事吗？”

“对，”马切洛·贝塔西答道，样子显得有些烦恼：“我还有急事呢。”

操流畅意大利语的这位“西班牙领事”引起了拉扎罗的怀疑。“劳驾，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马切洛·贝塔西先是抗议，随后还是拿出三本外交护照，上面注明“西班牙驻米兰领事馆。”拉扎罗不喜欢这位“西班牙官员”，他发现其中一张

相片上的图章是印上去的，而不是用钢印压上去的。他心中暗暗地高兴。“护照是假的”，拉扎罗说道：“我逮捕你们了！”

“这是什么意思？”马切洛·贝塔西吼叫起来：“这样做你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晚上7点钟我要和一位英国高级人士在瑞士会晤。我从没见过这样无耻地对待外交人员的行为。我要对你们抗议！”拉扎罗将护照放进口袋，命令这位“西班牙领事”把车子开到市政厅去。在那里他们接受进一步检查。游击队长贝利尼特地去看望那些“西班牙人”。他们已被带到市政厅的一间小屋子里。马切洛·贝塔西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并自我介绍是西班牙领事，有外交使命去瑞士，他要求准许他和他夫人及孩子立刻就走。贝利尼说，“只要你们的证件未经核实，就不能放你们走。”他向贝塔西点了一下头，问：“这位夫人是否和你在一起？”

马切洛·贝塔西看看他的妹妹克拉拉·贝塔西、墨索里尼的情妇，不知所措了。“不，不，我不认识她。她要求上车，我们只是带着她和我们一起走。”

“嗯！闹乱子的时候，我在科莫，为了避免危险，我请求他们把我带到某处平静的地方。我肯定是走不了啦，你要把我怎么办？”

贝利尼说，他呆一会儿再作出决定。说完他就走了。

在另一间大厅里，拉扎罗止在检查部长们的公文包和皮包。检查完毕，他问墨索里尼：“喂，你的呢？”

“我只有一个皮包，就在你身后。”

拉扎罗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黄褐色的皮包。当他打开皮包时，墨索里尼低声地但郑重地说：“那是秘密文件。我事先告诉你，都是最重要的历史文件。”

拉扎罗很快地翻了翻文件，其中有墨索里尼对1943年7月25日那次政变中逮捕他的人所提出的诉讼材料，还有一份逃亡瑞士的计划。有一个夹袋里装的全是希特勒的信件。文件下面有160个金币。还有五张支票，其中三张是每张50万里拉的。拉扎罗当场把钱和文件没收了，其余的生活用品还给了墨索里尼。

游击队为了防止法西斯党解救他们的“领袖”，或者为了防备意大利人民要把他们打死，决定把墨索里尼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

到达兵营后，贝利尼要他放心，他的处境是安全的，并问他还需要什么？开始，他说不要什么，接着又改口说：“我希望你向一位被你们囚禁在东戈的女士转达我友好的问候。她和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在一起。”

“那你要我对她说些什么呢？”

“唉，没有什么要紧的话。只是说我很好，我向她问好，让她不用担心我。”

“一定为你办到，但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谁？”

“怎么……一位很亲爱的女友。”墨索里尼踌躇了半天，不愿说出她的名字。

“那你起码得把她的名字告诉我，我好跟她谈话啊！”

“要她的名字有什么用呢？”他含糊地说道：“那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不愿给她制造麻烦，一个可怜的女人！”

在贝利尼的坚持下。墨索里尼看了看周围没人，才低声对他说：“是贝塔西夫人。”

同意大利所有的人一样，贝利尼知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墨索里尼的情妇。

当贝利尼离开墨索里尼来到贝塔西这里时，卫兵们先向他汇报了这位阔夫人放荡无羁的行为。她向卫兵要了一杯白兰地，品尝了一下，说味道不好，就放开了。再要一杯好的。卫兵送去了，她说上面有灰尘，对身体有害，又丢开了。至今她还戴着头巾型的帽子，穿一件水貂皮的大衣；左手戴着结婚金戒指，故意装得潇洒自在的样子。

贝利尼来到贝塔西的房间里，她独自一人呆在那里。

“有人托我问你转达他的问候。”贝利尼平静地说。

她吃惊地抬起头。“问我？谁？”

“我的一个俘虏。”贝利尼说。

这时，她神经质地极力争辩说，她唯一认识的人就是用车带她的西班牙绅士。“不，这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但我不认识他！……”

贝利尼说，装腔作势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是谁，太太。墨索里尼亲自对我说了。”他站起来装着要走。

“请你告诉我”，她央求道，“你能向我保证真是墨索里尼本人托你带的口信吗？”

“我对你再说一遍，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贝塔西太太。”

她深深叹了口气：“对，这是真的。我叫克拉拉·贝塔西。”她接着提出来一大堆问题。墨索里尼捎来了什么信件？他在那儿？处境危险吗？谁是指挥官？

贝利尼要求她冷静下来。他说，他就是这儿的指挥官，眼下墨索里尼没有危险。

“眼下？”她恐慌地叫道，“为什么眼下？他会出什么事吗？告诉我，发发慈悲吧！”

他告诉她，如果没有任何解救墨索里尼的企图，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解救他？世界上谁会做这事？如果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们所看到的事！上帝，多么不幸啊！树倒猢狲散，全跑了。他们只想逃命。没有一个人想一想他们爱戴过的人。他们本应该为他牺牲才是……”

她开始哭起来，然后又沉默不语。停了片刻，她又问道：“他叫你对我说些什么呢？”“他只是要我向你转达友好的问候，并让你不用为他操心。”

她哀求他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

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随即告诉了她和墨索里尼的隐私。她用一种平静的声调对他说，她在1926年结识墨索里尼，当时她只有20岁，年轻、漂亮，又风流，又潇洒，而墨索里尼则“是一个显得很年轻的男子，他总是隐瞒他的年纪。”他当时43岁，打动了她的，不是他的外貌，而是他很强的个性和留给她的“坚定、果敢”的印象。然而，她感觉到墨索里尼许许多多的情妇从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爱他的。“但是，我所期望的就是他能像对待一个亲爱的忠诚的朋友那样想着我，对待我，使他得以避开生活上的忧虑，哪怕是短时间的。”

这个女人还说，她和墨索里尼的结合，完全是出于“纯真的爱情”，不像其他的情妇们经常要求他给予帮助。“请相信我，我对这些女人往往是和

蔼的。我认得他所有的情妇，我并不嫉妒。我能理解她们，宽恕他们。我是个能支配他的心和他的情感的女人。”因此她从设想到和他永别。她俯下身子，握住贝利尼的手说：“让我见见他吧！”

这位年青的游击队长感到震惊，他轻轻推开她的手说：法西斯分子可能试图解救他们的“领袖”，这样一来，她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现在，我知道了”，她大声喊叫，“你们要杀死他！你要答应我，如果墨索里尼被杀，我将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把我和他同时枪毙吧。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我愿和他一起死去，一旦他死了，我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不管怎样，我应该死，死得更慢，反而更难受。……”就在墨索里尼和贝塔西要求见一面的时候，在科莫，当地游击队总指挥官乔瓦尼·萨尔达尼亚上校接到一份从米兰总部发来的电报：“尽快将墨索里尼和部长们带到米兰。”

为了防止盟军方面劫持墨索里尼的一切可能，意大利游击队总部电告锡耶纳盟军总部：

“全国解放委员会深感遗憾，不能送交墨索里尼。他已由人民法庭判决，并在法西斯分子枪决 15 名爱国者的地方正法了。”

4 月 28 日天刚亮，游击队总部派瓦莱里奥上校率领一支由十五名装备精良的武装人员组成的护送队离米兰，前去贝利尼游击队去执行枪毙墨索里尼等要犯的任务。

瓦莱里奥来到贝利尼队部，要了一张俘虏名单，然后宣布：

“本尼托·墨索里尼，死刑！”

“克拉拉·贝塔西，死刑！”

“要枪毙一个女人？”贝利尼问。

“她不仅仅是墨索里尼的情妇，而且是他的顾问，多年来，她支持墨索里尼的政策。”

下午 4 点钟，他们来到关押墨索里尼的处所。瓦莱里奥上校夹着一支枪走到墨索里尼面前，低着说道：“快点，我救你来了。”“真的吗？”墨索里尼看了看对方的武器，“那你可真太好了！”他和贝塔西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他们被带上一辆汽车。汽车沿乡间公路开到贝尔蒙蒂公馆大门口。他俩被推下车，并被指令肩并肩地站在一堵墙根前。墨索里尼步履蹒跚，贝塔西泪洒满襟。瓦莱里奥上校大声宣读着对本尼托·墨索里尼的死刑判决书。只听得“咔嚓”一声，子弹推进枪膛。突然，贝塔西尖叫起来：“不！不！墨索里尼不能死！”她转身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他。

一排子弹射来，两人双双倒在地上。

当晚，他们的尸体被装上车、运到米兰，抛到洛雷托中心广场。

4 月 29 日，意大利米兰洛雷托广场。上午 9 点钟，一大群吵吵嚷嚷、愤怒呐喊着的米兰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是来观看刚刚被枪毙了的墨索里尼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的尸体，同其他 17 具法西斯党徒的尸体，一起堆放在广场上。墨索里尼的尸体侧放着，他的头颅枕在贝塔西的乳房上。一位妇女咬牙切齿地朝墨索里尼的尸体连开五枪，尖声叫道：“我为我那个死去的儿子报仇啦！”两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狠狠向死者的脸部踢去……最后，群众用绳子把墨索里尼和情妇贝塔西的尸体，捆住脚踝，倒挂在路灯下的架子上，供人们唾骂、观看……一连数日，那尸体在风中摇来荡去……

杀不死自己的杀人魔王

——日本战犯东条英机之死

东条英机，日本战犯。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升关东军参谋长。

1938年任陆军次官。1940—1941年任陆相时，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组阁，兼陆相、内相。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下，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不久被捕。被判处绞刑。

1944年7月16日，接替山本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因塞班岛之役被美军打败而自杀。由于战争连遭惨败，东条内阁不得不辞职。

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在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用懊丧的语调说，由于塞班岛失陷，他决定辞职。这是气氛最低沉的内阁会议，重臣们默默无言。“剃刀东条”的眼神有些呆滞，他那一小绺仁丹胡在簌簌地颤抖。会议结束了，东条仍在痛苦地抱头沉思。

四年前的这一天，东条坐进了陆相的宝座，不久又窃取了首相大权。也是在这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野心勃勃的东条曾经发誓要用东洋的刺刀，用日本人的鲜血征服中国，征服印度支那，征服东南亚以及整个东方世界。他想与他的盟友希特勒平分秋色！

正是在这种野心驱使下，他当上首相50天，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接连侵占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嘿，那时的东条，真可谓神气十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现在……东条用带血丝的眼睛斜睨了一下墙上的“大东亚共荣圈”地图，紧接着烦躁地猛击了一下自己的秃头，唉！如今丢盔卸甲，连吃败仗，到处挨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岂止是一纸辞呈所能了却的愁苦啊！

8月6日，天晴气朗，7时09分，美国飞机数架，飞入广岛上空，盘旋几周后离去，8时整，美机B—29两架，从高空进入广岛上空，8时15分只见从一架飞机上投下一颗巨型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立即发出令人目眩头昏的强烈刺激性白光，顷刻间广岛市上空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广岛市在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声中，化为灰烬。在广岛的343000人中，当日死亡者有78150人，负伤和失踪者为51408人。全市建筑物，毁坏殆尽。紧接着，8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命令美国空军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日本天皇在多种力量的威慑下，终于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陆军省内的一些死硬法西斯顽固分子，在东条和阿南等人直接或间接怂恿、鼓动之下，虽然进行了最后的挣扎，疯狂地反对投降，但是，他们的叛乱活动未能得逞。1945年9月2日，在日本的东京湾停泊的世界最大的四艘战列舰之一——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战胜国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来到东京后，在各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四十名战犯。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第一名。

9月12日，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和亚、美各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恶魔，还故作镇静地坐在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一群新闻记者和前来执行逮捕令的美

国军人，涌进东条在世田谷的寓所花园。到下午3点钟前后，人声鼎沸，水泄不通。

在此之前，东条让他的夫人带着侍女立刻离开家庭，孩子们早已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很不情愿离去。“请多多关照自己！”她知道，铃木医生曾经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过心脏的位置。她担心东条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这个愚蠢的女人好像还存在什么幻想。她又说了一遍，鞠了一躬，退出去东条头也没抬，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东条夫人带着侍女从后门溜出去，绕过围墙。只听到屋子里响起一声沉闷的枪声。她已来不及回去关照了，只见前面街道上乱七八糟地挤满了车和入。当她走进地势较高的铃木医生的家时，视线越过围墙，看见美国军人和宪兵已经把她的家团团包围了。

“告诉这个狗杂种，赶快滚出来！”有个美国军官在喊。紧接着，是门板破裂的声音。

下午4时17分，保罗·克劳斯少校和执行逮捕的人，以及紧紧跟随的记者们冲进了东条英机的办公室。只见东条并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从白衬衣内浸出来。他右手上还握着一支0.32厘米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

“别开枪！”克劳斯大喊一声。东条眼神发直，好像并没有听到克劳斯的喊声。啷一声，东条手里的枪落在地板上，他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记者们的摄影镁光灯在啪啪地闪光。东条痛苦难耐地皱眉咧嘴，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沿着他的小仁丹胡灌进嘴里。下午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开始蠕动。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翻译记录了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可是并没有人同情。

“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但声调稍大了一些，“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

经军医诊察，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所标的位置上穿进去，但没有打中心脏。当医务人员把他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

在东条被捕的第二天清晨，另一战犯——陆军元帅杉山也开枪自杀了。近卫公爵在前一天晚上也服毒自杀了。在开庭审判日本战犯之前，有34名陆海军将领，畏罪自杀。

1946年5月组成了由中、苏、美、英、澳、加、法、荷、新、印、菲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从这一年的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止，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审判。最后，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7名罪大恶极的战犯绞刑。

1948年12月22日深夜，在东京鸭巢监狱内，血债累累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默默走上了绞刑架，把脖子伸进了全世界人民给他们准备的绞索。

骨朽人间骂未销

——大汉奸周佛海之死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印载着长串忠臣良将的美名。也有少数认贼作父、醜颜事敌的民族败类，远古有之；近如抗战时期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等。

抗战初期，由重庆叛逃南京，胜利后从南京解返重庆，在白公馆看守所关押一年的大汉奸周佛海，当其年轻时候，也曾有过追求进步的一段。然因个人贪欲无限膨胀，在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支配下，他不惜一程一程，急剧滑坡，由共产党倒退到国民党反动派，再堕落成人所不齿的汉奸，终缉拿归案，明正刑典。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要求投降。11日，蒋介石一日三令，命蒋军兼程前进，抢夺胜利果实；命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14日，蒋对沦陷区所颁第一道命令，就是委任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程克祥、彭寿为正副秘书长。

给周佛海的具体任务是：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受降接收。当时，周手中握有税警总团万余人，两师“中央警卫军”的调动权，也抓在他亲戚、参谋长祝晴川手中。周佛海凭重庆一纸电令，和这两部分武力，摇身一变，俨然“抗战有功”之臣，越发狐假虎威起来，竟命令熊剑东部配合“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偷袭上海郊区七宝镇新四军驻军，我指挥员顾复生等多人战死。

周的“行动总指挥部”，设在报司非尔路76号原汪伪特工总部。指挥部下属“调整室主任”，由军统降敌分子万里浪担任。

日本投降后，这帮汉奸都以“曲线救国”人物自居。而当时负责“肃奸”工作的戴笠，也乐于利用这帮人马，协助其“肃奸”和“劫收”，结果闹出许多以好肃奸的笑话。周佛海之事便是其中之一。

众奸戴上蒋政府乌纱帽不久，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已大批空运上海、南京。

周佛海把伪行政院及上海市府移交后，9月底戴笠亲赴周佛海宅，通知周佛海、罗君强（伪上海市公安局长）、丁默屯（伪浙江省长）等：“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众奸闻言，喜上眉梢。30日一早，欣然坐上去重庆的专机。

三天后，戴笠再度光临，对周佛海妻杨淑慧说：“周到重庆就病了，已送医院，希望明天你和你儿子带上看护，去重庆照料。”实际上周此时处境已与软禁无异。

时周佛海的次子周之友刚好来家，杨淑慧告诉儿子准备明日去渝。周之友把嘴一撇：“我不会照顾，我不去！”

戴笠满脸秋霜地说：“你知道，当我要什么人干什么事的时候，是没人敢回我半个不字的。”

周之友振振有词地答：“我不是你的部下，用不着执行你的命令。”

这个一向见官高一级、衣角上带刺的戴笠，岂容这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辩驳，登时以威相逼，“你不去？今晚非跟我走不可！”

一个不依，一个不饶，局面尖锐对峙，周之友的外祖母、母亲都吓哭了，

再三劝他还是去好。周之友也知道岂能拧过戴笠？便说：“去可以。不过我一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第二我要有行动自由。”

戴笠也见风转航，接口说，“所提条件，可以答应。只是我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你要换个名字，第二不许你看你父亲在重庆的老友。”

杨淑慧当场给儿子改名周祖逵。戴笠说：“现在我给你写封介绍信给毛人凤，到重庆后，由他安排你们。”

次日一早，杨淑慧、周之友和看护马小姐，便登机直飞重庆。

在白市驿下机后，军统总务科长侯桢祥开车将他们送到“中美合作所”特区戴笠住地杨家山，与丁默、罗君强会合一处。

次日早晨，杨淑慧母子去“四一医院”探视周佛海病情。周占用了三间病房，由南京跟来的两名副官陪同照料。医院伙食、医药均为上等规格。在美国医生精心治疗下，病势已见好转。父子相见后，周佛海第一句话就说：“不是我叫你来的！”

周佛海有两个儿子，长子周少海是前妻所生，中央军校14期毕业，本在胡宗南部当连长。周投敌后，被关在兰州。次子周之友，名幼海，为杨淑慧所生，曾留学日本。在沦陷后的南京，他结交了一些地下党员。对其父汉奸行径，一直引为耻辱，父子长期不和。

过了三天，周之友见到毛人凤，问对他作何安排？毛说：“戴先生来电，你的事由他回重庆后亲自安排，希望你安心等待。”周之友故意反问：“戴先生在信里，不是要你为我安排吗？”毛怫然作色说：“我只能按戴先生电报办事。”

又过几天，周佛海已病愈出院。一行人便由杨家山搬到白公馆软禁。

周之友与乃舅杨惺华住楼下左厢房，罗君强与周佛海的两名副官分住右厢房前后间。中间布置成客厅，摆了八仙桌和椅子，四周是藤椅和茶几，人或躺或立，可凭栏远眺。楼上左厢房前间由周佛海夫妇居住，后间住看护小姐和广东老保姆。右边前后间分别由丁默^堃和马骥良（伪储备银行秘书处^长）夫妇居住。

各房间家具齐全。顿顿鸡鸭鱼肉，八菜一汤。旧历春节，更酒宴丰盛。在这里，除不准跨越大门一步外，凡下棋、打牌、唱戏，甚至看《新华日报》，均可“自由”。

抗战胜利后，首遭处决的汉奸，是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1944年4月，接手汪精卫出任汉奸政府主席的陈公博，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等，均处死刑。

报上大字标题，大倒这群汉奸的胃口：从过去饭桌上的“风卷残云”，渐变成举箸不语，食不知味。周佛海更牵肠挂肚，心事重重，整天在走廊上看云看树，闷声不语。

胜利不久，在上海，戴笠陪同“中美合作所”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去看周佛海，谈话都通过翻译。到白公馆后，周佛海托看守买来英文字典，一度雄心勃勃，准备复习英文，将来好投靠“山姆大叔”。殊不知时移事易，金风乍起，木叶飘零，脑子里全为兔死狐悲之感所盘踞，周佛海可是连一个字也学不进去了。

4月底，周之友接到出狱通知。晚上，父子俩作了一次长谈。周佛海要儿子去美国念书，他说：“你妈给你的钱，足够你到美国去念书，还是到美国去好。”

周之友大声争辩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生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

要走自己选择的路了！”望着这长角的“羔羊”，周佛海只好耷拉着头，认输地说：“好了，人各有志，一切你自己决定吧！”

周之友出狱后，先去成都住了半月。接着和萧孟能回到重庆，设法买到机票，于6月初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他母亲已由军统押回上海，追缴遗产。周之友哪管这些家事，经过与地下党联系，月底，到了解放区淮阴。8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加入共产党。继受组织派遣，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在上海政法部门工作，现已离休。

周之友离开白公馆后，周少海火气更大，跟老头子狠狠干了几仗。周佛海受不了，向侯梅祥提出：“你把他送走吧，否则我一天好日子也不能过。”周少海就这样离开了白公馆。

蒋介石纵容、庇护汉奸的行径，激怒了国人。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1946年9月，蒋介石始令军统将周佛海等专机押返南京，关进老虎桥监狱，由南京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主审。11月7日，周佛海被判处死刑。他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仍维持原判。事情至此，按司法程序，唯有家属可提出抗告。不料农历年三十（1947年1月21日）下午，杨淑慧的抗告被司法行政部驳回。

从初审、宣判，到抗告，为保丈夫一命，杨淑慧不惜八方奔走，金条开路，找遍了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和军统首脑。她曾破费两大根金条托请庞炳勋、孙殿英、吴化文等六位投敌将领，给周佛海写了“于抗战有功”证明，可惜均毫无用处。

按蒋政府法律，抗告驳回24小时后，随时可拖出枪毙。杨淑慧无比惊恐，马上去找蒋的机要秘书陈方，说：“如果佛海真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陈方好奇地反问：“有什么办法呀？”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说：‘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字。但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因为佛海认识他的笔迹。这封信我早送到香港银行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被处死，请不要怪我撕破脸皮，将全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都将知道，蒋先生好话说尽，还是置人于死地。这对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道德和信用来讲，总不是好事吧！”

一番话，把陈方吓得汗毛倒立，赶紧出来圆场。他说，“蒋先生早说过，枪毙周佛海，不经他批准，任何人不能擅自决定。明天大年初一，我去蒋先生那里拜年，一定提醒他这件事。我拿头担保，周佛海不会枪毙，你回去好好过个年吧！”

大年初四（1月25日），杨淑慧去给陈方拜年。陈方告诉她说，他已把法院报批周佛海的公文压下来了，并已和蒋先生谈过此事，你可以一百个放心。”

当天，陈果夫弟兄又呈文给蒋，说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能按照政府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周密布置军事，胜利后使江浙西省不致陷入共党之手，不无微功。拟请……准予缓刑或减刑处罪。”

3月26日，蒋介石假戏真做，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特赦，改判周佛海为无期徒刑。

这出话剧远未收场。后周佛海在狱中生病，杨淑慧又动脑筋想保外就医，沾上一个广西籍国大代表马某老婆的路子。此人是个巫婆，住在豪华的安乐酒家，家中设坛治病，杨淑慧曾为丈夫向她求过香灰面药。

这天，马巫婆压低嗓门，神秘地说：“我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如果你肯出40根大金条，她有办法使你丈夫保外就医。”

杨急于知道：“他究意是什么人？”

马显出更加神秘的神情：“是陈小姐。”

当时南京城里，正盛传着陈洁如回国抢夺第一夫人位子的事。杨听后大吃一惊：“你真认识这位陈小姐？”

“当然认识。”

“你要能介绍我和她见面，由她当面向我谈清，她能让老头子答应周佛海保外就医，40根金条我保证不少一分一厘。”

马巫婆采取关门战术：“那怎么行，人家和老头子的关系，在外面是绝对保密的。你和她见面的事万一传出去，问题就闹大了。”

从马家出来，杨淑慧赶到监狱，把这桩没做成的生意，说给周佛海听。周佛海既不相信事有可能，又担心拿不出这么多金子。

杨说：“卖点首饰，东凑西凑，或许能凑足40根条子，问题在于到底是真是假？”

周佛海为官20余年，可谓长袖善舞，搜刮有术。虽上比“四大家族”不足，却下比省县官员有余。胜利后，据中央银行国库局查抄汉奸财产登记帐册，周家保险柜共藏黄金91条，计910两。各种金戒指52只，价值黄金335两。翡翠项练2串，上缀大小翡翠103粒，价值黄金335两。连同翠镯、白金钻石圈、珍珠等，总值黄金1858两。另外，尚有美金8万元，以及名贵印章、字画。这就难怪杨淑慧不把400两黄金当回事。

隔了两天，马巫婆找上门来问杨，拿定主意没有？此时，杨既怕失掉机会，又怕上当受骗。想了半天，来个折中。提出先给20根，余数待事成后再付。

马故意装神弄鬼，说等回去问明对方，再来回话。晚上，马来表示同意，讨了20根金条去。

不出一个星期，一个自称军统军法处的特务，来找杨淑慧调查此事。杨矢口否认。以后马巫婆也再三叮咛她：千万要顶住。

这军统法官隔天就来，催逼甚紧，谈话中隐隐约约，主动道

破了事实真象。临走，恶狠狠地说：“明天我再来，万一有其事，你得负责！”

这下，杨淑慧可吓破了胆，忙找马巫婆。马也慌乱起来，把真话都吐露给她：“所说那陈小姐，其实是毛人凤老婆，想利用你保外就医心理，敲一笔竹杠。这两天来的法官是郑介民派的。”

毛郑两人是对头，郑介民想利用这事来搞毛人凤。毛人凤老婆要我告诉你，只要标一口咬定没有这事，她愿把金条还你，军法官拿你也无法。”——仅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戴笠死后，军统内部以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分为头领的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为争权夺利，激烈倾轧的情形。

杨淑慧依计而行。第二天军法官来了，她不但抵死赖掉，且当面具结，为的是取回20根金条。

1948年2日，周佛海病死狱中，结束了这卖国巨奸的一生。

